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九 2023.05

小鸟

一根布条和我的第一次“田野” | 田野中国

张海律 《哈萨克斯坦雪原，祖辈离开，晚辈归来》 | 非虚构图书馆

刘雨萌 《漂浮水母幻症》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内森·英格兰德《杂技演员》 | 故事群岛





小说

-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5 漂浮水母幻症 刘雨萌
第二回 | P11 华北瀑布 岳凯强
故事群岛 | P21 艺术人生 海伦·加纳
P25 杂技演员 内森·英格兰德
发现经典 | P37 “就从我住的这个镇子开始吧，这就是阻止战争的办法” 菲利普·罗斯

非虚构

- 非虚构图书馆 | P59 哈萨克斯坦雪原，祖辈离开，晚辈归来 /
P73 亚马逊断章 张海律
田野中国 | P81 一根布条和我的第一次“田野” 陈雯琦
P91 李汉超的世界，从世界地图开始 /
P97 《一九八四》重要吗？ 伊险峰
发现经典 | P103 1968 年的第一个星期 马克·科兰斯基
P113 让 – 保罗·萨特的完美的毛主义时刻 理查德·沃林

档案

- Newsletter | P135 BuzzFeed 和 Vice 倒台，为什么数字媒体这条路总是走不通？ 张依依
P141 到 2070 年，日本人口预计只有 8700 万 Snufkin
发现经典 | P145 “我是不会转身离去的那个人” 马丁·艾米斯
P151 收聚到桶里的雨 苔丝·加拉格尔

专栏

- 驾驶我的车 | P155 我们走在大路上 沈非
斯嘉蒂的眼睛 | P163 你知道雪地女王是谁吗？ 刘天
接力访问 | P167 037 郭睿：不做记者之后，她选择做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
P171 038 潘赫：这个世界对内向的人越来越不公平，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 /
P177 039 思邪 & 月亮：我们从创伤出发，有了交流的动机 /
P181 040 葛宇路：我是一个个体户，我生产一些观念 /
P187 041 孙大肆：2020 到 2022 年，我和上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P193 042 曾嘉慧：你有没有想过，流亡意味着什么？ /
P199 043 荷花：在广州，做一个马路裁缝 杨樱、伊险峰



题图为电影《脸庞，村庄》（2017）剧照

小鸟问答 Vol.29

小鸟 | 小鸟问答

看到更多可能之后，我们决定创造更多可能

i

纯净。

这一卷“24 小时文学聚会”会有一篇小说，《漂浮水母幻症》，担得起纯净这个词。写校园生活，但没有写暴力，没有性，没有师生间冲突和青春期叛逆，它就是写一个女生对友谊的困惑。不是说写前面那些就不纯净，也不是说写前面那些的都是在做噱头，我们仅仅是想说，哪怕不依赖于戏剧化的冲突，仅仅靠控制文字本身，就能达到让人屏住呼吸的效果，是一种能力。

“田野中国”有一篇文章，《一根布条和我的第一次“田野”》。作者陈雯琦，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人类学硕士在读，这是她的第一次“田野”。看完文章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她会为田野二字加上引号。严格来说，这是一个从艺术装置生发开去的观察，而这篇文章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建立在观察上的思考和共情，尤其是后者。学术阐述依据某种框架，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处（从“绑”的隐喻出发，重新审视在持续分化和撕裂的社会关系废墟上进行社会修复和联结的可能性及多样性），难处在于脱离学术框架之后，要如何表达你最为重视的部分，而你重视的又是什么。从文学性和公共性的角度，这篇文章都值得一看。

ii

“田野中国研究助理”招聘截止，但你会看到更多

我们借着招聘研究助理，陆陆续续与十几名人类学和社会学年轻学者交流。他们会说自己正在做的田野，对公共写作的困惑与热情，对专业本身的困惑与热情，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谈论走出学术和专业之后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学科研究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公共性，为什么在一系列的研究之后，那种本应让更多人感受到的公共性反而消失了，成为了图书馆资料或者学分凭证？

我们遇到了太多很好的应聘者或者潜在的合作者。从年轻的本科生到已经功成名

就（但还没有找到学院派最合适机会）的博士后研究者，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想法，或称之为需求。这些也启发了我们要为此做一些事的想法。

小鸟关于“田野中国”的更多设置目前正在筹备当中，目前我们可以说的是，它不光是文章——当然内容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可能更希望做的是提供一种可能，在学术框架之外，大家一起来做点什么。

iii

对于小鸟文学眼下的工作来说，拓宽我们非虚构的视野。我们为此蠢蠢欲动。

我们以前提过这个“自愧弗如”的发现：来自于学界的写作者，他们通常有更谨慎和专业的方法论做田野调查支撑；他们有基于方法论的更长久的观察，不论是对某个地域、某类人或者某类社会组织方式；他们与传统的非虚构写作者相比，更不容易被现实热点所摆布，虽然我们知道热点的报道于我们这个社会是更稀缺的。

后来做“接力访问”，知道大家基于社会现实做了很多事情，哪怕只看文字输出的部分，也有相当多的“非虚构”可以挖掘。准确说，只要“看到”，“记录”就是顺手的事情。但如果只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在那些理论上应该职业“看到”的人里寻找，到目前为止，失望要远大于兴奋。

所以蠢蠢欲动的是，我们会在晚些重新公布“非虚构招募计划”。

有知情者一言以蔽之，小鸟也打算做一个“水手计划”，这是单向街公益基金做的一个项目。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为更多人提供写作和观察社会的合作机会，那是小鸟的荣幸。

iv

这一期的“非虚构图书馆”，一个“中亚古拉格”的故事。

作者张海律，是媒体从业者。媒体出身的作家进入旅行文学的时候，似乎更愿意强调文学，总是急于与采访脱钩的样子，目的地本身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还和一个朋友交谈，他本身也是旅行文学写作者，他就认为，旅行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至于其中的现实关怀和思考，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标准令人困惑。无论如何，“目的地”这三个字本身包含的目的是作家写作的缘由。

以我们的理解：

——作者看到了什么；

——作者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作者的发现对于作者自己意味着什么；

——作者的写作对于读者意味着什么。

这四个层次尽管不是衡量作品价值的体系，也不是逐级递进的线性要求，但是旅行文学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才能开始自己的写作啊。

这也是我们觉得《哈萨克斯坦雪原，祖辈离开，晚辈归来》的价值所在。

依照惯例，张海律还选择了两篇旧文，都是旅行文学，“目的地”分别是亚马逊和苏格蘭。

v

从记忆进入历史

我们还是在意于更多的个人记忆叠加起来，他们的旅行记忆和旅行观察叠加起来，更多的人在写更多的文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记忆变成历史。

哪怕在当地，某些记忆是不被允许的，但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有机会保留，就可以让它变得扎实而可触摸。蒂莫西·施耐德在他著名的史学著作《血色大地》中说：

1930 到 1940 年代的暴行，正逐渐从历史中淡出，换上了名为“记忆”的外衣。如果继续把谈论当成禁忌，我们就会在缺乏描述与解释的无知情况下“纪念”那些自己从未参与过的事件。没有历史的记忆，终将逐渐化为遗忘。在《血色大地》刚出版的时候，书中技术的大多数暴行都还没有写进历史，都还鲜为人知。就连最有名的犹太大屠杀，也开始被从历史中抹去，改写成社会上的文化记忆。

历史一种

与朋友一起聊天，提及 2022 年因为回国、旅游、在上海、出差等原因在广州、海南、上海、新疆等地的隔离经历。从巴黎回国、挑选在广州落地隔离的朋友说：“那个年代真是太疯狂了。”

我觉得很震惊，一是这么快就进入历史叙事，二是这年代明明还在进行当中啊。

我们无时不在历史当中——这个大家逐渐有了共识。但我们还要有能力记录历史，或者像施耐德所说，真正把文化记忆写入历史。记忆是个人的，文化记忆是有禁忌的，但历史不会。他说，“俄国还可以明订‘记忆法律’，利用犹太大屠杀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禁止任何人批评斯大林。他们的逻辑是，犹太大屠杀是绝对的至恶，所以凡是批判苏联罪行的，就是在变相声称犹太大屠杀没那么邪恶。当犹太大屠杀变成一种象征，它就脱离了历史。二次大战始于德苏联手入侵波兰，犹太大屠杀也源于先后被苏联与纳粹占领的那些土地。当俄罗斯人不再能讲出这些事实，他们就不再能讨论犹太大屠杀。”

本卷封面小鸟：

灰头绿啄木鸟，据说叫声像有人在笑。

联系我们：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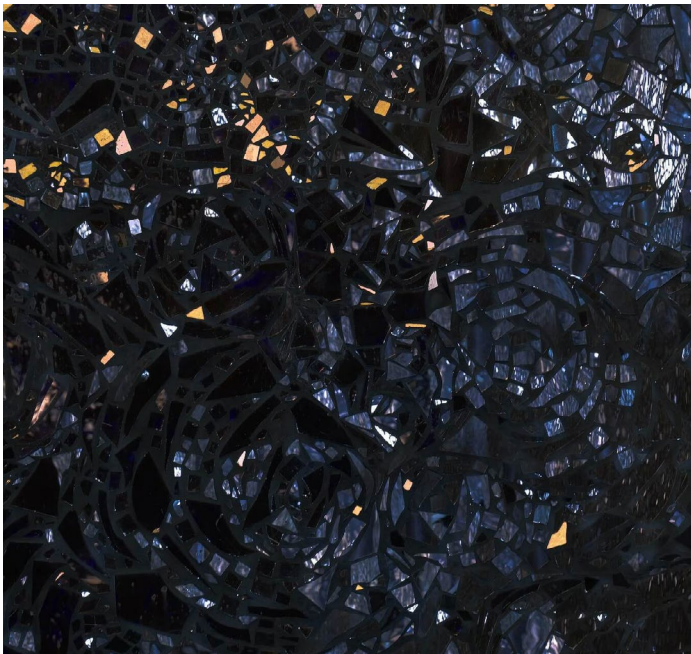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Viktor Talashuk](#) on Unsplash

小说

漂浮水母幻症

刘雨萌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知道它们会来，
这是我十五岁时唯一确定的事。

夏天到来的第二个周，我开始和新倒垃圾。

两个人抬着蓝色的垃圾桶，下两层楼梯，经过一排树和一片空地，走到操场边的垃圾池。去的时候，阳光直面打来，我和她都不开口讲话。回时我们背对太阳，两条影子被钉在地上，怎么也走不快。我有了一点想说话的欲望，就问她：“你想不想去教学楼对面的那座山。”她转身看山，却被阳光啄得睁不开眼睛，整张脸皱成一张纸团。

“这周没时间了，下次再看吧。”

我点点头，一般说下次的，就是不会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把视线集中在眼前的一处空气，静静等待水母出现，我知道它们会来，这是我十五岁时唯一确定的事。

我不记得水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们出现以后，就再没消失过。课本上的字、教室里的桌椅、窗外的树和山、包括空气，只要我死死盯住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漂浮的透明水母。它们缓慢而有节奏地游移着，纹路和眼前的世界不同，所以能被我认出来。直到双眼睁得酸痛，水母才在没有克制住的眨眼间猝然消失。

新问我怎么走得这么慢时，我正等待最后一颗水母走远，没有及时回应。她以为我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于是认真地补充道，放心吧，说话算数的。

新是我的同桌，齐刘海，头发不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她走路的背影总是左右摇晃，像河流上的船，虽然脚步和其他人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把视线转移到上半身，她永远一晃一晃的。这件事也有好处，在所有学生都穿校服、所有女生都扎高马尾的校园里，我能远远地认出她，就像从森林里认出一只企鹅。

我们做同桌的第一天，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道题选 A 还是选 D。我看了一眼她的练习册，她正指着第四题，我说选 C。新露出很为难的表情，在草稿纸上沉默地演算着。我用余光看到她依然算出 A 的答案，接着在练习册写下 C。倒数第二节课，她用笔戳了戳我的胳膊，“第十六题选什么啊？”她问。第十六题和第四题是同一种题型，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她讲了做题方法。

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不喜欢给人讲题，新是我的同桌，给她讲题似乎没什么不对，新不会因为几道数学题就变成我的朋友，我也明白。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大家都有朋友，唯独我没有，但因为没有朋友的人是我，这件事又不那么奇怪了。我总是一个人到学校，一个人去食堂吃饭，放学后一个人回家。直到第二个学期，班上转来了一个同样沉默寡言的女生，倩，我几乎以为她能成为我的朋友。

在小学，我认识的四五个女生的名字里都有倩这个字，现在我又遇到了。这个倩有一种文静的气质，笑也是恬的。她极少说话，仔细想来，我竟没有关于她声音的记忆。有一次，我在年级办公室问老师化学题，她也在那里，岌岌可危地站在靠墙的办公桌边。班主任用一种很急切的语气对她说：“越是自闭症，越要说话啊，想到什么就要说什么，不说话怎么好起来。”化学老师讲了什么，我没听进去，只好不断点头。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假装没看到倩，但我看见了，她脸上画着和往常一样的笑，这笑比哭更令人难受。第二天，我发现我也开始笑了，在食堂和倩四目相对，我意识到自己不知所措时，我已经在笑了。

下午去倒垃圾，我和新说起朋友的问题。我问新，“你知道人是怎么变成好朋友的吗？”新有点讶异，似乎想笑，但看我不像在开玩笑，也认真起来，“先做朋友，朋友做久了就慢慢变成好朋友了。”

“我觉得你有好多朋友，我不知道怎么把别人变成我的朋友。也许我已经完全卸下防备，倒了这么多次垃圾后，我几乎能对新说一切话，而且我相信她不会告诉别人。

“你想和谁交朋友吗？”新问我。

“我觉得我能和倩做好朋友。”

“这个嘛，我也发现了，但她对谁都笑，你好像只有看她的时候才笑。”

我无奈地仰起头，“我不想笑的。”

“笑一笑没什么不好，你总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偶尔有人叫你，你也不答应，板着脸很难交到朋友的。”

“为什么喊我名字我就要答应。如果有重要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这样更节省时间。”“你不答应，别人怎么往下说啊。”

新不再用淡然的语气，我感到这是坏话长期累积的结果，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了，说不定新也是。我不想再听下去，故意看向别的地方，用力地说，“反正万怡也是我的朋友，我不需要和所有人都做朋友。”

“万怡？她和班上每个人都是朋友。”

我没有话可说，盯着操场对面的山不放。新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没有说下去。但我知道话还没完，而且后半句更糟。过了一会儿，新又向我搭话：“你还想去那座山啊？”

“不然呢？”

新不再吱声，仿佛是中间的垃圾桶拉着两个人往前走。

一只，两只，水母缓缓地从右上方移到视野中央，我往下看，它就往下沉，尽管我看不清水母在走路还是飞行，我确信它们是一步步位移的，每一步的距离都很接近。水母为什么可以随时随地地出现呢，我想过许多原因，其中最可信的假设是：水母住在我的视网膜上，所以它会随着我的目光跳跃。当我在作业堆里写到手指酸痛，水母就从桌角游到书本中间，我用目光牵引它们移动，以此打发枯燥的夜晚。水母不会说话，但它们的样子从不重复，有的像哭泣的人脸，有的像睡着的婴儿，透明的纹路能勾勒出任何形状，沉默也就无关紧要了。

妈妈告诉过我，有太多话想说不是什么好事，喋喋不休的人会让大家讨厌。学校里的事却相反，不主动交流就会被当作另类，课间的废话成了健康的一种证明。我和倩都多吃力啊，要是能变成水母就好了，想不想说话，都是健康的。

我没有把办公室里的对话告诉别人，倩肯定不想让人知道。不过我很担心其他人发现了，倩会以为是我说的。上课的时候，我顺着看黑板的方向，瞄到倩坐得笔直，完全是认真听讲的状态。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暴露，就连在走廊上遇到时，她也只是和往常一样对我笑笑，也许倩没有在办公室看到我？

自始至终，我都没办法向倩说话。我和新可以在倒垃圾的路上聊天，因为我们是同桌，

我和万怡偶尔一起去食堂吃饭，因为她来找我一起吃饭。我和倩呢，她坐在第一组，我在第四组，距离上没有任何优势。况且，就算我找她，我该说什么呢，她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我总不能去问她叫什么，住在哪里，会看见透明的水母吗。

倩恬静地笑，我也挤出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的笑容，这就是我们全部的交流方式了。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衣服从卫衣变成了棉服，我会感到时空一直在重复，就像回到六月，那时她一直穿白色长袖和粉色外套，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其他的衣服。我想和新确认，又觉得这个问题很冒犯，只好通过自己穿的衣服来判断时间有没有重复，还好，我每周穿两套不同的衣服，倩虽然没有变化，我却不一样了，时间仍是往前行驶的。

要是能变成水母就好了，想不想说话，都是健康的。

物理课上到电路图的时候，我和倩终于有了一次接触。那天学习的内容是电路实验，要用并联和串联两种方式组装电路。轮到并联，我的小灯泡没有亮，直到放学铃响起，我都没找到其中的错误。帮老师送实验器材回去，我问她可不可以让我借一套回家，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清。老师很高兴，借了两套电路材料给我，建议我同时组装两种电路，对比更明显。

我抱着盒子回到教室取书包，发现倩还没走。她看见我手上的东西只是一瞬间的注意力，就不再关心了，反倒是我很不好意思，解释说今天的实验没做好要回去再练一练。她点点头，“嗯”了一声。教室里没有其他人，我看她还正在收拾书包，就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你觉得今天的电路实验好玩儿吗？”倩有点尴尬地笑，回答我说，她并联的灯泡没有亮。我激动地告诉她：“我的也没亮。”倩张开嘴笑了，我第一次见她这么开心。

“你要不要也拿一套回去试试？”我问倩。

“可以吗？”她问。

“当然可以了。”我从盒子里取出一套配件，装进书包内袋，再把剩下的那套零件摆好，电阻和电池放在左边，插线和灯泡放在右边，然后关紧盖子，递给倩。她说谢谢，我不谢。我故意放慢整理书包的速度，不料，穿着粉色外套的倩向我说完拜拜，就走了。我自然也说了拜拜，还朝她挥了挥手。除了礼貌，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倩却比我更早，她仍穿着粉色外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她一点儿都不喜欢粉色。电路实验的箱子已经放在我的课桌上了，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谢谢。两个字方方正正的，都很瘦小。我打开箱子，左边是电阻和电池，右边是插线和灯泡。

我想了一早上，忍不住问新，新却一副嫌我大惊小怪的样子。“这有什么，可能是她组装完了，然后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好。”

“可是，不可能连线的形状都一模一样。”

“你把每根线的样子都记清楚了？”

“……这倒没，我记得一些，但我不确定。”

“那不就行了。”

我不再反驳新，可我也没完全信服。去实验室还器材时，我又组装了一遍电路，和昨天在家里做的结果一样，两只小灯泡同时亮了，只是在白天，灯光平淡了些。我正要关掉，水母的触角突然从小小的钨丝上伸出来，浮现出的身体露出捕猎的异样。我知道它们在陪我，放心地关掉灯，水母随着发光的轮廓消失在空气里，我拔线，把配件一一收进盒子。答案是什么，我早就知道了。

初中生活过去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想说话的人在早操的时候是最尴尬的。当所有人都在和朋友聊天，然后站在一起，我就成了最多余的人。这件事不比吃饭或者放学，吃饭时可以盯着碗，放学后全力跑回家就行了，做早操能看什么呢，周围全是人，我只好看操场对面的山，以及山顶上树的形状。

大概是看了太久的山，我发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秘密。比如，树不是突然变绿变黄，而是像长出手臂或者双腿那样，由现在的变化一点点蚕食掉原来的模样；树和树的关系也不简单，起初两棵树间有一段距离，后来叶子长多了，它们像朋友一样牵着手，直到逐渐穿过对方的身体，呈现谋杀的意象；树的颜色往往和下雨有关，但雨是透明的，它不能通过颜料的形式给树上色，只好让整个世界沉浸在振动中，连最小的一厘单位都在抖动，眼前的世界仿佛要碎掉之际，雨又一针一针地把它缝起来，复原后的山就呈现出更深的绿色。

树永远看不完，但我还是对这座山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整个学校的人都对着它做操，它又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国旗下的讲话一结束，我就飞快地跑出队伍。不用回头也知道，

这时操场上的人像一盘四散的滚珠，而我是最快的那颗，山如果在观察人群，会第一个看到我吧。

我总是第一个写完作业，第一个跑回家，尽可能拿下更多的第一名，好像这样做，生活就会以某种安全的姿态保持前行，我会永远和新一一起倒垃圾，永远保护水母的秘密。但我没想到的是，倩突然退学了。

倩不见的那个下午，班上的人都在写限时交的数学作业，偶尔的低声交流关于二次函数，借块橡皮什么的。我的作业早就写完了，新的自然也在几分钟后写完。到了倒垃圾的时间，新拉开门，我无意中回头，在课本资料堆得比后脑勺还要高的教室里，倩的桌椅空空如也，非常独立，也非常孤单。

我和新提着垃圾桶走向操场，路边的树已经枯成雕塑，带着斑点的黄褐色树叶落在花坛边，每个坛子都满满当当的，像老年人的烟灰缸。我望着那座山，它的颜色冷褪了，只有垃圾堆是花花绿绿的。

“快冬天了，看来我们今年没法爬这座山。”

我知道，新这是示好的意思，但我不肯饶人：“如果你真的想去，我们上上个月就去了。”新不回答。

“你觉得倩还会来上学吗？”我问。

“不知道。”新说。

冷风把剩下的话掠走，我感到自己的手正在变僵，新的左手也冻得发红。我停下，新以为是要交换位置，于是我们换了一边，我用一直塞在衣服口袋里的右手拎桶，新刚好把她的右手团进上衣口袋。不知不觉地，我和新都走得更快了。

水母仍不分季节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尤其是准备考试的时候，眼睛累得透不过气，水母却安然无恙地漂浮着，散漫地出现在字符之间。它们似乎格外喜欢语文试卷，作文纸的格子里常常涌出五六只水母，有时候还会惊现我从没见过的巨兽，它倨傲地盘在桌面，我连试卷都看不见了。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在晕眩中起身跑到另一栋楼的楼顶。

这种一瞬间失去视觉的感觉让我几乎要咧开嘴大哭一场。我会失明吗？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努力镇定下来，不停地寻找地面上的人，数一、二、三……就像小时候妈妈做的那样，三个数之内就不能哭了。视线最终停在一件蓝色衣服上，蓝点朝着操场的方向不断移动，变成一条闪烁的短线，急速地上下晃动，马上就要划过山腰，触到山顶的那棵树。我擦干眼泪，看清楚那是去上体育课的，穿着蓝色运动服的人。

雨后的空气湿冷，我的肺最先镇定下来，眼睛才慢慢看清周围的事物：灰色的云和砖红色的房顶，学校大门两侧是行政楼，和教学楼隔着一片空地，上面有四张乒乓球桌。一切都被无形的手放置好了，连移动的人都在这个坐标系内，我突然感到一种憎恨的心情，希望那只透明的巨兽再次出现。

回到座位上，我收到新的纸条：你怎么了？

我把脑袋埋进双臂，思考要不要把水母的秘密告诉新，其实倩会更理解我的，可她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想到实验室里灯泡的微渺亮光，我整整一节课都没办法把头抬起来。

作文纸的格子里常常涌出五六只水母，有时候还会惊现我从没见过的巨兽

下午，我和新提着蓝色的垃圾桶，经过两层楼梯，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新不时看看我的表情，我只留心地上的积水，绕过它们。

“我想给你说一件事。”我对新说。

“你说吧。”新摇摇晃晃地走过一小片水洼。

我看着新的眼睛，说：“我能看见透明的水母。”

“在哪里？水族馆吗？”

“不是，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就在我的视网膜上。”

新立刻放下垃圾桶，凑过来看我的眼球。她先和我四目相对，我同意后，她又用手指撑开我的眼皮，连眼睑都看了一遍。“没有水母啊。”

“我不知道怎么让你看见它们，它们是透明的，但是纹路和眼前的画面不一样，而且它们一直在移动，就像光斑。”我努力向新解释清楚，不知道她能明白多少。

“它们是透明的？那你怎么看清它们的纹路呢？”

“比如我现在看到的这条路，整张画面是平滑的，但如果有水母在，它在的地方就是不

平滑的”，我伸出手指比划，“假如世界是一横一横的，水母的纹路就是竖着的那一个，就像世界的皱纹一样。”

新好像听懂了，但疑惑的神情压过了惊奇，问我，“水母会不会影响你看东西？”
我不情愿地点点头，“把桶拿上，边走边说吧。”
我把早上的事情说了一遍，新更担心了，“透明的，有点像光斑和阴影，一直缓慢漂移？”
“对。”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我妈妈就在眼科。”
我有点生气，“水母是我的好朋友。”
“你都被它吓哭了。”新捏紧桶沿，把垃圾倒进池里，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融进更浓的腐烂，我们提起空桶就跑，到了空气好一点的地方，我才回答她，“早上看到的又不是水母。”
“但它也是透明的，你能看见的东西。”新用手充当扇子，用力驱赶最后一点臭味。
我很难反驳新，也许她是对的，但看到水母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后来，新偶尔询问我的眼镜度数，似乎想间接打听水母的情况，但她终是没有直接问。毕业典礼的时候，新和我约定爬上操场对面的山。她说，只要有一个人记得，下次就是真的下次。我问新具体什么时间，她露出一种阴谋式的微笑，又很笃定地说，高中的第一个假期。之后，伴着年级主任的讲话声，新趴在我的膝盖上睡着了。
很长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也许我说出来的，不只和对方感受到的不同，和事情本身都截然相反。但新趴在我身上睡着的那刻，我突然觉得，人与人之间也不是完全无可救药，倩能发现这点吗，我多希望是。

水母依然每天出现，轻飘飘地游荡在陌生的高中里，比一切明天都要可靠。只是不像水母的透明物也越来越多，我好几次都因为它们看不清笔记本上的字，有时候闭几分钟眼睛再睁开，还是会看见庞大的阴影。高中的课本经不起打断，在早上看到十二次花纹迥异的透明物后，我去了医院。
经过圆形小孔里的红色风车、测眼压的风、视力表和遮挡眼睛的勺子，以及一些眼底检查后，戴眼镜的医生确凿地说出三个字：飞蚊症。“浮动的光斑和阴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她把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点头。“这种情况就叫飞蚊症吗？”我又问。
“对。”医生熟练地敲着键盘，诊室里能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
我接过刚打出来的病历单，走出医院，最后一行字是在公交车上看完的：若眼前黑点突然增多、视力下降、视物遮挡，随时就诊。我把诊断说明又看了一遍，还是不懂，接着看第三遍、第四遍，用手指指着字看，直到辨认不出任何方块的形状和意义，眼泪才一滴一滴掉下来。无论如何，我想不到，事情竟是这样。

这些症状都无关紧要，病的名字比它本身更能打击我，它被打印在纸上的那一刻，我三年的生活变成了笑话。我笑出大把眼泪，笑这件事情竟没有商量的余地，它就叫这个名字，而我死也不会同意，我不想和这三个字产生任何关系，就好像一承认它，我看过的所有水母都会变成蚊子。
水母永远是水母，这是我唯一确定的事。

放假后，新给我打了电话，我没有表现出惊讶，反倒让她意外。第二天，我们在约好的路口碰头。新走来的样子像一只慢吞吞的企鹅。
“你回来了，在外面上学怎么样？”
我摇摇头，新笑了。我们顺着公路往上走，阳光很温和，坡不太陡。
“你在高中有玩得好的朋友吗？”
我认真回顾了一遍认识的人，说没有。他们学习很认真，有时候打游戏，但我不喜欢打游戏。
“那不正好吗，我感觉你只对学习感兴趣，你们学校有三年都是全市第一，很适合你。”
我摇摇头，“高中比初中累，生物要记的太多了，我可能会学文科。”
“我肯定学文科，数学太难了，但文科要记的东西也很多。”
一路上，新漫无边际地讲着，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一件件跑得越来越远。这大概是她把我当老朋友的表现，我专心地听她讲话，这比想象中的感觉还要美好，即便她说的种种小事，我早就见过了。新说到她和初中同学还有联系，几个要好的朋友就在他隔壁班时，我尽力微笑才咽下心中的羡慕，有朋友多好啊。

走到半山腰，操场从脚下的视野里冒出来，我才发现，学校对面的那座山和我们身处的山是连着的，我们走错了上山的路，但毫无影响。眼前的位置可以看清整个学校。我和新找到干净的空地坐下，俯视着模型一般的初中校园，操场比记忆中的小很多，一个人也没有，

旁边的教学楼像积木。“对了，你还记得李倩吗，她现在和我一个班，人变得开朗多了。”
“那太好了，我当然记得。”
“她现在还追星呢。”
“啊？”
“对啊，不过和我喜欢的不一样。”
我歪着头，似乎所有女生都在高中后迷上了某个明星，这让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喜欢明星呢？”我问新，仿佛回到了和她倒垃圾的时候。
“开心啊，总要喜欢点什么的，你也有喜欢的人吧？”
“我喜欢猫。”
“谁不喜欢猫！”新不屑地说，我反而笑了。
时间就这样轻轻地停了下来，谁都没有接着说话，新和我坐在原地，还有风，一切都是安静的。

我不知道新是什么感受，从我的角度望去，学校像一盘没人下的棋，到了开学的时候，操场又会重新挤满棋子，那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不知道山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我还记得新和她的朋友们在体育课上说笑的样子，每个女孩都吵吵嚷嚷的，一连串的笑声里，新远远地看见我，那眼神仿佛在说：过来吧。而我一直没能走入她们，不知道为什么。
“不往上再走走吗？”新问。
“走吧”，我起身，拍掉身上的草叶，“你还记得我高中跟你说过的水母吗？”
“记得啊，你现在有觉得好点吗？”
“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去医院了，结果还不如不去医院，反正也不严重。”

新似乎在掂量如何安慰我，我正想告诉她那段难熬的时间已经过去，新开口说：“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我怕你眼睛有什么问题，回家问了我妈，她说这叫飞蚊症，可能是你学习太用功了，用眼过度。我想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就没和你讲，飞蚊症多难听啊，你肯定不会喜欢的。”
我懵在原地，阳光正好从新的肩膀边穿过来，落在我的衣领上，一年前的影子和现在的影子重合在一起，我和新不知不觉地站成两棵树的形状。
我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对啊，还是叫它水母吧。”



刘雨萌

生于 2001 年，喜欢铅笔，讨厌昆虫。最喜欢的画家是安野光雅，但脸上的表情总是奈良美智。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周六见。



题图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华北瀑布

岳凯强 | 第二回

一滴雨，
就是一个小型瀑布。

华北瀑布 1 号

*

我有这样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件可以称之为“记忆”的东西，作为 1 号记忆，它现在应该储存在海马体最深的那道褶皱里。它是这样一个场景，就是醒后发现屋外有人在活动，衣服摩擦，脚步移动，以及某些直系亲属低声言语，这一系列低分贝的悉索，混杂着模糊的光，让我感觉一切都很远，很淡，疏离到让我感觉好像我并不属于这里，于是开始挣扎，挥舞着刚成型的四肢，哭，我有逃离的冲动，但没有逃离的能力，于是只好保持着这份矛盾的伤感，直到有人向我走近。

但我也已经记不清那个人了，他或她的面容模糊，但携带着全世界向我走来。于是，在这与其说温情，不如说科幻，或兼而有之的 1 号记忆场景中，我被抱了起来。借助他人之手，我对这个世界熟悉起来。拥抱代替了伤感。

华北瀑布 36 号

*

五岁看西游记，把棒子塞进耳朵的孙悟空感染到我，于是也学着把黄豆放进耳朵。我没长成一粒豆苗，要感谢医生。现在偶尔耳鸣，是轰轰隆隆的瀑布声。

华北瀑布 33 号

*

这个是被我称作“跳山”的私人游戏：从一块梯田，跳到另一块梯田上，直到跳下整座山坡。当我像蚂蚱一样跳下一座山，完成这项在当时的我看来了不起的壮举时，四下通常

无人，这让我倍感失落，于是从裤兜里摸出一只塑料打火机来庆祝。

北风猎猎，草木成灰，秋天，一个孩子。

有几个秋天，我站在山脚下，目睹一整座山在燃烧。

华北瀑布 8 号

*

初中以前，甚至很多年，我都有私人理发师。

王天火，我姥爷，本职教师，业余洗剪吹，他不锈钢剃刀上的寒意，常常让我哭泣。现在他宝刀未老、身体健康，他还没死，我就对他充满怀念。

我对很多人都有这样不礼貌的感情，他还没死去，我就对她充满了怀念。

华北瀑布 25 号

*

那个村后来怎么样呢，它那么干旱，唯一的井里，跳进去一个女人。

后来村民们就收集雨水，所以我是一个吃雨水长大的人。

王天火这个名，据说是因为他出生时房顶滚下来的闪电球，把草房给点了。后来他改名王天和，希望老天对他和气，不要发火。我是被这个闪电击中的男人的女儿生下的，她多病、易怒，我后来就吃雨水长大，所以后来，和雨的关系比和她更近。

华北瀑布 24 号

*

村子很穷，后来我一直对它进行精神上的扶贫。又因为闭塞，所以很多年来，它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样貌，直到最近一次回去，我发现它被一条高速公路刺穿了，山石裸露，如同新鲜的伤口，那里曾是我上小学的地方。

学校里有戏台，后面是个石膏厂，石膏厂旁有颗歪脖子树，我曾倒挂在上面，为了止住我那时过于频繁的鼻血。

没有一本教材叫《华北瀑布》是这里唯一的遗憾。

后来上的初中，现在已经做了楼盘，叫做学府花园。勾机后面的瓦房是宿舍，最后一次进去满地树叶，也不知这些树叶，是不是当年同一棵杨树上的。

那个操场倒是还在，风也还在，只是“他”矮到操场的尘埃里去了。

被当时的自己打了一耳光，我就离开了那里。

华北瀑布 30 号

*

如果我们年轻时遇到过，后来你又因为种种原因离开，那么在我心中，你应该是永远年轻的。

那些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人，在我的记忆里总是永葆青春。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他的脸了，但奇怪的是，我还记得他的粉刺，那种青春期的花朵，盛开在记忆中失焦的脸上，因此显得更有些刺目了。

那天，他是来借宿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宿舍隶属学校，但又不在学校，和学校隔着一条马路，所以老师很少过来查寝，因此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留宿一些同学。而在这其中，混杂着一些不良少年。但他算哪种，我到现在为止，也并不能完全能够说清。

总之是，这些人不想，有时是不能回家。也正是叛逆的年纪，刚被网吧老板赶出来，或者身无分文走出台球厅，像条野狗无处可去时，就会来找我们，我们这里相当于他们的收容所——虽然事实上，据我所知，我们的宿舍以前是一个肺结核医院。现在想来，那个地方确实奇怪，经常感觉是住在一个巨大的肺里，每天被吞进去吐出来好几次。

他们来的时候，就敲敲我们的窗户。有一天，他也来了，也敲敲我们的窗户，我们就开了门。

他进来也不客气，自顾自地坐在床上，郑重地给自己点上一根烟后，才开始介绍自己，说是谁谁谁的同学介绍他来的，然后吹嘘结交了哪些朋友，做过哪些大事，总之是把自己伪装成道听途说的一部分，想借此换得一晚留宿。

后来他说的我们都困了，他也打起了哈欠，然后他掏出小灵通看看说不早了，就开始自顾自地脱衣服。

先是上衣，然后是裤子，然后我们看到了他的假肢。

一条塑料腿，被他靠在肺结核医院曾经的病床上。

华北瀑布 67 号

*

我的性启蒙,在学校对面的录像厅。老板娃娃脸,这个喜欢男人的男人、太行山下的荷花,在我毕业一两年后消失不见, 塑钢门窗上贴着“转让”。

现在连网吧都绝迹了, 青春地标只剩国营新华书店, 录像厅更像白犀牛一样濒危, 如果遇到, 我都会进去看看, 没准儿是他呢我经常想。

他是生意人, 不好直接拿的, 有其他打折方式。现在想想, 他是用女人的影像招揽男人, 从而满足自己对男人的嗜好 (当然不是和我) 。

后来我也做生意, 生意人嘛, 习惯用办法代替忧伤。于是我逐渐原谅了他的狡黠, 也知道了他的无奈, 甚至觉得可爱。

华北瀑布 31 号

*

阴天的时候, 我总想起一把铁锹。

这个情景好比一个农场游戏, 我脑袋上方应该悬浮着一把铁锹, 在这个马赛克世界里, 我应该穿着像素背带裤, 正准备收获一些虚拟土豆。我就像一个数字梭罗, 正在以信息化的反自然样貌冒充着大自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 铁锹说起来同样乏味, 不过是铲起一块平原, 把它挪到另一块还叫平原的地方。这种原始的棍状挖掘机, 冬天时划过水泥地面, 发出带刺的声音, 就像容嬷嬷在窗外发射寒针, 能把人从梦中扎醒。

我就从棉被里爬出来, 穿上衣服, 迷迷糊糊来到院中, 进而看到雪被堆在一起, 露出黄色的土, 黄白无限交替, 导致华北就像一张巨大的虎皮。

所以一到冬天, 我总感觉像站在老虎背上。我经常看向地面, 思考老虎。但老虎无法被思考, 于是我在老虎背上跺跺脚, 背着铁锹就出了门。

我要去埋钱。这事已经酝酿了很久, 基本从生下来就开始了, 不能再等了。

首先, 把一块和五毛码齐, 用皮筋扎好, 然后装进完达山奶粉袋。

再然后, 挑没人的时候, 马上刨个坑, 把钱种下去。

最后, 划拉几把干草, 仿佛它们是不经意间长出来的。

这就可以了。

这时, 大地将是你的银行, 小草将是你的保安。而你像个毒贩。

以后只要注意浇水施肥, 来年就会长出一颗摇钱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主要是为了防盗。因为我的妹妹是个贼。

我的零花钱, 她从台灯下偷过, 然后是一个铁皮罐, 上面写着: 1997·香港。不过“香港”已经生锈, “狮子山”上残留着几块华北污渍, 里面的空气喜欢自己发酵自己, 闻起来有种金银花的味道, 喝起来接近小麦王的口感。

所以一到冬天, 我总感觉像站在老虎背上。我经常看向地面, 思考老虎。

最秘密的地点包括一尊观音, 在她慈眉善目的表情后、陶瓷皮肤下, 塞满了我的压岁钱。现在说出来已经不怕贼惦记, 因为里面的钱后来变成了干脆面、贴纸和塑料发卡。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对观音的态度很复杂。她没有保佑好我的钱, 那运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就更谈不上了。后来我及早地摆脱偶像崇拜, 估计和这事有关。

总之妹妹当时对偷已经丧心病狂。但我对藏也可以说深陷其中, 甚至还隐约兴奋: 我也是有秘密的人了, 这让我浑身发痒、上课偷笑, 希望她找不到的同时又希望她能找到。而附带结果是我们就以这样病态的方式在黑暗中像蟑螂一样把我们可怜的家翻来翻去, 并最终发现它一无所有。

地基之上, 我们的家空空荡荡。

后来她终于不偷了, 改邪归正后, 爱上了种地。她挥舞着铁锹, 从此变得很勤劳, 而勤劳使人致富。

就是在这样的阴天, 一个银灰色的下午, 她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年, 她才 7 岁。

于是我脑袋里自此有了这样的画面: 她背着闪亮的铁锹, 站在老虎背上, 而在老虎背上人民币长势良好。但遗憾的是, 在这个日益褪色且我再也无法抵达的个人历史性画面中, 总伴着一阵可耻的哭声。

这哭声在 21 世纪飘摇不定, 像只有 1 格的联通信号, 在电话那头断断续续地呜咽, 也和刚出土的人民币遥相呼应, 总在半夜把我弄醒。起身后, 我发现我 33 岁的老脸上, 正

挤着 10 岁那年的泪水。

我抬起手又放下, 这泪水因为过于珍贵, 以至我不忍去擦。于是又小心躺下, 然后在黑暗中开始等, 因为作为一座决堤的大坝, 我希望让这些错误的泪水, 顺着不断生长的眼角纹, 流回正确的时间。

华北瀑布 32 号

*

妹妹后来在非洲, 她跟我说过一件事在赞比亚附近的村民喜欢蹲在中国矿业公司门口, 展示自己刚刚抓到的猴。这些猴年轻, 委屈, 眼里常常饱含泪水。有的同事会因此买一只, 只要 50 块人民币。

可一到晚上, 这些猴, 听到墙外的口哨就会逃跑。

它会自己开门, 然后翻墙, 熟练地跳到墙外卖猴人的肩上, 吃他从口袋里掏出的香蕉。于是我想象这样的画面: 凌晨三点, 猴和人走在夜色中的非洲草原, 温度适宜, 月色感人, 失去猴的主人还在梦中。

第二天, 卖猴人又牵着昨晚跑掉的猴蹲在门口, 猴眼中的泪水再次蓄满。

久而久之, 这些远渡重洋的国人已经习惯这样的把戏。但他们照买不误, 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它洗澡, 擦擦干, 然后为它找一个干净纸箱。

华北瀑布 55 号

*

我有时会面朝墙根突然蹲下, 因为墙根总躺着一两只虫。

如果溯源这个习惯, 可以倒回二十年前, 那时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地球还没有现在这么重, 自转的时候也听不到多少噪音。我那时四岁, 对地球上的事物都还比较热衷, 穿开裆裤蹲着看虫是其中一项。

经过北方干燥天气的脱水处理, 这些昆虫的死一般都很脆, 它们早已抛弃干瘪的躯壳, 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也留下一大堆我至今搞不清楚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总死在角落而不是地板中间, 难道对自己的死感到害羞? 还有, 为什么总是四脚朝天像一个标准动作, 是预感到自己的死, 然后在墙的帮助下翻转身体? 等等, 这些问题会困扰我直到腿麻。

于是我站起来, 站起来后差不多就三十岁了。

某种程度上, 我欢迎虫子们来做客, 总是开着纱窗, 哪怕是在夏天。如果有可能, 我会像酒店门童那样, 站在门口对所有虫子说欢迎光临。

因为我对不起虫子, 我对虫子有罪。

要从“掀蝎子”说起: 掀开石头, 瞧瞧下面有没有蝎子, 这就是掀蝎子了。把蝎子用筷子夹进罐头瓶里, 然后送到药铺, 每只可以得到五毛。为了赚点零花钱, 童年的我们经常会把一座山的石头都掀开看看。所以事到如今, 我得承认, 我曾亲手摸过一座山。

一座山的手感, 说重也不重, 上手其实很轻, 回忆起来那就更轻了。

是金色的空气中微苦的树叶味儿, 大汗后的清凉, 体表分泌出一层盐和日落太行……我见过一条白蛇, 睡觉时脑袋搁在圆心, 它盘着的身体好像它刚做的梦, 特别圆满。还有几排找不到主人的白卵, 原地等待了整个夏天。某种程度上, 石头就是昆虫的三室两厅, 掀开的过程就像开盲盒: 有时是一只隐居多年的蚂蚁。有时则是一个小洞, 村里走丢的傻子和动物们在里面相依为命。以及可以想想这样的画面: 一家正在晚餐的昆虫, 突然被人掀开房顶。……记得当时彼此都很心慌, 一时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

就以这样突兀的方式, 我和很多昆虫四目相对过, 不知它们是否还记得, 外出爬累时, 会不会靠在树上想起这件灰尘般的小事, 进而感叹一下那只比石头还大的“昆虫”, 现在何方, 过的怎样。

我也常想, 作为一只虫子, 它后来搬家了吗? 是否爬出大山, 再婚续弦。或以头触地停在哪里。应该是四脚朝天地死去, 爬了一辈子, 现在终于可以歇歇脚——它目视蓝天, 世界轻脆无声。

更或时光荏苒, 至今健在, 终于成为一只年迈的甲虫, 没有社保, 孤苦伶仃, 在磕磕绊绊的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突然有天异想天开, 把颤颤巍巍的触角伸向那冰冷到有些疏离的空气中, 发出这样断断续续的信号:

好……好吧……我……我原……谅你。你, 和你当时的莽撞。

虫子突然开始抒情, 这并不奇怪, 属于自然界普遍现象, 比如夏天走在路上, 有些蝉会突然叫起来, 突然想和你谈一谈, 但它们很难得逞,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类很愚蠢。

就这样, 一个多年前的和解, 由一只昆虫发出, 微弱、抽象到不能打扰正在上班的我。

我也顶多望向窗外, 在秋天的下午, 目光跟着天气一起转凉, 那是一切都很清晰的混沌时刻: 突然明白了一些事, 但又不是太明白。

华北瀑布 77 号

*

大雪总是超出我的理解。超过了数学和语文, 英语也不行。

面对大雪, 我总显得形迹可疑, 来路不明, 我不敢出门。

大雪让我感到紧张!

我有什么资格站在雪地上, 这么白的雪, 难道我也可可以试试? 我结结巴巴地想到。

我不行的, 我把腿收回去。

很多年后, 我把大雪理解成一个人稍稍释怀。

她是离开过人世, 现在又回来了, 故地重游一番。这次她回来, 主要是想开了, 于是落的哪都是, 她是一大群激动而忧伤的伞兵, 落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以前走过的路上, 爱过的人头上。当然, 不爱的人也要撒一点, 野生动物也不会放过。

有时她在野外追兔子, 非要落在它背上不可, 结果当然, 没有一只狂奔的兔子能逃过一场缓慢的雪。

她就到处弥漫, 庞大又仔细, 落到自己的墓前, 就像自己给自己祭奠——这么多年过去, 很少有人再想起她, 她也快淡忘了自己。

此时如果隔窗伸手, 就会收到从天而降的白色通知单, 上面写什么看不清, 但人们就是能得到下雪的重要消息, 于是凑到窗前, 看她落在白菜上, 工厂农田, 党章和新马路上, 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上, 她也要落一点, 她甚至落进互联网。但以我的观察, 她落在煤块上最好看。

总之她不管, 她想开了, 她就到处落, 这次终于落到了实处, 漫山遍野, 挨家挨户, 让人看到了成效。而与之相比, 她活着的时候是多么虚幻。

引用: 她是一大群激动而忧伤的伞兵, 落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以前走过的路上, 爱过的人头上。

我应该叫她小姨, 她生前死于一场大火。

华北瀑布 79 号

*

雪后去遛狗, 这样的傍晚, 乘着雪, 我总想起一些事。

那时我年龄还轻, 火车还是绿皮的, 遇到一个女大学生, 有晴朗的眉目, 笑着从口袋掏出一只乌龟, 拿在手里把玩, 隔着嘈杂的人群, 我就对她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 她的短发, 她自足的笑容等等。但我那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技巧去表达我的爱慕, 于是就看着这么好的人消失在华北的暮色之中, 没有一点办法。

还是有机会和她一起抚养乌龟的, 如果当时和她一起消失在华北的暮色之中。

后来, 她有了一份她不知道的我的失落, 而在我这方面, 不只是一番矫情后取笑自己, 这样的遗憾, 诸如此类的遗憾, 把羞耻的我推向一种柔软, 质地如一些晴天, 因为对忧伤没有一点办法, 于是只能高兴地走在路上。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度过了取消自己以捕获他人的季节。

华北瀑布 80 号

*

我记不清了, 我当时应该是很小的年纪, 但总感觉自己是个大人, 何况我兜里还揣着一笔巨款, 足以买下整个世界。

因为我当时的世界, 由溜溜球、雪糕和课外读物构成, 所以严格来说十来块就够了。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就会发愁, 我那时还不足以应付比我更多的事物 (现在当然也是), 它们都极其陌生, 大多坚硬、疏离到让我发自本能地拒绝, 我不想去了解, 更多时候是被迫。

比如被迫去接触一个和尚。我记得他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要预示一下我的命运。我本能地说不用了, 别。但他很坚持, 很固执, 仿佛不预示我的命运, 就会影响他的命运。于是我答应了。我没有其他办法。

或者准确地说, 他穿过人群向我径直走来的姿态, 好像专门为我而来, 这让年幼的我大受感动, 所以与其说我相信了他拙劣的话术, 不如说我相信了他坚定的姿态。

他坚定的姿态, 或者我多舛的命运, 当时的成本价是 5 块。现在, 经过多年通胀, 估计得 1000 块, 我不知道, 我没有再去算过命。

我已经记不清他当时的预示, 再说他当然是个骗子, 他的话不足为信。但很奇怪, 我时常感觉我可能正活在他所预示的命运里。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上当, 他骗走了我的心 (假如我有这种接近桃形的粉红色东西的话), 导致我进入了一种本不属于我的命运, 但这一切, 由多年前一次掐指带来的连锁反应, 可能正是我的命运。尤其是这么多年后, 当我写下这些, 几乎是一种命中注定了。

“一切都是必然, 可以如释重负。”甚至多年后的现在, 我凭空拿来的这句话, 让我分不清这是我的虚构, 还是他在虚空中的赠予。

但是,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就是他。多年前我身着袈裟, 路过华北, 以坚定的姿态骗过很多人, 包括自己。

华北瀑布 16 号

*

有段时间吧, 有几年, 他每个月都去献血。

他高血压, 每天吸食尼古丁, 也会偶尔喝点土制的乙醇。但即便如此, 他的血依然能通过各种精密的仪器检测, 让他成功的把血献出去。这让他得意, 仿佛他的血和他一样聪明。

他还为赠品高兴, 通常是一个盆, 底部印着某某医院。

而我总觉得义务献血像活体献祭。坐在病床上, 在医生的帮助下献出自己温热的血液, 这和原始祭祀没有区别, 只不过祭台换成了不锈钢病床, 巫师是穿白大褂的医生。

我还想, 那么现在, 他的血应该淌在别人的血管里了, 这让我感觉我和他的血缘关系不是那么近了。这种感觉很古怪, 他体内的河流, 他的“华北瀑布”, 并不只是流向我, 而是流向了更多人, 导致那些远方的病人和我都是兄弟, 因为大家身上都留着我父亲的血液。

四海之内皆兄弟。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对陌生人好一点, 比如主动让座, 和电信诈骗人员多聊一会儿。总之,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 和宗教一样刺激, 耶稣说爱人要胜过爱自己。

华北瀑布 17 号

*

我和他抽烟时, 我们不说话。但我们都是人, 是人就会尴尬, 斩钉截铁, 不可避免。为了走出尴尬, 我们会突然开始说话, 几乎同时。这种情况很多, 包括在电话里, 总是沉默几秒后, 突然开始同时说话, 导致线路一时间拥堵不堪。

要不 (行!) 你先。

久而久之, 我发现我们沉默的时间几乎一样, 我们对尴尬的忍受时间几乎一样, 它是如此精确以至带来很多困扰。试想冬天, 一对沉默的父子, 他们突然开始齐声说话, 话语淹没无语后, 他们低首了, 并在心里酝酿下一次尝试。没过一会, 儿子首先开口了, 但老父亲也缓缓张开颤抖的嘴唇, 于是句子们再次撞到一起, 它们在空中打架, 入耳后就只剩偏旁: ㄆ ㄣ 几 ㄇ ㄣ看起来像日语, 但我们并不是在说日语, 我们是在用方言沟通。

我以为沟通就是交通, 所有句子都要错峰出行, 才能顺利抵达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遗憾的是我俩都喜欢同时发车。

更像一项技术故障而无关情感。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 必然不是巧合, 应该来自我早年对他的模仿。换言之, 我不知不觉模仿了他的沉默, 甚至连沉默的时间都把握的分秒不差, 而由此带来的尴尬, 我也一并继承了。

这份尴尬古老、沉重并好笑: 我当初敏而好学造成的这份尴尬及其附属, 现在已成为父爱的一部分, 或灰色浪漫的某种。

华北瀑布 48 号

*

我和家乡都变了样, 谁也不认识谁了。醒来骑车上街, 乘着绿荫, 骑到初恋的门口吧。

我的心思, 过了多年还是小心思。

和我打过架的人, 我的小情敌, 在我早就不恨他的十几年后, 死在从山西来的煤车下, 比我们更早地成为煤的一部分。

而那个我们共同爱的校花——同桌的你, 后来据说卖麻辣烫。但现在的我, 健康起见, 离辣椒这些刺激性食物越来越远。

我还没老，还不能去回忆。我也没病，没病在床上，要去追忆似水年华。再说我阐释情感的能力和当时一样差，在未来，也不见得会好起来。

但我要说一次和她的旅行，赶在它模糊之前，如果它们果真会的话——我并不笃定，尤其在这样的 2021 年，我被困在家里，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机器人，编号 X-233，电量很低，大概率失去了共情能力，不只是和别人，还有和过去。

因为时间久到淡忘，还是荷尔蒙奇怪的作用，那些时候发生的事，好像完全没有起因。比如在一个毫无预兆的白天，我们突然决定去旅行，草率得就像小混混突然决定去网吧砍人。

我们约在了交车站，然后背着书包就上了车。

应该是夏天，顺着盘山公路一直向上，公交在树影中穿行，脸部就明明灭灭像火焰，车厢闷热，隧道悠长，她当时的存在，让我一直怯于描写夏天。那时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对方，进而要去了解一下世界，我们野心勃勃，各种不明的、杂乱的愿望在身体里疯长，再加上公路的颠簸下，几乎要把我们撑破了。但这里面，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只有爱是最笃定的，因为在这场小小的私奔里，把我们带上山的不是公交车，正是我们因为幼稚而完全彻底的爱。我们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车也不要停，它应该在夏天的山路上一直摇晃，而我们应该一直明亮。

我以为沟通就是交通，所有句子都要错峰出行，才能顺利抵达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我们后来已经很高了。随着山路不断上升，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盆地这件事得到了证实，课堂和工厂废气离我们越来越远，父母老师同学也不见了，我觉得登高就是死去，它们之间很像。

在这辆公交开到天上之前，我们下了车。

带刺的苍耳，至今没从那件毛衣上脱落，我也是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喇叭花也叫地黄，而不管当时还是现在，狗尾巴草一直叫狗尾巴草。这种草生命力极强，几乎遍布北方山顶，远看就像无数条狗钻在土里，只露出尾巴在风中摇摆，如果随手拔出其中一条，可能真能拔出一条狗来，然后抱回家。冬天它们干枯，一点就着，夏天它们则适合衔在嘴里，用它毛绒的那头去碰她的手、脸——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晚自习，我们逃了出来，我把脑袋支在她肩膀上，发现月亮并不只是形成潮汐。

我们就在有狗尾巴草的山顶，穿过它们并感到自在。然后紧接着就是一阵无助了，我们不知道这份爱——这种对年幼的我们来说极其陌生的东西，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或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哪里，藏到哪里。它让我们紧张，所以到处游荡，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对方，但后来为时已晚。

我们是坐着滑梯下山的，不是虚构，因为在当时就是有那样的东西。那个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的滑梯，从山顶直达山腰，让人免去了下山的一半烦恼。尽管在当时看来，那更像一条顺流而下的小河乃止瀑布，或者更确切来说是一条石头做的产道，我们坐在其中，不知道应该作为儿童还是成人。我们就在暮色中滑行，一前一后，时而撞在一起，尖叫，声音从少年的喉咙发出并被山谷放大，一切都是模糊的，一切都很快。

到达山腰已经有了夜色，公交停运，我们是搭一辆三轮回到镇上的，然后我们走进那个高中。那时它已经变得格外辉煌，像一座宫殿，现在我们回来了，作为一对被放逐的国王和王后，我们在晚自习的课堂上坐下来。但身上的晚风、汗水造成的盐，和粉笔的味道、同学看着我们的目光以及我们将要踏入的未来是那么格格不入，于是我打开课本把头埋下去，我感到很疲惫，又突然很难过。

毕业赠言：作为您的同桌，也许我曾伤害了您的心，在此深表歉意，但愿在今后人生您能记起我。我觉得您虽有时暴躁，但我还是觉得您是班上，不仅是班上，而且是我人生最可爱、难以忘怀的您！

一滴雨，就是一个小型瀑布。

这几天，墙头总是蹲着半只猫，它背对我，尾巴指向不明，有时是一整块阴影，有时则是一阵风，它从零八年吹来，至今没有停。是，我知道的，每当这时，那些不重要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但它们通常不会比半只猫来的更戏剧。

暴雨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郊外。我们那时年轻，渴望潇洒，怎么会去哪都带伞呢，我们不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雨水灌顶时，只好沿着黄河某处的大堤，冲到桥下避一避。那时我们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口袋里的烟，要用塑料打火机烤半天才能点燃。

可是哪一年呢。可是哪一年不重要，哪一年都有那样的年轻人跑到桥下，在承重柱上留下那样的墨宝：

张浩然，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爱我一次呢？

是啊，张浩然你为什么就不能爱她呢！哪怕一次，你的爱到底给了谁。我们对过去的张浩然表示了解，呼应着我们的不解，记忆中的雨也大了起来，亿万雨滴借道华北，闪电把我们搁浅在桥下，我们哪也去不了，于是继续研读承重柱上的“QQ 空间”，还声情并茂念了起来：

王凯！我爱你！我恨你！我很难过，也很无奈！

张雪酷毙了！希望你勇敢点，但愿我俩的感情天长地久。

我本来可以生活的比任何人都好，以前的我不喜欢触碰感情，是你让我学会了感情，最后被感情输的一败涂地！

爱我就呼我 3434232 号码没变心也没变

这些让人怀旧的句子，虽然有些语病，但总的来说问题不大，说情绪饱满，感情真挚也只不过分。我们像在给肥皂剧配音，念到最后，甚至自己都产生了共情，尤其雷雨交加的场景下，我们的 VO 在桥梁下不绝于耳，久久回荡。

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深情。我们深情过的。我们的深情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我们的话术并不相同，这不同，关乎品味而不在情感，我们情感上的认同在当时，还不足以杜绝我们在品味上嘲笑他们，在这脆弱的品味失效之前，嘲笑几乎不可避免。也几乎是种疾病了，在时间鄙视链当中，我们嘲笑我们的过去，后来我们嘲笑我们的嘲笑。

它们毕竟已经过去。作为暂时的考古人员，我们在这“原始洞穴”里走来走去，它通往古人张浩然的世界，可以再向前一步吗，我们每向前一步就是倒退一步，就还在原地，还在抽湿漉漉的烟，蹭脚下的土，而在更远的地方，闪电正在集中，太行山点火后隐约开始上升，但平原的目的始终不明。

大部分冲积平原都曾是河床，人行于上，就像当初大鱼游荡。所以下雨，干涸的人类不免想起自己湿润的祖先，记忆也被潮湿召回，往事进入汛期，就潮水般浮动，水草一样摇晃着北方的人们。

承重柱上还有人类晚期的涂鸦、当代人的壁画，大致都粗俗到可爱。遍地烟头酒瓶，说明这里曾是失恋现场，如果地下埋个情人，我们并不会感到意外。

还有去年的野火早就熄灭，想必某人曾在此地烤手，也许是夜色中的张浩然，我们像雨中的侦探，蹲在地上，研究炭烤出来的句号：●

总之这鬼地方实在让我们浮想联翩，光鲜的路人下了桥，也许都是土狗，要对来自四面八方之风嘶吼，因此很难说清桥的作用到底是用来拉近人们的还是让人们在桥下失语的，以至要用水果刀刻下那样的话，以及那些根治阳痿时尚寿衣的小广告和棺材店老板留下的电话号码，已经开始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于黄河钙化之前，人生大抵不会很潇洒。因为我们不是目睹了吗，北方桥下有灰烬，荒凉的姓名与日俱增。

北方的雨就是这样的，北方的桥也是这样，我们后来终于无聊，雨还没停的时候，就很想离开那里了。那时还有很多远方等着我们去，平原的尽头，莫格道尔，初冬的斯利那加，它们仿佛是为了让我们去而在此，不然它们的名字对我们就毫无意义，可后来我们见过更多的，还是类似桥下这种地方，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那样的，其貌不扬，和塑料打火机一样常见，也毫无意外地丑到雷同，抹平视线后不再给我们带来惊奇，新事物的发现，后来我们更多凭借语言，可那是近乎可怜的一种方式了。

雨停后，我们就从桥下走出来，像河里的鱼刚变成人类，腹鳍穿上鞋后，就和那些曾在桥下失去恋情的人们一样，沿着微颤的桥面，穿过温热的人群，一直走到了今天。



岳凯强

摄影师，广告从业者。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
他们欣欣向荣。



题图来自 [Ernest Malimon](#) on Unsplash

小说

艺术人生

海伦·加纳 | 故事群岛

我朋友说，

“我希望你在我的墓碑上写‘她只为自己而活。’”

我和我朋友一起去墓地遛狗。正值墨尔本的秋天：微风习习、空气怡人、阳光和煦。狗在我们前面的坟墓之间一路小跑。我在口袋里装了一把剪刀，以防我们会在被遗忘的坟墓堆上碰到玫瑰丛。

“我不喜欢玫瑰花，”我朋友说，“我讨厌它们有刺。”

狗钻进一片常春藤，定在那里。我们阔步走过猫王纪念碑。

“你想在你的墓碑上写什么，”我朋友问我，“什么样的墓志铭？”

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两百双靴子所有者。”

回过神来，我朋友指了指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她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可怜的人儿，”我朋友说，“我希望你在我的墓碑上写‘她只为自己而活。’”

我们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蹒跚而行。

我和我这位朋友认识二十年了，但我们从来没在同一个屋檐下住过。她从欧洲回来，刚好无缝衔接住进了我租的房子里的一个空余房间。因为那个男人，这个房间刚好空出来了——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朋友有一些特定的信仰，私底下我一直认为有些古怪。有时候我想，我朋友就是以前人们说的“傻大姐”。她相信轮回——并不是说这本身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有时候，不知道她在世界哪个地方，她会给我写很长的信，这些信出自她可爱、优雅、灵巧的手，信中字里行间都讲的是她以前的生活逸事，解释她现在的心理构成和现世化身的种种行为。

我眼睛一目十行，飞速阅览信件，越看越感觉尴尬。

我朋友是位画家。

初次见到我这位朋友时，她订婚了。手上戴着古董蓝宝石戒指，脚上穿着意大利靴子。但再次在迈尔斯见到她，她手上的戒指没了。我从未问及缘由。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去墨尔本南雅拉的一家俱乐部跳舞。乐队的男孩也都是学生。我们爱慕他们，尽管我们也才 22 岁，但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面对那些男学生有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我们读了《斯通夫人的罗马之春》。那年是 1965 年；女权运动之前。

我朋友带着她的手提箱下了飞机。“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说，“澳大利亚男人，即使四十多岁了，也还穿得像个小男孩？他们穿着短裤、人字拖鞋和细条纹 T 恤。”

每天早上我们打开门都会看到一只猫在我们后院的灌木丛下熟睡。于是，我们收留了它。看电视的时候，我和我朋友总会为猫躺在谁的腿上争吵。

我朋友是音盲。有一次，她坐在汽车后座上，分别用独唱、合唱、说唱等方式不着调地唱着《蓝月亮》，汽车沿着普特路上山、下山、过河，一路向北，她一直用她的方式唱着，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我朋友以前住在大学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像学生一样生活。她的床安置在楼下前厅窗户正下方。一天下午，她父亲来看她。他轻轻叩门。无人应门，他便往窗户里面瞄了一眼。眼前的景象惊得他踉踉跄跄退回到栅栏那里。我朋友说，他当时的样子就像心脏病发作了一样。

我朋友下午经常到我家附近散步。她从一大片绿色植物后面的小巷子走出来，在我家落满灰尘的橱柜里找到几只花瓶，然后用树叶做插花造型，既时尚又大方。

我们俩各自结婚前，我去我朋友家帮她刷浴室墙面。油漆是橙色的，我穿的棉质连衣裙也是橙色的。她哈哈大笑，因为我站在浴室里，只能看到手脚和头。后来，天黑了，我们坐在她厨房的桌子旁，她卷了一支大麻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毒品并真正抽上一口。我担心会有侦探透过厨房的窗户看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没有拉上窗帘。我们在温暖的夜晚走到吉纳维美，吃了两碗意大利面。我感觉似乎记得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点滴细节。

我朋友远在他乡时，她父亲去世了。

“现在，”她对我说，“我知道悲伤是什么滋味了。”

“什么滋味？”我问道。

“有时候，”我朋友说，“就是你预料的那样。但有时候只不过是脾气暴躁。”

我朋友的父亲去世时，他的后事办得不太好，他没留下什么钱。

我朋友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打破禁忌，把条纹和花卉图案混搭穿的人。她站在纪念神殿的台阶上，头顶撑着一把黑色的伞。那是 1960 年代。

我朋友从欧洲回来，找到了一份工作。她不为挣钱画剧院布景的日子，就去自己在城里的又冷又脏的工作室，画画其他东西，没有特定对象。她穿着廉价的鞋子，用发针把头发卷起来，贴着脖子。

学生时代，我朋友为一位四十多岁，在夜间工作的知名女性当保姆。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她带我上楼，”我朋友说，“展示了她的卧室。卧室里铺满了鲜花。我们站在门口往里看。她说，‘性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们读了《斯通夫人的罗马之春》。那年是 1965 年；女权运动之前。

当那个男人……那个被我朋友占用掉房间的男人来吃晚饭时，其他人都离开餐桌后，我朋友和他还能再聊几个小时，讨论不同的见解和认知模式。我朋友说话很慢，一句话老长，弯弯绕绕，爱打比方，还时不时大笑。那个男人是科学家，说话轻快急促，但他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听。他们似乎在互相倾听。

“我指的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神。”我朋友说。

“是自负，”那个男人说，“让人们希望他们的生活超越自己存在的意义。”

有一年夏天，我和我朋友在富茨克雷一家大型商店的男士内衣服装部上班。我们穿着小棉裙，蓝色凉鞋。我们在那里上班很开心，促销、打包、在货架梯上跑上跑下、在收银台收账、和商店里的男孩们一起去公园吃午饭。那时我很开心。年龄最小的男孩看着我们，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你们哪个是我的最爱。”有一天，我朋友在特价专区为一个脸庞消瘦的女人服务。有人哭了。我抬头一看。我朋友正冲向门口。她呜呜地哭着。我们都僵住了，就像戏剧里姿势定格了一样。那个女人摊开双手，对店里所有一脸懵的人解释。

“我什么都没说，”她说，“跟我没关系。”

我丢下客户，追着我朋友跑出去。她在大街上跑到一半，停下来看着一家商店的橱窗。她不哭了。她开始跟我谈关于……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那是 1960 年代；女权运动之前。

有几天晚上，我朋友从工作室回来，表面镇定，但乐不可支。“我们需要的是，”她说，“那些自由放纵的时刻，那个时候能够真正做到除腐出新，去塞求通。”

我朋友没钱买酒的时候，把柠檬切成块，丢进水壶里泡水。

我朋友从手术室出来了。我跑过去扶住她的胳膊，但她从我身边挤过去，弯腰俯身蹲在路边的排水沟。我递给她一块手帕。夏天的风从电车敞开的两侧自由吹过。我们站起来，抓住车上的皮革扶手带。“我不能坐下，”我朋友说，“他给我身上裹了一大块纱布。”那是 1960 年代；女权运动之前。电车驶过深深的花园。我朋友一路微笑着。

我朋友和她丈夫来我家串门儿。我和我丈夫听到他们的车声，从楼上的窗户向外看。我们可以听到他大声呵斥她，她抽噎哭嚎的声音加大。我跑下楼开门。他们站在门垫上，看上去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们去皇家公园放风筝，风筝是她丈夫做的。他叫她的昵称是从她父亲那里学来的。当然，他们都爱她。那是 1960 年代。

我朋友很孤独。

我朋友卖掉了她的一些画作。那些画作被带走前，我去她的工作室看了看。油画颜料的气味让我震惊：那种气味让人感觉充满阳刚之气。那是 1980 年代；女权运动之后。那些画作很宏大。我不“懂”它们的寓意；后来我又似乎懂了些，那些画作让我眩晕，其间怪异的植物和生物朝着不可抗拒的黄色光源回溯。

“幸福来得太隐秘、自然、平淡，了无痕迹。”我朋友说。

*

我朋友在市场买了一只新鲜的鸡。“来，她说，”感受一下。”我从她手里接过。鸡肉上有疙瘩，很嫩，再摸摸骨头，就像手碰到小宝宝的感觉。

我朋友不在的时候，我去了她房间。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亨利·詹姆斯对一个陷入困境的朋友说，‘投身于另类生活……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人生，虔诚地祈求神助并得到垂怜，我向你保证，永远不要让真诚的祈求者失望——帮他度过一切难关，并向他揭示这样做的秘诀。’”

我生病了。我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端来可口的零食。我靠在枕头上，轻轻地弹着我用尤克里里学过的五和弦。我朋友坐在椅子边上，瘦骨嶙峋的双手交叉捧着一个杯子，陪我说话。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消失在窗外的云层中。她就像一台机器，可以永远不停地说话。她说到她要花多少钱在油画颜料和画架上，说到她的油画作品中体现的轻盈、乐观、女性气质，说到她接下来准备画什么，以及为了引起评论家的青睐，她不得不在画作中体现出更加坚韧和暴力的一面。她还说到关于她所在领域的男人们现在都在做什么，以及在画下一批画作前她必须得搞清楚他们的动向。

“听着，”我说，“你不必在意那些。你的画作很棒。”

“我的画作是很棒，”我朋友高声说，“但我不是。”她的嘴垂下去，张得大大的。她开始抽泣。

“我都四十岁的人了，”我朋友说，“还是没挣到什么钱。”

我依次划过 G, A, C 三个和弦。

“我很孤独，”我朋友说。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她的脸拉得老长。“我想找个男人。”“你可以有。”我说。

“我不想随随便便找个男人，”我朋友说，“我也不想找个年轻小伙子。我想找一个不会认为我满脑子疯狂的男人。我想找一个男人能看到我身上别人看不到的闪光点。我想找一个能照顾我，和爱我的男人。我想找一个成年人。”

我想，如果我能弹得再好一些，我可以把她刚才说的话编成一首歌。

“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我对我朋友说，“找不到那样的男人。你为什么期望找一个那样的男人？”“为什么不呢？”我朋友反问道。

“因为男人不会为我们这样的女人做那些事。我们对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所以男人不会那样做。好吧——有些男人会那样做。但我们会鄙视他们。”我朋友不再哭了。

我继续弹尤克里里。她喝了口杯子里的水。



海伦·加纳

澳大利亚著名小说作家和非虚构作家。1942 年生于澳大利亚吉朗。她创作了多部小说，有《毒瘾难戒》《小天地中的大世界》《孩子们的巴赫》等，并为此斩获多个奖项。她还是澳大利亚最受赞誉的非小说创作作家之一，并于 1993 年获得沃克利新闻奖。2006 年，海伦·加纳获得墨尔本文学奖。她现居墨尔本。

译者：胡小兰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英语翻译硕士学位。热爱文学，曾在第二十六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汉译英比赛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艺术人生》（*The Life of Art*）选自海伦·加纳短篇小说集《来自冲浪者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Surfers”）。Copyright © Helen Garner, 1985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来自 [All Bong](#) on [Unsplash](#)

小说

杂技演员

内森·英格兰德 | 故事群岛

狙击手的子弹和生存机会之间
只隔着一个小女孩的白日梦和人们对熊的喜爱。

谁会想到这种规模的战争竟会迁怒波及海乌姆 [1] 这座小城的傻瓜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麻烦，包括疱疹病毒和收税员，会来侵扰这座城市。

市政会刚成立时，先贤智者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一长条羊皮纸上立下了一条法律，签上名字，敲上章，并且相当隆重地把它钉在一棵树上：在这个叫做海乌姆的地方不欢迎来自城市边界之外的任何一阵风，一声口哨，甚至是一朵云的阴影。

这里住着一群简单的人，有着简单的信念，只想简简单单地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延绵几代人，没有外人进来，只有故事能传出去，就像每个好故事那样。关于智者的传说就像这场战争后来那样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最著名的智者就是曼德尔的祖父，外号公牛的格洛南。

在富尔顿街鱼市场，码头工人们及格洛南试图淹死一条鲤鱼的故事报以充满意第绪幽默感的大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奶制品商店，一位顾客的打嗝也被格洛南的故事治愈，侍者向顾客讲述了在酸奶油极度紧缺时期，格洛南如何向公众宣布水就是酸奶油，酸奶油就是水，以一己之力让七七节 [2] 免于陷入混乱。

这些故事是怎么传出来的不是什么秘密，虽然他们不欢迎外来者，但每隔几年总有人会途经这里穿过这座城市。这些穿越者里有一个流浪汉，一个风流妇人，一个在暴风雪里迷路的行吟诗人，一个骑骡子的马贩子。有一个面善的吉普赛铁匠待了一个星期。他给城里每扇门都换了新的铰链，他的妻子则在广场的阴影处给迷信的人算命。当然，最出名的拜访者当属那个马戏团，他们支起帐篷，在三天时间里一场又一场地表演。除了这些少数穿过城市中心的人，不管有些人怎么说，当然还得算上在海乌姆郊外那兴盛的黑市。否则城里那些商店的好东西是哪来的？即使是否认黑市存在态度最坚定的人也不时被人看见在吃香蕉。

当入侵者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筑起高墙，创造出个叫海乌姆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方时，仍然有人用格洛南的逻辑来自我安慰。聚居区里缺少美好的事物，充斥着恶劣的事物，

那里的人重新命名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称他们的痛苦为“母亲的乳汁”黑暗变成了“自由”；污秽被指为“希望”——然后看着各自的手和脸以及被煤烟熏黑的衣服，他们感受到：幸运。只有死亡他们无法重新命名，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能放置在死亡的位置。这时他们变得悲伤并且感到饥饿并且有人开始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在这个时候，马迈拉比，他们中最虔诚的那个，把曼德尔送出了墙。

曼德尔一点都不惊慌，因为那拥挤的聚居区外的街道就是他们的城市的街道，那些家就是他们的家，即使现在住着别人。黑市也还是老样子，除了它已经被战争改变，比以前更秘密更贪婪得多。曼德尔高兴地发现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农民仍然在运用他祖父的智慧。土豆被当成金子，一袋金子也可能是土豆。曼德尔花了大量的后者（现在是前者）去换回他能藏在身上的尽可能多的前者（现在是后者）。他把整件生意当作好兆头，认为人们又恢复理智了。

这笔成功的交易给曼德尔一丝真正的信心。他没有原路潜回，而是冒险穿过冰屋的正门并且忽略了太阳升起的第一个迹象。他跑过斗鸡眼比拉的商店的后巷绕过市政广场，继续向前直到来到他自己的房子。他出现在那里是一种疯狂——或者是一种自杀。任何人只要瞥到他一眼就知道了，甚至比这更短，他们的知觉已经变得非常敏锐。那些土豆的命运会如何呢？如果曼德尔被抓住吊在那颗宣言树上，脖子上挂一块写着“走私犯”的牌子，它们肯定就到不了聚居区了。那些塞满他的口袋，从脚踝到手肘都挂满了的珍贵的土豆会被浪费，软掉，长出眼睛来。但是曼德尔需要看一眼他的前门，那一条草地以及两个夏天之前他刚刚自己油漆过的墙面板。就是在那个时刻他自己的卧室窗户的百叶窗打开了。曼德尔转过身用尽全力奔跑，除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他没再见过那位新住客。在下一条街上，他看见一个下水道，他使出猛力拉开了下水道的盖子。此时一只公鸡叫了起来，曼德尔一开始以为是有人在喊救命和警铃声和子弹飞过的声音。他伏下身子钻进地下，盖好下水道的盖子，他听见公鸡再次叫起来才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自然现象。他认为这是又一个好兆头。

*

从下水道钻出来之后，曼德尔不是很确定他究竟是在墙的哪一边。海乌姆的犹太聚居区充满忙碌的活力。要不是每一个犹太人的破旧装束，他们就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里的人群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是马戏团又回来了吗？他们给每家商店都带来了甘草糖？”曼德尔问走过身边的孤儿尤切福德，抓住她的手臂，手掌里握着一小个土豆，她一把拿走。她抬头看向他，眼睛被风吹湿了。

“我们都要搬到农场去了，得赶快，不能误了火车。”

“你是说农场。”他扯着自己的胡子，俯下身直到和孩子脸对脸。“是有奶牛的那种农场？”

“还有鸭子，”尤切福德说完就一溜烟地跑了。

“烤鸭？还是像中国人那样抹上酱烧？”他在她身后喊道，但是她早就消失在人群里了，带着每一个聚居区小孩特有的灵巧消失了。他从来没尝过酱鸭，只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曼德尔一边穿过蹒跚的聚居区人群一边在想象一顿晚餐，想象那酱鸭的味道是否就像一口咬进包着焦糖的苹果的味道，又或者口感像抹上蛋黄的面包那样松软。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胃液开始翻腾，就在他急着去找拉比的路上。//

*

命令非常简单：只有必需的生活用品能带上火车。大多数人打包了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一些衣服，以及一两张照片。一块面包里藏上一只钻石戒指，或者一双羊毛袜子里滚进一串珍珠。

对于海乌姆的哈西德派犹太人来说，解读这样一项命令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任何一个哈西德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总会形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在海乌姆这两个群体分别叫做“梅克尔的学生”和“马迈尔哈西德”。“梅克尔的学生”是一群放松生活的人，在守法的前提下轻松地敬奉上帝。由于这种相对轻松的教规及他们倾向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个群体越来越受欢迎，有数以千计的信徒。

而“马迈尔哈西德”则正相反，极度严格。如果教义里写需要禁食一天，他们会在前一天就不吃东西，禁食之后的一天也依然饿着，就为了防止他们在计算月历时被月亮的不同阶段所蒙蔽算错了日子。对于犹太法典规定的禁食要求他们也同样严苛。双倍执行还不够，他们三倍执行，经常在逾越节家宴要求的倒第十二杯红酒之前就昏厥了过去。这样的热忱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经过他们调整的犹太教节日长达连续三个星期，这也绝不是短时

间的投入。到这个犹太聚居区解体之前，玛迈尔哈西德，算上儿童，一共也不超过二十个人。

★

法令一开始被当作谣言传播，引起了广泛的困惑。聚居区的人们试图通过耳语和充满怀疑的舌头根来做出符合逻辑的决定。每个家庭的主人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紧闭双眼，挣扎着想要用常识来判断这个绝不平常的情况。

为了平复信众的恐惧，梅克尔的领袖被迫颁布了一条他自己的法令。他站上一节货车车厢，用一把砍掉头部经过打磨的扫帚而不是他原本的红木手杖撑住身体，他把“必需生活用品”定义为准备一间夏季避暑屋所需的一切物品。下面的信众提出问题之后，他回答他所指的夏季避暑屋是那种没有装修过的屋子。他低吼出最后一个字然后重重地砸下扫帚以示强调，他脚下的空车厢传出一记回声。

从下水道钻出来之后，曼德尔不是很确定他究竟是在墙的哪一边。

于是梅克尔的信徒们收集了床架，抽屉，吊床和草坪折椅——每个家庭搬家时所需的物品。玛迈尔哈西德的拉比以他无限的严苛（以及对梅克尔信徒羞耻的放纵的回应）认为除了长内衣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属于“必需”，因为所有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装饰。

“连我们宗教仪式上用的装饰流苏都不算？”费泰尔惊讶地问道。

“连你的胡子都不算，”拉比说，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困境的严重程度。这个回答在人群中引起一阵恐慌，除了曼德尔，他正忙着在人群里分发土豆。没有人吃。他们在等待拉比做赐福祷告。但拉比拒绝了他的土豆。“还是给梅克尔的信徒吧，他们无法忍受一无所有。”

信徒们如同条件反射一般向曼德尔伸出手要他收回他们的土豆“吃吧，吃吧！”拉比说“你们吃你们的，让我享受看着你们吃的喜悦。”他微笑着对信徒们说：“有你们这么忠诚的学生即使是阿奇瓦拉比也会深感荣幸的。”

迈马尔的信徒们赶回自己拥挤的公寓，男人们脱下了他们的华达尼外衣和宗教饰穗，女人们叠起了连衣裙扔进了抽屉。费泰尔，颤抖着双手，流着泪，开始剪自己的胡子，一点一点，一寸一寸。“为什么不一下全剪掉呢？”他妻子扎哈瓦问道。但是他做不到。所以他像个理发师一样地修剪着胡须，如同一直在做最后的修剪。扎哈瓦用脚步丈量着地板，踩过一丛丛剪落的胡须以及那块飞扬着灰尘的阳光照射下的长方形，那残忍的，无法躲避的聚居区的阳光。扎哈瓦在她婚后第一次把手帕留在了家里，毫无必要地锁上了门离开。

他们回到临时车站，发现梅克尔的学生们拖着地毯碗碟以及每一条缝隙里都漏出衣服袖子和领子的塞得不能再满的行李箱。有个小女孩带着她的宠物狗，它的瘦弱身体和比它更不健康的女主人一样让人震惊。玛迈尔信徒们转过脸不愿多看眼前这一幕对“必需品”的宽泛定义。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普通的规定，即使是来自他们的施虐者，也应该被严格执行以免让侵略者认为犹太人在遵守戒律上不虔诚。

拉比玛迈尔命令他的信徒远离那些异教徒，以避免穿着内衣光着头的玛迈尔信徒被误认为是法庭上的犯人。他们走开了，衣衫单薄，女人们毫无羞色，因为这样不体面的打扮要求是来自她们的老师之口。

对拉比来说，即使走到了最后一列车厢都还不够远。“跟我来，”他说，推开人群向既算是又不算是海乌姆的隧道走去。

尽管这里有一条铁路，一个隧道，以及一个敌人建造的临时车站，但没有一样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多年前当铁路沿着树林的边缘刚开始铺设时，格洛南就亲自介入了。他发誓火车决不允许穿过海乌姆的任何部分（发誓，他想，应该加上安全地穿过，但这不重要）。犹太智者们查看地图，合约，争吵着该如何丈量距离，他们突然发现工人们正在挖的隧道通过的那座山很大部分都属于海乌姆。他们恐慌了，争论不休，高声喊叫到嗓子嘶哑，开着马拉松式的会议。快到午夜的时候，格洛南才想到一个办法。

智者们敲响了每家每户的门，对着还没完全醒过来的居民轻声耳语，他们把每一个能动手的人从床上叫起来，然后他们带着凿子，厨房用的切菜刀，螺丝起子和锄头一起来到工地。这也是他们所有人第一次走出海乌姆，尽管只有几英尺的距离。他们每人拿起一块将要用于建造隧道的砖块，等待着格洛南的信号。他发出猫头鹰般的喵喵声，于是他们开始动手——在每一块砖中间刻上了一条围绕一圈的直线。在日出之前，在工人们回到昨晚收工时堆着的砖头之前，格洛南做出了一个声明。每块砖的上半部分属于他们，下半部分，所有线下的部分属于铁路。这样的话，当火车通过隧道时，它就不能算是穿过海乌姆了。大家纷纷称赞格洛南的智慧，不但把火车挡在了城外也让城里的居民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现在骄傲地拥有了许多块砖头的上半部分。

曼德尔回忆起那个早上。他穿着睡衣站在他父母房子门前看着他的祖父——伟大的格洛南——被朋友和邻居扛在肩上抬到广场。即使是最艰巨的挑战，同铁路的斗争，现在也变得如此轻而易举。

这份记忆让他感到一阵轻松（而从那个孩提时的早晨到今天早晨，今天这个像陷入陷阱，被铁齿生生咬住人生的早晨，这一路的过程是如此折磨人）。他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不小心踩到了玛米林的鞋子，差一点撞倒小尤切福德。他让自己站稳，然后扶稳小女孩，他们一起慢慢向前行进，穿过这个犹太人群，这个兜兜转转，匆匆忙忙，最后在运载牲口的火车车厢坚硬的地板上瘫倒的人群。曼德尔不明白拉比是如何计划活着到达隧道，尽管他相信他们最终会成功。黑暗已经降临有段时间了，看上去它终将裹挟住他们，把他们拉入它的真空——隧道已经在那里准备好吞没他们，如同许多硬币掉入一个深深的口袋一般。

而这也是曼德尔此刻的感受，当他们从人群中离开时，就好像他们正从一只张开的手掌中跌落，坠落。

当两名士兵从相反方向穿过隧道的入口时，他们的牧羊人拉紧了他们的缰绳，就在车顶的狙击手把注意力转向另一边的当口，就在曼德尔跟随拉比走进隧道之前，尤切福德看见了她的叔叔米沙，当场呆住了。曼德尔没有再见到她，尽管他直到自己生命终结之前一直希望能再见到她。

尤切福德看着她的叔叔被推搡，殴打，驱赶进一节车厢，她那始终温柔可爱的叔叔，他会用杏仁蛋白软糖雕刻出各种好看的形状：花朵，水果，孔雀，它的羽毛会融化在她的舌尖。

“快跟上，尤切福德，”拉比在隧道那里喊道，同时并没有停下脚步。但是前方的黑暗是如此可怕，而且还有米沙叔叔——就只有一节车厢的距离——叔叔总会给她准备着礼物。

她的注意力被一声健康的狗叫声吸引了，那是一声愤怒的吼叫，不是犹太人的早已被处决的瘦弱的狗叫。这是一头拉扯着主人向前的狗叫声。尤切福德转身看见这只畜生正沿着人群的边缘飞奔过来。

在那条狗追上她，把她的衣服从皮肤上扯下，再把她的皮肤从骨头上扯下之前，车顶的狙击手已经让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脖子。子弹留下了一颗红宝石般的洞，就像一个不检点的女孩会戴的那种。尤切福德用一根手指碰了一下她的喉头，把眼光转向天空，疑惑着这份奇怪的礼物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曼德尔回头看向枪声的方向；其他人都谨记着索多玛城的教训。

★

玛迈尔的信众们沿着铁路转过一个弯，他们发现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一辆客运列车。也许每个犹太聚居区外面都有第二辆列车等着，使玛迈尔信徒不必和梅克尔信徒坐同一辆车。列车很老旧，从上世纪的报废品里拼凑起来的一样。远处的机车头看上去那么小根本担不起拉动整列车的重任。但曼德尔感觉这还是比隧道那一头的货车和混乱要好多了。曼德尔很肯定火车的管理员正在下一个犹太聚居区等待着下一趟列车运送一批犹太人。这里从来就没有那么多旅行或商业的需求，而现在却突然有了交通车流，这土地上的犹太人真是多啊。

“怎么回事？”拉比对曼德尔说。“你人最高。去看一看。”

路过每一节车厢，曼德尔都踏上金属踏板，双手拉着车门口突出的把手升起身子。他的手很大，来自家族遗传。格洛南的手据说像铲子一样大。曼德尔的手——要小一点——一直都很柔软，笨拙但也不起眼。犹太聚居区的生活改变了他。它让它们变得坚硬而且具有某种威慑力。他双手抓住列车把手的那一刻，玛迈尔信徒们甚至怀疑曼德尔会跳到车窗的高度或者会把火车拉倒在他们头上。

只有曼德尔回头看向枪声的方向；其他人都谨记着索多玛城的教训。

曼德尔身体靠向右边，向车厢里撇一眼，然后宣告他的发现。“满了，”他说。“满了。”接着“还是满的。”拉比和他的跟随者们紧贴着像是一个整体随着每一声继续向前。

试到第四次，车厢是空的，曼德尔推开了车门。迈马尔信徒们一拥而上，还不知道到他们的好运气，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辆运送非犹太人的列车。

在任何一辆其他车辆上迈马尔的信徒们都不可能走那么远。但这碰巧是一辆杂技演员的车，车上都是为了某个重要表演在等待中转的表演者。他们是一群在战争时期四处旅行巡演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不会对任何反常的景象大惊小怪——他们对自己的这一点也非常引以为傲。而且，就如曼德尔事后发现的一样，他们中间还有那个最近才加入的罗

马尼亚人和他的熊。就是因为他——以及他的熊——那些在最后几节车厢里打瞌睡的乘客，看见了曼德尔的光头以及后面踉踉跄跄跟着的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傻子们，他们会觉得眼前的场景非常好笑，而不是奇怪。这是曼德尔的又一个人生经验。狙击手的子弹和生存机会之间只隔着一个小女孩的白日梦和人们对熊的喜爱。

这个罗马尼亚人带着的那头二手转卖来的熊既不会跳舞也不会踩上一个球表演，更不会假装凶狠地发出怒吼。它被用来在一架破旧的照相机前和孩子们合影，但它毫无用处，拒绝做任何动作而只是坐着。从这个特点罗马尼亚人琢磨出一个法子。他会把熊打扮成一个受伤的士兵，拖着他的毛茸茸的同志在舞台上转圈，同时发出炮仗配合他的政治讽刺台词。这会让观众歇斯底里的大笑。一个能得奖的表演！从这里他又想出了其他的把戏，把熊打扮成：消防员，暹罗连体双胞胎，以及——为了那些表演者们的喜好——新娘。当列车突突地缓慢爬上山的时候，罗马尼亚人会给熊穿上新娘的婚纱和面纱。他会从第一节车厢下车蹒跚地扶着他的新娘假装他们刚刚误了上山的蜜月火车。车上的表演者们欢乐地大声笑着，看着他沿着铁路跑着大叫着列车员并且被挂在自己腰上的一个巨大锡制怀表绊倒。这个罗马尼亚人是个滑稽的家伙。也是个强壮的家伙。能和熊一起奔跑的人都必须很强壮。

当迈玛尔的信徒们出现在列车后部的时候，所有看见他们的人都想起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是有多想念他的表演啊。想念那头小熊是怎么摸爬滚打的。像个真人似的。是的，能有一群新的耍把戏的人很不错。于是他们让出他们的座位，大声笑着这群剃光了头的傻子，这群没化妆的小丑——不，不是小丑，是杂技演员。他们这身苍白无色的装束只能是杂技演员——而且还那么瘦。正好是杂技演员的身材。踩钢丝的轻盈身材。

就是这样，迈玛尔的信徒们成功地登上了列车。

他们忙着选择车厢座位，寡妇蕾切尔还有空间架起双腿，用来把女人同男人隔开，让丈夫和妻子在一起，让他们中最小的沙拉加，十一岁的男孩，可以和他妈妈坐在一起。为了向以色列扫罗王用羊来数人的典故致敬，拉比用赞美诗的诗篇来计算他的跟随者，一个人就是一个字，他早就知道他会数不到尤切福德。这是降临在他们身上的诅咒。永远少一个字。

*

曼德尔曾是个梅克尔，但被迈玛尔的智慧所折服加入了他们的小团体，但他仍然保持了饮酒的爱好。他找到了列车上的酒吧车厢——在战争时期仍然保留完好的酒吧——他衣服上连口袋都没有，更不要提钱了，否则他能买一些提神饮料。他抓挠着自己长内衣的羊毛质地，盯着那些酒瓶，听着它们互相碰撞发出的轻轻如铃声般的声响。他特别被一个加铅框的水晶酒瓶所吸引。它里面的柔和的单一麦芽液体沿着内壁起伏，倒进玻璃酒杯，用一种曼德尔认为是非常残忍的方式挑逗着他。

刚刚带大家脱离了危险，曼德尔想要找一个好心人来请他喝一杯。而恰恰是以这种方式——一种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能把自私的举动变成奇迹的方式——曼德尔主动地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一位法国圆号专家称赞了曼德尔表演服装的粗制简单并邀请他和她一起喝一杯。就是她告诉了曼德尔他们被当作了杂技演员。在自由的交谈中，夹杂着对火车时间的延误的抱怨，她告诉他这些麻烦不断的列车的最终目的地。

“这个，”她说，“是大魔术师根特告诉我的——他其实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德鲁肯穆勒在鸽子和戒指的魔术上一一直都比他好。”她停下又叫了两杯白兰地。曼德尔伸出手碰到了她的手臂，又突然停住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如果这不是太铺张的话。”他指着酒瓶，红着脸，想起拉比关于暴饮暴食的讲演。

“很好的选择，很好的选择。我很乐意。”她一把把一只空酒杯敲在深棕色的桌面上（这桌面的颜色是如此深就仿佛是白兰地酒液渗过玻璃杯渗进了桌子的表面）。自从拉比梅克尔的手杖被没收之后他也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奢侈。“酒保，再来一杯威士忌。来一杯你们最好的。”酒保端上来三杯酒，音乐家把多出来的那杯白兰地倒进了自己的杯子。她一声不响地喝着酒。曼德尔默默地向她敬酒，在祈祷之后，抿了一口他的威士忌，长久以来的第一口。他让酒的煤烟味升起来充满他的头脑，希望如果他喝得足够慢，如果他让威士忌在舌头上停留足够长并且足够缓慢地一点一点滑进喉咙，那么也许他的味蕾就能像浸满了酒的酒桶上的某根橡木条那样得到永久的治愈。也许那样他就能在上帝给他的不管多少长短的余生里保有那份温暖和舒适了。

“不管怎么说，根特在给最高元首的一场表演结束后来到我们这里，在那里他美丽的助

手莱妮在化妆间里听一位官员夫人说起一种用火车变的无与伦比的魔术。他们在火车里塞满了人，婴儿都被塞进了乘客头顶的行李架上，底下已经没地方放人了——但是回来的时候火车完全变空了，就好像从没用过一样。”

“那些车上的犹太人呢？”曼德尔问。“他们在他们身上施了什么魔法？”

“敏捷的手法，”她说，不小心把酒洒在了桌上，同时她挥动手指做了个演示。“一种经典的幻觉。一开始他们还在这里，接着就不见了。”

“据那个官员的妻子说那些见证了这魔术的人们当场就昏厥了，被这幻术的宏大场面给吓倒了。刚开始的时候魔术师就站在那里，他脚下满坑满谷的犹太人，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她为了戏剧效果停顿了片刻，仿佛仍旧身处剧场。“火车空空如也。魔术师独自站在站台上。除了火车烟囱冒出的烟什么都没有。他表演的这个魔术，一阵烟又一阵烟，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

“根特听说这个以后就忘了德鲁肯穆勒和他的鸽子开始沉迷于兰妮告诉他的这个魔术。他会坐在酒吧边对着兔子尝试同样的把戏，把他那些兔子变成一阵阵的彩色的烟，粉红的，紫色的，有时就是灰色的。他发誓非要练成那个完美的魔术。但是他心里知道，你看得出来，他的魔术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一火车一火车的犹太人的宏大场面。有一次他问我的看法时，我对他说，根特，我说，那种超乎寻常的魔术不是靠灵巧的手指做到的。”听到这里曼德尔感到有只手放在了他膝盖上。

一喝完他的酒，曼德尔就跑回了坐满迈玛尔信徒的车厢并把刚才听到的恐怖故事转述给了拉比。曼德尔是拉比的爱徒。曼德尔也许不是执行上帝戒律最严格的那个，但他的身上有上帝的精神；这是拉比能看到的。出于这个原因他忽略了对小道消息的斥骂而开始掂量起他学生带来的最难以置信的报告。

一种经典的幻觉。一开始他们还在这里，接着就不见了。

“这不可能，曼德尔！”拉比说。

“他们的残忍没有底线，”寡妇蕾切尔叫道。

拉比在沉默中坐了几分钟，细想着去年发生的事以及所有那些在他眼前消失的人们。他觉得曼德尔说的也许是真的。

“我恐怕得说，”他说，“曼德尔刚才说的小道消息也许是真的。鉴于其重要性，重复传这件事不算罪。”拉比瞥了一眼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在原本他胡子所在的地方用手指捻了捻空气。“我们别无选择，”他说。“只有一个选项。我们只能做一件事……”迈玛尔拉比的信徒伸长了脖子等着他说下去。

“我们必须学会翻跟头。”

*

曼德尔小时候去看过马戏。在马戏团来表演的三天里，曼德尔偷跑进帐子看了每一场表演，藏在松木长凳底下从大人们不够长的双腿和铺着稻草的地面之间的空隙偷看。

虽然他不记得任何套路或者大胆的壮举，他的确记得，除了那些不可告人的部位的装饰片的闪光之外，让其他人相信他们是真正的杂技演员的秘密。那秘密无非就是大喊一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声“咳！”知道了这个，迈玛尔信徒们在走道里排成一排开始练习了。

“你们必须时不时地拍一下手，”曼德尔告诉他们。拉比早就已经接近老年了，所以他拍手和叫喊的次数远多于他跳跃的次数。

谁也没想到寡妇蕾切尔的手臂能外翻，或者舒梅尔·贝勒尔能手倒立在地上模仿螃蟹走路。曼德尔试图把身体挂在行李架上，结果摔倒在地板上，大笑不止。其他人也分享了这一刻的释放和他一起笑了起来。在这节靠近列车尾部的车厢里洋溢着真正让人感同身受欢乐。他们为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机会雀跃着。他们尽情放肆地大笑着，就像自由国度里的自由人一样。

拉比打断了大家的笑声。“即使在最陌生的环境里我们都必须遵守戒律，”他说。于是，就像教律对唱歌的要求一样，女性只能结伴才能翻跟头，男人不能去接住女人——但丈夫可以接住他腾空的妻子。

还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已经非常清楚他们的状态：饥饿和病痛使他们虚弱，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高强度地要求自己的身体——还要加上他们根本对杂技一无所知以及不停震动无法站稳的火车。至少，他们需要得到一些练习的方向。一两个窍门让他们可以入门。痛苦于眼前的状况，拉比叫停了他们徒劳的折腾。

“曼德尔，”他说，“回到你的饮酒八卦的世界里。给我们带一点杂技的秘诀回来。现在

这个样子，就连瞎子也不会被如此丑陋的摔倒所欺骗。”

“是的，就是你，”拉比说，把他往外赶。“快点。”

曼德尔没有动。

他看着这群迈玛尔信徒，想象其他人眼里的他们。他明白只有上帝的意志才能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更适合这群穿着统一服装的灵魂的归属地可能是疯人院的病房。他们被当作杂技演员实在是有点扯，瞥一眼就知道，受益于当时特殊的环境让人们没有起疑，这种情况有多珍贵，只有他们的首次亮相演出才能证明。这是一个荒谬的任务。但再一次，曼德尔想到，还有什么比他们逃离的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还有什么比消失的犹太人的魔术更难想象的。如果海乌姆的好人们能相信水就是酸奶油，如果那个在曼德尔床上醒来，穿着曼德尔的拖鞋漫步到窗前的农民能通过关上百叶窗就相信他看见的这些东西都是他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杂技演员一样翻过大地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呢？

“我要去带回什么？”曼德尔说。

“秘密，”拉比回答道，声音里带着锋芒，没时间再修正或澄清了。“上帝创造的每件事背后都有秘密。”

“还有针和线，”寡妇蕾切尔说。“还有剪刀。还有其他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曼德尔说。

“是的，任何东西，”蕾切尔说。“纸张或者细绳。任何针可以穿，线可以缝的东西。”

曼德尔对这个要求翻了翻眼睛。这寡妇说得好像他要去的的地方是斗鸡眼比拉的杂货店一样。

“他们会有，”她说。“他们都是艺人——永远都会有掉了的纽扣和扯坏的布料。”她对着曼德尔咯咯笑着，而曼德尔仍然翻着白眼。“像我们现在这身衣服，肯定不行。”

首先引起曼德尔注意的是桌上那个闪着光的圆号，旁边瘫坐着那个吹号手。他赶快过去坐在她身边。他看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森林。他试图发现被树林遮盖的隐秘世界。小尤切福德的农场一定就在那里，藏在树林深处的像伊甸园一般的一小块孤独的田地。它会在又宽又急的河流的另一边，那里连狗都闻不出犹太人的味道。

曼德尔敲了敲桌子想要叫醒音乐家，但一抬头却发现从吧台周围聚过来的诸多目光。这些观察者并没有显得不友好，只是出于好奇，旅行中的无聊，感兴趣——曼德尔认为——怎么会有一张新面孔已经跟一个女人这么熟了。

“是你？”她说，抬起头微笑着。“我那穿睡衣的骑士回来了。”她半有意识地扫视了一遍房间四周，那些看客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酒杯前。“酒保，”她叫道。“给我的骑士来一杯。”她把头枕在自己的臂弯里，把圆号移走，这样她就能毫无遮挡地看着曼德尔。“你在我的梦里，”她说。“你和根特。我不能再跟你讲这些故事了，它们像鬼魂一样不散。”

“我扯坏了我的演出服，”曼德尔说，“我唯一的一件。在最尴尬的部位。”

在桌子的遮掩下，她的手指一步一步沿着曼德尔的腿移上来。

“我想不出是哪儿，”她说，试图扑闪着被酒精弄的麻木的眼皮。

“线，”曼德尔说，“还有针。你不会碰巧有——”

“当然，”她说。她想要撑自己起来。“在我的车厢里，跟我来。我在那里给你缝。”

“不用了，他说。“你去，我待在这儿——要是你能的话，要是你不介意给我介绍一下的话，我急需建议。”

“等我帮你缝好，”她说。她掀起嘴唇，用多年混迹风尘的姿态着重强调了她的意图。“离这就两节车厢。”

“你去，”曼德尔说。“然后我们再聊。也许晚上晚一点我回来你的车厢让你帮我加固缝线。”曼德尔眨了眨眼。

圆号手撇了撇嘴走了，踩着火车的节奏蹒跚着离开看上去正好保持了某种平衡。曼德尔偷偷查看了打开的圆号盒子。从里面摸索着他找到一块印着花的棉布，都被唾液沾湿了。他向四周看了看，若无其事地把布塞进了他的袖子里。

*

“这叫沃尔特全旋，”曼德尔说，试图模仿他刚理解的动作。他在充满烟味的餐车里半学半展示时，记住的和忘记的差不多，等他回到迈玛尔信徒那里转了两圈后又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在他身体笨拙的诠释那动作时又再次不知所措了。

舒梅尔贝勒很有动力，第一个尝试这动作，证明了——正如他这整个下午做的那样——只要是需要配合时间的动作他都几乎毫无用处。在他的抗议下，因为他也想要出一分力，

舒梅尔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在演出时他只需持续在台上来回倒立行走就行了。动作协调性对寡妇蕾切尔和施拉加的母亲，以及——毫无意外的——拉比来说都是问题。为了他们，曼德尔再次回到餐车去寻找更简单，更少挑战的动作。对于施拉加，一个天生的钢丝绳表演者，他要求有更复杂的动作组合。

曼德尔在车厢间停留，思考着眼前的铁轨和枕木以及它们带来的机会。要是他现在跳出去，以蹩脚的杂技技巧翻滚到路边或者旁边的野地里会怎么样？要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另一个噩梦，追求一种和现在的处境差不多的随机无望的命运；或者干脆低下身子把自己塞到火车轮下一劳永逸——面对这种没有奇迹的永恒会有多简单？思考再三，曼德尔两者都没选，他感到风打在脸上的感觉，移步迈进下一节车厢，越过人群，轻声说着对不起，一路保持着微笑，他的感知此刻锐利得像是等待觅食的鸟，鹰眼般注视着零散的棉布或者谁遗落的丝带，任何能带回去给蕾切尔的东西。

还有什么比他们逃离的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还有什么比消失的犹太人的魔术更难以想象的呢

有两个男人，永远站在同一扇窗前抽着数不尽的雪茄，渐渐认识了曼德尔并开始开他的玩笑。这两人特别注意到他衣服外面挂着的额外的碎布片。“要做布娃娃吗，”其中一个会说。另一个，转着手里的雪茄，喷出一口一口又一口的烟，仿佛他自己就是一列火车，把雪茄从嘴边拿下说道，“你们有多少人，每人都有这么一块装饰的布吗？”

跟这些车厢数目一样多，曼德尔在心里说，跟火车数目一样多，跟这铁轨的长度一样多。跟被抓起来的人，等在火车站的人，继续迁移到下一个地方的人一样多。跟天上落下的雨滴一样多，除了在海乌姆，他们在海乌姆把雨水收集在水槽里变成一股一股的酸奶油洪流。

*

每一次曼德尔回到迈玛尔信徒这里，他都觉得车厢像是空的一样。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簌簌抖动的窗帘，或者是蕾切尔睡眠惶惶地微笑着——她因为动作太慢而没来得及在他进来之前把自己藏起来。这让他想起以前有陌生人间进海乌姆时的小城中心。所有的本地人都会消失，包括斗鸡眼比拉尔，他还经营着旅店。（这个旅店是智者们的主意——不管欢不欢迎外乡人，不能让人说海乌姆是个连住宿都没有的乡下地方。）最终，出于好奇或恐惧，一个忍受不了悬念的居民会冒险出来看一眼。此时准备来大肆表演三天的马戏团早已经搭好台放好椅子，老虎都在倒扣的桶上就位了，三天里在那里坐了三次，直到有一位智者长老敢率先进帐子瞥一眼。

“都出来吧，”曼德尔叫道，“天要黑了，我们还有事要做呢。”座位单间的门打开了，曼德尔叫所有人坐在位子上。“施拉加，”他说，“还有费泰尔和扎哈瓦。我们几个把整个动作分解成几部分，每个人只学自己的那部分。”

“不，”拉比说。“没有时间了。要是再过一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我们该怎么办？”

“有时间，”曼德尔说。“火车现在根本不动。前面车厢的人都下车沿着铁路走了一段，再跳上火车的时候只向后移了几节车厢而已。明天整个早上直到中午都是我们的。那个圆号手告诉我——我们是要去参加一个晚会表演。”

“听上去他们在骗你，”费泰尔说。“他们也许知道我们是谁。”

“他们知道吗？”扎哈瓦问。

“他们知道什么？”小施拉加走出他的座位隔间，一脸恐惧。

“没人知道曼德尔说如果他们知道的话我们早就完了——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至于练习，分解动作练习是很聪明的做法。这样能让你休息一下，拉比，让蕾切尔有时间缝制衣服。”曼德尔对蕾切尔微笑着，她正在给费泰尔扎紧胸前的软木。费泰尔咬着一点线头来躲避传说中的死亡天使，因为只有死人才穿着衣服缝补。“这叫动作编排，拉比。这些事就是这么做的。”

理解了这一点后，他们在整节车厢的走道里开始练习动作编排。那些没轮到的人就坐在座位隔间里，门开着，试图从眼前飘过的一鳞半爪里记住动作。这就像是通过一页一页翻一本书来学习如何跳舞。

有人开始练习侧手翻和空翻了，滚的东倒西歪，施拉加，有一股子蛮劲，而且身材瘦削，更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腾挪，倒是展现出极大的潜力。拉比看了说道，“我的孩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谁知道你会成为什么啊。”

迈玛尔信徒们练习到练不动为止。那一晚在他们酣睡的时候，前面的火车司机鸣哨向

对面另一条轨道开过的火车致意，那辆车载着那些赴死的人开往另一个方向。

施拉加第一个起来，天亮前一个小时。他在每个人身上轻拍一下叫醒他们。每个人都突然从睡梦里惊醒，向四周看了一会，紧张又困惑。

他们立刻又开始了练习，在黑暗中竭尽全力。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拉比打断了他们。“从那下面站起来，”拉比对蕾切尔说。她正坐在地板上撕座椅底下绑在四角的衬垫布料。她会用这些布料缝制扎哈瓦心口的月亮装饰。“过来，”拉比说。曼德尔正在把弄蕾切尔缝在他一个袖管上的勺子，同时在建议施拉加跳跃的幅度，他和其他人一起围到拉比的座位隔间。

“我们要从这场历练里幸存下来需要不止一种投入。”拉比边说边看向窗外。

他们男女分开，开始念自己的清晨祈祷词。这举动并非说明他们对眼前真正的危险视而不见，而是他们不被这危险占据心灵的证明。他们高声呼唤天堂。他们说完之后有一刻停顿，一刻寂静。仿佛他们在等待上帝的回答。

火车停了。

它停下的时候费泰尔正跳在半空。他落地时受到比火车更大的冲力向前屁滚尿流地撞到了坚硬的墙上。

“我的背都断了，”他说。其他人都没有理睬他。他的声音里并没有真正的紧急。车窗外是一排又一排的铁轨一个连一个的站台以及第一排无法数清的高楼那高楼理所当然地，比巴别塔更高。

费泰尔站起来的时候，那些艺人们早就开始涌出站台，拖着行李箱和手提包，装衣服的包和圆角银扣的化妆盒。

车厢的门被一把推开，一个人跳了进来。他留着一撇稀疏的胡子，就像是雨槽一样把汗水分开分离苍白的双唇。那汗水是如此充沛；他的脸显而易见地涨红着，新的汗珠不断冒出来。

“你们是谁？”这个男子问道。“这群乌合之众是演什么的？”

曼德尔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是杂技演员。”

“你们是从垃圾堆上翻下来的吗？”

费泰尔感到自己服装的可笑，把手盖住了胸前由香槟酒瓶塞组成的五角星。

“没事，”那个男人说道。“你们需要多少准备时间？”

“准备？”曼德尔不知所措。

“我可没有耐心。我们已经晚了三个小时了。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不是你们的。”一只手臂从门那边伸出来。男人看了眼手腕上的表，尽力擦掉眉毛上的汗水。这只手跟他一点都不配，仿佛这个入侵者是由不同零件散装起来的。他的脸更红了，鼓起腮帮子吹出口气。“准备时间，”他说。“跳床，鞍马，高空秋千。需要搭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曼德尔说。

“就你们这个样子，嗯？可以。那么，很好。”他看上去冷静了一点。“那么就你们第一个上。现在快下车帮其他人把家伙搬到剧院去。”

迈玛尔信徒们冲出了门，曼德尔张大着嘴看着那高楼，随着它眼光一直升到天上。他吹响一声口哨声继续盯着看。那既美丽又充满威慑力。这整个地方都充满威慑力，因为每一种奇观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损坏，每一样美丽的事物都混杂着战争的灰色。想要逃离这层阴影，举办宴会，盛装出席舞会，即使是敌人这么做也显得像是一场闹剧。那灰色的调子无处不在。表演者们匆匆走着，脸上带着演出前特有的阴郁的表情。每个人都是冒名顶替者。他们在台上摆出的笑容，曼德尔知道，会闪光。

寡妇蕾切尔用一根绳牵着一只猴子。猴子手里拿着一个香蕉，多年来的第一次。寡妇会快走几步然后突然停下。那猴子会做出同样的举动。她弯曲的手指捏成了一只爪子，准备第一时间掳走奖赏。曼德尔站在她身后，头顶着一个箱子，看着蕾切尔试图从一只猴子手里骗走一只香蕉。他很惊讶，如同每一次一样，见证一种新的堕落，看见又一种不幸的冲击力大到足够让他要落下泪来。他深呼吸了一下，努力忽略掉不公正的感觉，那些有钱人的情感，那种曼德尔已经放弃了的一次又一次体验恐惧的自由的感觉。

*

只有一会儿工夫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一座宽度和整列火车一样长的建筑。内部的装修一定也宏伟异常。但迈玛尔的信徒们没有机会去看拱顶上产生视觉错视的壁画或大堂

里装饰的金叶子。他们快速穿过两扇门被领进了后台。

当一切进入开始的节奏，那些表演者的情绪也产生了变化。人群中流动着一种新找回的能量，一种高度集中的职业精神。即使是那些餐车里的酒鬼，曼德尔在走道里擦肩而过的疲惫的抽烟的人都突然展现出精准的动作。曼德尔注意到一个杂耍演员一把抓住猴子，用一种漠然的蛮横把这个动物强行塞进了裤子里。曼德尔还注意到那些上了年纪的舞者把脸藏在带着镜子的化妆箱背后，重新抬起头时他们所创造出的青春面貌让房间里任何一个位置上的人都不会质疑。曼德尔恐惧得直冒冷汗，看着这些无恶意的准备动作，试图从中分离出那让他不安的东西。

每个人都是冒名顶替者。他们在台上摆出的笑容，曼德尔知道，会闪光。

舞台经理急匆匆地过来了，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他手上拿着锡制的剑，看到任何闲着没事干的人就大叫“快点”，曼德尔明白他最大的恐惧即将到来。那恐惧来自在场每个人展现出来的效率，干脆的跳跃动作，纪律和秩序。他从一开始就看到这些了，从侵略者步入小镇的那一天起，他们发现广场空无一人，开始踢每家每户的门，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竟然能花时间找到这样一群快乐地隔离在地图的一个小黑点上的海乌姆的傻子们，从这一点体现出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就是这种精准的效率，曼德尔知道，会抓住他们。

“这就好像我们是在地球的深处，”蕾切尔说道，指着那些狭窄的通道，沙袋以及数不清的绳子和螺钉。

“哪一个是用来下雨的？”费泰尔说。“哪一个是用来丰收的？”

“哪一个是用来救赎的？”拉比说道——他的语气充满接近绝望的悲伤。

“你们做得很好，”曼德尔说。他不管一切曾经被教化的礼仪戒律，伸出手碰了碰蕾切尔的面颊。“我们的演出极丰富想象力。”他把两个手肘并在一起，袖子上的勺子发出钟声一样的撞击声。

“简直是用一针一线制造的奇迹。真的。”这句称赞来自扎哈瓦，穿着用香烟盒子做成的胸甲，她的膝盖处缝着许多烟斗清洁毛刷。

寡妇伸出一只手臂挽住扎哈瓦的腰——她一直是这么瘦的女孩子，即使是在以前也是——把她拉过自己的身边，就像以前那些安息日的早上她们一起从祈祷室走出去的时候那样。蕾切尔用尽力气紧紧的抱住她，扎哈瓦，用更温柔的方式回抱着她。她们两人都闭着眼睛。很显然她们沉浸在另一个地方，她们回到了那间小祈祷室门外，山茱萸正满开，两人都穿着新衣服，虔诚而美丽。

曼德尔，拉比，以及费泰尔，所有没能加入这个拥抱或者逃进过往美好日子的迈玛尔信徒都扭开了头。这一幕用任何平常的抵抗力都无法承受。他们重新抬起目光时扎哈瓦在年长的寡妇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这一吻时如此真诚，以致于曼德尔试图把它的重量一切为二：

“你要知道，”他说，“从来没有一节意外登上的二等车厢里可以做出那么多东西来。”

他的蹩脚的玩笑没有引起一丝微笑。这只让迈玛尔的信徒们再一次移开视线，急切地寻找一个可以安放他们目光的地方。

可能是来自一个漏了的烟斗，屋顶上的一个洞，或者那个来回奔忙的舞台经理沾满汗水的下巴，但最可能的是某个匿名的眼睛里滴下的泪。它滴在了地板上，就一滴，就在拉比的右侧。

“这是什么？”拉比说。“我受不了这个。一分钟都不行！”

曼德尔和其他人都做出一副毫不知情的表情，好像他们没有感知到在他们周围蔓延开来的沉重和失败的气氛。

“过来，过来，”拉比说。“我们是第一个上，施拉加还没练好沃尔特全旋呢。”他用脚打出四拍的节奏。“哈，”他说。“从最上面开始，”他说，穷尽了他所学到的全部词汇。

他们让出一块空地走了一遍流程，拉比不让他们有一刻休息，曼德尔全心全意地爱着他。开幕五分钟前经理来找他们了就是在那时从舞台的侧翼他们看见了一切猩红的地毯，华彩的金色穗带，支型吊灯以及画着壁画的屋顶——充满英雄人物，仙女和星光——被精致的装饰条框住，而那些装饰条本身也有木雕的粉红脸颊的小天使装饰，还有观众——穿着长裙头发高高盘起的女人，穿着军装的男人，胸前别满了因为高效，勇敢和力量而获得的奖章。这是一群地位显赫重要的观众，那种会让人出汗的观众。左边楼上还有一个包厢，里面坐着一位领导人和他的随从，一个有着巨大权力的人，曼德尔能感受到，在场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注视着他。支型吊灯暗下来了，舞台灯光亮起来，经理轻声说“上台”，于是施拉加迈步走上了台。其他人跟着上去了。很显然。他们跟着上去仅仅因为也没有其

他事可以做了。

一会儿，又一会儿，又一会儿，他们都站在了舞台上，什么都看不见。蕾切尔用一只手挡住自己的眼睛。观众席上传来一声咳嗽，然后是一个笑声。还没等回音消失拉比就叫道：

“站到你们的位置上！”

他们抬起头，站直身体，在坚硬的地板上四散站好位置。

“哈，”拉比叫道，他们的编排开始了。寡妇蕾切尔起跳一次然后站到一边把两个手肘外翻的手臂翻转过来。曼德尔，光彩照人的曼德尔，竟然完成了一个半转身跳跃，在施梅尔贝瑞尔的协助下（也是他唯一的任务）定格在向天展翅的天使造型。没有站到位的费泰尔，没有接住向他冲过来的妻子。扎哈瓦落地是撑在了踝关节上，发出一声清脆，清晰的骨裂的声音。她没有因疼痛而抽泣，马上站起来。尽管即使从楼上的包厢里都能看出她的脚不对了。观众席上传来一声惊呼，然后是一片寂静。然后从楼上，左上方，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曼德尔知道那是来自哪个包厢。他知道是那个最豪华的包厢，那个身板最直最高，那个有魔力的人，肯定。当然，这也只是推测，因为他怎么能看见呢？

“看啊，那个声音说”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笨拙。有一个停顿，然后是一阵耸人听闻的爆笑。这笑声回响着让楼下的观众也发出会心的笑声，他们笑得没有那么厉害——他们不想超出限度。曼德尔回头看向拉比，拉比耸耸肩无可奈何。年轻的施拉加，天生的幸存者，向前跳了一步似乎要继续。扎哈瓦向前移动到寡妇蕾切尔身前，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肩上。

“再来，”一个声音喊道。“这场滑稽戏不可能已经结束了吧。再来！”这个声音说道。又一个声音，是女人的，从同一个位置发出刚好传到台前。

“是的，继续，”这声音说道。“继续犹太人芭蕾。”跟着是一阵愚蠢的大笑，就像刚才那个爆笑一样，观众们也跟着大笑起来，大而空旷的回声让人感觉似乎天花板上那些木雕的小天使也在笑着。

拉比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用脚拍打地板。

曼德尔挥手让他停下，向前踏出一步，向台下移动，追光灯刺眼地毫不留情地打在他的皮肤上。他只管向前走，脚灯走进黑暗中，他的双手裂开了，没有血色，骨节突出，像个入侵者。

曼德尔手掌向上抬起，在黑暗的笼罩中。

但是此刻没有狙击手，瞄准伸出聚居区的手；没有烈犬，扑向从货车车厢缝隙中伸出的手；没有天使，就像他们一直以来那样沉默隐身，等待着从烟囱里伸向铺满烟灰色云彩的天空的手。

[1] 波兰城市，位于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在历史上，该地于 1815 年转属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 9 万人死于当地两个德国战俘营。1944 年 7 月 22 日波兰共和国在此宣告成立。

[2] 七七节是犹太传统节日。



内森·英格兰德

美国小说家，1970 年生于纽约，被视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犹太裔作家之一。曾获美国笔会 / 马拉默德奖和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奖。

译者：徐振锋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任职于广告公司，并从事翻译工作。

《杂技演员》选自内森·英格兰德短篇小说集《欲望的重量》（*For the Relief of Unbearable Urges* copyright © Nathan Englander, 1999），译文由群岛图书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为电影《美国牧歌》剧照

小说

“就从你住的这个镇子开始吧，这就是阻止战争的办法”

菲利普·罗斯 | 发现经典

他的生活就是被这颗炸弹摧毁的。
爆炸的真正受害者是他本人。

我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找他。我从瑞典佬那里得知杰里住在佛罗里达，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一直是孤僻的家伙，除了他自己那些令人费解的兴趣外，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似乎他现在也不太可能有比过去更多的心思来忍受同班同学的才智。谢利·明斯科夫刚和我告别几分钟，杰里就大步走过来了，身穿和我一样的蓝色双排扣休闲西装，胸部像个大鸟笼，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一束绳样的白发罩在脑门上。他的体型真的有些古怪：尽管宽大的上半身替代了笨拙少年擀面杖似的胸部，但他移动身躯时支撑他的还是那长梯样的双腿，丝毫不比卡通片《大力水手》里的奥丽弗·奥尔的那双长腿粗一点或好看一点，还在学校时这种步态就显得极为笨拙。我一眼就认出那张脸，在那么多的下午，当时我自己的脸成了他仇恨聚集的焦点，我总看见他这张脸在乒乓球台上疯狂的舞动，只因争强好胜、总想置人于死地的秉性而呈深红色——是啊，这张脸的特征我永远不会忘记，四肢颇长的杰里的疙疙瘩瘩小脸，是一种四处觅食的野兽固有的面具，让你不得安宁，直到被他从巢穴里驱赶出来。这张雪貂脸明显地表示：“别和我谈妥协！我根本不知什么叫妥协！”现在这脸上具有的只是他一生的固执，总想将球抽向另一家伙的咽喉。可以想象，杰里采取了与他哥哥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在众人面前也显得极不平常。

“我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杰里说。

“我也没料到。”

“我原以为这种场合还不够让你大驾光临。”他笑着说，“我敢肯定你会觉得这种多愁善感有些多余。”

“这正是我认为你会有的想法。”

“你是那种从生活中驱除了所有多余情感的人，毫无回家之类的愚蠢的渴望。对虚幻的东西也不再具有耐心，只会将时光花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不管怎么说，他们坐在一块，

对这些东西称什么‘过去’，其实它们连过去的碎片之碎片都算不上。这是一种没有被引爆的过去，没什么真的能被挽回，空洞无物只剩乡愁，大家废话连篇。”

这寥寥数语使我知道自己是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只说明了他为什么娶四个妻子，就是娶八个、十个或十六个也不难理解。每个人在重逢时都不免陷入深深的自我陶醉，但这是另一种宣泄。杰里的身躯可以被分为瘦骨嶙峋的孩子和体格高大的男人两种，但他的性格始终如一，冷漠地习惯于让人洗耳恭听。这是怎样的一种进化！从行为古怪少年成长为自信男人。先前那种笨拙的冲动似乎被改造成极具智慧和决心的某种混合体。其结果是他不仅成为只知发号施令而从未想过要按他人意见行事的那种人，还成为了你可以指望他搞点事情的那种人。一旦杰里脑袋里有了什么主意，不管多么不切实际，最终结果都不坏。孩童时代如此，现在似乎更是如此。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在孩提时代对他那么入迷，第一次意识到对他的迷恋不仅因为他是瑞典佬的弟弟，更因为他作为瑞典佬的弟弟的那种决然的与众不同，他与那个三项运动全能的人相比尚未完美顺应社会规范的阳刚之气。

“你为什么来了？”杰里问。

关于前一年对癌症的恐惧和前列腺手术对泌尿系统的功能影响，我没有直接讲什么。更确切地说，只是说了些该说的东西。这并不全是为我自己，我答道：“因为我已六十二了，在所有那些乡愁的废话形式中，我估计这种场合最不可能缺乏使人不安的惊奇。”

他欣赏这种说法。“你喜欢使人不安的惊奇？”

“也许吧。那你为什么来了？”

“我碰巧要来这里。反正周末我不得不过来，所以就先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我认为他们没想到他们的作家这么简洁、这么谦虚。”当我在用餐接近尾声、被主持人请到麦克风前时，心里对这种场合该讲的话早有准备。（主持人是艾文·勒威因，有四个孩子，分别为四十三岁、四十一岁、三十八岁和三十一岁，有五个孙辈，分别为九岁、八岁、三岁、一岁和六个月。）我只是讲道：“我叫内森·祖克曼，是四年级第二学期班会的副主席和班级舞会小组的成员。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孙辈，但十年前做过一次五倍分流手术，这使我感到自豪。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给他们的自述，多少如同要求的那样，要么关于医疗，要么让大家有点好笑，说完便坐下。

“你想听什么？”我问杰里。

“就那些，正是你讲的那些，不用装腔作势。威克瓦西的普通人。还能有别的？你的行为总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你甚至孩提时代就这样，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的自由。”

“我想那更适合用来描述你，杰尔。”

“不，不。我找到的是不切实际的办法。个性轻率，小鲁莽先生，每当事情不顺，我马上就会发病，开始高声大叫起来。你才是那种对事情有大局观的人，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条理。就是在以前你也对什么都爱动脑筋、估计形势、得出结论什么的。对自己也很在意，满脑子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个敏感的男孩。不，这一点不像我。”

“是啊，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可是花了血本。”我说。

“对，做坏事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绝对不可容忍。”杰里说道。

“现在容易些了？”

“不用担心，手术室使你成为绝不会出错的人了。就像写作一样。”

“写作使你成为常出错的人。你曾以为有的幻觉是对的，实际上却是一种使你无法自拔的保守。还能是别的？作为一种病态，并不会完全毁掉你的生活。”

“你生活得怎样？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在某本书的封底上，读到过你和一位贵族住在英格兰。”

“我是住在英格兰，但没有什么贵族。”

“那么是和谁？”

“没有谁。”

“不可能。你要和谁共进晚餐怎么办？”

“我不用晚餐。”

“只是目前，分流术带来的智慧。但我的经验是：一个人哲理的保质期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事物总在变。”

“看这就说明了生活已离我而去。我很少见到其他人。我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小地方，那里到处是丘陵，我与开综合商店的家伙和邮局的那位夫人交谈。那夫人是邮局的局长。就这些。”

“小镇叫什么？”

“你不会知道。在森林里。离一座叫雅典娜的大学城大约十英里。我刚开始写作时在那

里遇见过一位著名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谁还在意他了，他的有关美德的看法已不适合当下的读者了，但在以前人们都敬重他。他现在像个隐士，离群索居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太苛刻，他却坚持认为这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正在解决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某些问题从我的生活中溜走了，这就是问题。在商店里谈波士顿红袜队，在邮局里谈天气，就这些，这是我的社交话语。我们是否值得有那样的天气。当我来取邮件时，外面阳光灿烂，女局长对我说：‘我们不值得有这种天气。’毫无疑问。”

“女人呢？”

“完了。生活中没有晚餐，也没有女人。”

“你是谁，苏格拉底？我不这么认为。纯粹是个作家，一心只想当个作家，没有别的。”

“一直没有别的，我让自己少受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罪，我就是靠这个才免于沾上那狗屎。”

“‘狗屎’指什么？”

“我们相互间的印象，一层又一层的误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毫无用处，自以为是，完全是目中无人。我们只靠这些看法活下去。’那是她，那是他，这是我。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够了。你知道几个月前我见到谁了？你哥哥。他对你说过？”

“不，他没有。”

“他给我写信，约我到纽约吃顿饭。信写得不错。我突然心血来潮，就开车去见他。他打算为你家老头写颂词。他在信中请我帮忙，我也想知道他的想法。他来信说想写点东西，这使我很惊讶。对你而言，他只是个哥哥，对我来说他依然是‘瑞典佬’。你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家伙。我不得不去。但在餐桌上他根本没提颂词的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番。就在一个叫作文森特餐馆的地方。就这些。和从前一样，他看起来很不错。”

当我来取邮件时，外面阳光灿烂，女局长对我说：‘我们不值得有这种天气。’毫无疑问。

“他死了。”

“你哥哥死了？”

“星期三去世的。两天前举行的葬礼。在星期五。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泽西。看着大哥去世。”

“因为什么？怎么死的？”

“癌症。”

“但他已做过前列腺手术。他说已经取出来了。”

杰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还告诉你什么？”

“他有点瘦，没别的。”

“还有别的。”

所以说，瑞典佬也死于这种病。这种病，令门蒂·格里克吃惊的是，夺走了敢死队中一半人的生命；这种病，令我吃惊的是，一年前使我成了“纯粹的作家”；伴随所有这些让人愈加孤独的损失，一切都消失，每个人都走掉，这种病也让我层层剥落，成为一个日渐衰老、所有的能力只为着始终不渝的单个目标的人，一个不管是否喜欢都只在字里行间寻求慰藉的人，却尽力从事所有那些事情中最惊人的事业：完成描写战争期间威克瓦西地区不可战胜的英雄、我们社区的护身符、带着传奇色彩的瑞典佬。

我问道：“我见到他时，他知道自己麻烦吗？”

“他有他的希望，但他肯定知道。转移了，蔓延到全身。”

“听到这些我很难过。”

“下个月就是他的第五十次同学聚会，你知道星期二他在医院里说了些什么，他死掉的前一天对我和他的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里他语无伦次，但有句话他讲了两遍，所以我们听明白了。他说：‘到我的第五十次聚会去。’他好像听到班上每个人都在问：‘瑞典佬去吗？’所以他不希望大家失望。他很坚强，是个惹人喜爱、简朴单纯、吃苦耐劳的人。他不懂幽默，也不注重情感，只是个可爱的家伙，命里注定要被某些真正的疯狂举动所操纵。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个平庸之人，没有坏毛病，生来不善言辞，长得也端庄，过着人人想过的普通生活，就这么回事。符合社会准则，仁慈和蔼，等等。但他尽力去做的是生存下去，使自己的人不受到伤害。他努力使自己的那一排人无一伤亡。这对他来说终究是场战争。这家伙也有高尚的一面。他一生中有些令人痛苦的自我克制。他陷入一场自己并没有发动的战争，所进行的战斗就是为了使大家团聚，但他倒下了。平庸、普通——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人们会想起这些。我不想作评判。我兄弟是这个国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绝对如此。”

我当时就在想，杰里说这番话是否是他瑞典佬还活着时就已形成的看法，是否一点不带哀悼者常有的那种重新评价，以及对他给予他一表人才的哥哥更为苛刻的杰里式的

看法表示出的后悔。他哥哥那么完美、那么有条有理、那么稳重和规范，每个人都景仰他，他成了社区的英雄，而这个小的利沃夫只要有什么和他雷同总被人拿去和他比较。刚才这番对瑞典佬不算评判的评判完全可以看成是杰里的一大长进，是几小时前才产生的同情心这种情况常在人们去世后出现与他们的争执也烟消云散人们有呼吸时缺点那么多，有时让人忍无可忍，现在却让你感到最为可亲。当你坐到灵车后面豪华轿车里时，昨天以前你还一点都不喜欢的东西，已成为不只是令人同情的，而且是让人羡慕的事业。到底哪种评价有更大的真实性？是葬礼前的那种不刻意讨好，在日常生活的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严厉的评价，还是在那以后家庭聚会时被极度的悲哀控制时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外人也说不清。棺材入土时的情景能使人们心里起很大的变化，忽然间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嫌弃这死去的人，但看见棺材对寻求真相的心理究竟起多大的作用，我没有什么把握。

“我父亲，”杰里说道，“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讨厌鬼。他独断专行，到处插手，也不知人们是怎么为他干活的。他们迁往中央大街时，他让搬运工首先运的是他的书桌，他要放的第一个地方不是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里，而是在工厂的正中心位置，这样他就可以监视所有人。你无法想象外边的噪音，缝纫机呜呜作响，冲切机不停地撞击，数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把他的书桌、他的电话和他这大人物围在当中。身为手套厂的老板，他却常常亲自扫地，特别是剪裁机周围，人们在那里下料，他想从皮料碎块上知道谁让他亏损。我很早就告诉他去他妈的，但塞莫尔从来就不像我，他性格宽厚，所以人们拼命指责他，说很难听的话。一个永不满足的父亲，那些永不满足的妻子，还有那个小害人精——怪物女儿，就是妖怪梅丽。他曾经就是那么个顽固的家伙。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他绝对是个不容置疑的成功人士，吸引了许多人将一切都献给了厂。非常精明的商人，知道如何裁剪手套，知道如何做成生意，对第七街上追逐时髦的人们有很大影响。那里的设计师们什么都对这家伙讲，所以他总能保持前卫。他到纽约时一般都会进商店逛逛，买点竞争对手的产品，从他人的产品中找出特色。常常就在店里，他看看人家的皮料，拿起手套用力拉，像我们老头教他的那样去做。大多数产品他亲自去销，结算所有的账目。女顾客被塞莫尔弄得神魂颠倒。你可以想象，他到纽约来，请这些粗野的犹太佬聚餐，这些买主可以使你成功，也可以使你破产。他招待他们大吃大喝，而这些人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他对这些人阿谀奉承，而是在晚饭结束时，他自己被人捧上了天。圣诞节来临时，他们总给我哥送戏票和苏格蘭威士忌，而不是他去送人家。他知道怎样以自己的为人去赢得这些人的信任，他琢磨出顾客最喜欢参与的慈善活动，弄一张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年度大餐的入场券，像电影明星一样穿上晚礼服亮相，当场捐出一大笔钱资助癌症病人、肌肉萎缩症病人，管它什么，反正是些犹太人联合倡议的东西，都由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付账。他什么都了解：下个季度的流行色啊，服装的长度是增加还是减少啊。真是个招人喜爱、责任心强、工作卖力的家伙。六十年代遭到几次不愉快的罢工，局势非常紧张。他的雇工也参加罢工，看到他坐在车里来到现场，几个为他缝手套的妇女就跪下道歉说不该离开缝纫机。他们对我兄弟比对工会更忠诚。大家都爱戴他，他是个决不会犯愚蠢错误的完人。除了手套，对他而言没有理由去关心其他事。然而他却在后来的日子里遭受了羞辱、猜疑和痛苦。人们常在乎的那些问题从未把我兄弟难倒过，他以另外的方式获得生活的意义。我不是指他这人单纯。有些人认为他单纯，因为他一生都对别人这么好。但塞莫尔绝没有那么单纯。单纯是没错，但从来不是那种单纯。另外，那种自我反省也是他很久才学会的。如果说有什么比扪心自问更糟糕的事在生活中过早出现的话，那就是扪心自问来得太迟。他的生活就是被这颗炸弹摧毁的。爆炸的真正受害者是他本人。”

“什么炸弹？”

“小梅丽心爱的炸弹。”

“我不明白什么叫‘小梅丽心爱的炸弹’。”

“梅丽蒂丝·利沃夫。塞莫尔的女儿。这个‘里姆洛克的爆破手’是塞莫尔的女儿。就是那个炸掉邮局、杀害医生的高中生。这家伙为阻止越战，将早上五点钟去寄信的人轰上了天，一位去医院上班的医生。迷人的小孩。”他语气里全是鄙视，似乎还容纳不下他所有的鄙视和仇恨，“用炸掉商店里的邮局的方式把战争带回家乡，发泄到林登·约翰逊身上。地方太小，邮局只好设在综合商店里，实际上不过是店后面的一处柜台，有几排带锁的箱子，那就是邮局的全部家当。到那里去买清洗剂、卫生药皂和力士香皂时顺便买几张邮票，古怪迷人的美国传统。塞莫尔喜欢这些奇怪风俗，那孩子却不。他将孩子从现实中救了出来，可这孩子把他送回现实中。我兄弟以为他能将全家从人间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带回到以前的里姆洛克，而她却将他们送了回去。不知何故地把炸弹安放在邮局的橱窗后面，爆炸时也将商店炸坏了。被炸的那人就是途中顺道去寄邮件的医生。再见吧，美国！你好，现实！”

他陷入一场自己并没有发动的战争，所进行的战斗就是为了使大家团聚，但他倒下了。

“我没听说过这些，一点也不知道。”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事，当时人们的野性刚刚暴露出来。忽然间人们不得不去弄清楚疯狂举动的缘由。到处都是公众活动，限制被取消，权威软弱无力，孩子们都疯了。大家都感到威胁，大人不知结果会怎样，他们手足无措，这是演戏吗？革命真的来了？还是游戏？是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将国家弄了个底朝天，大人也开始疯狂。但塞莫尔不在其中。他是那种知道自己道路的人之一。他明白有什么不对头。但不像他那个胖妞一样是个胡志明狂，他只是个自由派的可爱的父亲，只懂日常生活的哲学大王。他用人们理智对待孩子的现代思想将她养大，一切都容许，一切都谅解，而她却恨透了。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怎样恨他人的孩子，这个小孩却轻而易举使人们承认，她很痛苦，自以为是从出生以来这小坏蛋都没什么长处。看，我也有孩子，孩子很多，我知道孩子成长时是怎么回事。自我沉溺的黑洞是无底的。长胖是一回事，长头发是一回事，大声放摇滚乐是一回事，但超过极限扔炸弹就是另一回事了。那种罪行永远也弥补不了。那次炸弹事件后，我兄弟没有了退路，那颗炸弹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完美的一生结束了，这就是她存心要做的。这就是人们（那女儿和她的朋友）怨恨他的原因。他运气太好，众人爱戴，他们就因为这个恨他。有一次我们全部到他家去过感恩节，有德威尔妈妈、多恩的胞弟丹尼、丹尼的妻子、利沃夫家族的所有人、我们的孩子，大家都在场，塞莫尔站起来敬酒。他说道：‘我是个不信教的人，但当我看看这一桌人，我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将光辉洒到我身上。’那些人真想搞掉的就是他，他们做到了，毁掉了他。那炸弹其实可以就在他们的客厅爆炸。那次暴力事件将他的生活弄得很糟、很恐怖。他这一生都没有机会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当一切都顺利时，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以前上帝是如此庇护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杰里以前也这么关注他哥哥的生活、了解他哥哥的事吗？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奇怪的大脑里聚集的所有那些专横意念也允许他把注意力投向许多方面。死亡并不会对自我迷恋的威严带来冲击，总的说来反而会强化它：“我怎么办？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呢？”

“他告诉过你很可怕？”

“曾经说过，只有一次。”杰里说，“不，塞莫尔只是默默承受，忍下去。你仔细观察这家伙，看着他，他会一直努力干。杰里苦涩地说道：“可怜的杂种，他命该如此——天生要承受重担、咽下苦果。”他这么说的时，我想起瑞典佬从混战的人堆中用力摆脱出来，手里总抓着球，在很久以前那个深秋的下午我是多么深地爱上他，当他选中我进入瑞典佬利沃夫生活的幻影时，改变了十岁的我。那时我有一阵似乎觉得自己也被伟大的事业所召唤，既然我们天神仁慈的面容只照亮我一个人，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篮球从不像这样，跳级生。”那种直率在我听来是多么迷人啊。他使我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是一九四三年一个少年想得到的一切。

“决不屈服，他很坚强。记得吧，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他加入陆战队打日本人？是啊，他成了该死的陆战队员。只有过一次妥协，就在佛罗里达。”杰里说道，“他实在受不了。他带着全家来看我们，有孩子们和第二任非常自私的利沃夫太太。那是在两年前。我们全部到了那个吃石头蟹的地方。一共十二人就餐，噪音震耳，孩子们都极力表现自己，笑声不断。塞莫尔喜欢这个样子，风流倜傥的一家全在那里，生活就如同人们期望的那样。但当馅饼和咖啡端上来时，他起身走开。我看到他没马上回来，就出去寻找。他待在车里，泪流满面，浑身颤抖，抽泣着。我从未见过他那样。我哥是块岩石。他说：‘我想女儿。’我说：‘她在哪里？’我知道他一直清楚她在哪里。多年来她东躲西藏，他总去看她。我相信他们经常见面。他说：‘她死了，杰里。’起初我还不信。我想这是免得我去跟踪。我以为他一定刚在某处见过她，不管她到哪里，他都会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个杀人犯。这杀人犯已四十多岁了，而她杀害的人却不能死而复生。但当时他抱住我，又松开，我不由得想到：是真的？家族里这可恶的怪物真死了？但如果她已死，他又哭什么？若他有一半的头脑，就会意识到，有个那样的孩子真是太出格了。若他还有一半的头脑，早就该被这孩子激怒了，并在多年前与她形同路人、分道扬镳了。多年前他就应该把她从头脑里剔除干净，让她滚得远远的。这愤怒的孩子越来越疯狂，还有使她丧失理智的神圣事业。哭得那样——为了她？不，我不吃这一套。我对他说：‘不知你是撒谎还是讲实话，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她死了的话，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没有其他人会对你这样讲，他们都会深表同情。但我和你一块长大，所以与你直言相告。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让她死，她不属于你，她不属于任何与你相关的东西。她不属于与任何人相关的东西。你玩球——得有玩球的场地。她并不在场地上玩，甚至一点都不沾边，就那么简单。她在圈外，天生的畸形人，以不受约

束的方式行事。你要停止对她的悲伤，你敞开自己的伤口长达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够了。这已使你发疯。再这样下去会要你的命。她死了？好！让她去。不然会腐烂在你的脑子里，也要夺走你的生命。’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我以为能让他发怒。但他只是哭，不肯罢休。我说过这家伙会被这桩事弄死，他真的死了。”

杰里是说过，而且没说错。这是杰里的理论，认为瑞典佬不错，指的是消极，指的是总在努力去做正确的事，一个受社会制约、不发脾气的人物，从不轻易发怒。愤怒的感情既不是他的债务，也就不是他的资本。按照这种理论，恰恰是这种忍气吞声最后毁掉了他。而进攻性却有净化或疗伤的功能。

看起来杰里能坚持下来，毫不犹豫或者说毫不后悔，不屈不挠地执着于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因为他对愤怒有特别的天赋，他另一种特别的天赋是不回头看。我想，他从不回头。他不因记忆憔悴。对他而言，回头看就是无聊的怀旧，甚至包括瑞典佬的那种回首往事，二十五年后还想到炸弹爆炸以前的事，回想过去，无益地为与那颗炸弹一起烟消云散的一切哭泣。对这女儿施以正当的愤怒？毫无疑问，这样想会好受些。不可否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正当的愤怒更使人振奋。但在这种情况下，要瑞典佬超越之所以成其为瑞典佬的界限，这不是过分要求吗？在他的一生中，人们肯定常对他这么干，以为他曾经是神秘的瑞典佬，总是法力无边。我在文森特餐馆就那样干过，小孩式的期盼被他天神般的气质震慑，结果却见他完全和常人一样。要让他人将你看成神的代价就是使追随者的梦境永不消减。

“知道塞莫尔的‘致命关注’吗？致命关注他的责任，”杰里说道，“被责任完全吸引。他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打球，他却到乌普萨拉，因为父亲要他离家近些。巨人队给他一份双 A 球队合同，美国职业棒球小联盟中排在第二的实力等级，仅次于 3A。小联盟球队一般附属于大联盟（MCB）母队，为其青年球员或受伤、弃用的球员提供训练、康复和比赛的机会。，有一天还可以和威利·梅斯打球——他却到中央大街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工作。我父亲让他从制革厂干起，把他放在弗雷林乌森大街一家制革厂干了六个月。每周六个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知道什么叫制革厂？制革厂就是狗屎堆。还记得夏天的那些日子？强风从东边吹过来，硝皮的恶臭弥漫威瓦西公园，笼罩在整个社区上空。啊，他从制革厂毕业，塞莫尔做到了，壮得像头牛。父亲又让他在缝纫机前待了六个月，塞莫尔目不斜视、专心掌握那台该死的机器。给他一只手套的皮料，他能缝制起来，比那些缝纫工干得更好，还只用一半的时间。他可以娶到想要的任何美女，但还是和漂亮极了的德威尔小姐结婚。你应该见过他们。迷人的夫妻。他们俩到美国各地旅游时总笑容满面。她是天主教后代，他是犹太教后代，一起到里姆洛克老街去养一群吃小谷物早餐长大的后代。可他们得到的却是那个该死的孩子。”

他从不回头。他不因记忆憔悴。

“德威尔小姐怎么啦？”

“他们住的房子没有一间是合适的，银行的存款不管多少都不够。他让她去养牛，搞不好。让她办苗圃，也不行。他带她到瑞士做世界上最好的整容手术。甚至还没到五十岁，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了，这就是那个女人想要的。所以他们艰难跋涉到日内瓦，让曾给格蕾丝王妃做过手术的那家伙来给她整容。他要是在双 A 球队日子会好过些；要是在凤凰城和某个女招待胡来，到马德亨斯打一垒，也会混得不错。那该死的孩子！她口吃，你知道。因她口吃，她要报复大家，就引爆了那炸弹。他送她到语言矫正师那里去，到诊所，看心理医生。为了她，他有干不完的事。可回报呢？砰！这女孩为什么要恨她父亲？这位伟大的父亲，这位真正了不起的父亲，英俊、和蔼，有责任心，不想别的，只为他们——他的家庭着想。为什么她追着他不放？我们自己那可笑的父亲怎么养出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而他却生了她？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因为基因需要分离？所以她不得不离开塞莫尔到切·格瓦拉那里？不，不对。引起这些，使这可怜家伙的余生被置于自己生活之外的毒素是什么？他一直从外面窥视自己的生活。他命里的搏斗就是埋葬这东西。但他能行？怎么干？能指望一个像我哥那样魁梧、可爱、讨人喜欢的傻子去对付这颗炸弹？某一天生活开始嘲笑他，就再不会停下来。”

我们就谈了这些，这就是我从杰里那里听到的全部内容——要再多一点就只好自己补充了——因为这时一位身材娇小、头发灰白、身穿褐色便服的女士走过来做自我介绍。而杰里这人天生就不会在有第三人出现时待上五秒钟，所以向我玩笑般地示意后便消失了。当我后来再去找他时，听说他早走了，去纽瓦克乘飞机回迈阿密了。

我写完他哥哥后——这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干的事：连续六小时、八小时，有时十小时去想瑞典佬，与他交换孤独，占据这个和我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物，消失在他体内，日夜揣摩这位显然空虚、天真和朴实的人，再现他的崩溃，把他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描绘出来，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将改掉那些姓名、把突出身份的标志掩盖起来前，我有一种业余作家的冲动，想给杰里送一份草稿，听听他的意见。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写作和出版到目前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打消这种念头。“这不是我哥，”他一定会告诉我，“一点也不像。你误解他了。我哥不会那样思维，不会那样说话。”等等。

是啊，现在杰里可能早已从葬礼后突然使他陷入孤寂的那种客观现实和积怨中恢复过来，那种积怨使他成了医院里人们不敢与之交谈的医生，因为他永远不会错。而且，还不同于大多数有成为众人楷模的亲人去世的人，杰里·利沃夫只会因为我没能像他一样抓住瑞典佬的悲剧实质感到好笑，却不会发怒。很有可能：杰里心里厌烦、嘲笑般地翻弄我的草稿，一项一项地带给我坏消息。“那妻子一点不像这样，孩子也不是那样，连我父亲都弄错了。我没说过你引用的那种话。但是，伙计，不提我父亲就如同谷仓少了一堵墙。娄·利沃夫是头畜生，伙计。这家伙不中用。他有魅力，他是和事佬。不，与我们所知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手里有剑，老爸暴跳如雷、订下规矩，就这么回事。不，没什么相似之处……比如这里，说我哥有心计，通晓事理。书中这人对失败很明智，而我哥认知上有问题，这丝毫不像他的思维，他没有这般理智。耶稣啊，你甚至还给他一位情人。完全是判断失误，祖克。绝对离题了。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捣腾出这般东西？”

但是，若杰里的反应真是这样，他不会听到我太多辩解。我去过纽瓦克，找到了中央大街下段荒凉街区里被废弃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我到威克瓦西看过他们的房子，现已失修，还去了克尔大街，我在那条街上从车里钻出来，沿车道走向车库，去看看瑞典佬以前常在冬天练习挥球棒的地方，可这么做看来很不明智。三个黑小子坐在前面台阶上紧盯着车里的我。于是，我解释道：“有个朋友以前住在这里。”见他们没回答，我加了句：“那是在四十年代。”随后我开车离去。我驱车到莫里斯顿去看梅丽的中学，然后到西面去了旧里姆洛克，找到在阿卡狄山路上塞莫尔·利沃夫一家曾度过青春幸福时光的大石头房子。然后就到村子里一家新开的综合店（麦克弗森商店），坐在吧台边喝了杯咖啡。这家店铺取代了原来那家被利沃夫十几岁的女儿炸掉邮局的商店（哈姆林商店）。她为的是要“把战争拉回美国”。我到过伊丽莎白，那里是瑞典佬美貌的妻子多恩的出生地。我在她所住的艾尔莫拉宜人的街区转了转，开车经过她家常去的圣日内维夫教堂，再一直向东到她父亲住的伊丽莎白河边的老码头一带，这些地方在六十年代由古巴移民和后裔取代了最后那批爱尔兰人。我还从新泽西美国小姐大会办事处搞到玛丽·多恩·德威尔的光面照片，一九四九年她才二十二岁，那时她正被加冕新泽西小姐。我也找到她的另一张照片，刊登在一九六一年的《莫里斯周报》上：拘谨地站在壁炉前，身着休闲西装、裙子和高领毛衣，画面上题为“利沃夫太太，一九四九年新泽西小姐，喜爱生活在一百六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她说这种环境反映出她家的价值观”。在纽瓦克公共图书馆我查阅了《纽瓦克新闻报》（一九七二年停刊）的运动版的微缩胶片，搜寻瑞典佬为威克瓦西高中（一九九五年已陷入困境）和乌普萨拉学院（一九九五年停办）增光添彩时的记叙和得分情况。这是五十年来我第一次重读约翰·R. 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甚至一时认为自己所写的关于瑞典佬的这本书也可称为《来自克尔大街的男孩》。在土尼思一九四〇年为康涅狄格州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们写的小说中，那个孤儿作为联赛的主力队员唯一的缺点就是总想将右肩下垂而向上摆动，啊，就这点毛病也足以刺激诸神来毁灭他。

然而，除了这些和其他的努力，我所发现的瑞典佬的世界使我早就想承认我心中的瑞典佬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然，根据这些线索，他给杰里留下的基本影响已荡然无存，也从我的印象中消失，因为这些都是我不了解或者不想知道的东西。瑞典佬的形象在我的书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聚集起来，与他肉体聚集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是否这意味着我想象出一个富于幻觉的人物，完全缺乏真人独具的本质，是否我头脑里关于瑞典佬的概念比杰里所想的更荒谬（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他的想法荒谬），是否瑞典佬和他的家人在我心里显现时没有在他弟弟心里那么真实——也许，谁知道呢？谁又能知道呢？要描绘像瑞典佬这样令人琢磨不透的人物，了解那些人人喜爱、多少有些不愿抛头露面的普通小伙子，谁只要有兴趣都可以猜，在我看来主要是看谁的猜测更周详一点。“你不记得我，是吧？”这位使杰里匆匆消失的女士问我。她热情地笑着，把我的双手握住。她精心打扮的脸庞在短发的衬托下，显得又大又实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棱角分明，恰如罗马君王的古石雕。她虽然面部有着如同用刻刀划过的深深刻痕，但在玫瑰色的妆容下也只是嘴唇周围皱纹较多，在经历几乎六个小时的亲吻后，唇膏差不多蹭光了。此外，

她的肌肤尚有些许姑娘的柔性，显示出她好像没有遭受女性通常经历的种种磨难。

“别看我的姓名牌，我是谁？”

“你告诉我。”我说。

某一天生活开始嘲笑他，就再不会停下来。

“乔伊丝，乔伊·赫尔本。我有件粉红色安哥拉毛衣，原来是我表姐的，艾斯特尔的，她比我们大三岁。她死了，内森，归入尘土了。我漂亮的表姐艾斯特尔，她抽烟，和比她大的男人约会。在高中时，她和一个每天要刮两次胡子的男人约会。她父母在政府大街有间礼服和束胸衣店，叫格罗斯曼。我母亲在那里上班，班级坐于草车出游时你跟我亲热过。信不信由你，我那时叫乔伊·赫尔本。”

乔伊：聪明的小女孩，披着髻曲的淡红色头发，圆脸上有些雀斑，丰满性感，总也逃不过罗斯卡先生的眼睛。我们这位体态肥大、有个红鼻子的西班牙老师，每天早晨当乔伊身穿毛衣到学校时，总要她起立背诵家庭作业。罗斯卡先生称呼她为“酒窝”。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日子里，人们总能干成许多掩人耳目的事情，我却一无所知。

因为语言的联想并非完全不可靠，乔伊的形象持续地逗弄我，不比罗斯卡先生受的影响少，我最后一次见她从政府大街跳上车到学校，当时她穿一双古怪但有挑逗性的、敞开口的橡胶鞋套，明显是她哥哥长大后不能穿才传给她的，就像她漂亮表姐的安哥拉毛衣一样。每当有几行约翰·济慈的名诗不知怎么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总会想到她在我身下的那种充实丰满的感觉，她美妙的浮力是我这种青春期的男孩敏锐的雷达即使在干草车上隔着厚呢外套也感觉得到的。那些诗句是取自《忧郁颂》：“……尽管唯有嚼过欢乐之酸果 / 味觉灵敏的人方才有缘看见。”

“我记得那次出游，乔伊·赫尔本。你在大车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而我现在看起来像斯宾塞·屈塞，”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我再也不害怕了，可太晚了。我过去很害羞——现在再也不那样了。哦，内森，我老了。”她叫道，我们拥抱着，“老了，老了，多么奇怪。你那时想碰我裸露的胸部。”

“只要那样就能让我满足。”

“是啊，”她说，“那时刚长起来。”

“你十四岁，它们大约一岁。”

“总有十三年的差异。那时我比它们大十三岁，而现在它们却比我大十三岁。但我们肯定接吻了，是吧，亲爱的？”

“哟啊，哟啊，吻个不停。”

“我练习过。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练接吻。”

“和谁练？”

“在手指上。我当时应该让你解开我的胸罩。若你想，现在也行。”

“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全班人面前解开一只胸罩了。”

“真令人吃惊。当我准备好了，内森却长大了。”

我们来回嬉笑着紧紧抱住对方腰向后仰这样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部和身体的变化，那是半个世纪的生活对人体的改变。

是啊，我们不停地打量对方，从头到脚，用身体接触，所花的那么长的时间正如我在那架干草车上疑心过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样关键。这肉体，人们不管怎么用劲也无法将自己剥离出来；只要是在死之前，人们都无法逃避肉体的束缚。早先我看见阿伦·梅斯纳时，就好像在看着他父亲。现在我望着乔伊，看到的则是她母亲的样子，那位袜子卷到膝盖，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罗斯曼礼服店里的肥胖的女裁缝……但我想着的则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的肉体对他暴君式的控制。这么孔武有力、才华横溢同时又孤独寂寞的瑞典佬，生活从未使他变得精明，他并不想作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垒手度过一生，只想做个人人能认真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没完没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婴儿。他想最好自己不是这么个天生的体育奇才，似乎对一个人来说，仅有那种天赋是不够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称的更崇高的呼唤，而他的霉运便是找到了这种呼唤。校园英雄的这种责任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贵族义务一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传统观念，认为贵族阶级有义务为社会承担责任，即“地位越高，责任越大”。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种方式行事，早规定好了。你得谦虚，你得克制，你得恭顺，你得善解人意。这种英雄般理想化手段·这种被当做责任和道义壁垒的战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这些都运转起来，全因为那战争，因为那由战争引起的糟糕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情感脆弱的社区里的孩子们远离家乡、面临死亡，人们被这个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克制的小伙子如此深深

地吸引，因为他有天赋抓住任何人扔到他近旁任何地方的任何东西。对瑞典佬而言，在荒谬的环境中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难道还有别的？

一切只因另一桩事了结。一颗炸弹。

当我们在文森特餐馆会面时，他坚持认为他的三个男孩是多么好，可能是因为他以为我知道炸弹的事，知道他的女儿，那个里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样对他作过严厉的评价。这么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是这样——即使在二十七年后，人们又怎么能不知晓或忘记？可能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忍不住，即使想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谈谈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他首先想和我谈的是什么。他父亲心爱的人遭到的“打击”就是他的女儿——她像惊雷一样落在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他要找我谈的——想我帮他写出来。而我却错过了，我这个人的虚荣心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那么天真，可见我远比我所谈及的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餐馆，我只从瑞典佬那里挖到最浅层的珠子，而他想告诉我的却是这个：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内心生活，这故事悲惨、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这是个终极团圆的故事，而我却全错过了。

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他觉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错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来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来他还能掩盖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时也能忍受一些，这次又向他袭来，势头比以前更猛。他尽力把一切抛到一边：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个优秀的男孩。在我看来，早在一九八五年，在希尔体育场我见到他与年轻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将这些抛在一边了。瑞典佬从地上爬起来，他确实这么做了——有了第二次婚姻，对理智和传统约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枪，可传统重塑了一切，无论巨细，形成抵御不当行为的屏障。这第二枪也是对想做传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丈夫和父亲的观念的再次冲击，要求他重新对作为家庭秩序核心的标准条例和规定做出保证。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错位的、特别的、不恰当的、难以接触和理解的东西，他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即使是瑞典佬这个上帝赐予了凡人该具备的一切品质的人物，也不能像决裂者杰里指示的那样去摆脱那个女孩，尽力完全摆脱那种疯狂的占有、父亲的责任、对已失去的女儿的偏爱，抹掉那个女孩和那段历史的一切痕迹，从“我的孩子”的歌斯底里中永远跳出来。要是他真能渐渐忘记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没有那么伟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给予的最糟糕的教训，可毫无作用。而当一切发生时幸福不再同时降临。这都是人为的，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是以完全与个人和个人的经历疏离的代价换来的。这可爱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用他温和的方式处理冲突与矛盾，这信心十足的前运动员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战斗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对抗不公平的方式（人类交手时难以根除的恶习），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种自然的高贵品质也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不可能再那么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满足于相信旧的瑞典人方式，但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们的三个男孩——为了他们天真的完整性——他还是冷酷地假装下去，他冷峻地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时间来试验忍耐力。一场劫后余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过的是双重生活。

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

现在他濒临死亡，支撑他度过双重生活的东西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老天见怜，那种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时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没，现在却整个地回来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为和对了不起的孩子们的父爱。在身患癌症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恐惧又回来了，比以前更糟，她回来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夺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这时他想：“有这么个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个作家，或许我可以告诉他……”但他把一切告诉了作家后又会怎样？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写有关父亲、有关儿子的事，我给他写信谈谈我父亲——他会拒绝？也许他会对此回信。”抛出的鱼钩为的是我。但我来则是因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鱼钩，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来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讲给一位专业人士……”但他约我到那里后，他却不能讲。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并不需要。他对此事有了别的更好的看法，他是对的，那一点都不关我的事。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你找到某人，你会想：“我把这事告诉他吧。”但是，为什么？这种冲动就是诉说，会使你解脱。那也是为什么事后你会难受——你解脱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惨和糟糕，也不会因此而好转，只会恶化。这忏悔般的袒露心迹只会使苦难加重。瑞典佬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种木头人，他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些。他意识到通过我也会一无所获。他肯定不愿

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样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时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随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后回家，将故事藏在心里，带入坟墓。我错过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错过这一切。

现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们的妈妈还会待在里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亲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亲肯定有九十岁了，在九十岁的年纪为她心爱的塞莫尔服丧。而那女儿，梅丽蒂丝，梅丽……显然没有来参加葬礼，和身材魁梧但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见面，意欲报复的叔叔认为有责任将她抓来，交给警察。等杰里走后，她离开藏身之地前来悼念，亲自到旧里姆洛克，可能经过伪装。她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继母，还有祖母一道，为她父亲的死号啕大哭……然而没有，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对杰里说的是真话，四处躲藏的女儿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该发生，至少对他是这样。

这位战无不胜的人物的毁灭真是惨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发生在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身上的那种事。即使在孩童时代我们就知道，对他来说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谁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的方式被搞得四分五裂？美国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松动脱落，一路飞旋来到旧里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脱俗的气质、他的荣光、我们对他的英雄角色使他摆脱自我怀疑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些富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死是政治谋杀，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约翰·R·土尼思的托姆金斯韦尔男孩的殉难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约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岁，是另一个命运的宠儿，也是一个浑身流露美国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岁时被人暗杀。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儿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约翰逊的战争、毁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认为，理所当然，他是我们的肯尼迪。

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个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同学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更多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鲁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他们住在商店楼上的阁楼里，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雙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科奇普莱恩斯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墓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与她毫无顾忌地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有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想……当你感到忧伤，梦想……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一九四八年秋天的干草车上时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哈罗德睡在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解开胸罩。我不想你成为我的男朋友来接我去玩，发现我哥哥在哪里睡觉。这和你无关，亲爱的。”

“唉，要是告诉我，我会好受些。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样。”她说道。开始我们还在笑，但乔伊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首该死的歌曲《梦想》。我们过去常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家里的地下室调暗灯光，随着这歌声起舞。那时候花衣魔笛乐队里还有乔·斯塔福德，他们总是认真地、以固定和声演唱这首歌，和着四十年代那种病态紧张的节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击打声。她哭也可能是因为阿伦·梅斯纳成了共和党人；二垒手伯特·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埃塞克斯县法院报摊前擦鞋，他逃离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医生；朱里尔斯·平卡斯植上十四岁少女的肾，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靠药物控制身体的排斥现象而导致全身颤抖；门蒂格里克依然是个十七岁的毛小伙子；乔伊的哥哥哈罗德在厨房里睡了十年；希里马娶了个年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没有让他想割喉的糟糕体态的妻子，但他还需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单影只，连个孩子或孙辈也没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话说，“类似那样”。毕竟分别多年后，这种团聚将完全陌生的人们拉到一起待上的时间太长，那些任意发泄的情感也在我身边慢慢滑过，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在越战时期带给他和家人的狼藉名声。他这个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不满，而在中年时才觉醒过来，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这些常态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美国可预见的未来从实实在在的美国历史直接展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变得更聪明，懂得上一辈人的不足和局限，每一代人

又一点点地脱离乡土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在美国的权利，将自己造就成摆脱传统犹太人风俗习惯的理想之人，不带一点从前美国的那种不安全感和古老的桎梏，心地坦然地作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这种未来被打断了。

失去了这女儿，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复制品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似乎他才是逃犯，将他赶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的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

所有这些常态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

以前在这个国家里，两代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是固定的。那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会认真对待规定，反复去适应我们生来所处的文化氛围。而现在为了成功，这老一套的后移民争斗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我们超凡的瑞典佬以务农为乐的绅士城堡里那么病态。一个人就如同堆积在一起的一副扑克牌，展开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他将要遭到的打击做好准备。尽管他小心翼翼、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善意，可怎么会知道安分守己的生活需要这么高的赌金？人们顺从无非就是想降低赌金。漂亮妻子，漂亮房子，他的事业如施了魔法，把一个老人的那点事情弄得干净利落。真的不枉此一生，这是他的乐园。这便是成功人士的生活。他们是良民，只觉得幸运和感恩戴德，上帝朝下对着他们满脸堆笑。有问题，他们调节。但一切都改变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谁朝下面任何人露出笑容。还有谁能调节？人们生来就不会应付生活中的逆境，更别说应付不可能的事情。但谁又生来就会对付将要发生的不可能的事情？谁生来就会对付不可理喻的悲剧和苦难？谁也不会。人们毫无准备时悲剧往往降临，这就是每个人的悲剧。

他从外部窥视自己的生活。他生活中的挣扎就是要埋葬这种东西，可他又怎么能办到？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机会问问自己：“事情怎么会成这样？”当过去一切都很正常时，他为什么要去费那番心思？为什么事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那之前他一直承蒙上帝的恩宠，根本没想到有这种问题存在。

一百个老人大胆地将时钟调回到大家对时间的流逝毫不在意的那个年代，所有这些力图复兴我们班在本世纪中叶那种天真浪漫的激情随着下午的愉快时光的流逝即将结束，这时我开始深思那个使瑞典佬临死都大惑不解的事：他是怎么成为历史的玩物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是你在书本上、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东西，却一路钻到平静的、交通不便的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来到乡下。这里自从华盛顿的军队曾两次冬季驻扎在邻近的莫里斯顿以后，历史上就再也没什么可提的啦。历史这东西，在独立战争后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大的波及，这次却回到这些与世隔绝的丘陵地带，令人难以置信地、带有其可以预见的偶然性地、跌跌撞撞地钻进塞莫尔·利沃夫四平八稳的生活中，然后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人们常用长远的眼光看历史，可实际上历史是个突如其来的东西。

就在此时此地，我一边搂着乔伊随着过门乐曲的节拍晃动，一边仔细考虑，试图搞清是什么造成那种命运，它一点不像人们为那位有名的威克瓦西三项全能运动员所勾画的。当时这首乐曲及其渲染的伤感恰到好处，当时瑞典佬和他周围的一切，他的城市和国家正处于繁荣的顶峰。那是人们最富有信心的年代，到处充满富于希望的幻想。乔伊·赫尔本再一次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她轻轻地抽泣声中只听见这昔日的流行曲向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老人召唤。“梦想……也许能够成真”，我将瑞典佬放到舞台上。在文森特餐馆的那天晚上，纵有上千个充分的理由，他也无法迫使自己要求我这么做。就我所知，他也没打算要求我这么做。使我写关于他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到那里去的原因。也许只是我在那里的原因。

篮球从不像这样。

在我的孩童时代，他就触动了我内心的东西，正如他对无数孩子做过的那样。那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最强的想象力。但期望自己进入他人的荣光之中，无论作为孩子或作为成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你若不是个作家则会一败涂地；但从美学

角度出发，你若是个作家也将一事无成。在其毁灭之中拥抱你的英雄，让你的英雄生活到你的灵魂深处，而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削弱他，你却想象着进入他的霉运中，不是将你同他处于崇拜焦点的那种无所顾忌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悲惨衰落的惶恐共命运——啊，这就是值得我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和乔伊待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瑞典佬和在这只不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战时在威克瓦西高中凯旋的日子到他女儿在一九六八年扔炸弹的岁月之间，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想到那种神秘的、令人烦恼的特殊的历史过渡期。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战争不时引起的动乱，一些家庭怎样失去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却没有，塞莫尔·利沃夫一家作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之一又是如何挨过来的。这些家庭富有忍耐力，是善良的，也崇尚自由意志，但他们的孩子却变得狂暴，走进监狱，或者消失到地下，或者逃往瑞典或加拿大。我想到瑞典佬的大崩溃和他是怎样把这想象为自己未能尽职而造成的。一切从某一刻起必须发生。他是否是任何事情的原因都不要紧。不管怎样，是他要自己负责的。他一生中都在这么做，让自己很牵强地去负责任，不只是一要控制他自己，而且要控制任何无法控制的东西，献出他的一切将他的世界聚合到一块。是啊，灾难的原因对他而言就是背离常理。瑞典佬对自己能有其他解释？肯定是背离常理，就那么一次背离常理，即使只是他自己把这看成是背离常理也罢。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起源于他的失职，他是这么想的。

挥去在文森特餐馆就餐时的光环，当时我匆匆忙忙地得出最不经思考的结论——单纯就是那种单纯——我放到自己舞台上的就是我们一路跟随进入美国的这孩子，他是下一次浸礼的关键人物。在这里人们就如同当年的新教徒一样自由自在，作为一个美国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也不必非要做个发明了众所周知的疫苗的犹太人或在最高法院占一席之地，也不是非得聪明绝顶、赫赫有名，成为人中豪杰，而是作为新教徒世界的同类，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国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随着《梦想》优美的旋律，我使自己渐渐离去，远离这团聚，我进入梦乡……梦见现实的岁月。我开始注视他生活的内幕——不是孩子们对其胜利狂喜不已的那种神或半神半人的生活，而是另一位易受伤害的普通人的生活。隐隐约约地，看吧，我发现他在新泽西的蒂尔，在海边的小屋，那个夏天他女儿才十一岁。当时她还离不开他的膝头，还不停地用各种爱称对他呼喊，如她所说忍不住要用指尖去探测他耳朵到头骨最近的距离的念头。她用毛巾裹住身体，跑步穿过房间，到外面的晒衣绳上取一件干浴衣，嘴里大声叫道：“谁也不许看！”好几个晚上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他正在洗澡的卫生间，当她看见他时大叫道：“啊，对不起，我的天——”“滚开，”她对她喊，“滚出去——我的天！”那个夏天有一次在海滩玩耍后和他单独驾车回家，被日光浴搞得昏头昏脑的，她懒洋洋地倚靠在他光光的肩头，她仰起头，一半天真一半大胆地、早熟地装出成年女性的样子说道：“爸爸，像你吻、吻、吻妈、妈妈那样吻我。”他自己也被晒得头昏脑涨的，整个上午和她在海浪里翻滚已是疲惫不堪。他朝下看见她游泳衣的一条带子从肩上滑落，乳头露了出来，那深红色的就和蜜蜂蛰过的肿块一个样。“不，不。”他说道，这使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把衣服弄好。”他虚弱地加了一句。她无言地顺从他。“对不起，小甜饼——”“噢，我自找的，”她说道，尽力控制住眼泪，又成了他叽叽喳喳的可爱的伙伴，“在学校也一样，和朋友一起也差不多。我一有什么念头就停不下来，我总被牵着走、走、走——”

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战争不时引起的动乱，一些家庭怎样失去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却没有

好一会儿，他看着她脸色变得那样苍白或者说扭曲成那样。她尽量把那个字拉得很长，特别是在那天，他几乎都忍受不了。“走、走、走——”而他比任何人更了解此时不能做的是。如梅丽所说，她“开始瞎胡闹了”。她尽可放心，作为父亲他永远不会在她开口时冲她大喊大叫。“冷静些，”他对多恩说，“放松点，别管她。”但多恩控制不了自己。梅丽开始口吃厉害起来时，多恩就用手搂着她的腰，眼睛盯着她的嘴唇，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能做到！”可她自己嘴上却说：“我知道你做不到！”梅丽的口吃让她母亲伤透脑筋，也害了她自己。“我不是问题——妈才是！”尔后老师也成了问题，她总在回避梅丽，尽量不让她回答问题。大家开始为她感到难受时，所有人都成了问题。后来她突然讲话流利、不再口吃，大家的恭维也成了问题。她特别憎恨人家夸她说话流利。只要人家表扬她，她就完全失去控制。有时候，梅丽害怕到一定程度时她会说：“我整个系统要短路了。”看到这个孩子能这样集中精力取笑此事，真令人惊讶——他这珍爱的快乐的玩笑家！要是在多恩的控制之下如此快乐就好了。但只有瑞典佬一人能接近她、改变她，尽管他总在克制自己不要恼怒地冲她吼叫：“如果你真的勇敢些，流利地讲话，你觉得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

吗？”这种恼怒从未表现出来过：他不像她母亲那样把手扭来绞去。当她陷入麻烦时，他也不会盯着她的嘴唇，或像她母亲那样纠正她的话。每次她讲话时，他不想将她变成不只是在这个家里而且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用尽一切办法，不让她将这种耻辱变成她成为爱因斯坦的特殊方式。他的目光告诉她他会尽力帮助她。只要和他在一起，她想怎么口吃都行。所以他对她也讲过：“不、不、不要。”他做了多恩宁死也不会做的事——取笑她。

“走、走、走——”

“噢，小甜饼。”他说，就在这时他知道夏天里双方看似无意的玩笑——两人细细品味的那种亲密感，太美妙了，无法放弃，但又不能太认真去考虑，去过分重视，完全超脱肉欲。这会随假期的结束一块消失，她又将整天待在学校里，而他也要回去工作，他们并不能轻易找回那种感觉。只是当他终于了解到这夏天的浪漫需要完全的再调整时，他引以为傲的平衡感才失调，一只手把她拉过来，激情地亲吻她口吃的嘴唇。这是她整个月都在索取的，可那时她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她想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有那种感情吗？他还来不及想就什么都发生了。她才十一岁。这在当时非常可怕。这不是任何他曾经片刻担心过的东西，这是一种你从未意识到的禁忌，是被禁止的、自然而然地认为绝对不能去做的事。你不过是轻而易举地，尽管只在一刹那间，做了这事。在他整个的生命中，不管是作为儿子、丈夫，甚至雇主，他都从未向任何这类偏离情感条例的事情屈服过，他被这些条例束缚。事后他老在想，这种奇怪的老辈错误究竟是不是他的责任感垮掉了，他的余生都在为之付出代价。这次的亲吻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味，也不是在模仿什么，以后也未重复过，持续了五秒钟……最多十秒钟……但这次灾难后，每次他刻意去追寻他们苦难的根源，寻到的便是那个反常的时刻。当时她十一岁，而他有三十六岁了。他们两人都被汹涌的海浪和火红的骄阳挑逗起来了，在从海滩一块愉快地往家赶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这些。

但那时他也在想，那天过后他可能太故意离她远些了，肉体上本来不需要离她这么远。他只是想让她明白用不着担心他会再一次失去控制，也不必担心她自己纯粹自然的糊涂念头，结果却夸大了那次亲吻暗示的内容，过分在意其挑逗性。他继续努力将此改变为一种完全无害的自发的关系，反而加重了这口吃小孩自我怀疑的负担。而他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帮她治愈！

那伤害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伤害梅丽？是那无法去掉的缺陷本身或者是将缺陷强加到她身上的人们？但怎么做的？他们除了爱她、照顾她、鼓励她，还给予她支持、指导和独立，这些都在他们看来符合常理——而这个还未开窍的梅丽却被玷污了！扭曲了！疯掉了！是什么所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口吃——他们都没有长大后引爆炸弹！梅丽哪里出错了？他对她做过什么错事，这么严重？亲吻？那次亲吻？这么残忍？一次亲吻就能将人变成罪犯？亲吻的恶果？是他的退却？那就是兽性？但好像不是因为他从此再没有拥抱她、触摸她或者亲吻她——他爱她。她知道这个。

一旦这种微妙的感情开始萌芽，自我反省的折磨就没有尽头。不管答案是多么牵强，他的问题总没完没了，他这个人以前从没有重要问题真的要问自己。那次炸弹事件后，他再也不能将生活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或者相信他的生活与他所想象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他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幸福的少年时光，他的成功，似乎这就是他们招致毁灭的原因。所有的胜利在他的审视下都显得肤浅；甚至令他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恶行。在他记忆中的过去再没有清白可言。他明白你所说的一切要么比你说的多，要么比你说的少；你所做的一切要么比你想要的多，要么比你想要的少。你说的和做的肯定会起作用，但这作用却不是你想要的。

他所了解的那个瑞典佬，心地善良、举止端庄、有条有理的塞莫尔·利沃夫，蒸发掉了，剩下的只有自我反省。他不能从脑海里去掉那种想法，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也无法诉诸那种有些邪恶的念头——所有的一切都出于偶然。他被容许进入了一个甚至比梅丽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宫：这里没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夜晚躺在床上时，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活想象成一张口吃的嘴和扭曲的鬼脸——整个生活没有原因和意义，糟糕透顶。他再也没有什么秩序的概念。一点没有。他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口吃者的思维，完全脱离他的控制。

除了她父亲，那一年梅丽热爱着的还有奥黛丽·赫本。在奥黛丽·赫本之前有天文学，天文学之前是四健会英语为 4H Club，一个美国非营利性青年组织，于 1902 年创立，它的使命是“让年轻人在青春期尽可能地发展潜力”。“四健”（4H）分别代表健全头脑（Head）、健全心胸（Heart）、健全双手（Hands）和健全身体（Health）。伴随而来的甚至还有使她父亲有点烦恼的一段天主教狂热时期。每次她到伊丽莎白去玩，德威尔外婆都带她上

圣吉纳维芙教堂。天主教小装饰品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房间，只要他还把它们当成小装饰品，只要她不出格，一切都相安无事。一开始是圈成十字架的棕榈叶，是她外婆在棕枝全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送给她的。那还不错。任何孩子都想把它挂在墙上。然后是蜡烛，放在厚玻璃里，有一英尺高，叫“长明蜡烛”，标签上有一幅耶稣的圣心画和一句祈祷词：“啊，耶稣的圣心，他说：‘请求吧，你将得到。’”那不太合适，但只要她不点燃它，只放在梳妆台上作为装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再就是一幅正在祈祷的耶稣的侧面像挂在床头上方，这一点不好，可他没对她说什么，没告诉多恩，也没对德威尔外婆抱怨，只是对自己讲：“没什么害处，一幅画而已，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英俊男人好看的画，有什么关系？”

甚至令他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恶行。在他记忆中的过去再没有清白可言。

有关系的是这雕像，一尊圣母石膏像，是德威尔外婆放在餐边柜和卧室梳妆台上的那些大雕像的袖珍版。这雕像使他和她坐下来谈话，他问她当利沃夫奶奶和爷爷来玩时，是否愿意将这些画和棕榈叶从墙上取下来放进衣橱里，还有那雕像和长明蜡烛。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尽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她有权利挂上自己想挂的任何东西，但奶奶和爷爷是犹太人，当然他也是，不管是对还是错，犹太人不会挂这些，等等。当然，她是个乖小孩，想过人喜欢，特别想讨爸爸喜欢，她小心翼翼，当下次瑞典佬的父母来旧里姆洛克时，不让他们看见德威尔外婆给她的那些东西。后来有一天，天主教的一切东西都从墙上和梳妆台上永远消失了。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做起事来全凭感情冲动，生活中全心全意地关注新的兴趣，激情一过，所有东西，连同那激情一道被锁进箱子，她自己又朝前走了。

现在是奥黛丽·赫本。她从她所能找到的报纸杂志上仔细搜寻这位电影明星的照片或芳名。甚至电影时刻表——“蒂凡尼的早餐，2 点，4 点，6 点，8 点，10 点”，她在饭后将它们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她的奥黛丽·赫本剪贴簿里。好几个月她进进出出，装出个顽皮小姑娘的样子，丛林小妖精一样优雅地闪进自己的房间，对所有反光的物体都转动卖弄风情的双眼微笑着，只要她父亲说一句话她便大笑起来，笑声里带有人们所称的那种感染力”。她买了《蒂凡尼的早餐》的录音带，在卧室里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听见她在那里模仿奥黛丽·赫本魅力无比的腔调演唱《月亮河》，非常流利。不管她有多装腔作势、卖弄风情、自我陶醉于大胆表演，家里没有谁表示厌烦，更不会去管她脑子里那个滑稽的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如果奥黛丽·赫本能帮她减少一点口吃，就让她继续那滑稽表演吧。这女孩，有上天赐予的金色头发、逻辑心理、高智商、成人一样的幽默感，并能如此对待她自己。她还有修长的四肢、富裕的家庭和独有的执着，什么都有，只缺流利。安全、健康、爱，可以想象的一切优势——只是无法在点个汉堡包时避免让自己蒙羞。

她多么用功！放学后，她两个下午去学芭蕾舞，两个下午由多恩开车送她到莫里斯顿看口吃矫正医生。星期六，她很早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后骑自行车跑五英里山路，去位于旧里姆洛克村庄里的当地巡回心理医生的小诊所，但这医生有一种谬论。瑞典佬发现梅丽尽管拼命努力，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他气愤不已。心理医生使梅丽相信口吃是她的一种选择，一种她表现出她特殊性的方式，当她意识到多么奏效时便将自己封闭在里面。医生问她：“如果不口吃，你父亲会怎么看你？你母亲的感觉又会怎样？”他还问：“口吃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瑞典佬不明白让孩子感到要对她不能做到的事负责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去见这位医生。到他离开时，真想宰他。

从病因学上讲，梅丽的问题似乎与她有这么漂亮和成功的父母有关。瑞典佬竭力理解医生的话，认为医生的意思是父母的好运让梅丽吃不消，所以她从和母亲的竞争中退却，任由她母亲在她的头顶上罩住她、关注她，结果导致她采取极端手段。另外，为了从漂亮的妈妈身边夺走父亲，她故意作践自己，成为严重的口吃者，因而可以用一种表面的弱点操纵大家。“但梅丽的口吃使她自己很痛苦，”瑞典佬提醒他，“所以我们才带她到你这里。”她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遭受的惩罚。“有一阵瑞典佬不明白医生解释的是是什么，他答道”不，不，看见她这样口吃我妻子难受得要命。”“也许，对梅丽而言，那正是好处之一。她是一个绝顶聪明、操纵心理很强的孩子。如果她不是，你也不会对我这么生气，只因我告诉你口吃特别能操纵他人，即使不是报复性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行为方式。”他恨我，瑞典佬心想。这全是因为我看起来的样子。因为多恩的样子，他才恨我。他嫉妒我们的长相。这就是他恨我们的原因——不像他那么矮小和丑陋！心理医生说：“父母对有的东西那么关注，女儿有时却认为这种东西很无聊，所以她的成长过程很艰难。除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自然竞争，最要命的是人们会问小女孩：‘想长大后也成为你妈妈那样的新泽西小姐吗？’”“但没人这么问过她，谁问她这个？我们从来不问我们没有谈过此事，这话题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会谈它？我妻子不是新泽西小姐，我妻子是她母亲。”“可是人们会这样问她，利沃

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们问孩子各种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这不算什么问题。”“但你确实也清楚，当孩子根本无法和母亲比，甚至不能接近这种水平，她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会采取——”“她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注意点，我认为你可能将一种有偏见的负担强加到我女儿身上了，让她把这看成一种‘选择’。她没有选择，口吃的时候对她而言完全是地狱。”“她常对我讲的并不是那样。上星期六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梅丽，你为什么口吃？’她告诉我：‘口吃只是更容易些。’”“但你知道她那样说的意思。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指的是她就不用努力去做要不吃就非得去做的事。”“我刚好想到她在告诉我比那含意更多的事。梅丽可能甚至感觉到如果她不吃，那么，噢，天哪，人们将会发现她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里，大家不切实际地非常重视她讲的每一句话。‘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谁说我们是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耶稣啊。我们是普通的家庭。这是梅丽讲的？关于她的母亲，她这么对你讲？她会从她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没讲这么多。”“因为这不是真的”，瑞典佬说，“那不是原因。有时我认为原因只是她的大脑反应太快，比她的舌头快多了——”啊，他怜悯地看着我，听着我笨拙的解释。养尊处优的杂种。冷漠绝情、无心无肺的杂种。愚蠢透顶的杂种。愚蠢——这是最糟糕的。所有一切都因为他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样子和多恩的样子……“我们经常遇到有些父亲不能接受、拒绝相信——”噢，这些人没有一点用处！他们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请这狗屁心理医生是谁的主意！“我并非不接受任何东西，见他的鬼。是我首先带她到这来的。”瑞典佬说，“我按照任何专业人士建议做的一切来帮她克服。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我女儿这样做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她面部扭曲痉挛、腿部抽筋、敲打桌面、面色苍白，这么难受，你却说她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操纵她的父母而已。”“那么，她敲打桌子、脸色苍白时谁说了算？谁在那里有权控制？”“当然不是她！”瑞典佬气愤地说。“你认为我对她的看法不仁慈。”医生说。“是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她父亲看来是这样你可能从未想到过有什么生理上的根据不，我没有说过。利沃夫先生，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讲些生理学理论。但那不是我找到的治疗她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

她的口吃日记 她吃过饭后就在厨房桌上把一天的事写入她的口吃日记。看到这些东西，他最想杀掉的就是心理医生。这家伙最后还告诉他——作为“不能接受、不愿相信”的那些父亲中的一个——只有当她的口吃变得对她毫无用处，只有当她想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简而言之，只有当她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替代这种操纵意识的时候，她才会停止口吃。口吃日记是一个红色三环笔记本，她遵照口吃矫正医生的建议，把口吃时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她坐在那里非常仔细地回忆和记录一天来口吃情况的变化，哪些场合最不容易发生、什么时候以及和谁在一起时最容易出现，这时的她难道不觉得口吃是她最大的仇敌吗？星期五晚上她和朋友急匆匆赶往电影院而将笔记本随手丢在桌上，他读到后的那种撕肝裂肺的痛苦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我什么时候口吃？有人突然提问而我又毫无准备，这时我容易口吃。人们看我时，那些知道我口吃的人，特别是他们盯着我的时候。尽管有时和那些不了解我的人在一起会更糟……”她继续写，一页又一页，用她非常优雅的书法写下去——她似乎说在所有情形下她都口吃。她写道：“甚至当我做得很好时，我还是忍不住要想：‘他要多久就会知道我口吃？我会过多久便开始口吃并毁掉这一切？’”尽管每次都失望，她仍然坐在父母能看见她的地方，每天晚上仔细写口吃日记，周末也不放过。在矫正师的指导下，她用不同的“策略”应付陌生人、店员和那些能与她开展相对安全的谈话的人。她和矫正师注意研究策略，以便应付与她关系密切的人——老师、女朋友、男孩子，然后是她的祖父母、父亲、母亲。她把策略记在日记里，还将与不同的人可能谈到的话题列表也写下来，写下讲话要点，预想最可能发生口吃的时候，做好充分准备。她怎么能忍受所有这些自我意识带来的苦难？要求她对随时发生的事情先行安排的计划，拒绝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退却的毅力——是那个杂种所说的“报复手段”？这种不屈不挠的干劲，瑞典佬从未见过，即使在人们将他训练成为橄榄球队员的那个秋天他也没有这么玩命，他并不真正喜欢这项运动中的暴力性，他在用头奋力冲撞时也犹豫过，但“为了学校的缘故”，他去做了，而且做得漂亮。

可是梅丽辛辛苦苦做的事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在矫正师安静、安全的密室里，她被人从内心世界拉出来，据说她感到特别自在，能准确无误地讲话、开玩笑、模仿他人说话和唱歌。但一到外面，她发现口吃又来了，开始左右她，她想尽一切办法，一切办法，避免以 b 开头的字，很快她就急促地乱讲一通。下星期六那位心理医生又要忙于对付字母

b 和“它无意中给她暗示的东西”，或者字母 m 或 c 或 g“无意中给她暗示”的东西。而他猜测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主意并没有解决她任何一个难题。人们说什么都没用，到头来全是废话。心理医生帮不上忙，矫正师不起作用，口吃日记没用，他无能为力，多恩也不行，就是奥黛丽·赫本轻盈活泼的演讲也没有丝毫帮助。她实际上处于某种东西的控制下无法脱身。

太迟了：如同神话故事中天真无邪的人被诱惑喝下毒药一样，这活蹦乱跳的孩子过去常在家具上高兴地爬来爬去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裤骑到每一只大腿上忽然间她向上蹿高，转而又横着发展，长胖了——她背上和颈部的脂肪增厚，不再刷牙和梳头，在家几乎什么都不吃，可在外面独自一人时总在吃东西，干酪牛肉汉堡配炸薯条、比萨饼、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油炸洋葱圈、香草奶昔、根汁汽水加冰激凌球、冰激凌浇巧克力酱和各种糕点。她几乎一夜间变大，成了个行动迟缓、不修边幅的十六岁、身高近六英尺的大家伙，同学给她起的绰号为胡志·利沃夫。

口吃成为她割下所有撒谎杂种脑袋的弯刀。“你他、他、妈的疯子！你冷酷无、无、情的怪、怪物！”只要林登·约翰逊在七点钟的新闻节目一露脸，她就咆哮不已。对着电视上当时的副总统汉弗莱的脸，她叫喊道：“你这笨蛋，闭、闭上你撒谎的臭、臭嘴，你胆、胆小鬼，你、你肮脏同、同谋！”当她父亲作为新泽西商人反战协会特别小组的成员，和他们的指导委员会到华盛顿去见他们的参议员时，她拒绝了一起前往的邀请。瑞典佬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他要不是希望以这种明显的参与方式减少一点她对他的愤怒的话，才不会参加这个组织，并志愿花一千美元为这个指导委员会在《纽瓦克新闻》上刊登抗议广告。他说：“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把心里想的告诉凯斯参议员。你可以直接与他谈。这不是你想的吗？”“梅丽，”娇小的母亲对大个子、怒目而视的女儿说道，“你也许会影响凯斯参议员——”“凯、凯、凯、凯斯！”梅丽突然爆发，让父母大吃一惊，一口把唾沫吐到厨房地板砖上。

她现在整天都在用电话，这小孩以前得采取她的电话“策略”才有把握拿起话筒后三十秒内喊出喂的一声。她已完全克服了难受的口吃，但还不是她父母和矫正师希望的那样。不，梅丽得出的结论是，使她扭曲的不是口吃，而是企图改变这种现象的徒劳。发病似的徒劳。她可笑地将这口吃看得那么重要，只是为了迎合里姆洛克这些父母、老师和朋友的期望，这些人使得她过分重视了说话方式这种原本次要的东西。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说的方式使他们不安。要彻底摆脱口吃，她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发“b”这个音时，丝毫不去管他们怎么难受。是啊，她已不关心自己开始口吃时敞开在每个人脚下的深渊；口吃再也不是她存在的中心——她该死的很有把握这也不会是他们存在的中心。她强烈抗拒扮演里姆洛克其他那些小女孩努力扮演，以便获得大家的羡慕和喜爱的角色，她不热衷于此——她将无用的举止、对社会的那点关注和她家的“资产阶级”价值观都扔到一边。她在自己的问题上浪费了够多的时间。“我不想花一生的精力昼夜不停地同该死的口吃纠缠不清，而此时孩子们正被、被、被、被林登活生生烤熟，被、被、被约翰逊烧死！”

现在她的精力全都冒了出来，毫无遮挡，这抵抗力以前曾被用到其他地方，由于不再关心那种古老的障碍，她第一次享受的不仅是彻底的自由，还有令人振奋的对自己完全把握的力量。一个崭新的梅丽出现了，在抗议“罪、罪、罪恶的”战争时，她终于发现有个难题值得她用自己惊人的力量去对付。她把北越称作“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起这个国家她带有很深的爱国热情，让人以为她不是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斯以色列，而是在河内的贝斯以色列，多恩这么说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我要是再听到她说一次，塞莫尔，我准会发疯！”他尽力让她相信可能没有她听到的那么糟。“梅丽有信仰，多恩，她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里头没什么奥妙，她还没完美表达出来而已，这背后有某种想法，肯定有许多感情因素，有许多同情怜悯……”

多恩现在只要和她女儿一谈话，即使不发起疯来，也会逃到屋外、躲进谷仓。只要她们两人一块待上两分钟，瑞典佬就会听到梅丽与她的激烈争吵。多恩说：“有些人只因为自己有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父母就会感到非常幸福。”“很遗憾，我没有被洗脑到那种程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梅丽回答道。“你是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我能告诉你该做什么，我也必须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能因为我十六岁就把我当女、女、女孩看！我要做我想、想、想做的。”“你不是反对战争，”多恩说，“你是反对一切。”“那你是什么，妈？你赞成的是母、母、母牛！”

这些人使得她过分重视了说话方式这种原本次要的东西。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说的方式使他们不安。

现在多恩一夜又一夜流着泪上床睡觉。“她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瑞典佬,“如果有人要挑战你的权威,你怎么办? 塞莫尔,我完全迷惑了。这是怎么了?”他告诉她讲:“实际上,她是个有顽强意志的女孩,有主见、有事业心。”“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是个坏母亲吗?是这个原因吗?”“你是好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母亲。这不是原因。”不知她为何这样对待我。我不明白自己对她做过什么或者她认为我对她做过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我管不住她。不认识她了。我以前认为她很聪明,现在一点也不。她变得愚蠢了,塞莫尔,我们每次谈话后她反而变得更加愚蠢。”“不,她只是对人有些粗鲁莽撞,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她依然很聪明,十几岁的孩子都这样。是存在这种剧烈变化,与你或我都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随意地反对一切事物。”“全是因为口吃,对吧?”为她的口吃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们总是这样。”她因为口吃很恼火,“多恩说,‘她因此也没有什么朋友。’她总是有朋友的,还很多。而且,她已战胜了口吃。口吃不是原因。”“不,是原因。你绝不会战胜口吃,”多恩说,“你总是处于恐惧中。”“那说明不了现在的问题,多尼。”“她满十六了——这是原因?”多恩问。“如果是的话,”他说,“也许很大部分原因是的,我们尽最大努力使她熬过十六岁。”但是接下来呢?当她过了十六岁,她就会到十七岁。”她十七岁时就不同了,到十八岁又不同。情况在变。她会有新的兴趣,她将上大学——有学业上的追求。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好。重要的是常和她谈话。”“我不行,不能和她谈话。现在她甚至连母牛也嫉妒,要把人逼疯了。”“那么,我多跟她谈。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她,也不要向她让步,哪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话题,也要保持和她交谈。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也不要紧。你不可能指望说的话马上就有效果。”“但她的回答会产生效果!”“别去管她怎么回答。我们不得不对她讲我们必须讲的,即使这种谈话看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要画条线,不画线,她就不会照规矩办事。画好线,她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照办。”假如她仍然不呢?”“多恩,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理智、坚强一些,不要丧失希望或耐心,她总有一天会战胜这种对一切都反感的心理。”“她不想战胜。”“那是现在,是今天,但还有明天。我们所有人之间有一种联系,这是重要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她,只要我们不停止交谈,明天就会到来。当然,她令人发疯,我也不认识她了。但如果你没有让她耗尽你的耐心,如果你继续和她交谈,不放弃她,她最终会复原的。”

尽管看起来没有希望,他还是谈啊,听啊,保持理智。这场战斗似乎不会终结,他很有耐心,只要发现她太出格便画线约束。不管她在回答时公开表示出何等恼怒,怎样的嘲讽、刻薄、难以捉摸和虚情假意,他还是坚持询问她有关政治活动、校外情况、新交的朋友等事情,语气温和但执着,这使她恼火。他向她打听星期六到纽约去的情况。她在家总是随意地高声大叫——她还是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孩子,一想到她在纽约可能遇到的那些人,他便感到惊慌。

第一次关于纽约的谈话。“你到纽约干什么?到纽约见谁?”“我干什么?去看看纽约,这就是我做的。”“梅丽,你干什么?”“我做所有人都做的,逛商场,看看橱窗陈列,女孩子会干什么?”“你和纽约的那些热心政治的人搅到一起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你刷牙也是政治。你和反对越南战争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了。你是去见他们?是或不是?”“他们是人民,是的。他们是有思想的人民,他们中间有些人不赞、赞、赞成战争。他们大多数不信、信、信奉战争。”“那好吧,我刚巧也不信奉战争。”那么,你有什么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多大了?他们以什么为生?是学生吗?”“你为什么想知道?”“因为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每个星期六你都独自一人到纽约去,并不是每家的父母都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走这么远。”“我去参……我,你知道,那里有人、有狗、有街……”“你带回家这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材料,带回来这些书籍、传单和杂志。”“我想学学。你教我学习的,不是吗?不光是读书,而是要学习。共、共、共产党的……”“是共产党的。那上面写着共产党的。”“共产党人的思想也不全是共、共产主义。”“举个例。”“关于贫困、关于战争、关于不公平。他们有各种思想。你是犹太人并、并、并不意味着你只有犹太教的思想。是啊,共、共、共产主义也一样。”

第十二次关于纽约的谈话。“在纽约你到哪里去吃饭?”“谢天谢地,不是在文森特餐馆。”“那在哪里?”“到其他人人都去的地方,餐馆、自助餐厅、人民公寓。”“住在这些公寓里的是些什么人?”“我的朋友。你在那里遇见他们的?”“我在这里遇见一些,在城里遇见一些——”“这里?哪里?”“中学里,比如说谢、谢、谢丽。”“我未见过谢丽。”“谢丽就是班上表演戏剧时总是拉小提琴的那一位,记得吗?她到纽约去为、为的是上音乐课。”“她也卷入政治了吗?”“爸,一切都是政治。只要她有头、头、头、头脑,又怎么能不卷进去呢?”“梅丽,我不想让你遇到麻烦。你对战争很气愤,许多人对战争都气愤。但有些对战争反感的人不知道限度。你知道这些限度是什么吗?”“限度,这就是你所想到的。不要走极端。好吧,有时你不得不走该死的极端。你以为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种极端。在这小小的里姆洛克,这不叫生

活,这里没有什么极端。”“你不再喜欢这里了。想住在纽约?喜欢那样?”“当、当、当然。”“假如你高中毕业后会到纽约上大学,你会喜欢吗?”“我不知道是否要上大学。看看这些大学的管理,看看他们怎么对付反战学生。我怎么会想上大学?高等教育。我称之为低等教育。我可能会上大学,也可能不会。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计、计划。”

爸,一切都是政治。只要她有头、头、头、头脑,又怎么能不卷进去呢?

第十八次关于纽约的谈话。她有个星期六晚上没能回家。“你绝不能再这么干。你绝不能和我们不了解的人过夜。这是些什么人?”“绝不要说绝不。”“谁和你待在一起?”“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从音乐学校来的。”“我不相信你的话。”“为什么?你不相、相、相信我也会有朋友?人们会喜欢我——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人们会招待我过夜——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你相、相、相、相、信什么?”“你才十六岁。你得回家。你不能在纽约市过夜。”“不要提醒我多大了。我们都知道岁数。”“你昨天走时我们期望你六点钟回家。晚上七点钟你打电话回来说要在那里过夜,我们说不行。你坚持要这样,说有地方住,所以我同意了。”“你同意的,当然。”“但不要再这么干。如果你再这样,你就再也别想一人到纽约去。”“谁说的?”“你父亲。”“我们走着看。”“我再让一步。”“让什么,父亲?”“如果你再到纽约发现太晚时,必须找个地方过夜,你就住在尤曼诺夫家。”“尤曼诺夫家?”“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他们了解你的一切。他们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可是,我一起住的那些人也有漂亮的公寓房。”“他们是谁?”“我告诉过你,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他们叫什么?”“比尔和梅里莎。”“那比尔和梅里莎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人、人、人,同其他人一样。”“他们靠什么为生?多大了?”“梅里莎二十二,比尔十九。”“他们是学生?”“是学生。现在他们把人们组织起来为改善越南人的处境做事。”“他们住在哪里?”“你想干什么?来找我?”“我很想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纽约有各种街区,有些好,有些不好。”“他们住在非常漂亮的街区,非常漂亮的房、房、房子里。”“哪里?”“他们住在晨边高地。”“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的。”“这套公寓里住多少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你是我女儿,才十六岁。”“也就是说,我这一生都要这样,就因为是你女儿——”“不,当你满十八岁、高中毕业后,想干什么都行。”“那么我们这里谈的是这两年的区别。”“对的。”“这两年里将会发生的大、大事是什么?”“你会成为自谋生计的独立人。”“如果我愿、愿、愿、愿意,我现在就能自谋生计。”“我不想你与比尔和梅里莎待在一起。”“为、为、为、什么?”“我的职责就是照顾你。我想你和尤曼诺夫一家住,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纽约并在那里过夜。不然你就被完全禁止去那里。你自己选择。”“我到那里是要和我想待在一起的人住。”“那么,你不能再到纽约去。”“我们看着办。”“没有什么‘看着办’。你不能再去,够了。”“我很想看你阻止我。”“想想吧,如果你不同意和尤曼诺夫一家住,你就不准去纽约。”“那战争怎么办——”“我的责任是对你而不是对战争。”“啊,我知道你的责任不是对战争——那就是我去纽约的原因。因、因为那里的人们真正感到对战争有责任。当美国轰、轰炸越南村庄时,他们感到有责任。当美国把婴、婴儿炸、炸成碎、碎、碎片时,他们觉得应该负责。可你不会,妈妈也不会。你不会关心,哪怕只打扰你一天也不允许。你不会因此去别的地方过上一夜,不会为这事睡不着觉。不管以哪一种方式,你都不会真正关心的,爸爸。”

关于纽约的第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次谈话。“我不能这样谈了,爸爸。我不愿意!我拒绝!谁和父母这样谈!”“只要你还未成年,出去后晚上不回家,你就该和父母这样谈!”“但是你使我发、发、发疯,这种敏感的父亲,一心要了解人家!我不想被了解——我要的是自、自、自由!”“如果我是个不这么敏感的父亲也不想了解你,你会感觉好一些?”“我当然会!我想我肯定会!你为什么他不妈的试、试、试着改变一下,让我妈的看一看!”

关于纽约的第二十九次谈话。“不行,你成年以前不能搅乱我们的家庭生活。到那时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还不满十八岁——”“你所想的一切,所谈的一切,所关、关、关心的一切,都是这个该、该死的小、小、小家、家、家庭的好日子!”“这不是你所想的?这不是你感到愤怒的?”“不、不、不是!从、从、从来不是!”“是的,梅丽,你为越南的那些家庭感到气愤。对他们被毁掉而发怒。那些也是家庭。那些家庭也和我们家一样,也想有权利享受和我们家一样的生活。这不是你自己想为他们争取的吗?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安全和平的生活?”“不得不住在这个默默无闻地区的特权中心?不,我想这不是比、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呼吁的,这不是我为他们呼吁的。”“你没有?那么再想想。实话讲,我认为过上这种在太平无事的地区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生活会使他们很满足。”“他们只是想夜晚能上床睡觉,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再担心睡着时是否会被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全是为了让新泽西的特权阶层的人们过上他们的和、和平、安、安全,贪得无厌、毫

无意义、吸血鬼似的小、小、小日子！”

关于纽约的第三十次谈话。梅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后回家。“啊，他们这么慷慨，巴、巴、巴利和玛西亚。过着他们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是教授，是严谨的学者，也反对战争。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吗？”“哦，还有某个反战的英国教授、反战的社会学教授。至少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反战。他们都一块游、游、游行，我认为这才叫一个家庭。而不是这些该死的母、母、母牛。”“看来那里还不错。”“不，我想和朋友在一起，不想八点钟到尤曼诺夫家去。不管什么事情要发生也是在八点以后！如果我想晚上八点以后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我可以留在里姆洛克。我想八点以后和我的朋友待在一起！”不管怎样这还不错。我们都让步了。你不能在八点以后和朋友待在一起，但可以和他们待上整个白天，这总比没有要好得多。你同意这么做，我感到很不错。你也应该这样。你下个星期六还去吗？”“我不会很早就安排好这些事。”“如果你下星期六要去就提前给尤曼诺夫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你你会来。”

关于纽约的第三十四次谈话。梅丽未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好吧，就这样。你违约了。星期六不准再离开这个家。”“我被软禁了。”“无期限地。”“你这么害怕的是什么？你认为我会干什么？我和朋、朋友在外面玩，讨论战争和其他重要事情。我不懂你为什么想了解这么多。每次我到哈姆林商、商、商店去，你都要问无、无、无数个该死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怕？你不过是个胆、胆、胆小怕事的家伙，只是躲在这些树林里不敢出来。不要把你的恐惧抛洒到我身上，让我也像你和妈妈一样害怕。你所能对付的是母、母牛。母、母牛和树木。可是，除了母、母、母牛和树木外还有别的东西。还有人，真正痛苦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害怕我会被人睡了？你担心的是这个？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被人搞掉。我这一生做过什么不负责任的事？”“你破坏协议，不用多说了。”“这里不是公司。这不是交、交、交、交易，爸爸。是软禁。每天在这房子里就像被软禁。”“你这么干我不太喜欢。”“爸爸，闭嘴吧。我也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没、没有喜欢过你。”

他们只是想在夜晚能上床睡觉，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再担心睡着时是否会被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

关于纽约的第四十四次谈话。第二个星期六。“我不会开车送你到火车站。你不能离开家。”“你要做什么？把我挡、挡在家里？你怎么能阻止我？把我捆在儿童餐椅上？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女儿的？我不敢相、相、相信自己的父亲用武力威胁我。”“我不武力威胁。”“那你怎么能让我待在家里？我不是妈妈那些哑巴母、母、母、母牛中的一个！我再也住不了这里，永远，永远也不住。冷、冷漠、平静、镇定先生。你这么害怕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你听说过纽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吗？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就是为了感受纽约的生活。你过去常常要我去经历一切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到纽约试试？总比被遗弃在这里好。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意？不是你先提出来的？不是你深思熟虑为家庭作的计划之一，也不是事情本该进行的那个样子？我所做的就是坐上该死的火车到城里去，每天成百上千万的男男女女就这么去工作。结交坏人，但愿上帝不要让我有其他想法。你娶了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你家里人是怎样看待你结交坏人一事的？她嫁给一个犹、犹、犹太人，她家里人是怎样看待她结交坏人一事的？我能比这更坏？也许和一个梳着非洲大蓬头的家伙外出——这是你害怕的吗？我想不是，爸爸。为什么你不去为重要的事情担心，比如战争，而不是你这滥用特权的女儿独、独自乘火车到大、大城市去？”

关于纽约的第五十三次谈话。“你还没告诉我，如果我乘该死的火车到城里，我会遭、遭遇到什么可怕的该死的厄运。他们在纽约也有公寓房和屋顶，他们也有锁和门。不只是在新泽西的旧里姆洛克才有锁。还是想想吧。和‘爱’押韵的塞莫尔·利沃夫？你认为所有陌生的东西都是坏、坏的。你想过没有，有些东西对你陌、陌生却是好的？作为你的女儿，我也会有一种本能在适当的时候和好人在一起？你总认为我会以某种方式乱搞。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就会认为我可以和好人凑到一块。你对我没有一点信心。”“梅丽，你知道我谈的是什么，你和政治极端分子搞到一起了。”“极端分子。只因、因为他们不同意你、你的观点就极端。”“他们是些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要干成任何事情靠的就是坚强的思想，爸爸。”“但你才十六岁，他们大你这么多，比你老练得多。”“那是好事，所以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一些对自由的误解把一个小国家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把男、男孩子的腿和鞣、鞣丸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爸爸。乘汽车或火车到纽约去，在上锁的安全的公寓房里过一夜——我看不出这有多极端。我认为只要可能，人们每晚睡哪里都可以。告、告诉我这有什么极端。你认为战争坏、坏吗？哦——极端思想，爸爸。那不是极端思想——是有人对某件事关心，而想尽力去改变。你认为那是极端？那是你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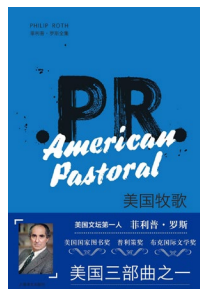
题。对有的人来说，尽力拯救他人的生命比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更有意义——这是极端？不，另一种才是极端。”“你说的是比尔和梅丽莎？”“是啊，她退学了，因为她有比得到学位更重要的事。阻止屠杀对她而言比一张纸上的学、学、学士两个字更重要。你把这叫作极端？不，我认为极端是当这种疯狂行为还在进行时人们却像平常一样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当人们受尽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剥削时你却每天继续穿上西装、系着领带去上班，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才是极端。那才是极端的愚、愚蠢，一点也不假。”

关于纽约的第五十九次谈话。“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又退学了。我给你讲过。他们住在晨边高地。”“梅丽，给我讲得还不够。那里有毒品、有粗暴的人，是个危险的城市。梅丽，你可能陷入许多麻烦，有可能被强奸。”“就因、因为我不听父亲的话？”“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女孩子不管她们是否听父亲的话都有可能被强奸。有时父亲也强奸。强奸犯也有孩、孩子，那也使他们成为父亲。”“告诉比尔和梅丽莎，请他们到这里来和我们度周末。”“哦，他们真巴不得离这儿远点。”“喂，你九月份到学校去怎么样？你最后两年去读预备学校。也许你待在家里和我们一块生活够了。”“总在计划，总在考虑最恰当的方法。”“我还能做什么？不计划？我是男人，是丈夫，是父亲。我经营企业。”“我经营企、企、企业，故我在。”“有各种学校，有些学校里有各种有趣的人，有各种自由……你去和学校的指导老师谈话，我也会去咨询——如果你很烦，讨厌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可以到学校去。我知道你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我们都认真想一想你到学校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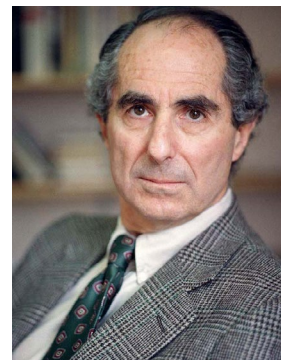
关于纽约的第六十七次谈话。“你可以在莫里斯顿，在旧里姆洛克这里随心所欲地积极参与反战运动，你可以在这里把人们组织起来反对战争，在你们学校——”“爸爸，我想照我的方、方式干。”“听我讲，请听我讲。旧里姆洛克这里的人们不反对战争，他们恰恰相反。你想唱反调？就在这里对着干。”“在这里为此事做不成什么。我怎么办？绕着商场游行？”“你可以把这里组织起来。”“要里姆洛克人反战？那就大、大不相同了。反战的莫里斯顿高中。”“对啊，把战争带回家。口号上是这样吧？那么就这么办——把战争带回你住的镇上来。你想不受欢迎？你一定会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我可以担保。”“我并不要不受欢迎。”“但是，你会的，因为在这里这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如果你在这里竭尽全力反战，相信我说的话，你将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不教这里的人们反战？这也是美国的一部分，你知道的。”“很小一部分。”“这些人也是美国人，梅丽。你可以就在村子里积极地反对战争，用不着去纽约。”“是啊，我可以在客厅里反战。”“你可以在社区俱乐部反战。”“一共就二十个人。”“莫里斯顿是县政府所在地，星期六到莫里斯顿去，那里有反战的人。封泰因法官反战，这是你知道的。阿威利先生反战。他们和我在反战宣传上签过字的。老法官和我一起到华盛顿去过。你也知道，这里的人们不太高兴看见我的名字在那里出现。但那是我的立场。你可以在莫里斯顿组织一次游行，你能设法办到。”“而且莫里斯顿高中的报纸也会报道。那将使军队撤出越南。”“我知道你善于进行反战演说，在莫里斯顿高中已经很有名气了。如果认为这不重要，你为什么还去干呢？你肯定认为这重要。对这场战争，美国的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重要。梅丽，就从你住的那个镇子开始吧，这就是阻止战争的办法。”“革命不在农村开、开、开始。”“我们没有谈革命。”“只是你没有谈革命。”

那是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有关纽约的最后一次谈话。谈话起作用了。虽很艰难，但他很有耐心，态度坚决，所以终于起作用了。据他所知，她再没有去纽约。她接受他的建议，留在家中。随后，她把客厅变为战场，把莫里斯顿高中变为战场。一天，她出去把邮局炸飞了，一同毁灭的还有福雷德·康伦医生和村里的综合商店。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房，前面挂着社区的公告板，还有一只旧桑纳可水泵和一根金属杆，商店主人诺斯·哈姆林每天早上都在上面升起美国国旗，打从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未中断过。诺斯和他妻子还管理着邮局。

本文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自《美国牧歌》



美国牧歌
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6月



菲利普·罗斯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1959 年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受到瞩目，此后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2012 年宣布封笔，一生共创作 29 部小说，代表作有《波特诺伊的怨诉》《鬼作家》《萨巴斯剧院》《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等。

发现经典

我们用经典里的文字，帮你记住“历史上的这个月”。



题图来自 [Ihor Malytskyi](#) on Unsplash

非虚构

哈萨克斯坦雪原，
祖辈离开，晚辈归来

张海律 | 非虚构图书馆

宏观时间意义里不起眼的瞬间，
却也是凝冻了群体和个人苦难的岁月

Karlag 和 ALZhIR，分别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两大城市卡拉干达和阿斯塔纳远郊，是前苏联时期的两座重要劳改营，如今已成为不太那么出名的“黑暗旅游”景点。再说，寒风刺骨的隆冬时节，也没几个人会去这些地方“旅游”。一周时间里，住在当地俄族房东和躲兵役俄国青年公寓的我，“参观”了过去的苦痛，听闻了当下的困境。无论曾经的劳改者还是当下的战争“难民”，被裹挟入历史的长河后，都会被封冻于中亚广袤的冰原深处，成为宏观时间意义里不起眼的瞬间，却也是凝冻了群体和个人苦难的岁月。

从雪原驶入历史

二月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还被一望无垠的深雪覆盖着。此等隆冬时节前去古拉格，算得上一番切肤的黑暗旅游体验。

一个周四的上午，我坐在一辆老款起亚的副驾上，跟着开车的亚历克斯，路过一座巨大的东正教教堂，驶出卡拉干达历史城区。公共建筑和居民屋舍迅速消失，道路两侧空荡荡的雪原上，间错停放着一些用于抽油的“磕头机”，以及在风雪中冬眠的大型工程车辆，以此表明这片地区“家里有矿”的显赫事实。亚历克斯用其表达逻辑清楚但词汇量有限的英语，一路跟我聊着，从谢肉节的这些天吃些什么，说到自己的电信工程师工作，再彼此试探着谈到俄乌战争。

“你说普京到底怎么想的？怎么不用点厉害的终极武器，赶快结束这场战争？我可没说核武器啊，但是摧毁对方中枢的武器总有吧。”38 岁的亚历克斯，是在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工业重镇卡拉干达（Karaganda）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人，也是让我这些天享受免费吃住的热情沙发主。

起亚越来越接近距离卡拉干达市区 40 分钟外的目的地，话题来到近在眼前村落 Dolinka 的黑暗历史，斯大林时期，这里曾有着前苏联古拉格群岛系统中最大的一座——Karlag。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儿设立古拉格吗？”亚历克斯问到。

“用大量免费的强制劳动力来发展农业，以保证你们这儿的煤矿产业吧？”我说着从维基百科词条读来的资料。

“这是一部分原因啦，更多还是那些知识分子养尊处优，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啥事不做，得让他们做点贡献，改造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荒野。”显然，亚历克斯对西方历史观里这些绝对“平庸之恶的存在”，有着不同的个人见解。

或许是的，没有古拉格和与此相伴随的大规模免费强制劳动力，就没有亚历克斯今天所生活的城市卡拉干达，以及儿女成双颇为幸福的家庭。属于特定年代的苦难，被冰封在上游的冻土层中，从人类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可能也就算不了什么。我想到索尔仁尼琴著作《古拉格群岛》的开头：

1949 年，我与友人们偶尔在科学院的《自然界》杂志上读到一篇值得注意的简讯。那里以细小的字体写道，在科雷马河上进行发掘时，不知怎样地发现了一片地下冰透镜层——凝冻的古流，其中冻结着古生动物区系的代表物。科学通讯员作证说，这些又似鱼类，又似蝶螺的东西保存得如此新鲜，在场者们击碎了冰块，当即就乐意地吃掉了它们。

说话间，起亚驶入了 Dolinka 村中心的一扇大门，好客的亚历克斯放下我，要赶回城里上班了。眼前，是曾经古拉格群岛之中最大那个 Karlag 的行政管理大楼，今日凝冻了历史的 Karlag 博物馆。



Karlag 行政管理大楼，如今的博物馆

俄族沙发主

50 万人口的卡拉干达，位处哈萨克斯坦中北部，是这个世界最大内陆国家的第五大城市。我幸运找到的沙发主亚历克斯，是城中为众多俄族人口中的一员。俄族究竟占城市人口的多少比例，无论是谷歌 ChatGPT，还是亚历克斯本人，都没法告诉我答案。但在整个卡拉干达州，据 2020 年统计，刚过 35%，远超全国 15.5% 的俄族人口比例。这些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俄罗斯人只会更多。

之所以选择做沙发客，比节省旅费更重要的原因，是被关在国门内憋了三年的我，有着迫切跟当地人交流甚至生活在一起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流程化服务的酒店给不了，变质成为交钥匙给密码完成交易的爱彼迎也给不了，只有在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镇青年”家里，才能得以落实吧。

大清早，亚历克斯从火车站接上我，将起亚后备箱打开放置行李箱时，里面摆着的白桦树枝，就证实了车主的民族身份。那是俄罗斯浴（Banya）中最不可或缺的工具，用绑成笤帚的白桦树枝，轻轻抽打自己和彼此，成就一种神奇的按摩效果。

亚历克斯家距离火车站不远，都算得上在市中心。行经城市历史博物馆前，亚历克斯指着在雪地里手拿一块石头的男孩雕像告诉我这是一个牧民娃儿也是我们城市的小英雄，因为天气冷到实在受不了，他生起火来，把完全不保暖的帐篷扔进火堆里烧了，火却越烧越旺永不停歇，于是，地下丰富的煤矿被发现了。”



关于卡拉干达发现煤田传说的
牧童雕像

这自然是当地人戏谑玩笑的“野史”。可能真实的故事是，1833 年，少年阿帕克在打猎土拨鼠时，从洞中发现一块闪亮的黑色岩石，有着特别强的燃烧特性。西伯利亚一位商人听说后，跑来这片草原，买下了阿帕克家的土地，成立了矿业公司。

从民间蜂拥而至的野蛮采矿，到成为国营性质的工业重镇，还隔着 100 年呢。起亚拐进一条小街，一边是刷着透亮蓝色、有点巴洛克风格的办公楼群，另一边是狭长低矮的四层老旧公寓。它们好看而安静地屹立在雪堆边，像冬日里的圣彼得堡。亚历克斯家，就在狭长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

“这是我爷爷奶奶的祖宅，1937 年日本战俘建的，而卡拉干达，是 1934 年才正式被宣布成为城市而开始规划建设的。这几年我就搬过来住了。”亚历克斯在家门口告诉我。

“日本战俘？可是 1937 年二战不是还没开始？诺门罕？那也是两年后啊！”我纳闷问到。

“哦，也不是战俘，就是日本人，斯大林时期不是强制迁徙苏联境内各族人口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嘛。”亚历克斯纠正道。

说话间，我们走进陈旧的楼道，打开一楼左边那扇有着古远历史的铁门，走进他温馨的家园。妻子斯文塔娜裹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迎我。儿子刚去不远处的小学上课，妹妹头顶着一只硕硕仓鼠羞涩地跟我问好。一只叫阿尔法的拉布拉多，迅速叫着嗅了过来，要跟陌生人交朋友，另有一只神气的黑猫跳到了冰箱上。儿女双全、猫猫双全，汤姆和杰瑞还没任何矛盾，这是何等幸福的画面。



卡拉干达沙发主一家

Karlag, 最大古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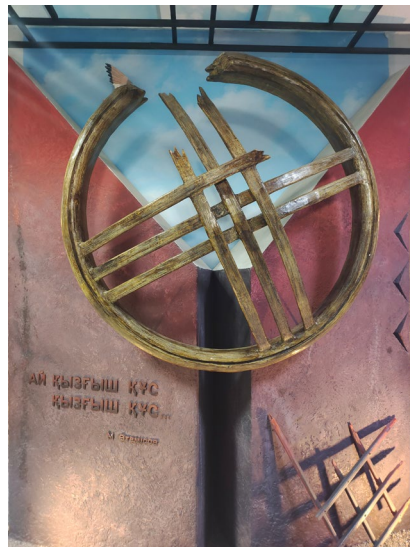
为亚历克斯爷爷建起居所的日本人，正是我此刻置身 Karlag 巨大系统和悠长历史里、那些曾被流放过来的劳工。他们并非古拉格的囚徒，而是有着相对自由的“特殊定居者”或“工作定居者”。1930 到 1953 年间，在整个苏联境内，这样的“雇员”估计能有六七百万之众。

Karlag，是卡拉干达集体劳动营 (Karaganda Corrective Labor Camp) 的缩写。其劳教监狱和生活区域，主要位于卡拉干达西南方 45 公里的 Dolinka 村。而囚徒和“工作定居者”们一道参与劳动的区域，则可以从北边与阿克莫拉州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南边的楚河流域，范围共计 1.78 万平方公里，和科威特的国土面积等大。当然，规划区域中 95% 的土地依然作为传统牧场，至少在 1931 年建立初期如此。

从行政管理大楼重新修葺装扮而来的 Karlag 博物馆，是一幢两层的长条形灰色楼房，正中间的红色五角星，在白色的雪地上煞是显眼。大楼左侧一座完全描述不了形状和寓意的雕塑上，用哈萨克语写着寥寥数语。我打开手机里的谷歌翻译怼了上去，大致是一首



瞭望塔模型和背后的斯大林



Karlag 博物馆入口，断裂的毡房顶

诗：谁开的枪？我的坟冢埋于何处？作者是哈萨克斯坦上世纪诗人、国歌歌词作者塔日巴耶夫。

从正门进入博物馆，迎面是一个曲杆顶圈，哈萨克传统毡房里连接顶部天窗和墙围的最重要物件，不过却是断裂开来的。旁边竖着一座用于监控囚徒的瞭望塔模型，其后是紧盯着你的巨幅斯大林肖像照。一个长相飒美的中亚年轻姑娘，从斯大林身后绕出来，用中文说了句“你好”，继而以英文自我介绍道，“我叫萨尔宾娜，是您的朋友亚历克斯提前预约的英文讲解，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英语还不太好，可能很多词不认识。”我这才明白，亚历克斯之所以要替我把 Karlag 之旅安排在周四，是因为萨尔宾娜这一天没有课，才有空来博物馆实习。“冬天根本没人会来古拉格，”我实习两个月，你是第二个游客，上一次是个拉脱维亚人。”

除了“你好”，这个漂亮女孩还会说“哥哥、妹妹，你的妈妈怎么样？”几句中文，准备将来找机会到中国留学。“我家虽然就住在附近村镇，但和古拉格的历史并没联系，是 2011 年才从哈萨克斯坦南部搬来的，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都是劳教者的后代”，萨尔宾娜开门见山的这番话，也像是告诉我，好好看展吧，别指望从她身上挖到什么精彩故事。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接踵而来的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大饥荒开始，博物馆被按时间线和监管职能单元，划分作 14 个展厅。萨尔宾娜也就耐心带着我，穿梭于用曾经油灯装饰的走廊，在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的斯大林目光注视下，以基础的英文，尽可能介绍恐怖的历史。

索洛维茨基，古拉格之母

1919 年到 1922 年的大饥荒中，整个哈萨克斯坦约 100 万人死亡。或许鉴于此，10 年

之后,卡拉干达开始国有化规模化开采煤矿,并在 1931 年 12 月 19 日建立起 Karlag 时,就把粮食生产和供应作为保障生产的重中之重。20 年间,在 Karlag 铁丝网内被关押过的 100 万囚徒,加上铁丝网外被迁徙的“工作定居者”,通过零收入或低收入的劳作,持续不断地为煤矿工人补给着肉蛋奶等必需品。虽然这并没能能在初始阶段,阻止哈萨克斯坦成为 1932 年苏联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比例最高(38%)的加盟共和国。灾难原因既有天气因素倒致的农牧欠收,也有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改革,导致牧民无法迅速适应农垦生活。哪怕现如今,相较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完整存续下来的哈萨克族牧民转场生活,哈萨克斯坦的这些传统反而变得稀有。

“到 1934 年为止,古拉格在科雷马、科米、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地方的发展,重复着与索洛维茨基相同的模式。发展初期,草率低效、混乱无序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死亡。”第二个展厅里的一段英文简单介绍到,并伴随着整个苏联的古拉格分布图,最大的那颗红星并非此地的 Karlag,而是位于巨大国土西北边被称为“古拉格之母”的索洛维茨基。



古拉格之母索洛维茨基修道院

我曾在 2018 年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搭乘白海的渡轮,到过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茨基。这是一个由 6 座岛屿组成的群岛,航程终点,是有着入选世遗名录的修道院的大索洛维茨基岛。1923 年 11 月 5 日,这座修道院就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征用为“索洛维奇特别营”。作为苏联第一个强迫劳动营,这里也就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命名为“古拉格之母”。

美国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其专著《古拉格:一部历史》中认为:索尔仁尼琴选择“群岛”这个隐喻,形容苏联的劳改营体系绝非偶然,索洛维茨基,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群岛上发展起来,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向外扩张,直至北极圈、远东和中亚那些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古拉格岛屿”。

在大岛醒来的第二天,一艘名为大洋号(Oceania)的邮轮,带来了远多于 800 岛民的浩荡大军。主力部队分 20 支纵队,穿过 16 世纪为防范瑞典人入侵而筑起地 11 米高、6 米厚城墙,直插修道院内部。昨天抵达时正在临时抱佛脚操练英语的当地向导,让我跟着聆听讲解。可是限于表达障碍,以及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乘客对俄国历史的认知度,团员间竟出现了重大错误的信息传播:“德国人当年打到这儿了啊!还建了集中营!”,几个美国老太太一惊一乍地说着。

我连忙作为热心群众上前纠错和解释这不是德国人建的,是二战前就有的作为劳动营,自己人关自己人的。”其中一个老太太想明白了,但北美大妈团里的大多数压根没听说过这段历史,更别提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

为了接待这艘邮轮,群岛和白海沿岸城镇能说几句英语的年轻人,估计全被叫来提前培训。可突击性训练的效果,怎么可能向外国人说明白他们北境之地这些复杂、残酷、血

腥的故事呢?一个男导游在巨大的苏联地图前呆站了片刻,注定也没听懂美国女人的“历史拷问”,翻出手里的小纸条扫了两眼,那上面还用俄语发音标注了一些陌生英语单词,然后继续说着包含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契卡、知识分子等关键词的程序化解说词。

Karlag, 从捷尔任斯基到索尔仁尼琴

回到雪原上的 Karlag 博物馆。第二个展厅入口,立着一个男子半身像,眼神坚毅而冰冷。“这位是捷尔任斯基”,萨尔宾娜指给我,“人们说他只需要三件东西就能过日子:面包、清水和工作。”

如果说岛屿索洛维茨基是古拉格之母,那么这个总是揣着黑色笔记本、在上面随机写下偶然想到的“敌人”姓名和住址的严肃男人,可以算是古拉格之父。十月革命后,他在列宁要求下,创办了“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制造古拉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斯大林死后,再次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即更为人们熟知的克格勃。

反怠工,正是工作狂捷尔任斯基的职业使命。其实将所谓缺乏劳动热情的公民流放至荒野,是早自 18 世纪沙俄政府就有的传统,并用苦役的方式解决了麻烦的经济问题:占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人烟实在稀少,因此导致帝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强制劳动就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几十万农奴奉献生命建设圣彼得堡,成就了沙俄欧洲化的进程。《古拉格:一部历史》书中,安妮认为,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继承者之一。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轻松逃跑三次,为此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你不必去劳动,可以沉默默想自己的心事,甚至可以逃跑”,他的传记作家写到。

捷尔任斯基将怠工和反革命划上等号,斯大林则不允许自己怠工和逃跑的经历,再在今后的流放和强制劳动刑期中发生。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 1929 年到斯大林死亡的 1953 年,最可靠的估计表明,约有 1800 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过苦头甚至失去生命,这还不含那 600 万被合法强制拘留在流放地的工作定居者。

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一列照片,按层级上下关系,列出契卡头部成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也都在 1936 到 1938 年的大清洗中,被抓来各处古拉格或直接人间蒸发了”,萨尔宾娜继续着导览工作。

对面的房间搁着一张摇篮车,婴儿床上也写着斯大林的字样,要让娃娃们从小知道“斯大林才是你爹!”至于妈妈?有的妇女就是在古拉格,遭到看守士兵强暴,不许堕胎才生下了孩子,从小真不会知道亲爹是谁。“一些被流放到这儿的知识分子,在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还嚎啕大哭呢”,萨尔宾娜对着一份当地报纸的讣告说到。我认为这有可能不是因为恐惧而自发的“表演”,而更可能是真情实感的表露。记得中学时一次家宴,因文革话题亲戚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我那位孤僻的知识分子外公愤怒摔了碗筷,“是的,我被迫害过,但我绝不后悔。”

也有知识分子成为相对的幸福儿。跨学科研究者亚历山大·基泽夫斯基,曾因关于太阳周期的著作,与 1905 和 1917 年的苏俄革命理论相悖,而被斯大林亲自点名,抓到乌拉尔山区的古拉格。却因血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帮助延长了古拉格紧缺劳动力们的寿命,原定为 25 年的漫长刑期,被大幅缩短至 8 年。1950 年获释后,这位在物理和生物方面都有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排到卡拉干达,继续又一个 8 年的“康复治疗”,作为 Karlag 新一批的“工作定居者”,转型研究煤矿科学。

任何一个景点,都喜欢把各种名人和自己扯上关系, Karlag 也不例外。无论是展厅墙上还是维基百科词条里的“Karlag 知名囚徒列表”里,都有着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大名。事实上,他是在卡拉干达北面巴甫洛达尔州的小城 Ekibastuz,度过的三年刑期,在从矿工、



萨尔宾娜敲响了一个召唤囚犯集合的铁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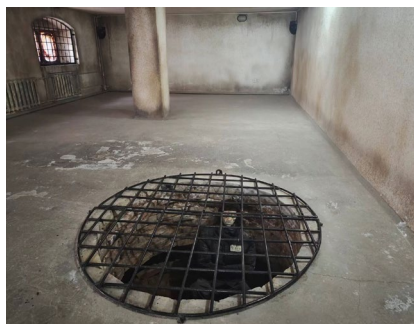
瓦工干到铸造工头的过程中，他切除了一个肿瘤，并进行着笔记写作。这段亲历，直接成就了其短篇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为后来大部头著作《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打牢了可信的基础。

叮叮当当……萨尔宾娜摇响了一个召唤囚犯集合的铁铃。“感谢这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付出，畜牧业、面包粮食和水渠灌溉，才在这片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大草原上发展了起来，养活了卡拉干达的居民和工人年轻女生也有着和我那位沙发主亚历克斯相似的历史眼光”可是，安妮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却不这么认为，她写到，“尽管斯大林毕生相信古拉格对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他的政治继承人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实际上，劳改营是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

我不知道她们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一些。是花海量时间做研究调查写出恢弘历史文献的外国学者？还是早习惯了用历史眼光看问题的当地平民百姓？我很早之前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记得里面也是看守摇了铃，晚饭时间到了，再过一会就吃不上汤里最后那片菜叶了。可是砌墙上瘾了的伊凡，还非要给隔离墙镶上最后那块砖，似乎只有这样，这一天才算完美。

Karlag, 烈日灼人

Karlag 博物馆的地下部分，被布置成了不同的囚室、审讯室和刑场。除去大量被以反革命罪、怠工罪、战时被纳粹俘虏而导致的疑似叛国罪等等，按刑法第 58 条名义逮捕的政治犯外，古拉格也实实在在地关押过不少刑事犯。他们中那些拒绝与管理方合作的位高权重者，被尊称为“律贼”，古拉格的地下世界，也是他们的地盘。一些更残酷的惩戒，并非来自于看守的命令，而就是律贼们可以擅自动用的私刑。



Karlag 的水牢

有时候他们会把告密者投入地牢碰上雨天，直至水没过肩膀才把人捞出来到了冬天，这样的私刑意味着处决。有时候，抗命者会被律贼叫人直接扔进粪坑，直至开春融雪后，劳改营里才会知道少了谁。

主宰囚徒命运的那些审讯者有一套流程化的工作，开审一个政治犯时，会让另一个在旁边三面围墙的幽闭空间待上八九小时，听着恶狠狠的问询，自己本想对抗的心智就被磨灭了。轮到作为下一个“嫌疑犯”出场时，大多已扛不住重压，而选择直接去拍证件照领取编号。

囚徒每天早上 6 点必须起床，不会太多的早餐，搁在一扇厚重金属门的洞口。囚室的双层床总会被竖起来靠在墙边并上锁，保证没人有机会找时机躺平。在监狱区域内学习和工作时，每天会有 30 到 45 分钟的放松时间，全员集合到一个没有天花板的 20 平方米空间。无论走廊上还是囚笼里，白炽灯总是亮着，直至晚上 10 点准时熄灭。

虽然一层有展厅说到被看守强暴的妇女生下没爹的娃儿，但绝大多数时候，女囚不大可能接触到男囚和劳改营职员。曾在北极圈内 Pecholag 劳改营工作并官及“典狱长”的 Fyodor Mochulsky，在其回忆性质的传记《古拉格老大》(Gulag Boss) 中写到：“如果女囚能证明自己怀上了平民劳工，或者更好的是，劳改营雇员的孩子，她就有理由得到宽恕，并期许可能美好的未来。因此，营地的领导对男女劳工都严加看守，尽可能不让异性接触，尤其需要让女囚远离我们的雇员。”

本着对丢工作甚至丢脑袋的担忧，正值二十来岁欲望强烈年级的 Fyodor，在与一位漂亮的未成年女律贼单独见面时，克制住了对方不停释放的勾引信号。他清楚，这个 17 岁

的少女经验丰富，她被送到古拉格的原因，是曾勾引几名官员到屋中和森林里，杀害他们并抢劫财物，只是因为未成年而没被立即执行死刑。这个少女律贼，甚至有本事利用规则范围内的灰色利益交换，来让服从她的女囚们超额完成劳改营安排的工作。一次，当时作为北部营房监管的 Fyodor 去洗澡，这个聪明而性感的少女摸了进来，“只着最单薄的内衣”，即便老来才写回忆录，Fyodor 也难以忘怀那个无限风光的险峰时刻。

“老板要帮你擦背吗？听着少女故作娇羞的声音 Fyodor 承认自己立即起了反应。一方面，我实在渴望女人，而森林里的狐狸精近在咫尺；另一方面，我深知如若事发，会将自己置于险境，被她操控玩弄，甚至丢了性命。没多犹豫，我将桶里的一点水泼了过去以作警告，并言辞怒斥，‘滚蛋！你再过来，我可要用滚水毁了你的脸。’从此，她没对我再有企图。”

地下层的尽头，是行刑场，虽是模拟场景，但也阴气逼人。萨尔宾娜自己也不愿意总到这块区域来，“契卡曾有着面对正枪决囚徒的传统，1937 年以前，这里的士兵也如此，但后来他们噩梦不断，说在走廊上、厕所里都会看见那些有着弹孔、留着鲜血的脸。于是从 1938 年开始，就变成从脑袋背后开枪了。”我记起波兰名导安杰伊·瓦伊达那部根据著名大屠杀事件改编的电影《卡廷惨案》，当纳粹德国 1943 年在占领的苏联境内，发现埋葬了波兰战俘和警察的集体墓地时，就是根据骷髅背后的枪眼来自证清白，坚称这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罪行。

三楼陈设着 Karlag 的另一面，以及 1950 年代后期古拉格系统解散后，囚徒和被流放者大致的去向。在劳改营文化生活部分，我看到一个芭蕾舞明星只言片语的故事，她被带到了 Karlag 打断了牙齿职业生涯从此告终，展厅里放弃一段熟悉却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我问萨尔宾娜，“这段旋律，我在哪一部电影里听到过。”

“我也有印象，但也记不起来”，即便是苏俄电影，年轻女生的阅片量肯定也比不上我。

参观行将结束时，伴随旋律的画面竟然跳入脑海。是被称为史上最伟大动画的《故事中的故事》，小灰狼推着摇篮讲故事，村中舞会中，男人一个个消失，去了战场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再没回来。可这是我近 20 年前看的影片了，此时此刻竟然就这么记了起来。经过一番查阅得知，这首好听的俄罗斯曲子名叫《探戈舞曲——被烈日灼伤》。是的，它也出现在米哈尔科夫关于 1937 年大清洗的电影杰作《烈日灼人》中。

卡拉干达，离去的和留下的

卡拉干达 (Karaganda) 的名字，来源于这片大草原丰富的“锦鸡儿” (caragana) 属灌木。作为方位格发音时，最后一个音节又与俄语“哪里”以及表达不想要情绪的脏话相押韵，因此成为前苏联一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笑话：它在哪？——在卡拉干达。城中还有一个以此笑话命名的雕像，标有阿斯塔纳、莫斯科等城市的路牌下，一个放下箱子的旅者在四下张望，另一个路人和一只土拨鼠摊开双手，似在无奈表示“是啊，卡拉干达这寸草不生的地方在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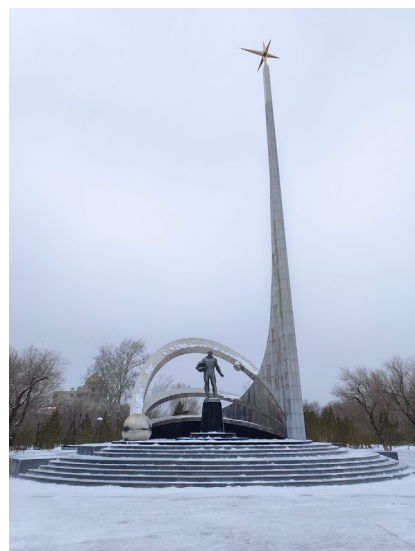


关于卡拉干达名称笑话的雕像

至少苏维埃宣布在此立市的 1934 年，卡拉干达确实是一问三不知的“在哪”荒野。沙发主亚历克斯和斯文塔娜的爷爷奶奶辈，作为某种程度上层级高一些的“工作定居者”，正是在交错长着锦鸡儿灌木的草原上迅速拥有了舒服的公寓和办公楼。立市之后在矿山、水库和工厂及其家属区包围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片具有公共服务和文娱性质的城区，如今在厚实深雪装饰下，沉淀下颇有姿色的旧时光。

旧时光里并非只有 Karlag 的苦难记忆，更多是用雕像凝固的美好日子。加加林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成为地球第一位太空人的荣耀，此刻他正抱着宇航头

盔，站在城市音乐厅的广场上；大型商超前，是当地英雄努尔肯伟大牺牲的最后瞬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驾驶着失控战机撞向德军坦克阵列；大型马戏团帐篷外，有给曾经城里少先队员带来欢乐的杂技演员，举伞男子正朝冰湖公园方向努力蹬着独轮车；还有举起沉重矿石的两位工人，他们身后的煤矿工人俱乐部，这晚将上演一场俄罗斯当红明星的脱口秀，海报上，这位网红似乎把自己打扮成了泽连斯基的模样。



卡拉干达加林雕像

雪地里社会主义时期的雕像颇为肃杀，雪堆背后的咖啡餐厅和小商铺却格外温馨。没准备任何礼物的我，蹭住着舒服老宅，始终有些不自在，就走进一家母女俩经营的花店。在这片大雪原上，绿植鲜花和蔬菜瓜果自然是非常昂贵的，我只舍得买上四朵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玫瑰。英语非常好的年轻姑娘跟我确认，“你是住网友家吧。确定要 4 朵花？在我们文化里，偶数一般是为丧事准备的哦。”幸好有了这番提醒，我才选上了第五朵康乃馨。



卡拉干达罗马天主教堂

小店童话般的内饰和街道上整齐干净的砖墙建筑，让我想到德国的一些小城。确实，卡拉干达成为初具规模城市后的 1940 年代，70% 的人口还真就是德裔俄国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伏尔加河流域，1941 年希特勒入侵波兰东部和苏联本土后，因为德意志血统，而被斯大林驱赶到中亚草原上。斯大林死后，这些德意志人大批离开，可赫鲁晓夫“草原变工厂”的中亚垦荒运动，又补充入了新的、与古拉格再无关的真正自由劳动者，到 1980 年代，卡拉干达人口突破了 60 万，远高于今时今日。1991 年苏联解体，剩下的德意志人，连带着大批量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迅速离开，全市人口锐减了 14%。习惯了工业城市生活的亚历克斯父母，选择了留下，斯文塔娜的妈妈和姐姐，则搬到了俄罗斯最西部波罗的海边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Karlag 博物馆没有陈列的详实个人故事，反而能在古拉格在线网站找到三则，恰好来自波罗的海三国他们都是在二战结束后以反苏通敌的名义被逮捕并流放到卡拉干达州。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或多或少与游击队活动有关，毕竟在那个被纳粹德国和苏维埃政权

反复争夺和蹂躏的年代，三个小国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公民，除了反抗别无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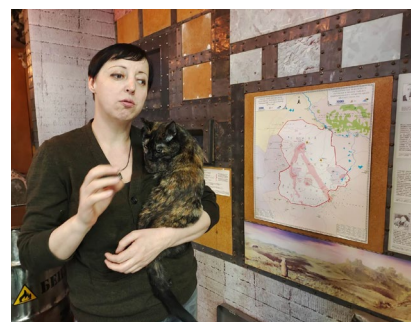
1956, 有着拉脱维亚女人拉脱维亚女人 Dzidra 的 Dolinka 劳改营合影

1949 年，丈夫在反苏游击活动中被击毙后，受伤并怀有孩子的拉脱维亚女人 Dzidra 进了里加的监狱，被判处到中亚劳教服刑 15 年。狱中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 Laimonis，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来到卡拉干达草原。起初，在城市南面专门关押外国人的 Spassk 时，婴幼儿福利院就安置在劳教营外，母子还能每个月见上一面，Dzidra 期许这样能让孩子记住自己。可短短两年后，这番“福利”也没了，3 岁的 Laimonis 被带到了更偏远山区的儿童之家，“被成为”孤儿。获得自由后，继续在卡拉干达寻子并生活的 Dzidra，又有了个女儿。母女俩 1968 年回到拉脱维亚，Dzidra 直至 2007 年去世，也没再有过儿子 Laimonis 的任何音讯。

我是在市中心一家名叫游牧 (Nomadic) 的旅行社，等会英语的主管到来前，从古拉格在线的手机网页版，读到的这则故事。隆冬时节，除了在城里逛逛，注定去不了有着自然风景的山区。主管奥尔加来了，她记得我给旅行社发过邮件，“我帮你在当地贴吧发过找旅伴的问询，毕竟城里还是有些对地区历史感兴趣的外语老师和商旅人士，有个法国女生感兴趣，可惜你在城里这些天她又没假。独自一个包车包司机，加上说英语的我，这成本你肯定接受不了吧。”奥尔加摊开几张地区旅游宣传册给我，指着卡拉干达东南面 Karkarly 山区的地图介绍，“这儿除棒极了的徒步线路和高山湖泊，还有一些苏联历史的遗存。Karkaralinsk 这个小镇，有一所孤儿院，古拉格时期没人照料的孩子，一部分就被安排到这儿。当然，整片 Karlag 区域，这样的孤儿院好像有过 18 个。有机会夏天再来吧，那时路也方便，可以不用绕回卡拉干达，接着去像巨石阵那样的一片花岗岩墓地，晚上就睡在转场的牧民毡房里。”

因为没有长时间的定居生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很难留下历史遗迹。而苏联初期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让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一部分学着农耕定居，还有一部分逃亡到中国。今天我们夏日里在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徒步或骑行，晚上住到哈萨克族同胞那些既作为转场居住也作为旅游接待的毡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到了哈萨克斯坦，却成为稀奇的“牧民家访”。

在卡拉干达做沙发客的三天，天气晴朗极了，加上只在雪墙堆砌的市中心漫步，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座重工业煤城。可事实上，卡拉干达正是哈萨克斯坦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没有之一。除了产煤导致的糟糕空气质量，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的 450 多次核爆，免不了也给这片广袤地区居民的健康留下了巨大隐患。卡拉干达自身，也曾 在 1962 年遭受了最严重的电磁脉冲放射性污染。作为 K 核试验项目的一部分，一次高空核爆产生的即时伽马射线，带着强大的电磁脉冲，烧断了保险丝，并穿透地面，使得电力电缆过载，点燃了卡拉干达发电厂。



卡拉干达环境保护 NGO 办公室

我走进有着工农兵墙画的一座办公楼，里面有一家生态博物馆。展品几乎都是当地环境资源和议题的文献，没有半句英文注释。一位职员抱着一只猫上前做自我介绍，“我叫安娜，这儿更多应该算我们 NGO 的办公室和给孩子的科普教育基地。这位自称“英语不好”的安娜，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跟我详细说着矿业结构、古拉格前后的人口变化、当下工业区与生活区的安全距离和隐患、核试验危害可能的持续时间，以及自家机构在环境部和工业部之间的尴尬桥梁角色，“发展优先，虽然同级，但环境部不敢得罪工业部。”这位安娜在此土生土长，却和亚历克斯家人一样，没半点中亚模样，“我妈妈是乌克兰人，我爸爸是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矿业居民中的德国人全走了，剩下我们和很多波兰人。”

据 2019 年人口统计，哈萨克斯坦全国的 3 万波兰裔人口，有一半都生活在卡拉干达州。这个数字，当然远小于 1939 年苏德瓜分波兰后被流放过来的 15 万人口。黄昏时，我去了市区西部南北毗邻的两大建筑。南面民族公园里，是恢弘的地区中央清真寺，外面空地上，2022 年 5 月 31 日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那天，立起了一座名为“大饥荒受害者”的新纪念碑；北面 Pobedy 公园内，是一座迪斯尼城堡般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坐堂。推开厚重的大门，正面的礼拜大堂上着锁，我大胆地沿螺旋楼梯，往地下走去，又再推开另一扇实木厚门，天籁级别的赞美诗吟唱，在巨大的空间中回荡。我想，祭台上的神父和数十排长条椅上零落坐着的信众，或许就是安娜提到那些没走的波兰裔吧。

ALZhIR, 女子古拉格

二月的阿斯塔纳 (Astana)，简直是一台因坏了零部件而无规则乱吹风的冰箱。在零下 30 度的户外，等候一个半小时公交去往古拉格，是比卡拉干达 Karlag 更为切肤的黑暗旅游体验。

与近百年前服苦役的囚徒和看守在真正的荒原里，搓手取暖，等候拥挤卡车不同，我是在一片光怪陆离的未来主义建筑包围下，等着如今遍布全城的新能源大巴。而相同之处在于，我和看守们都一样，得在没遮挡的开阔空地，焦虑地告诉自己，车就快来了。至于囚徒们，或许会担忧未知的目的地，也许比冷成冰棍的脚下还糟糕。

在下了几十次离开的决心后，一辆不知发往何处的 312 停到了面前，司机和陆续赶来的其他乘客，用勉强能识别的发音外加在手机上的书写告诉我，“就是去 ALZhIR，上车吧。”而原本准确甚至准点无误的公交信息应用 2GIS，上面显示的 300，一直不见踪影。

温暖宽敞、座位舒服的大巴车，驶过卫兵般屹立身旁的北方之光三塔，驶过巨大而白净的努尔阿斯塔纳清真寺，驶过顶层有着造浪沙滩泳池的汗·沙特尔毡房购物中心，驶过详细介绍清洁能源未来的 2017 世博会玻璃展馆，驶过 97 米高的生命之树——树顶挂着一个据说蕴藏人类幸福秘密的金蛋，驶出这座被美誉为“草原上的新加坡”的全新都市。经过城市西郊的一所大学后，漫无边际空无一木的雪原，会证明其去除修辞后的地理真相——1997 年才取代阿拉木图，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是仅次于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全球第二冷首都”。有气象记载以来，年均温 1.8℃，冬日夜间常在 -30℃ 到 -35℃ 之间，录得最低温 -51.6℃。

从哥萨克防御性质的定居点，到 20 世纪初铁路枢纽的阿克莫林斯克；再从赫鲁晓夫垦荒运动时的中心切利诺格勒，到独立之后“白色坟墓”之意的城市阿克莫拉；接着再从迁都更名后的阿斯塔纳，变为强调政治强人纳扎尔巴耶夫大名的努尔苏丹，如今再变回阿斯塔纳。一次次的更名中，也体现着人类从无到有，魔法般变出未来派都市的本事。

好魔法留在了身后“草原上新加坡”的璀璨舞台，坏魔法在市中心西面 40 公里外的小镇 Akmol 揭开帷幕。

我和另外两位男子下了车，朝马路对面一个似可对标阿斯塔纳生命之树的高耸建筑走去。其中一位男子用仅会的极个别英语单词告诉我，他是国家博物馆的维护工程师，今天



ALZhIR, 女子古拉格，
正面是悲伤拱门

放假过来看看。查资料得知，这个大型雕塑叫做“悲伤拱门”。如果说首都的生命之树顶端，时蕴藏了人类幸福秘密的金蛋；那么 Akmol 的“悲伤拱门”顶端，则是包裹了悲痛的哈萨克妇女头饰，而被它隐藏了的拱门本身，像是男人们的帽子。此地曾经的 ALZhIR，是俄语“背叛祖国者的妻子们之拘留营”缩写，也就是说，一座女子古拉格。



运送女囚的火车车厢

面对“悲伤拱门”的左侧，有一节运送服役女人们的火车车厢。简陋的几个双层铺位间搁着好些蜡像，介绍文字说这样一节车厢可以容纳超 70 名囚徒。右边一个戴着高级帽子的贵妇，似乎还在自我安慰，“那个不着家的男人犯了什么不关我事，都是误会，简单去几天，解释好了就可以回莫斯科”；左边一个沮丧地瘫在一侧，她可能早已知道命运的真相，甚至可能已经死了。她们大概都是 1937 年大清洗高峰时期，根据刑法第 58 条定义的“叛国者家属”，而被强制带到 ALZhIR 的 1 万 8000 名妇女中的一部分。

截锥状的博物馆本身，似一个收藏秘密的灰色盒子，搁在“悲伤拱门”后面。虽然没有窗户，但从天井透入的光线，打在展品上，也就揭开了秘密。馆员递上一个有着英、俄、哈三种语言选项的导览机，而后在每一个展区的墙洞上轻触一下，就可以倾听古拉格怪兽和这些苦难女人们的秘密。

1937 年，抵达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叛徒们的妻子”，也是先被送往卡拉干达的 Karlag。翻过年后，古拉格的妇女特别部门才选择在 Akmol 村建起这处 ALZhIR。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并无任何实质罪状的女人们不被允许通信。可是，那些告诉家人自己大概去了哪的信笺展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发往荒野之地的漫长列车上，每个女人会分得一份口粮，用白报纸包裹的鲱鱼和白糖。有劳改经验的大姐告诉姑娘们，下点狠心，咬破或戳破自己手指，写点基本信息在白纸上，揉成一团扔在经停车站上。好心的铁路员工，会按这些“血书”上的地址，寄给她们还没被带走的家人。1938 年，一位 ALZhIR 的女囚甚至收到一封带着邮戳的真正书信，来自她八岁的女儿。信中哀怨儿童之家的悲惨，希望尽快被妈妈接回去。这个女孩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了哪的？只能猜测，古拉格系统中还有良心未泯且不怕给自己惹麻烦的好心人。



ALZhIR 女子古拉格展览区

语音导览虽然内容翔实，但都是来自软件自动而生硬的翻译。在耳边絮叨了两三小时，我也就累了，决定想办法回程。会几个英语单词的国家博物馆电气工程师，也决定抛下那个投入到女性历史深河中的同行朋友，跟我回去。我们走出截锥，走出铁丝网装饰的营区，在全当场景还原的瞭望塔视野中，走在只有一条尾巴狗的村镇街巷上，遍寻不到任何一辆汽车，更别说公交和出租。天气实在严寒，哈萨克人应该都缩在周围现代化的公寓中。

我想起刚刚在馆内听到的一则故事，女囚们在营地周围劳作，一群当地人凑近过来，妈妈们提着布袋，孩子们从里面抓出石头砸向她们。看守们大笑着奚落女人们，“看看你们，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被人们仇视。”无辜的女囚们委屈着流泪，其中一个被石头绊倒，却嗅到似乎不一样的味道。这才发现，脚下的并非石头，而是用布草包裹着的干奶酪和奶疙瘩。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反客为主地领着电气工程师，自信满满走上国道，开始招手。不到5分钟，一辆小汽车刹住了。“你是中国人吗？”副驾上的男人用中文问到。他是一名新疆哈萨克族，老家在中国那边的哈密，过来这边工作和生活已15年。遗忘已久的中文，只能帮助他替司机打探那些穆斯林的必要疑问，“几个孩子？”、“结婚几年？”，以及“你们招手拦车的是个什么地方？”

“ALZHIR，你们这非常出名的女子古拉格”，我回答。

“那是什么？没听说过。”司机和哈密人纳闷。

或许是有限的共通语言传达不到准确信息。又或许是苦痛的历史早与当下的生活无关。

阿斯塔纳的“俄国难民营”

因疫情而内循环旅行的三年过去了，哈萨克斯坦是我在国门重开后抵达的第一个国度。记得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陆路入境这个世界最大内陆国那天，路边超市加油站里播着一则有趣的电视广告。一个俄国年轻人，背着行囊，千辛万苦翻越大山草原。一名哈萨克汉子骑着骏马来到跟前，递上一块蓝底上印着金色太阳国徽的巧克力。

俄国人问，“这是什么？”

骑马的汉子笑答，“这是自由的味道。”

接下来免签停留的两周时间，从刚抵达阿拉木图住所就帮我叫车的男生，到看演出结束回程路上帮我查公交信息的学生，再到阿斯塔纳公寓里一众忙碌自己事的住客，他们的一致特征是：躲避征兵上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青年。不必多问，态度绝对是反战的，至少不愿上前线成为炮灰。夸张一点可以说，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离开中亚国家的俄罗斯人，又大规模地回来了。虽然他们不是一代人，离去和归来的原因也完全不一样。

在首都阿斯塔纳，我住进高层建筑“北方之光”里的一家青旅。不知怎么设计和安排的，预订的那个单间硕大无比，还连带封闭露台，而公寓的其他三间则都是拥挤的多人间宿舍，里面住满了俄国人。于是乎，刚从ALZHIR女子劳改营归来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名古拉格的监工，在公共客厅里，面对一大群被流放过来的俄国劳教者。又或者，我更像是闯入俄国难民营的一个外人？

其中英语最好的女子说起自己的工作，是替因为祖国被西方制裁而没法从事金融活动的同胞们办理当地银行卡，“不过这里最多允许我们免签待上三个月，之后必须回国，再想办法过来。”



成为芭蕾演员而躲兵役的
俄罗斯雅库特小伙

一位完全是东亚面孔的帅小伙请我喝酒，以庆祝自己刚刚成功聘上国立芭蕾舞团演员职位，“比你在阿拉木图看到的那个团水平要高，当然了，比不了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小伙来自世界上最冷的城市雅库茨克，曾在莫斯科深造，并跟着一些小型舞团全球巡演。他坦言自己并不热爱芭蕾，“这只是谋生工具，我就喜欢打网游，以及喝酒。真的，演出头一天喝一点，上台后身体特别柔软，当然了，喝大可就麻烦了。”芭蕾小伙的文化课成绩特别糟糕，还因此在莫斯科被勒令退学，“幸好够明智，跑到了哈萨克斯坦，如果回我们西伯利亚老家，现在估计已经死在乌克兰了吧。莫斯科专盯着来自远东的少数民族裔兵源。”

这时候，芭蕾不止是他的谋生工具，而更是救命稻草了。

飞离哈萨克斯坦那天，恰是这位雅库茨克小伙的第一次登场，正是在阿拉木图已经看过的《爱情传奇》，1961年苏联时期的一部芭蕾舞剧。我掏出留下的节目单，问他会演其中哪个角色。小伙指着省略号后，“我是新人嘛。”

在阿拉木图时，我看了太多现场音乐。其中一晚在共和宫大剧场，是向前苏联摇滚传奇维克多·崔致敬的摇滚演唱会，相当于我们华语世界对Beyond乐队的致敬吧。台上仿真的朝鲜族小伙唱着崔最出名的那首《血型》时，我才翻出手机查阅歌词。卡拉干达的沙发主亚历克斯曾跟我说，“崔的歌，不用懂得语言就感觉很爽了，但如果知道歌词意义，那体验会更棒！”在这首名曲中，维克多写到，“我的血型，在袖子上印着；我的编号，在袖子上印着，祝我在战争中好运吧，祝愿我，不要永远留在这片原野。”

多么应景，这不就是避在哈萨克斯坦这些俄国年轻人所担忧的景象，没有谁再愿意把自己的血型和编号印在袖子上。

尾声

在科雷马河上进行发掘时，不知怎样地发现了一片地下冰透镜层——凝冻的古流，其中冻结着古生动物区系的代表物。科学通讯员作证说，这些又似鱼类，又似蝶螺的东西保存得如此新鲜，在场者们击碎了冰块，当即就乐意地吃掉了它们。

这是索尔仁尼琴巨著《古拉格群岛》颇有寓意的开头。

那一天前往Karlag路上，沙发主亚历克斯简单说着“被冰封在上游冻土层”中的那代苦役者，没有被强制征召过来劳动的他们，确实就没有今天他幸福生活着的卡拉干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这些苦难或许也真算不上啥，甚至没有能陈列于千年之后地球历史博物馆的一席之地。

“可是，在学会用历史发展眼光看问题同时，也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人这辈子很短暂，你们的那些个五年，我们的这些个三年，不由自主地，一眨眼就这么过去了。凭什么！”

我不免有些上纲上线的这番总结，亚历克斯却似乎没能听懂。他沉默了下来，开车驶在无垠的隆雪原上。

（文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高水位淹没的足球场



秘鲁驻莱蒂西亚领馆表示不能办签证

非虚构

亚马逊断章

张海律 | 非虚构图书馆

“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

因为等签证和交通船只，我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三国交界的亚马逊丛林深处待了好些时日，往上游逛了原住民部落、见了翻涌的各色河豚；划小艇朝内里湖泊，进入猴群与蜂鸟聚居的密林深处。而最为难忘的旅程，还是驶往巴西的三日慢船，它隔绝了网络，以前信息时代的方式，让乘客们在充满超现实主义幻象的大河上，释放出压抑已久的童真和玩性。

上游，鸚鵡飞离河水球场

秘鲁领事先生三周前死了，新官还未能到岗，因此我没能哥伦比亚唯一可能出签的最南端丛林城市莱蒂西亚拿到秘鲁签证，而转为选择容易搞定的巴西。就像是为了宽慰我，当地结识的朋友 David Ortiz 在喝酒时说到，“没事，秘鲁是我们拉美最无聊的国家，马丘比丘那些石头堆，你得用想象力还原历史场景才有点意思，巴西好玩太多了。不过在我们这片三国交界的丛林里，你依然可以报个团，往上游顺着国界走个二三十公里，爬上他们的岛屿也没人会去看签证的，也算是到过秘鲁吧。”



莱蒂西亚码头



丛林马其顿人表演

可以想见，为支持地方经济，也为满足外人好奇心，这样的行程总得有点原住民家访。我们的停靠点，是与东南欧那块历史地区重名的 Macedonia 人定居点。遮住阳光的大片木棚子里摆设着从雕塑到吹奏乐器的手工艺品，却没有任何族人追着拉着的兜售。部落长老带领着女人，用舂玉米饼用的棒子，在地面和双手间“捶奏”出韵律，以带魔鬼面具的孩子牵头，跳起了圆圈舞。另一边，一个欧洲美女被拉上去当作女主角。放心，哥伦比亚原住民远远没学会发明一些“有趣的婚俗仪式”，以向其他来宾强制收受不菲的礼金。整套说不上多特别的表演下来只用向竹箩里投上一两千比索折合人民币两块到四块即可。不过，因为疯狂阅片的年纪，看过一套 1980 年代的意大利铅黄恐怖电影《亚马逊食人族》，我总阴暗地把面前这位秀色可餐的美人儿，当作惊扰了当地神灵，而被当作残酷仪式的祭祀品。

动物也是少不了的。既然没有钓鱼项目，泥沙充足的浑浊大河里，必然见不到奇形怪状

的大鱼和传闻极度可怕的食人鱼，却在不少河段上，能轻易见到频繁跃起又迅速沉入水底的河豚，灰色的，在秘鲁一侧的 Cored 岛沿岸欢腾；粉色的，在隐秘清澈的 Tarapoto 潟湖里雀跃，而它们的这片领地，得体量细小的小船关闭马达，从腐败的密林深处钻出，才得以进入。另有一座猴岛上，生活着近百只顽皮的松猴，我曾在墨尔本动物园里见过这些从玻利维亚移民过去的小伙伴，并被其中一只偷走了交通卡。不知是不是已被人工驯服，哥伦比亚河岛上这些松猴，虽然能好几只的突然扑过来，占领你的手臂、脑袋、肩膀，却从不会是手痒的小偷，不过或许因为吃多了零食的关系，一位麦德林女士的 T 恤惨遭它们排泄。

支流一侧的 Narino 港，绝对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奇迹存在。裹挟着泥沙的亚马逊河，就从来没与从支流出来的清澈水体混淆。四月雨季带来的高水位，完全淹没了河畔的足球场和带顶棚的篮球场，赤裸裸或披着 J 罗国家队球衣的孩子们。纷纷一个猛子扎进清流里，到篮球馆里分离扑通着，竭力突破对方防守，将“水球”投入篮筐。这个 6000 人口的港区，仅有两部机动车，一部用于救护（它注定没办法驶入毫无道路的密林），一部用来收纳可回收垃圾。任何角落都可见的分类垃圾箱，以及屋檐上雨水灌溉花园系统，足以让任何敢于自称“环境友好”的大都市汗颜。不过，我没能村里住上一晚，不确定发电机在午夜歇息后，气温能否降至能让人安然入睡的程度。



河上的金刚鹦鹉劳拉

鹦鹉劳拉终日守在 Narino 港浮桥码头的最远端，咒骂着闷热的午后。对此司空见惯的孩子们，早已懒得搭理她，自顾自的从桥上跳下爬上。我们的小艇驶走了，顺便用芬达诱走了贪嘴的劳拉。离岸越来越远，正当我们想着回程时还得绕路把应该已经迷路的她送回去，她却突然飞离了芬达、飞离了甲板，发出那天午后丛林间最尖啸的叫声，展翅成了一支雄鹰，在大河上极速滑行并完成精彩绝伦的一次次俯冲后，孤傲地飞走了，她一直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整个画面落实了我对南美大陆“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劳拉既聪明如《霍乱时代的爱情》里那只终日咒骂着右翼政府、以至于让爬上树梢想让其闭嘴的年迈医生摔死的金刚鹦鹉，又炫耀着如《老炮儿》里那只突然在北三环上撒腿奔逃的鸵鸟那般骄傲。随着它尖叫和展翅，我看到了自由的样子，于是，矫情地盈眶了。

支流，皮划艇深入“雨”林

当云层堆成脸盆状时，也就是天空该把积蓄了一整天的水分，倾还给热带雨林的时候了。只不过，这一倾盆，偏偏得等到我决定深入雨林，来一趟皮划艇之旅时。并且，看这劈头盖脸砸不停歇的架势，估计得下个半年，直至把莱蒂西亚重新没入大河深处吧。

漂流出发点，是在距城中仅 2 公里的一处精致院落里，无论《孤独星球》还是 Wikitravel，均没有提及的秘境。照推荐人 David Ortiz 的说法，“对于莱蒂西亚周围丛林里那么多的好玩去处，旅游攻略几乎都不知道，外国调研者们又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嘈杂而脏兮兮码头不远处、机场跑道的旁边，竟能有与众不同的景观呢？”

我既迫不及待的想感受与众不同，又扭捏着不敢冲入瓢泼大雨中，来一场痛快热带淋浴。店家主人走进雨中，摊摊手表示，“这算什么”。半个多小时后，当暴雨差不多变成中雨之时，

我才鼓起勇气，随等候多时的掌舵男孩，拖着皮艇，从雨中走入通往溪流的后门。



皮划艇深入“雨”林

撑离岸边，双人双桨的皮划艇，就此扎入被苍天巨树遮蔽的河中。宽阔的树叶，暂且成了没多大用处的雨伞，衣裤瞬间湿透，却也因迅速撞见树干上同样破罐破摔的猴儿，以及对前方幻变景致的好奇心，而迅速开始放弃抵抗，干脆成为泡在浴缸中玩纸船的孩童。不过那件一直以来从不离手的玩具——手机——只好规矩矩矩搁在可漂浮的防水桶里，再不用（不能）隔着电子屏幕去欣赏风景。

我对植物学一窍不通，与花草草相关的旅程，不用说那些绕口的拉丁词学名，就算向导有本事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估计都不认识，更何况刚进大学的店家掌舵男孩词汇量极其有限，大抵只能在一遍遍从宽阔水域重又钻进密林时表示：“看见树干上那些齐整黑条了吗，那才是最高水位。”也因植物知识贫乏，我无法描述从溪流到湖面再到芦苇丛的风貌，至于动物，最常见的是时常如战斗机惊起的白鹤、如直升机悬停于荷叶上方的蜂鸟、时不时突袭摇浆的娇小树蛙，以及树梢上的丛林侦察兵——松猴。雨驻后，主舵男孩多次指向湖面远处，几经努力，好不容易瞥见一只冒上水面“长达”2 秒的粉红河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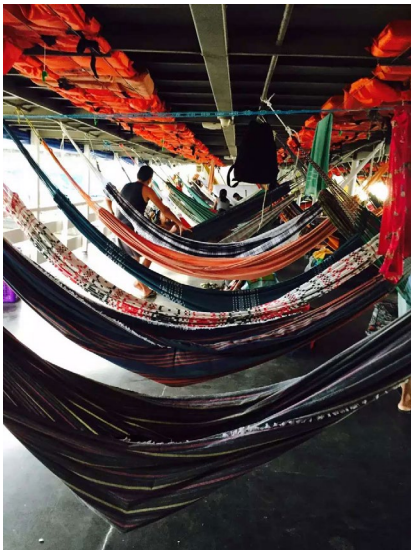
经过后来向 David Ortiz 打听，得知这片景致多样的水域被命名作“Yahuacaca Lago”。这词形似亚马逊丛林中最具神奇疗效的死藤水（ayahuasca），总之亚马逊流域充满着大量人类尚没能深究甚至科学无法解释的神奇植物，搞不准眼前的水林里，就有着原住民坚信可与宇宙沟通的终极工具吧。

干流，慢船三日

Day1

高水位季节，船只无论顺流逆流，都会比旱季快出许多。譬如，从三国交界巴西一侧的塔巴廷加下行至亚马逊流域最大都市玛瑙斯，搭乘快艇耗时从 36 小时减为 30 小时，而选择慢船，则更戏剧性的从整四天变为三天。可即便封闭空间的快艇配备航空座椅，谁又能忍受 30 小时不便挪动也见识不了风景的不停歇飞机呢？于是，只要不是时间特别匆忙，3 天的顺流慢船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根据船型不同，舱位又分为 800 到 1000 雷亚尔的空调房，以及 150 到 200 雷亚尔不等的吊床位（1 雷亚尔=1.8 人民币）。可是绝大部分人只要提前瞥过一眼房间，知道那是比旺角 200 港币陋室还要糟糕的逼仄空间，就都会毫不犹豫的决定去河边市场买吊床。

见其他即将同行的外国人还在犹豫，“睡吊床？怎么能熬过三天啊！”我便把去年在英国各大港口海事中心学来的知识抛出，“人家英国皇家海军直至一战后，才终于用上下铺换掉吊床的。女王在不列颠号上的水兵们，更是把吊床坚持睡到 1973 年。”那么，这可是丛林深处，导致寨卡肆虐的蚊子又怎么办？奇怪的是，即便在莱蒂西亚客栈的晚上，没有空调没有蚊帐，也没任何蚊虫来烦扰，更何况我们顺流而下，蚊子那点脆弱翅膀，飞得过航船，抗得住强风？



开往巴西的慢船甲板

我们较为简陋的 150 瑞尔吊床慢船, 于中午时分驶离三国交界处。乘客们纷纷无师自通地拴好吊床, 从头望去, 像是三排整齐晾晒的五彩床单, 连续多晚下来, 从没听见或听说哪个倒霉鬼摔了下来。彼此还不熟识起来的乘客, 与大河两岸构成一道沉默的风景, 就连想象中理应奔放不拘的本地人, 也还没开始展露巴西性格。这一天的行船, 三不五时地, 就靠岸上下货物和乘客, 瞅着谷歌地图上没啥动静的 GPS 小蓝点, 不免担心, 照这不靠谱的节奏, 岂不得晚点 5 天。航船掠过的简陋村庄, 往往又几所木屋、一座教堂、一颗粗壮的村公树以及一块绿油油球场组成。北岸偶尔可见一些嵌着太阳能板的舒适度假屋, 它们属于 12400 平方公里的 Mamiraua 可持续发展保护区。1980 年代整十年, 亚马逊雨林以每分钟消失一座足球场面积的可怕速度, 被大肆砍伐, 巴西部分的雨林骤减 20%, 直至 1988 年, 环保领袖 Chico Mendes 被开采者谋杀, 毁林问题才引发公愤, 并督促政府以强硬手段介入保护这块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地球绿肺”。Mamiraua 保护区, 也正是在这一亡羊补牢的大趋势下, 设立起来, 成为巴西第一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

即便曾被大面积砍伐, 巴西仍保住了占国土面积 40% 的 330 万平方公里的雨林, 这至少让航行所及的河段上看不出任何伤疤。在没有网络、没法驶入景区的漫长时间内, 我只好回归“电子书本”, 读完这个即便连军事独裁都无法有效自我管理国度的简史、继续翻看与航运有关的马尔克斯名著《霍乱时代的爱情》, 开看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关于上世纪后半叶激进左翼恐怖分子的 6 小时长片《卡洛斯》。

Day2

和切·格瓦拉一样, 卡洛斯也是拉美人。一位来自阿根廷, 一位来自委内瑞拉, 像是南美的伟大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继承者一样, 渴望着把解放事业推向全球。当骑在摩托车背上的格瓦拉医生, 遍历了苦难的南美, 选择输出对抗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 并在死后加冕为全球青年文化偶像时, 卡洛斯却以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为借口, 伙同 1970 年代欧陆一切左翼激进组织, 在中东独裁者的金钱使唤下, 以平民和政见不同者为袭击目标, 成为被世人万口唾弃的恐怖分子。

在慢船上看完电影《卡洛斯》, 思绪也就跟着回顾我有限见识中的拉丁美洲。3 年前我曾在危机四伏的中美洲浪迹一圈, 听危地马拉 NGO 工作者抱怨他们的军费开支是教育开支的 9 倍, 跟萨尔瓦多老游击队员踏上曾被右翼黎明巡逻队整村屠杀的广场, 眼瞅着显而易见的贫富悬殊, 也就理解了当地孩子所剩不多的选择: 不是成为暴力帮派分子, 就是进山里参加反政府武装。我知道即便奥运年来到, 巴西也有着同样显在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给孩子们一只破袜子绑成的球状物, 或是给他们一把手枪, 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只是河流正中的这条航船, 距离可以观察、对比和思考的生活真相实在太远。

要让能说英语的乘客变得相熟起来, 食物从来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幸运的是, 150 雷亚尔的船价, 竟还包括还算丰盛的一日三餐。就这么着, 大伙儿被鸡块、牛肉、带糖的巴西咖啡和辣椒酱撬开了羞涩之口。Jeff 来自底特律, 是一名拉丁舞老师, 正第一次出国, 准备拉美西非地玩上大半年; Phil 来自奥地利西部山区, 作为一名退休地理老师, 亚马逊一直是他的梦; 秘鲁大婶 Vicky 大婶移居加州 20 年, 正学着老乡巴尔斯·略萨, 用西语写作一些当代魔幻现实主义故事; 在加勒比海做活的阿根廷水手 Federico, 带着一

把吉他, 可那点雕虫小技比高中时的我还烂; 哥伦比亚大胸姐, 忘了她叫啥, 姑且编造成最大牌那位夏奇拉吧, 总在甲板上锻炼着拳脚, 跃跃欲试的想来一场卡波耶拉(巴西战舞), “我说 Jeff, 你总得带我们跳上一晚桑巴或莎莎吧, 我手机里音乐有的是。”

一个午觉醒来, 满甲板的吊床竟锐减了四分之三, 如我所料, 大部分亚马逊西部居民在一个叫做 Tonatins 的港口下了, 接下来, 完成这一流域主要接驳任务的航船, 将开始加速前行, 追回被反复停靠上下货而耽误的时间。厚重的乌云送来让大河水位继续上攀的暴雨, 甲板两侧拉起蓝色的挡雨帆布, 我想这得肆虐一整天吧, 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吊床上, 继续读着《霍乱时代的爱情》, 丧偶两年后的菲尔米娜, 重新开始与又爱又恨的初恋阿里萨见面, 他们都已经七旬老人, 猎艳过数百女人的阿里萨自始至终为菲尔米娜保持着“处男之心”。

Day3

Jeff 也非常想要给大伙儿来一堂免费拉丁舞课, 甲板上层也有着可以与手机相连的蓝牙音箱。但这可是一个周日, 对巴西人至关重要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联赛日。从中午开始, 就有两个乘客守在船上唯一的破旧彩色电视前, 紧紧盯着白花花的没信号的画面。他们是死敌对头, 分别穿着红色的弗拉门戈和白色的瓦斯科达伽马球衣, 里约州联赛的重要德比就要开始了。亚马逊时间下午 2 点, 电视天线终于对准了卫星, 上层甲板瞬时凑齐了全船巴西人, 开场哨响。



巴西联赛日的河轮甲板

我和毫不懂球的美国人 Jeff 下了一瓶啤酒的轻注, 赌哪边先进球。可恨的达伽马 11 号安德烈齐尼奥一粒精彩补射, 让我这个曾经的懂球帝输了, 7 号哥伦比亚人里亚斯科斯再下一城, 让全场穿着红黑间条衫的弗拉门戈拥趸瞬间泪崩。不过这样也好, 大局已定, 也就犯不上让敌对双方在甲板上动手了。不过, 船舱里最焦虑的人成了 Federico, 这个时候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盛大的德比, 博卡青年对阵河床, 阿根廷人早早穿起一道红色斜杠的著名队服, 毋庸置疑, 只有一个频道的亚马逊慢船电视, 是不会顾及巴西死敌的足球联赛的。无论伤心还是欢愉, 足球, 永远是拉丁美洲人民最能宣泄的出口, 对糟糕个人经济现实的绝望、对社会秩序混乱的失望、对反反复复动乱的认命, 都能在小小的皮球里找到释放管道。

黄昏时分, 大河上空最为惬意的阳光雨, 送走了“巴西主场球迷”, 甲板被“客场多国游客”迅速接管, 更准确地说, 这个告别的夜晚, 成了舞蹈老师 Jeff 一人独大的地盘。先是他借着我输过去的啤酒, 把积水的甲板当滑冰场, 一次次溜到桅杆那头; 然后是近些年滴酒不沾的我, 抱着斜向上深入河面的桅杆, 嘚瑟旋转。无酒之醉, 谓之青春, 我向来以这句好像源自歌德的“名词解释”, 来张扬自己的人来疯性格。No Zuo No Die, 虽不至于坠入河中, 我却也兴奋一跃, 踩碎了船员装货的一个空泡沫箱, 因此被大副讹了注定远超箱子价值的 100 雷亚尔赔偿款。

夜晚的嗖嗖凉风, 迅速吹散了我的心有不甘, 手机接上蓝牙音箱, Jeff 的教学时间到了。哥伦比亚大胸姐夏奇拉手机里的莎莎、桑巴和巴萨诺瓦, 还不如为旅程做好听觉准备的我多, 于是只好让我担任 DJ, 三个多小时的时光中, 瞅着 Jeff 对其他女乘客进行亲密教学。至少, 这位底特律老师还是教会了我一些卡波耶拉基本动作, 继而就开始一人踢腿一人下蹲躲闪的巴西战舞, 其中一次抬腿我速度没把握住, 狠狠踹在了 Jeff 脑门上。秘鲁大妈 Vicky 见状, 挑拨离间道: “你是有意而为吧, 看他带那么多妞儿们跳舞。”

是夜, 又来了一场狂风暴雨, 在如秋千般摇晃的吊床上, 我做了一个科幻噩梦。化身人形的外星侵略者, 大批潜入一场邮轮舞会, 它们的血是蓝色而人类是红色, 唯一能够区别



巴西联赛日的河轮甲板

敌我的方式,就是共舞时冷不丁一鱼叉扎入脖颈,舞到高潮时,甲板上蓝红液体混合滚动,水面上覆满尸首。

还有,我是在慢船即将靠岸玛瑙斯之前,才算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已是内河航运公司老总的阿里萨,为与菲尔米娜共修迟到了 50 多年的爱情,让船长高悬起没人敢靠近的霍乱黑旗,在河道上往往返返。

“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船长问。

阿里萨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前就准备好了答案。

“永生永世!”他说。

文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张海律

既是典型家乡宝的昆明人，又是经常撒野上路的旅行者。曾经过着电影节、音乐节、滑雪季的三点一线环球生活，并撰写相应文稿，现期待恢复曾经的体力、运气和文体荣光。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题图为电影《少年·小赵》（2015）剧照

非虚构

一根布条和 我的第一次“田野”

陈雯琦 | 田野中国

“或许，从一根布条的视角看，
束缚和联结本身就是一体的”

作者按：

2022 年夏天，我到广州参加“看见最初 500 米”Mapping 工作坊。作为第九届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策展单元之一，这个由人类学者项飙、建筑师何志森等主持发起的工作坊，拟通过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方式，将作为抽象学术名词的“附近”转化为个体可以看见、建构和行动的场域，以寻找一种修复社会联结的方法。

作为工作坊学员和一名人类学学生，我抱着对“附近”概念的理论兴趣，以及由“参与式观察的实践反思延伸而来的目标，从我的住处横沙村——我物理生活的附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但回过头看，与其说完成了一场田野，不如说在我每天的生活中，熟悉了一个人、两个人、一个物件、一种关系、一个生活情境。最终，我用一根布条做成的装置，试图“转译”我在村里偶遇的一位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和他的伴侣的“附近”。

在工作坊中，项飙总是强调，“观察”是要寻找一种“存在方式的问题感”。或许我带着某种问题意识，某种试图检视、分析、提炼的姿态，看见了他们的“最初 500 米”。但我发现，更多时候，我寻找到的“问题”，他们选择与之共存。反而是我，或许在不断叩问“问题”和“姿态”的情绪中，在无力、困惑和犹疑中，看见了我的“最初 500 米”。

或许最终“附近”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未被“叙事化”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片水塘，一个阳台，一个坐在阳台上的老爷爷，一个在阳台边忙碌的老奶奶，一根布条。还有一个站在阳台边的我。



“那个阳台上的老爷爷”

眼睛

和邓奶奶聊天，夜晚总是比白天让我感到更安定。因为我无需考虑当下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夜色因其天然的帐幕，留给我一个更隐蔽而妥贴的位置注视他人的生活：可以搭话，可以沉默，可以困惑；当百感交集地失语时，可以调节呼吸，可以伺机抽离，或就望向她的眼睛。

通常这个时候，屋内的粤语电视还是开到声音最大，招爷爷还是坐在那把他每天都坐的椅子上，面朝电视，背对我们，他稀疏的白发和他的脸一样不动声色。邓奶奶从他们家一楼的阳台里探出头来，双手搭在台沿上，问我今天又去了哪里玩，眼角的鱼尾纹开出了两朵花。可一般过不了多久，我又会看着那双眼睛慢慢暗下去，慢慢又说起爷爷的病情，慢慢又变成，算生活这笔帐。

我不是最先发现邓奶奶的。在横沙村，最醒目的一定是招爷爷。只要说起那个“坐在阳台上的老爷爷”，几乎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住在桥头那家对吧？”就在那条“大路”对面，挨着那个水塘，旁边是“成记美食”，还有一家盲人按摩店……后来，邓奶奶告诉我，那个水塘其实有名字，叫“长塘”。长塘有多长，村庄最初建造时就有多长——或许在成为城中村之前，村庄也有依山傍水的记忆。搬进村的第一天，我和一位广州朋友拖着行李，沿着长塘往村子深处走，一边聊她在这里度过的零星的童年，一边说起我这次毫无头绪的田野调查。我想观察“附近”，但作为一位半路出家的人类学学生，我好像并不擅长寻找一个合适的“观察对象”。她说，你看，那个坐在阳台上的老爷爷，他就肯定很想和别人说话。

看见他的第一眼，我的内心并没有太大波澜。他就像任何一位到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坐在窗边，坐在路旁，坐在太阳下，一言不发，好像退化成了一棵树，一塘水，只剩风吹过时动静，醒目地被人忽视着；等你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又直直看你一眼，像婴孩的眼神。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我的曾祖母，又想到小津安二郎镜头下的老年生活：很慢，很低，很多空镜，像在发一个长长的呆。最后一次回老家看望曾祖母，她坐在祖屋的窗户外等我，等到晚上和亲戚们聚餐结束，天色已暗，她还坐在祖屋的窗户外等我。

但那个老爷爷的眼睛似乎没有聚焦，他望见了我们，又好像望穿了我们。我分不清那张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好像很忧伤，又好像这种忧伤在这具身躯上缠绕已久，已经被习惯、被自洽，被正常化为面色的一部分……后来，当我日复一日经过那个阳台，遭遇那双眼睛，我慢慢明白，那是一种隐蔽的忧伤。

早上十点，那双眼睛就在那里，一直到夜幕降落。它面前的世界或许和我面前不一样，有自己的节奏，质地，偶尔的背景音乐（开到最大的电视声音，或是我一句也听不懂的粤剧磁带），甚至——时间。那双眼睛，让我每一次经过时都不自觉脚步放慢，那是我尝试进入那个世界的时间。后来，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向那双眼睛挥手，“爷爷好”——我看见一只手臂颤巍巍地举起来，也朝我晃动。

这逐渐成为我每天的仪式时刻，给予我莫大的激励。我觉得我开始认识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不被别人关注的人，这或许可以给他的生活带来某种慰藉。而我，从与人挥手开始，一种稳定的身体感逐渐取代周遭的陌生，变成某种秩序。这里的生活慢慢向我敞开，横沙村的鼓点浮现上来，人流的面孔开始清晰。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长塘的水波与我一同摇晃。我开始期待更具体的回音，对于田野——附近——阳台上的老爷爷。

可是——“他听不懂的”，奶奶如是说，“你要干什么？”

那天，奶奶就这样突然出现在阳台上，把我吓了一跳。那天，我第一次鼓起勇

气在阳台前停下脚步，尝试和爷爷进行挥手之外的进一步互动；他还是直直地看着我，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粤语音节。他好像真的听不懂我说话。

这并非我预料之中的结果。我不会粤语，可我并不害怕语言障碍。我相信语言的缝隙能渗透出某些东西，我需要学会成为一个非语言的沟通者。

但奶奶却告诉我，爷爷脑痴呆十年了。他根本不认识人。

他是傻的。

他不中用了。

他什么活都做不了

他只能每天坐在这里。

后来，在阳台边的多次探问中，我才慢慢揣摩到这番话里的某些滋味，以及关于爷爷的病症的更精准的概括——一种脑中风与阿尔兹海默症的混合版本。但在当时，我只清晰地记得自己有多么不喜欢这些形容。或者说，与爷爷搭话的冲动正源自对于这些有关衰老和疾痛的刻板印象的某种直觉式的反抗。我凑近了阳台，第一次看清了他眼睛中的细节：一种我不知该称之为迷茫还是恐惧的空白。他依旧直直地坐着，却像蜷缩成了一团。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年轻人在两位老人的阳台前进退两难。我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我感觉背后似乎有别人的目光，不知道是来自途经的路人还是周围不知什么时候涌出的邻居。但我来不及多想，我已经站上阳台这一暧昧的边界。“爷爷”，我还在尝试，尽量让语气温和而笃定。他的眼神还在挣扎，最终涣散了。

又是一阵尴尬。我突然想起自己手里的速写本里有一幅画。我不抱太大希望地翻开。是一只画工拙劣的山羊。

他的眉眼慢慢向下移动，还是紧锁，还是迟疑，还是……但突然一下，好像亮了——他像是抓住了一个东西，在一团混沌中，进而从嗓子深处挤出两个像笑声的音节。或许，他终于辨认出了一段陌生语流里那个长长的起始句。

他们一起笑了——看到那只蹩脚的山羊，奶奶也凑上前来。你挺厉害，她说，他平时连女儿都不认得的。

阳台

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我这两个月的田野里最开心的一天了。阳台前的驻足，虽始终关联着一丝冲动，但我就这样冲进了他们的生活。之后的变化像顺水行舟：奶奶接纳了我在阳台前的逗留，和一位老人的挥手，从此又多了一位。我认识了更多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亲属、朋友、邻居、熟客，观察到更多时段中阳台的不同截面——奶奶每次忙活着的事，爷爷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异，阳台最热闹和冷清的时刻。

我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年轻人在两位老人的阳台前进退两难。

这些都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作为“旁观者”的目光是多么单薄：我看见爷爷的孤独，却未看见奶奶的陪护（以及更多亲友的潜在关注）；我以为爷爷眼里是与人交流的渴望，但只有靠近时才发觉那更像被冒犯的惊恐。我好像更明白了一些东西，第一眼觉得突兀的场景，背后或有一套隐秘的秩序。在阳台上，爷爷独身一人，也实则包裹于台前无数过客的眼睛中；当我这一“闯入者”出现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启动某种散碎却实存的“监视机制”……“附近”好像被推开了一层涟漪，暗流补足的瞬间，也使我一窥其累层的结构与动态。

是爷爷的那个微笑，让某种触碰发生了，也似乎让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入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作为一种“联结”的信念推动我继续理解阳台内外的生活。“试着做些什么，让爷爷奶奶再笑一次吧。”可我却逐渐发现，原本以为像曙光的东西，也可能已经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弧光。随着我越来越深入“附近”，认识的人开始结成一网，我也越来越受制于一种张力，提示着我之于这张网的“异常”：在阳台前逗留的人群中，只有我是那个总是拥有一张椅子（奶奶拿给我的）、会被反复询问“你是谁”却仍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的人。而每次我试图给奶奶帮忙或送一些小东西（多是顺手买的食物），总会遭到礼貌的拒绝——或许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挖掘他人潜在需求的能力多么匮乏。

阳台令我玩味，我和爷爷奶奶的互动生长于此，也似乎止步于此。它像一面棱镜，

折射出“附近”的纷繁侧面，也引人迷失。好像已经触碰到的东西，转瞬又若即若离，“联结”是如此飘渺，似乎质疑和拒斥才是常态。恍惚间，我甚至怀疑起当初的那个微笑，难道也只是一道梦影？

确实，爷爷再也没有笑过。他的眼神依旧失焦，而奶奶依旧忙碌。很多个早晨，我出门时经过阳台，与她聊上两句，等约定下午再继续时，她却说：“你下午就见不着我了，我要上二楼去干活了。”说罢，把正在清洗的拖把放到长塘里去。

阳台令我受挫——它是一个问题。我像攻克一道关卡那样逼近它，审视它，站近看，站远看，站在桥上看，站在长塘对面看，从我家门口望出来的方向看，甚至想象自己站在“大路”对面的二楼看——那是另一个阳台，是爷爷奶奶的女儿家。奶奶讲，女儿专门买了那套房子，就是方便每天能在阳台上望见对面的父亲。但是，当初奶奶惊醒我的那句“你要干什么”似乎仍有千钧之重，我的“附近”到处都是它的回声。

或许，我自己也需要去探索这个答案。

我决定放下田野，短暂地逃离横沙村，逃离阳台；和朋友们去旅行，回到我的原生“附近”大口呼吸。临行前，我在阳台给奶奶留下了一封信，向她“正式介绍”我自己：我的“目的”（我确实抱着目的而来），我的“项目”（以及什么是田野调查），以及更重要的，关于“我”，参加工作坊的我，学人类学的我，在过去的一年因学业飘洋过海、作为“他者”重新发现生活世界的我，在爷爷奶奶身边一步步从孩童长大的我，满是烦恼和困惑的我……此刻我无从分辨，驱使我的学科意识还是私人情绪，但我希望真诚永远在姿态之前生长出来。

我尝试绕开阳台。

阳台门口正对着长塘，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不只有潮水，还有人和故事。我摒弃了动机和预设，只坐下来听。这些故事盘根错节地延伸开去，慢慢结成了一个语境，然后，阳台变成其中的一个坐标。我发现自己被托上了一个更远的位置注视着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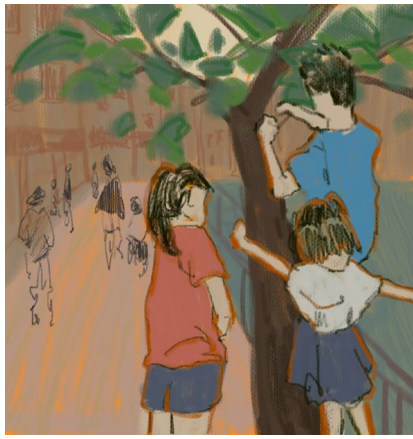
原来以前，招爷爷是会认人的，盲人按摩店的技师黄阿姨告诉我。除了聊爷爷，她还和我聊白话（“没怎么学会”），客流（“主要是年轻靓女”），和疫情之后的地租变化（“你们房子租贵啦”）。八年前，大女儿刚上初中时，她从湖南永州来广州，经同乡介绍来到这家开在横沙村的全是湖南人的盲人按摩店（虽然只有老板是盲人），从此便在这里住下，从头开始学习按摩技术。更年轻的时候，她在温州的服装厂里打工了许多年。下个月，她要回湖南一趟，她即将成为外婆。

以前村里只有他们这一家按摩店，开在村口，黄阿姨每天早上从当时的住处去店里上班，会途径老爷爷家阳台，时常还能看见奶奶用轮椅推爷爷出门转悠。后来因为和潮汕人的竞争，他们店面搬迁到老爷爷家隔壁，开始重新装修，她会把一些多出来的木材给老爷爷家送去。那时他还会说，“放在这儿就好，谢谢。”另外，“他老婆人也很好”——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奶奶本人——“有一次大雨，她专门跑到我们店门口提醒我们收东西。她说，喂，雨下这么大，你们没有看见吗？”

十二岁的品怡说，每天中午，可以看到爷爷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吃饭。

我第一次在阳台和爷爷搭话时认识了品怡，当时她是围观的人群里最不怕生的那个，由于我不会粤语，这个小女孩成了我的救兵，帮我向邻居们传达疑惑，也向我传达她的疑惑，“你在这里没有别的朋友么？”后来，她和她七岁的弟弟和四岁的妹妹，成为在我身边晃荡的“吴家三小只”。父母只允许他们在家附近玩耍，不能跑出长塘，所以他们只好每天去“成记美食”找店主那年纪相仿的三女儿紫琳。现在有了我这个“大人”的陪伴，他们得以“正当地”继续探索村子里其他的角落：宗祠、小学、公园、远离地铁站的长塘尽头的巷子（因为租金便宜，黄阿姨以前就住这里）、作为核酸点的篮球场和的小广场（“那是最好玩的地方！”）……

在我面前，孩子们尽情地展示他们关于“附近”的知识：如何跻身逼仄的小道，如何攀爬后山的陡坡，如何把桉树叶撕成爱心状，以及打开话匣子，七嘴八舌地“复读”从大人嘴里听来的村子的秘事，谁家总是大门紧闭，谁家半夜传来打斗的声音，天亮之后，哪条巷口的石板上又多出几行字……尽管后来，这些故事在奶奶那里，大多都有另一个更“祛魅”而平淡的版本。



三小只与他们的“附近”：一棵枝繁叶茂的梭树

“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那个老爷爷就在阳台上坐着了”，品怡说。暑假结束，她就要去从化上初中——“小时候妈妈还开水果店呢”——弟弟插嘴道，“现在她都不做工了，每天就在家玩儿。”

奶奶说，她是看着三个孩子们出生的。有一天夜里三小只中的老二突发肠胃炎（当时还没有老三），他年轻的父母慌了神，跑来敲奶奶家的门。“你小时候肚子疼还记得不”，在阳台，奶奶弯下腰，轻轻敲站在阳台外的弟弟的脑袋，“那时你还得你妈抱着”——“不记得了”。

“所以爷爷还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我向奶奶求证。何止呢，奶奶说，他可聪明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听话，吃饭只知道把爱吃的肉挑出来，剩下的不吃。打也没有用，骂他有用，一骂他他才听话。但他只听奶奶的话。



阳台上的那束花，花瓶里插着三小只用桉树叶做的爱心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三小只给爷爷奶奶送去一束花。奶奶或许觉得这是个“可接受”的礼物，找来一个空塑料瓶放在阳台上作花瓶，让我们摆弄。一整个下午，我们跑前跑后，期待地填充这道我们增添的亮色。安静坐着的爷爷突然发出一声和他身形不相称的吼叫，“冇搞啦！”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弟弟怯怯地说，他不让我们碰他的花。

孩子们悻悻地散去，我突然意识到，或许，他从来都没认识过我。他不知道那是我们送来的花。

这些故事在奶奶那里，大多都有另一个更“祛魅”而平淡的版本。

那以前每天的挥手呢？难道每天都只是在回应一个新的陌生人？

“附近”或许能在一种重复中建立，但对爷爷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却“杜绝”着很多东西。此时他的病症才以某种不能用呼吸去体量的面貌浮现在我眼前：一种真空。在阳台上，我所试图观察、假设、分析、验证的这一切复杂的关系，我费尽心力去想象、体验、理解的他的“附近”，我的一切情绪起伏、纠结反思……他浑然不觉，只顾吃喝，以及，

和奶奶在一起。

“他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吓着周围的小孩子”，闻声赶来的奶奶满眼歉意，而爷爷又恢复了一贯的不知所措。“平时亲戚来，要进阳台，他也大叫，要把人家赶走。”除非奶奶也在阳台上，亲戚们才能安然进门。

阳台或许是一片最后的自留地。

布条

那次短暂的“出逃”过后，我和朋友又拖着行李回到了横沙村。工作坊还得继续，待解的困惑还在那里，长塘已经变成了一面晃眼的镜子。朋友说，为什么有种回家的烦闷呢？又不想回来，又不得不回来，回来也干不了什么，只能瘫着。村子里，熟面孔越来越多，可我却渐渐开始躲。夏天已经进入最磨人的时刻。

因为暑热，阳台的布局也发生着小小的变化。到了下午，爷爷的座位更多时候朝向室内，阳台上的静默终于成为一道背影。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爷爷每天挥手了，一是我因惫懒而出门越来越晚，二是现在只有早晨才偶尔能和爷爷打上照面。有一天，我发现阳台门口居然拉起了一根布条，从室外看，爷爷规规矩矩地被“框”在里面，好像有点委屈。后来才知道，原来奶奶那天不在家，出门买菜去了。另外，夏天越来越热，已经不能让爷爷在外面一坐就是一天了。太阳那么毒，他一点不知道，只顾往外面挪。所以要拿一根布条拦着——

（想想还是觉得有一点滑稽的。）

我逐渐发现奶奶与人聊天时的一种程式，或者一套面部表情的转合：总是嘴角先动，浮起一个笑容——然后整张脸都笑开了——或是反过来，嘴角一动，笑容沉下去，那串数字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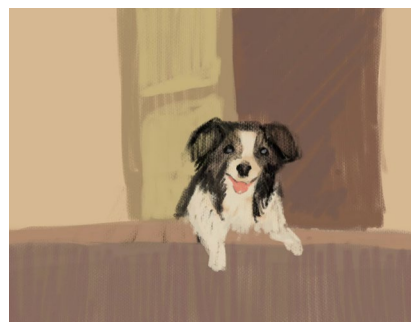
“12 年退休，他就中风，10 年进了 7 次医院，去年就进了 2 次，一次 15 天，一次 18 天，33 个夜晚我没有合过眼，在他病床边支个陪护床，每隔 1 小时起来一次，让护士换水……”

她那双眼睛的明灭往往是最难察觉的，除非故事本身已经开始闪烁。作为听众的我，一开始总是有很强的情感波动，后来慢慢意识到，是否讲述者自己也已迷失在故事中。而爷爷，本是所有故事的主角，却总仿佛只是一位安静的听众。

一个台风过后的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奶奶在阳台边叫住了我。当时已经十一点过，我第一次这么晚在阳台边见到奶奶。更令我惊奇的是，爷爷居然也还没睡觉——虽然没等我和奶奶聊上两句，他就想睡觉了，在椅子上发出动静。我因此难得目睹了奶奶安顿爷爷入睡的场景：搀他慢慢立起来，一步步挪到床边，扶他站着，找出一根布条把一床毯子裹在他身上，再放他慢慢躺下。阳台外的视角里，爷爷的身躯逐渐缩小，最后只剩下脑袋。

或许是天气凉爽，奶奶今晚好像很有聊天的兴致。再次回到阳台边，她看上去还丝毫不困，继续说起他们家的小楼。三十年前，这是村里的第一栋自建房，当时，长塘周围还都是菜地。动工时他们请了很多人来帮忙，她白天在家里给大家做饭，晚上回制糖厂上夜班——“就在村子后面”。年轻的时候，她们一帮同事跟老板去全国各地开会，顺便旅行。去北京那次，他们住在老板朋友家里。第一次见识了北方的公共澡堂（“生怕染病”），还去爬了长城——但她不小心穿了条裙子，走路极不方便，真是大失误。

那次回来，她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礼物，还带着一只小狗，一路抱着坐的飞机——“当时就可以带宠物上飞机了吗？”，我感到震惊——“是毛绒玩具啦。”



谁不想摸它的脑袋

不过，以前他们家真的有一只边牧，每天趴在阳台上，一有人路过就站起来，所有人都摸它的脑袋。后来有一天，阳台的门没锁住，那只边牧意外跑丢，她哭了好多天。

他们有一个大家庭，老人高寿，儿孙满堂。后来，老人们纷纷倒下，她开始学着做一个摆渡人：照护丈夫的母亲，三年；照护自己的父亲，半年；照护刚退休却突发脑梗的丈夫……不知多少年。还好母亲尚且康健，却在 92 岁那年的一个夜晚，不小心把家门口的长塘当成了柏油路，失足落水，被救起后从 ICU 里捡回一条命，但从此也终日卧床。她一边看护丈夫，一边和弟弟一起照顾母亲，又是五年——直至老人无疾而终，她自己也成快八十岁的老人了。

好在她无病无灾，骨骼硬朗，偶尔精气神还像个年轻人，笑起来像个少女。也不知是福是债

——这副身躯竟成了摆渡人的船桨。

“要不是被老爷子绑在这里”，她说，“我早出去旅游啦。”

隔壁“成记美食”的卷帘门拉下来了。我意识到奶奶或许该休息了。

隔壁一家六口，总是等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快十二点了，才开始吃晚饭。现在他们饭吃完了，她也拖完了，准备回家了。四个小孩子先飞出来（今天我终于见齐了紫琳的兄弟姐妹），你追我赶的，比赛谁同我和奶奶说“再见”的声音更大。奶奶笑着，他们身后的父母也笑着。我今天终于有机会和这位妈妈搭上了话了。她之前一直不准她的孩子们和我这个“陌生人”来往，但今天，她让我随便怎么叫她，“阿姨啊，姐姐啊，都可以，哈哈！”她快乐地说。毕竟，她大不了我几岁。她双眼晶亮，和她的孩子们一模一样。

和奶奶道别后，我继续回家。一路朗月高照，凉风习习，一切都是那么的轻盈，所有人都像被包裹在一种松弛的愉悦中。我望着天上的月亮，心想，真是一个圆满的、夏日的良宵。

但我猛然意识到，阳台那扇门背后，奶奶也继续回到了她的生活。再过三小时，闹钟会响第一遍，她要扶爷爷起夜，两小时后，又响第二遍。她或许正躺在床上，“但脑子里全都是清醒的”。

这不是第一个夜晚，也不是最后一个。

绑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子里，本地户约三千，加上外来户近一万，她认识所有的老人——又和所有的老人一起，看着孩子们出生，长大。街坊邻里若有急事，第一反应是敲她家的门。环卫工人要是路过，也几乎都凑上来和她搭两句话。在她脸上，无论什么样的情绪，似乎最终都能化为一汪和穆的平静；向外人散去，就成为一种温良的热气。

在阳台边，我总是感受到一种长久的令我失语的隐痛，在她不自觉重复的苦难史里，在那种心碎的语调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睁眼”。但在阳台边，她也认认真真拨弄我送的那束花，读我留下的那封信，她抬起头来，“你对我们这样好，为什么要觉得抱歉呢？”

她身骨硬朗，也略微佝偻。她没太大力气，常常扶不动因想“乱跑”而从椅子上意外跌落的丈夫。八月初的一天夜里，阳台的门缝里钻进了老鼠，她只身一人和老鼠搏斗，被咬伤了手。没有告诉女儿，而是自己偷偷去村里的医院打了针，现在还有两针要打。“不害怕吗？”“害怕能有什么用。”她是个爱干净的人，却给我看她手机里保存的那只在阳台口被她踩死的老鼠。肠子都出来了。

我好像对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熟悉，许多“事情的原委”，也像纸团一样一点点摊开。为什么儿女没能来帮忙？他们各自都有不得已的家事而分身乏术。为什么不送去养老院？外人的照料总难做到更细心，稍不注意老人就容易得病，“村里好几个老人送进去就这么走的”。为什么没请护工？村里其实对他们十分关心，多次派来专业人士，但那些人除了把家里弄得更乱，好像也没能带来多大的改变。你若问我她的需求？我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各种“红棉花牌”的保健品（“只有这个牌子才有效果”），那是她现在靠隔壁门面的收租为丈夫维系的补给。但除了物质性的关切，我好像也说不上什么。她似乎自洽于一种拒绝的、孤独的姿态。我慢慢明白，或许是因为他们走过的每一步，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一种经受漫长的考量、思虑、试错之后的最优解。

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无论什么样的情绪，似乎最终都能化为一汪和穆的平静

但在阳台边，更多见闻是难以消化的——或许我只是需要时间，或许最终也无从消化。多数时候，我猜的我的表情一定和她的表情一样，忧心的、抿着嘴的、皱起眉头的。但我不知道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听众，或者一个试图为她发现问题的旁观者。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应该是，愿爷爷奶奶身体健康，以及，奶奶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我发自内心地称赞她的笑容，那样在老年人身上少见的露出满口牙齿的笑容。她总说：“都是假牙啦。”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起了那根布条，爷爷被“绑”在家里的那个早上，从阳台前经过的我捕捉到的一丝幽微。

那根布条老旧，底色暗沉，弹力不足，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就像老年人用的，或许是因为隐伏的汗渍。它绵软的体量和爷爷在暗影里的身躯形成了鲜明对比，突兀而滑稽；拦在面前，又怎么都不像能拦住，古怪且刻意。轻飘飘的，却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它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东西，一直绑在在阳台背后的门把手上，对应的，门框另一侧的相同位置有一个铁钩，人要开门却留着门时，正好可以随手将布条拉起，挂住，成为一道防线。若是用不上，它就在门把手上绕成很多圈，在爷爷的椅子背后，大隐隐于阳台物件的丛杂之中。

我数次经过这个阳台，为何却很少注意到这根布条？可能是因为，奶奶本来就很少让爷爷离开她的视线。只有当她不在时，布条才会被拉起，阳台和门框之间长出一道显性的边界。阳台内的人被困在里面。路过的人感到奇怪，“这是在干什么？”“他一定想出来”，“要是能解开就好了”。

——会解开的，等奶奶回来。她一回来，“绑”就解开了，但她也不再出这个屋子。

或许，布条只是她身体的某种延伸。绑住了爷爷，也绑住了她自己。

我试图分辨和老人聊天时的一种心情，似乎总是逃不掉一团愁绪。仿佛一走进他们的生活情境，也就浸入了他们与世界最后相处的一段时光。那里，有不得不直面的生命的退行和看似漫长的消耗，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并从头习惯，所有由身体重新制定的规则 and 标准。

这样一种“被绑住”的生活，好像脱离了我们对于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的感知和理解。它看上去是如此怪异、不同寻常、哪里不太对劲。要一直被“绑”到生命的终点吗？是什么绑住了他们？什么时候又能解绑呢？或者，解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么？解开之后会剩下什么？自由却空荡荡的生活？

——但是，如果不是时间安排他们，而是他们把自己安排给时间呢？

在阳台边，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观察、反思，追问，批判，对抗。但他们，好像总是劳累。没有太多心力，不得不坐下，或倚靠阳台站立。他们好像一直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联结、维系、保存——哪怕是通过一种罕见的、沉重的、不得已的自我束缚。

——我难以想象如何去过这样一种生活，但总会有人把这样的生活过下去。我认为待解决的“问题”，他们选择与之共存。

或许，从一根布条的视角看，束缚和联结本身就是一体的。



被“绑”在阳台里的爷爷

阳台像是一座孤岛，但爷爷不是一个“被剩下的人”，因为，还有一根布条拴住了他。当“附近”开始退潮，当社会意义、精神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诸多联结被迫断开，奶奶找到了一根布条，一种最原始的物理意义上的联结，拴住了她的爱人。

哪怕滑稽、怪异、撕扯、疼痛——哪怕代价是，布条的另一端必须拴住她自己，才有力量支撑起这一联结，才能长成一个稳定的、安全的“附近”。

我意识到，我从一种近乎怜悯的共情开始关注爷爷，但最终在我面前层层剥落的，是两个老人的生命姿态。时间把他们的身躯变得柔软，正好绑住彼此，布条长出枝节，长成一副坚硬的骨架，里面有一个庇护所。他待在那里，安全，健康，“白白嫩嫩，身上没有一处疮疤”。

虽然，他颤颤巍巍，她柔柔弱弱。那就颤颤巍巍地活，柔柔弱弱地活。

爷爷的“附近”是长塘，是阳台，是那根布条——是奶奶。

如果终究有走不动的那一天，世界坍缩成一个朝夕相处的点。那就守着这个点，生活会继续，流水会淌开。

摇篮

在横沙村，一天仿佛是从晚上开始的——至少这是我在这里两个月新的生物钟，或是我的“附近”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

白天，住出租房的年轻人几乎都出门务工，街巷空空，路灯打盹，直到下午六七点，下班的人才慢慢汇集、发散，从村口的地铁站开始，空气中有东西撞来撞去——各路餐馆的招牌亮起来，卖猪脚饭的、螺狮粉的、深夜豆浆的……饭菜飘香，真的要兴隆到深夜十二点。

从我家出来和伙伴去吃夜宵，沿着长塘往桥的方向走，一路可以看到黄阿姨靠在店门口的摩托车上用家乡话打电话，“成记美食”前排起长队（妈妈数落孩子怎么不快帮客人舀饭），阳台后关着那扇门。若是天气好，在桥头能遇上吴家三小只，穿戴得整整齐齐，坐上父母的电动车。妈妈的后座带着儿子，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正准备去罗冲围，“要玩到凌晨三点才回家。”

（“他们爸爸以前的老板是罗冲围的，也在那边做工”——你看，奶奶总是知道。）

但等到新的一天，再走上那座桥，阳台就会开门了。有时可见奶奶在门前忙碌。有时只能看到那根布条。但爷爷一直定格在那里。或许从他的眼睛望出去，是布条，是阳台，是长塘。

或许，只有奶奶。

我至今未能步入那个阳台，正如我无法真正进入另一个人的“附近”。人类学家总是志在四方，但田野或许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扎根的地方。若说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意识到，任何以“观察”为名的实践都并非某种对生活的“豁免申明”。我能够看见的，始终只有我的最初 500 米。

但是在阳台边，奶奶帮我剪去长发，在纸条上写下她记得我的名字——字全都写对了，是件不容易的事。两个面生的女孩路过，问奶奶二楼的那只小猫是流浪的还是家养的。我才知道又有新的租户搬进来，以及，奶奶新养了一只小猫，帮她捉老鼠。我和她的互动总不会超过那个阳台沿，我知道，那是她“附近”的某处边界，但我作为她“非附近”，或许像那晚台风过后的凉意一样，进入了阳台的某些缝隙。

那个第一次和爷爷搭话时点亮的微笑，或许早已淡漠，但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让奶奶笑了很多次了，甚至现在她一看见我，就会笑。说起爷爷，她还是讲，“他像小孩子一样不听话。”但照顾老人，不像照顾小孩，小孩可以放在摇篮里，背在身上，老人不能背在身上。

我想，于是奶奶把自己变成了摇篮。

（文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雯琦

人类学硕士在读，之前学文学和艺术史，始终尝试在宏大的话语里逼近自己的肉身。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基米 背风处](#) on Unsplash

非虚构

李汉超的世界， 从世界地图开始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如果说构成一个人底色的东西通常顽固而持久，
那改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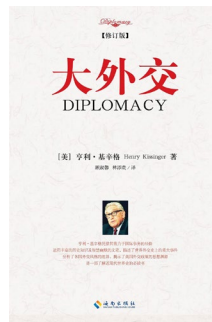
李汉超家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另一幅是中国地图。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摆设，对于墙上没有太多花样的时代来说，这东西在装饰意义上聊胜于无。李汉超对动画片没有太多热爱，跟大人一起看电视，听到什么新闻了，他会到地图上去找。利比亚，卡扎菲，战争，顺着地中海撒哈拉沙漠，荏摸一圈，找到利比亚，似懂非懂。他的家人反正看出来，他在关心卡扎菲。十三岁，作为一个小粉红，他说他得站卡扎菲。偶尔会琢磨一下，这个大方脸汉子关我什么事。没想通透。现在也一样，他偶尔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美国政治，拜登关你什么事？他说现在也想不大清。

但这是李汉超生活日常。

听人聊天，说《货币战争》可有名了，拿过来看看。一看，“我操，罗斯菲尔德家族这么牛逼。”连看了三本，不怎么跟人讨论，自己看自己消化。没人讨论的原因是中学典型理科班，小粉红也好，自由派也好，没有人在意。同学们也不看书，李汉超说。《货币战争》让他觉得看懂了世界格局。墙上的地图也活了。现在，他说那时看的都是“黑历史”类型的书。后来才开始看正常书。

他说的正常书，指的是经典。经济学，看曼昆的，政治学看基辛格的。“《大外交》，on China 这种。”那时，李汉超已经上高中。早上六点多到校，晚上九点钟放学，回家没时间看书，就只能在学校的看。他同学也发现这个人好奇怪啊，看些奇怪的书——“就是没用的书，就是这个意思。”

他学习好，年级大排名总能排十来名的样子，所以老师也不怎么管他的兴趣。“我们老师也有想交流的，当时我可能太小，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出来的。英语老师比较喜欢我。这是肯定的。看我在看书，平时聊天也比较多。我们班主任，某一任



班主任，数学老师，somehow 也挺喜欢跟我聊天的。会有这样的反应。数学老师在你具体读什么上帮不了你太多。”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在读什么书或者建立一个知识结构上有什么特别的帮助。“现实接触到的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现在他会说，小时候知识结构有欠缺。喜欢国际关系，看基辛格如同看爽文，一提国际关系，马约，嚯，世界这个大棋盘就摆在那儿了。如果非要说谁给了他一点支持，那只能是他爸爸，而他爸爸所做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墙上那幅本来可有可无的世界地图。

“一切都来源于那个世界地图？”

“你要这么说也对，倒是能对上。那是 2000 年啊，很多人家里都这样。这边挂个世界地图，那边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2000 年，李汉超两岁，他应该还没记事，确切地说，从他出生，家里就奠定了他未来对世界认识的格局。

2012 年 9 月，具体是哪天李汉超不记得了。那天下午，街上人群逐渐增多，喊口号，“钓鱼岛是中国的！”

他兴奋啊。《中国青年报》当年的报道说，中国有二十几个城市发生了游行示威。“日方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态度和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报道称抵制日货虽然情绪化，但是一种“鲜明的表态”，“以表明中国人不容侵犯的尊严”。

14 岁的李汉超，走出家门，看大世界。他只是看。队伍对他来说有点过于隆重。他很兴奋。游行只是听说过的事，没想到会在身边发生，参与游行的人也都克制而礼貌，没有人砸车，也没有什么很直接的目标让游行参与者可以投掷鸡蛋或者砖头，有惊无险，李汉超跟着走了一路。

在相隔八年之后，我们在北京一家星巴克聊天。他捻着他有点油的头发，头发掉下来，他从桌上把这些散落的头发归置到一块，继续捻。事后总结：四分看热闹，六分表达支持。回忆中最大的感受：开心。

他说这时他政治意识清晰。钓鱼岛就是我们的啊。

李汉超已经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聊天的那会儿，他应该在伦敦政经念 PPE，就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新冠疫情打乱了他的节奏。他在北京上网课。现在，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头观照自己的政治光谱。

“小粉红？你说具体什么东西影响了你？这个没办法讲影响。一开始，人生长在这儿，天然就是小粉红。”

那次反日大游行应该是李汉超给自己贴上小粉红标签的最重要原因，否则还能有什么呢？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好学生。他的讲述中，关于个人成长，只有这些：学习好，不怎么用功。不是“小镇做题家”，但肯定做很多题，就普通学生应该有的样子。从小没有遭遇择校这种难题，因为学习好，可以上长春当地最好的两所学校之一，吉林大学附中。另外一个是他们学校对面的东北师大附中。“我们学校考个前十二十清北就差不多。大家心里都有数。”

高中时可能就物理有点费劲。但他说的费劲与我们理解的费劲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并没有量化标准，总之他说学一学也就上去了。他是理科生，理综三百多分，全吉林排二十多。

他没过过去要国外读大学。“考那么高分为什么还要出国，省二百来万，不挺好的吗？”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生，父亲骨外科，东北这天寒地冻的地方，

也是一个重要科室。

除了爱看地图，还有一个他特意提出来的叫李阳的那个人，疯狂英语，“你知道他的 style，他就是锻炼你的自信心，（让你）大声说（英语）。你知道九十年代最疯狂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喊。我就没上街喊过了。但多少要有更极端一点的方式克服你的不自信。”他跟着一个像电视一样大的录音机听磁带。一大盒。他把录音机说成收音机。其实是带着收音功能的录音机。估计是红灯牌。这东西已经绝迹很多年了吧？但李汉超是 1998 年生的。

他说这会锻炼他的自信心。他又觉得他不缺这东西。五岁的时候去幼儿园，张口就能问校长挣多少钱——家人喜欢提起他的这个往事，好像天赋异禀的样子。

学习不用操心，他是一个有时间看美剧、玩游戏、看闲书的人。

差不多 2014 年，李汉超高二那一年。《生活大爆炸》下架了。“不给我看了。肯定有问题。小孩都喜欢《生活大爆炸》。那种情景喜剧特别招小孩喜欢。原来搜狐上直接点开就能看。突然就下架了。它、《海军调查队》《傲骨贤妻》。还有《律师本色》。不让我看美剧，这不行。就这么简单。”

自那以后，他以前看过的书，玩的游戏，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新认识。虽然“小粉红”那个标签，他说自己还孜孜不倦地背着，背着它上了大学。

他的朋友，北大的同学张岳阳，认为李汉超充其量只能算 centrism——中间主义，政治立场介于左右之间，一般主张以中庸的态度解决政治问题，反对变革——而且在大一的时候就是这样。张觉得自己才是真正从小粉红过来的人，“马会”成员的身份可以作为证明。

“李汉超当时激烈地嘲讽马会，我觉得孺子不可教也。他觉得我们愚蠢。大一认识他的时候就把他从朋友圈屏蔽了。政治观点完全不同。”

“马会”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简称。

李汉超对此的回应是：“我不同意它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是典型的毛主义组织。我记得他们 2018 年的时候动静很大，写檄文，号召同道们明确立场。我想，马克思也不是这么教你们的啊。我们有必修课啊。真读过。哪有明确立场这个说法啊？”

后来他们发现彼此住在一个宿舍楼，经常碰面一起走，然后又发现彼此接近的东西还挺多，也就慢慢熟起来了——先是政治标签变得不重要，再是其他标签也是刻板印象。张开始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报纸，而他原本是不看传统媒体的；李更多地看到“泡泡”以外的世界——在过去，李汉超会认为世界艰难，好好地待在泡泡里挺好，不要去接触那些奇怪的反人类的舆论。“泡泡”是同温层的另外一种说法。“我们俩现在什么都聊。那时候美国中期选举，如果有人关心的话，我是能聊起来的。我们系有一百多人，有几个熟的。跟我关系最熟的，都转系了。转历史之类的。本来人家就不喜欢经济，只是报专业的时候压力使然，本来心就不在这儿。”

至于那个从“小粉红”到“非粉红”的过程，完全不可考——李汉超自己也说不明白。

“对历史的了解是通过什么完成的？”

“我其实读得不多。我对材料的可信度不会判断。我觉得判断可信度挺难的。基本事实，我是知道的。我说材料可信度不好判断。晚年周恩来什么的，我不知道几分真几分假。对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异议的。”

“麦克法夸尔的那书我看过，《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其它都是看边缘的材料。文革影响的人太多了。我经常看。我看英汉翻译的书，（署名的）翻译家都被迫害过，一查都有。”



很难具体到哪些东西发挥了作用。我们知道类似于“反日游行”这样的人生锚点，通常是顽固而长远的存在，很多时候构成底色，但你还是不知道究竟哪些东西改变了这个底色。唯一能说明白的，是那年的《生活大爆炸》。

我想起跟赵捷聊天的时候，他们全家那里都会提到的“被锤过”的经典疑惑：赵捷认为他爸爸满腹牢骚，是因为奶奶生病时被医疗制度锤过；赵捷的爸爸认为，“如果真的有一天外卖停了，他就不再一门心思小粉红了”。赵捷爸爸的自信在于，“被锤”之后一定会导致“思考”“哪里不对”这件事，赵捷爸爸的失败之处可能也在于此，“被锤”并非一定导向进一步的思考，还可能导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候群呢。同样是面对喜欢的东西下架，李汉超与赵捷不一样：为什么《生活大爆炸》被下架？一定是哪里不对。

其后的事相对来说虽然纷纭，但实际上很简单——找到他自认为正确的获得信息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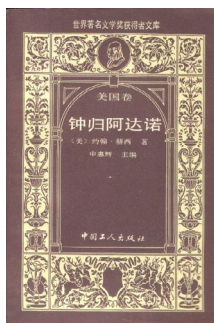
“2014 年我开始看《经济学人》。奇怪的机缘，跟《生活大爆炸》没有关系。上课的时候老师顺口安利了一下，就订阅了。现在唯一正版订阅的就是这个。”

显然他对自由主义风格显著的信息源是认真而且尊重的。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之前说过的，在他热情推荐下，张岳阳至少在获得信息这个领域里接受了《经济学人》，继而开始订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之类媒体；二是李汉超很认真地考虑了是否可以在《经济学人》谋一份职，“谁还没有梦想呢？上周它招的是纽约办公室的。我想去。我看他们每年都招十几次实习生。标准没有要求，你要随简历附送一篇 600 字文章。我还没准备。我争取招的时候看看。”

与此同时，远离没必要的社交媒体，不要自寻烦恼。

“他们说我活在 20 世纪。看报纸。我今天来之前，正好我在说，除了微信，社交媒体我是不会主动用的。微博我只看好友圈，当朋友圈使。豆瓣是用来标星的。推特是用来……”总的来说，他生活在张岳阳“指责”李汉超的那个属于他自己的消极的“泡泡”里。

李汉超的“泡泡”包括：当他感觉焦虑的时候，他就要看一些积极、“越来越好”的书。比如最近在看《钟归阿达诺》（这本书讲二战后期盟军占领意大利之后，一位少校去阿达诺做镇长，该镇有七百年历史的钟被拿去做炮了，少校想着把这口钟找回来。约翰·赫西在中国以广岛核爆之后的非虚构作品《广岛》知名，他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却是这一本），而看约翰·赫西这本冷门书的原因，是之前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盟军登陆嘛，越来越好的过程，而且纳粹跟现实还有关联。一千多页，英文版”。这本书里有个脚注，提到了《钟归阿达诺》。



“泡泡”里还有不会去“招惹”《三体》。

“我是一个没看过《三体》的人，它的周边太恐怖了。它的粉丝，它的衍生学说。我没直面过它的粉丝。人嘛，有那时间，我看《经济学人》不好吗？人不能总活在自己的泡沫里。2016 年希拉里不关心中西部，人们劝她应该去泡沫外看一看别人在想什么。到 2019 年我已经想开了，我要把自己带入 2016 年里希拉里的角色，我就活在泡沫里。”

不过，看起来，李汉超会随时偷窥一下“泡泡”外面的世界，时不时地要对希拉里表示遗憾：我并非特别想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在想什么。但你要理解北京政治，为什么要挺川；你要理解中国社会小粉红是怎么变出来的，你得知道‘入学’是怎么来的。“我有那时间玩玩游戏不好吗？后来我看了，我得有选举、我得要赢，才有义务全

面了解社会的变化。”

“有很多人是要跟小粉红辩论的，挺不挺川据说对中国简中世界也是一次撕裂……”

“他们有很强的辩论欲。我尽量避免跟活人打交道。其实都有（跟我意识相近和相反的人）避免。连豆瓣动态都是。现实中的好朋友，非常二十世纪。知乎上的谁谁谁，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话？书是看不完的。那么多真正的知识等着我们去搞。为什么要在社交媒体上（辩论）？社交媒体上你能咋论。最厉害就是抖个机灵。而且你抖机灵又非常没有营养。不像美国脱口秀。这没必要。”

他又加了一句，“知乎我也不用了”。

“知乎有工具意义？”

“那上面有啥意义啊，一帮法西斯分子。我看知乎是 2016 和 2017 年。很晚。主要是看中国历史的问答，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你要看元明，在知乎上看明粉，跟着小粉红没啥区别。”

好像还是找到了一点了解历史的脉络，或者至少可以窥探一下他潜在的方法论。“小时候看柏杨版资治通鉴。我看柏杨。当时没接触到李敖。”“奥威尔算我偶像。”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悲观。它几乎弥漫在我们聊天的各个环节。

“我跟我后妈是合作关系，能有什么情感嘛？也没有什么喜欢，人是挺好的人。多个家庭成员，我们合作一下。他们俩后生了一个妹妹。她出来的时候我都十五六了。她现在上小学一年级。我对他们生孩子是一种政策性反对，主要是心疼孩子。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对地球都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这十几年二十年，人类完了。当我对人类的未来有看法的时候，川普已经走上政治舞台。2014 年 2015 年，外来因素都赶上这几年了。”

“没谈过恋爱，有过好感，没有告诉人家。我现在就能跟人产生好感，但我十月就走了，（或者）十二月？我为什么要打扰人家？俩人在一起，没几天就跑路了，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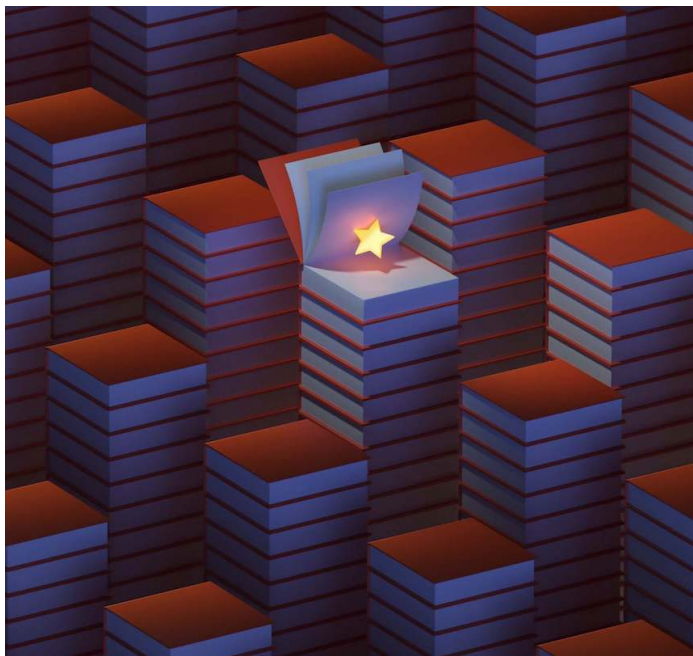
“我有这么好的聊天朋友，就为了这么几天爽一把，就失去朋友了。”

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九月底。最后聊天以当时他的生活作息结束。

“现在这样，早上十点起来，因为时差嘛，上课的时间对我非常友好。最早的课下午四点，最晚的课凌晨一点。当代年轻人哪有晚上一点睡觉的，所以特别合适。十点起来刷手机，《纽约时报》9 个推文，看完中午十二点了，吃中午饭了。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点外卖。有的时候做题，做作业，四门课，一周有四个作业。运气好的话，做完题，看书。因为我攒了好多书要看。《第三帝国的兴亡》，1000 多页，我看的还是英文版。中文版我想看简中，董乐山是我最喜欢的译者。电子版是不友好的。七月毕业时，那套第三帝国被我一股脑塞进了纸箱里，邮回家去了。再买一套浪费啊。我是能看简体字版就看简体字版，特别是董乐山翻译的。现在看好像只有《一九八四》、冯内古特的几本小说，《囚鸟》什么的、《正午的黑暗》，还有《光荣与梦想》。董乐山对极权主义是有特别的痛恨的，他哥（董鼎山）好像就不是，有点黑化的味道。有文章写为什么董乐山永远不会原谅董鼎山。”

到最后，他以 20 世纪遗老自居，连年轻人的身份都不愿意承认了。

“哪个年轻人会喜欢董乐山呢？”



题图来自 愚木混株 [cdd20](#) on Unsplash

非虚构

《一九八四》重要吗？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你不知道一本书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李汉超说到了《一九八四》，说到了乔治·奥威尔是他的偶像。

最初我们把一个人是不是读过《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视作一个标志，甚至可能算作一个分水岭。我们潜意识当中，看过奥威尔这两本书的人，对于威权主义应该能产生一点判断力，与之相关的诸多概念也会立体起来。跟“只要……，就……”什么的思维方式一样，我们似乎相信，只要看了奥威尔，所谓“粉红”的意识形态可能就会随之瓦解——网上流传的那个说法，“多一个人读《一九八四》，就多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开始也是这么乐观的。

这乐观背后的逻辑其实毫无道理。根本没有逻辑，只有乐观。

柴子亮高考那年，最后冲刺，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他对这个成绩很满意，跟我们总结说：“高三啊，我手机都被没收了，我啥也没有了。我每天过得都很压抑。它是很重要的一年，真正被约束的一年，也是真正下定决心努力的一年。”为此他感谢威权主义在他身上发挥的作用。威权主义的能量帮助他优化了自己的命运。

《一九八四》是柴子亮老师布置的课外读物。他读了，也能读懂，还跟我们一起探讨了小他两岁的弟弟在看《一九八四》时，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们当时问他，最后一年学得，高考考得好，“变量难道不是你自己吗？”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一样。短跑散打，只有在痛苦压抑的情况下，才会有成绩。没有人逼着，没有人压迫，人不可能违反人的激素分泌，去做违反人的机体性能的训练的。训练本身就是让身体发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柴子亮业余爱好散打和泰拳，关于身体机能，他有一套理论可以自圆其说，“竞技体育只是让你身体变差，超越负荷地去训练。”

“我有这个天赋，以及我想赢。我自己可以控制这个欲望。但作为社会体质来说，从大环境来说，不一定是想赢的。”

这里面有几种东西存在：

(1) 社会与个人的追求是不是一样的？个人追求超越常规负荷去实现自我，与社

会追求正义、追求公平是不一样的。柴子亮把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平移到对社会大环境的“体质”上，显而易见是有巨大差别的；

(2) 柴子亮认为自己有天赋，又有“赢”的能力和欲望，这是标准的“优绩主义”的思维方式。优绩主义在中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翻译方式，也有翻译成“精英政治”的，但不管如何翻译，大家有一个共识是：优绩主义是中国社会多年快速发展形成的一种共识。而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正面或者负面是需要重新评估和分析的；

(3) 多大程度上要营造一个“赢”的社会？我们准备为一个“赢”的社会付出什么样的成本？

(4) 如果个体可以以伤害自身的身体机能来强化某一项竞技性能，那么更庞大的利维坦打算以谁为工具、消耗谁，来达到一个伟大的社会目标？



随便聊了几句，你就会发现里面蕴含太多不确定的、残酷的或者困扰中国发展甚至困扰人类的诸多问题。你怎么能相信读了一本叫《动物庄园》的小薄册子，就会理解整个极权社会的奥秘？然后还会因此修正你的世界观？

我们理解“老大哥”的监视，我们理解“动物庄园”里的极权技巧，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我们的阅读经验基础之上。这与高中时老师安排一份课外读物的作业——你必须来完成它、而且要写一份读书笔记相比，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果《生活大爆炸》没有下架，李汉超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小粉红”标签？他是否会在2020年的时候声称奥威尔是他的偶像？这些都是未知的。读过什么书可能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调整了自己的一厢情愿，抽离“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以这种方式去看他们读的书——这可能比贴标签要有趣。

徐徐跟我们聊家中祖父辈的培育，会说到毛泽东。我们聊了至少三次五六个小时之后，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觉得毛泽东与曾国藩一样，都是古人啊？她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再鲁钝大约也能读出“这不是废话吗”。她出生在毛去世二十年后，记事的时候已经进入新世纪，与邓小平都没有交集了。对我们来说还是能够感知“可触摸”的历史人物，在徐徐那里与她的生活经验完全无关，理解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如此，事件也一样。杨楠说她父母是“下岗的”，这几乎是我们聊天时她身上最重要的标签，我们很自然会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印象，听她说上大学每月要花四千块钱时，简直有点气愤填膺。“你怎么这么能花钱！”潜台词是你爸你妈下岗，怎么能纵容你这么“败家”。也是过了好久，才意识到她对下岗的感受其实已经非常弱了：“下岗”作为事件发生在她出生前，作为标签，她现在还是会拿来界定家庭背景，但这与六七十年代的人说到“出身地主”差不多。她的生活与“下岗”其实无关——无论她的生活现在是富裕还是贫穷。

不能低估时间在人身上发挥的作用。所以，不但要抽离自己的阅读经验，可能还要适当抽离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的理解。

看一看最常被提及的书和作家，你更会发现，它与价值观养成关联度并不高。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单里都有谁。

乔治·奥威尔

李汉超先是从奥威尔那里发现“公平”是个问题。

“2012，2013年，我觉得社会上有不公平，心里为我们学校老师打抱不平。掌权

者不干事，是有意识的，可以说埋个伏笔。因为学校不是政府，学校不干人事，太在意料之中了。民主国家也有这样的学校，全球的学校都是这个鸟样。奥威尔白纸黑字写过这样的鸟样学校。你比如说英国有个小孩去看到学校这样，他肯定不会恨上鲍里斯约翰逊。这是奥威尔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在之后成为越来越显著的主流。”

他说自己看《一九八四》的运气特别好，上手就遇到了有董乐山[译者前言的那一本，听他讲起来，他似乎更迷董乐山，“应该不止是个翻译家，他对极权主义是有一种格外的反对”。因此，他对翻译也有了特别的兴趣——如前所述，他把进入《经济学人》工作是当成理想的，从翻译看到《一滴泪》，觉得苦。再看蒂莫西·加顿－艾什，《档案：一部个人史》。似乎发现一条脉络。



出生在 1995 年、工作已经三年的小英在大一的时候读了《一九八四》，相比于很多作为中学时课外读物的人来说，她看得比较晚，但她因此可以思考更多的东西：“看完之后很震撼。老大哥，监控，管制一切。感觉可以代入很多东西。”我们问是想到学校和老师吗？“不是老师。我经历的老师还挺好的。是最上层的那个老大哥。”

黄易相比之下就要模糊一些。虽然他自己的标签意识还挺多，比如他特意强调自己对托尼·朱特的迷恋——这是左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标配了。而且他还有写作理想，至少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没有放弃。有次聚会认识一位本科毕业于北大的女生，对于她给公众号写企业软文这件事，十分不解及鄙视，这个巨大的“别人家的孩子”给他刺激很大，担心自己也堕入大儒主义泥淖。他认为乔治·奥威尔写得就蛮好，“架空了一个世界观来讽刺现实世界”，“当然我要这样写是百分百过不了审的”。他对自己的担忧还是有一定前瞻性。

柴子亮还有个弟弟，也说自己喜欢《一九八四》。但是，他认为蓝底白字随处可见的“警情通报”是最准确最公正的，凡是到处要真相的那些人都是无理取闹——“给你真相你为什么不信”？可是真理部会修改真相的啊。我们拿《一九八四》的语言来问他。“他们是我们好的啊。”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交流就会进入宕机状态……

王小波

大部分人都看过王小波，他的杂文或者小说。小说在我们的调查中很难称其为一个门类，《一九八四》是很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但每个人提到它的时候，很少以小说的名义，更多的是觉得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政治理念相关的书。

某种意义上，王小波也是一样。

柴子亮会提到王小波的文风，不过举例子时重点说到的是王小波的杂文，提及小说的部分时会特意提到“龟头血肿”这个意向的有趣——他是学医科的大学生，可能还没有适应自己的角色。

最初他喜欢王小波，是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然后是《沉默的大多数》，再后来才是《黄金时代》。柴子亮有一段真情告白。

很重要一个原因，他谈论各种问题时很直接，包括性在内。莫言不一样，王小波直接，他觉得特殊又很重要的东西，直接拿出来谈。谈得还有趣。

我初二初三开始看。

先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

杂文能看懂。能看到生活中对标的东西。《沉默的大多数》那篇要后来一点点理解，

我不是沉默的大多数那种性格，所以更难理解他们的思维。

《黄金时代》是高二时看的，高三时又看了一遍。无聊吧，手机没收，就再看一遍。（两遍之后留下什么印象？）活力。其它作家可能让我看到幽默、史诗、宏大的东西，他给我感觉生活的活力。它跟我以前看的幼儿童话那些不一样，只摘取了生命的一部分。乐观的积极的，是面对整个生命的态度，真实，性，年轻，激昂，感觉都表现出来。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这样的作家。所以当时很喜欢他。（没感觉到荒诞？）也感觉荒诞，但正常生命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压抑了他所谈论的荒诞的这些东西，就是压抑了生活真实的东西，生命真实的样子。

不是文革，是很多东西。在他的书里，他并不是表现文革，上山下乡，相反，他只是给了这样压抑的环境去对冲，对冲显示无论是真理的真实还是生命的真实，就是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下，才体现出这样对真实的追求。

（其他作家写不出来这种感觉？）就说乌托邦三部曲，真正向往自由的文字只有“一九八四”这样的环境中才写得出，《美丽新世界》写不出。那里只能写礼教和高雅的那种生活。人们想得到他们得不到的那些东西。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自由的概念。因为自由是个很无限的概念。只有当有压抑的枷索套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离自由是最远的，但这个时候，才是对自由最真实的体验。

生活中也会这么觉得。

高三啊，我手机都被没收了，我啥也没有了。我每天过得很压抑。它是很重要的 一年，真正被约束的一年，也是真正下定决心努力的一年。

柴子亮最后关于高三这一年的这段话，前面已经引用过。在对活力、自由、真实、年轻而且激昂的生命赞美之后，他马上转入到表达对威权的谢意上去了。

你不知道一本书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而你最终获得的东西都包括什么。

鲁迅

中国人绕不开鲁迅。

我们问郭星你有喜欢的文人吗？他脱口而出的名字就是鲁迅，而且加上“先生”。

“他是完全客观的，我们国家有什么不好，应该如何改正。而不是我们国家怎么怎么不好，我去给美国人当狗。”郭星在说到鲁迅的时候，特意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河殤派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公知的祖先，喜欢说在美国绝对不会的那些人。”然后，又首肯了另外一位“转向”的前公知来表达他的态度：“还有一种就是你有立场，觉得国家不好，那你走嘛。有些人站在体制反体制，扛着红旗反红旗，那不是典型的吃里扒外？拿着谁的工资干谁的活，不是吗？有个叫乔木的，以前也是公知，觉得体制不好，然后真的走了，这就是敢作敢当。”

说老实话，我并不能从他瞬间提到的鲁迅、河殤派和“嫌不好你滚出去”的乔木之间琢磨出来这些各自都代表了什么。鲁迅对以上诸种——郭星想象中的鲁迅、“在美国绝对不会”派和“嫌不好你滚出去”——似乎都有一百年前的中肯评价，比如：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南腔北调集》）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

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论辩的魂灵》（《华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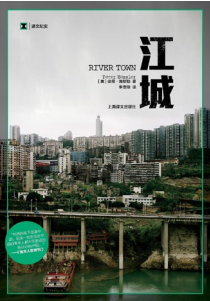
之所以问郭星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个当口，他正遗憾于那些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作家们没有在“文革”中悉数死掉。我们听着有点毛骨悚然，还好，还有文人在他认可范围之内。

鲁迅是最具争议的人物。每个人都会对他有自己的看法，被误读是一定的，不管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作为出现在中学课本里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身份还和中学生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有关，而且这逆反十有八九与老师对鲁迅是什么态度，或者父母对鲁迅是什么态度有关。而且鲁迅过于庞大，随便抓起来一个细节，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判断。杨楠说她不喜欢鲁迅，原因是“鲁迅不批评自己共事的人。鲁迅是公务员。鲁迅怎么不批判他的圈子啊”。教育部金事周树人在鲁迅的著作和人生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似乎很细枝末节的事，他会不会批评与自己共事的人，一时半会儿也不是那么容易下结论。但至少对此刻的杨楠来说，这个判断足以支撑她对鲁迅的态度。

何伟或其它非虚构

相比于前面三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来说，何伟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被调查者表示：（1）更愿意看现实题材的，真实故事为依托的作品，但可选择的内容并不多；（2）被调查者有明确意识，要了解中国，他们获得中国完整印象、或者相对全面而且复杂中国的了解路径不多；（3）即使明确表达要看“真实”内容的作品，他们也习惯于将之称为“小说”，有媒体相关经验或者社会学背景的人可能会提到“非虚构”，但不是主流。

不过，上述两种——媒体经验和社会学人类学背景——被调查者相对集中地提及《寻路中国》和《江城》，就足够让何伟在非虚构写作者中脱颖而出。他的两部重要作品中，《寻路中国》比《江城》更具影响力。



同时，成体系的文字更容易被读者记住：《江城》影响力不如《寻路中国》的原因是读者认为这是上一代人的故事。

尽管非虚构作品的需求很多，但过于分散。而且，当我们问及被调查者是否看过某本书的时候，他们偶尔还会表达对作品真实性的不信任。何伟 2020 年初在四川大学的经历也让其中一些被调查者对他的客观性提出质疑。

就是说，他们在面对非虚构作品和作家的时候，更多关注作者的价值观和立场。这也与我们调查大多在 2020 年 7 月到 12 月之间有关——年初关于方方日记的讨论，加大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站”、“黑”、“粉”、“路人”等加剧了身份和身份政治在信息传播中的权重，并扩大了社会的撕裂程度。

几乎无人幸免。

《上下五千年》

在做这个调查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上下五千年》是一本书——我一直以为“上下五千年”是普及中国历史的少儿读物的统称。它的作者是林汉达和曹余章。现在你能

看到各种冠上“XX 上下五千年”的书，但如果只有这五个字，一定是这两位老先生的作品。

至于我们的被调查者是否明确指向看的是正宗的版本，不好说。在我们调查中，还有人声称看过“二十四史”，但这也仅仅是指通读过各个朝代的普及历史读物（很有可能就是“上下五千年”）。

如果我们忽略版本和误解，广泛地当作是一本叫《上下五千年》的书，那么它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一本。在他们的个人成长中，如果这发生在学龄前或者小学阶段，那么他们通常会被家族贴上兴趣广泛、好奇心强、爱读书等标签，并得到持续的正面评价和鼓励。

但这个兴趣除了一位以文史为业的人——他后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之外，其他人很难持久维持兴趣。其中一人后来提及还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这是一脉相承的兴趣点。但这位《明朝那些事儿》的读者也认为自己是在看“通俗读物”，没有走入严肃或者研究型阅读里。我们在其后会更多了解到他的背景和故事，他觉得他对古代史的兴趣还有更聚焦的点，就是皇帝、权力关系和强人政治。而这些“更聚焦的点”有助于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则。他认为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希望从政，以国家主席为人生目标。他在我们的谈话中会频繁但高度简略地引述自己看过的古代历史，表情严肃，这些古代历史包括“外族入侵”“大一统”“中央集权”等等。

另外一位值得一说《上下五千年》的读者是张奇。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的书架，会简单分析他对读书的理解和特点。关于他更复杂的人生取向，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多文字涉及。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Constant Loubier](#) on Unsplash

非虚构

1968 年的第一个星期

马克·科兰斯基 | 发现经典

他只在意历史，
而没有任何评审团可以做出历史的判言。

1968 年的开端像所有正常年份一样——始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这是一个闰年，2 月份有 29 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世界告别了一个动乱年；城市降雪。

在越南，1968 年的开端很平静。教皇保罗六世宣布 1 月 1 日为和平日，为了他这天的和平，教皇说服南越人及其美国盟军在已有的 24 小时休战协定上再加 12 小时。南越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一支通常被称为亲北越的游击队——宣布了 72 小时的停火协定。在西贡，南越政府强迫店主们打出横幅：“盟军将在 1968 年赢得胜利。”

在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夜半，美托镇教堂的钟为新年而响起，10 分钟后，当教堂的钟声还在响，一支越共小分队出现在稻田边，出其不意地袭击南越第二舰队官兵，杀死了 19 个水兵，另有 17 人受伤。

《纽约时报》社论说，虽然再次开战撕裂了和平的希望，但另一个机会即将来临，那就是在 2 月份越南新年中开战双方有望停火。

“L'Année 1968, je la salue avec sérénité. ”78 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新年前夕说。“我祝愿 1968 年是祥和的一年。”戴高乐高而凛然，自 1958 年起，他一直在他发话的那个宝座上统治法国。他修改了宪法，使法国总统成了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有权力的首脑。目前，他正进入第二个七年任期的第三年，情况良好。他在镶金的宫殿里对法国人民（法国仅有的两个频道完全归国家所有）说，不久，其他国家将向他求援，他不仅将在越南，甚至将在中东谋求和平。“所有的迹象均显示，我们将在解决国际事务方面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以“我们”来称自己。

这位法国人口中的“将军”或“大夏尔”通过电视向法国人民致新年贺词的时候，显出“少有的温和，简直到了慈祥的地步”。他很少用严厉的词汇，甚至对此前被他认为是“可憎”的美国也不用。他的语调和他 1967 年的新年贺词形成对比，去年他将美国的越战说

成是“一个可恶的不公平的战争”，是一个“大国”摧毁一个小国。法国越来越在乎其盟国对自己的厌恶。

法国正处于一个平静而繁荣的阶段。“二战”后法国又进行了自己的越战，这一点戴高乐似乎已经忘记。胡志明——美国的敌人，与戴高乐同年，出生在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大半生都在反抗法国人。他曾经在巴黎生活，用的假名是 Nguyen O Phap，意思是“阮憎恨法国人”。“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告诫戴高乐，战后法国应将独立归还给印度支那。但戴高乐却跟胡志明说，即使他在召集自己的人民反抗日本人，战后他还是要设法重新建立法国殖民地。罗斯福说：“印度支那的人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戴高乐却决定他的自由法国军队要涉入在印度支那的任何行动，并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流了血，这片土地就归法国人了。”

“二战”后，法国人和胡志明打仗，惨败。然后是与阿尔及利亚交战，再败。但自从 1962 年后法国就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虽然戴高乐对经济增长点的漠然出了名，法国经济还是呈现出增长势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到 1967 年期间，法国人的实际工资每年上升 3.6%。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尤其是汽车、电视机。年轻人的大学就学率也明显上升。

戴高乐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对来年也颇为放心。他指出，左派尽管未必能获得权力，但他们将更为团结，“今年反对派对政府进行干扰，”蓬皮杜说，“但他们不可能制造危机。”

受欢迎的《巴黎竞赛》认为蓬皮杜是少数几个可以在 1968 年掌控权力从而取代戴高乐的人选之一，但编辑们更多地将来年的焦点放在国外，而不是国内。他们预计，“美国将有一场罕见激烈的选战”。除了越南，他们认为未来的热点还包括黄金兑美元的汇率之争，苏联东边卫星国家持续增长的自由，以及苏联国内太空武器系统的建立。

“今日的法国不会像往日那样因危机而瘫痪。”戴高乐在新年致辞中说。

因为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所发起的清洁建筑物的运动，巴黎显得前所未有的干净。玛德莲教堂、凯旋门、先贤祠和其他的标志性建筑物不再是灰黑色，而是米色和浅黄色，并且这个月将用冷水喷射洗刷巴黎圣母院上已有 700 年历史的尘垢。水喷会损坏建筑物吗？会使得圣母院怪里怪气，七拼八凑，暴露出石头颜色的斑驳不一吗？

戴高乐在 1968 年前夕坐在宫殿里，平静乐观，“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局不稳之际”，他保证“法国仍将井然有序，起到表率作用”。将军说，“我们没有敌人，”法国的终极目标是和平。

也许这种新式的戴式语气是因为诺贝尔梦在作怪。《巴黎竞赛》问蓬皮杜，将军身边的一些人对将军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感到愤慨，你是否有同感？蓬皮杜说：“你真的认为诺贝尔奖对将军有意义吗？他只在意历史，而没有任何评审团可以做出历史的判言。”

除了戴高乐外，美国的电脑产业也给寡欢的新年带来了少有的乐观，预示着 1968 年将是历史性的一年。20 世纪 50 年代，电脑制造商估计整个美国用六台计算机就够了。1968 年 1 月，美国已有五万台计算机投入工作，其中 15000 台是去年安装的。烟草业也很乐观地预计，1968 年将保持 1967 年 2% 的销售增长率。一家主要烟草厂家的主管人员扬言：“他们越是攻击我们，我们的烟草就出售得越多。”

但从很多方面看来，1967 年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全国内地黑人聚居城市的骚乱和破坏性暴动数量创下了纪录，包括波士顿、堪萨斯、纽华克和底特律。

1968 年是“黑鬼”（negros）变成“黑人”（blacks）的一年。1965 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组织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明了“黑豹”这个词，不久又衍生出“黑人力量”。1968 年此词刚出台时是指黑人武装力量，到该年年底，这个词指整个黑人群体。“黑鬼”成为一个有蔑视色彩的词，用于指那些不站出来争取自身权益的黑人。

1968 年的第二天，37 岁的黑人教师罗伯特·克拉克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密西西比州众议院的议员，成为该州立法院自 1894 年以来的第一个黑人议员。

但是民权斗争的中心从口音较软的南部乡村转移到了做派强硬的北部城市。南部的黑人与北部的不同。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大多是南方人，他们研究的是莫罕达斯·甘地的非暴力反英运动，而成长于纽约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却热衷于暴力反抗，像茅茅（Mau Mau）那样，后者在肯尼亚反抗英国人。卡迈克尔为人和善，思想锐利，还带着些许特立尼达人特有的戏剧气质。多年来，卡迈克尔在南方是监狱的常客，

频频遭受威胁和虐待，就像所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所经历的那样。在那些年里，非暴力受到质疑。卡迈克尔开始用语言甚至行动以牙还牙，回击种族主义者对他的侵犯。金的追随者高唱现在就要自由！“卡迈克尔的拥护者却高喊黑人力量！”金试图让卡迈克尔改用“黑人平等”，但卡迈克尔坚持他的口号。

1967 年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全国内地黑人聚居城市的骚乱和破坏性暴动数量创下了纪录

越来越多的黑人领袖想将种族隔离作为斗争武器，推行一种只有黑人的社会秩序，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也不允许有白人记者出现。卡迈克尔在 1966 年代替腔调柔和、持非暴力主张的约翰·刘易斯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袖。自此，卡迈克尔将该组织改造成一个主张暴力的“黑人力量”组织，从而使“黑人力量”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1967 年 5 月，当时尚籍籍无名的休伯特·拉普·布朗代替卡迈克尔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袖，至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非暴力”就只是徒有其名了。在那个血腥暴动之夏，布朗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说你们最好弄一支枪。暴力是必需的——它和樱桃派一样具有美国特色。”

民权运动严重分裂，金渐渐失去了对它的控制，许多人认为非暴力运动已派不上用场。1968 年，“黑人力量”眼看就要大行其道，警方也严阵以待。1968 年年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都在备战—建造兵器库，像在敌方安插间谍一样地在黑人社区派人卧底，招募公民作为常备军。洛杉矶瓦茨区在 1965 年 8 月的一次暴动中有 34 人被杀，此时的洛杉矶市正在考虑购买防弹装甲车，每辆车上安装一支 30 毫米口径的机枪；选购烟幕弹、催泪瓦斯或者灭火发生器；还有一种警笛，据说其音量之大足以使暴乱者致残。“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天啊，我希望永远不要用到它们，”洛杉矶警局副局长达里尔·盖茨说，“但我又意识到，在瓦茨这些东西该有多么宝贵，因为面对狙击枪我们毫无遮掩，无法救出伤员。”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特·布朗在一年前因瓦茨城暴乱而被罗纳德·里根击败之后，这些言论已经很有政治用途。问题是一辆装甲车需耗费 35000 美金。洛杉矶州长办公室有一个更节约成本的办法——多余的 M—8 军队装甲车每辆只需 2500 美元。

底特律在 1967 年的种族冲突中有 43 人死亡，其警方原先就有五辆装甲车，但还在购买催泪瓦斯和防瓦斯面罩以及需要对付狙击手的来福枪、卡宾枪、霰弹枪和 15 万发子弹。底特律的一个郊区就购买了一辆轻型装甲军用机动车辆，相当于一辆准坦克。芝加哥为警察部队购买了直升飞机，并开始训练 11500 名警察使用重型武器和控制人潮的手段，为 1968 年做好准备。从这一年年初，美国似乎就被恐惧支配着。

1 月 4 日，34 岁的剧作家勒鲁瓦·琼斯，一个秉性直言的“黑人力量”支持者，因在前一年夏天纽华克的暴乱中非法拥有两支连发左轮手枪而被判两年半到三年的刑罚，并罚款 1000 美元。当被问到为何重判勒鲁瓦·琼斯时，埃塞克斯县的法官利昂·W. 卡普说，他怀疑琼斯在被捕当晚“参与策划一个焚烧纽华克的计划”。数十年后，琼斯成了新泽西州的桂冠诗人，他的笔名是阿米里·巴拉卡。

在越南，美国官员永远都在告诉新闻记者这场战争即将结束，可它离终结仍然遥遥无期。1954 年，法国从越南撤退，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北越被胡志明控制，该地区本来也几乎尽在他掌管之下。南越则控制在诸反共派系手中。1961 年，北越的共产党通过越共人员占领了一半的南越领土，所到之处只遇到零星抵抗。那一年，北越开始将正规军输往南越以完成接管任务，其沿线就是后来著名的“胡志明小路”。美国进一步卷入战争，尽管它从来就没少插过手。早在 1954 年，美国就资助了法国战争耗费的五分之四。1964 年随着北越势力的巩固，约翰逊使用海军攻击北越的东京湾，启动了战争。自那以后，美国每年都增加在越南的军力。

1967 年，9353 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之前数年美军死亡人数的合计也没超过此数的一半。美军死亡总数已达 15997 人，另有 99742 美国人受伤。报纸每周都有当地伤亡报道。战争也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估计一个月花费 20 亿至 30 亿美元。到了夏天，约翰逊总统请求大幅增加税收以弥补不断增长的债务。“大社会”——约翰逊设立的以纪念已逝的前任总统的巨额社会花费项目——已严重缺钱，岌岌可危。1968 年年初出版的一本名为《大社会导读：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败》认为“大社会”正和自由主义本身一起死亡。

纽约市长约翰·林赛，一个具总统职位野心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在 1967 年的最后一天说，在现行开支计划下，如果国家不能给各城市增加拨款，那么“美国就应重新考

虑它自认在越南和世界其他地方负有的义务”。

正与苏联竞赛登月计划的美国政府被迫削减太空预算。甚至国防部也在精打细算，在年初请求国会批准延迟或取消可以延后购买的军火设施，以救急越战的费用。

这一年的第一天，约翰逊总统呼吁美国人减少去国外旅游，以挽回不断增长的外贸赤字，他认为造成赤字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国外旅游。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旅游者必须“分担负担”。约翰逊要求人们至少在两年内延缓不必要的旅行计划。他也提出了削减在国外的商业投资和征收旅游税，此举被田纳西州的民主党议员艾伯特·戈尔称为是“不民主的”。

法国人看问题难免带着“法兰西中心主义”的立场，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许多法国人认为约翰逊是用这些措施来报复傲慢的戴高乐。巴黎日报《世界报》说，约翰逊的提议给了美国一个“拿法国发泄怨愤”的机会。

随着战争耗资的与日俱增和越来越不得人心，1968 年的美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希望美化战争。《纽约时报》的 R.W. 阿普尔报道：

“我前几天听了一个吹风会，”一个中产阶层的平民说，“给我们介绍情况的人跟我们说：“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上层正在准备于 11 月让约翰逊总统再次当选。”

急速推进这个新的公关运动的目的在于要使南越看起来值得为之战斗。美国政府要诱导美国民众相信南越军队精兵善战，就得让南越军队做出点像样的事来。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府还必须尽力清除南越政府令人尴尬的腐败，不惜违背事实，将其头目阮文绍刻画成一个鼓舞人心的、正动员人民为正义而战的领导人。本就陷入困境的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到了 1968 年更是雪上加霜。

河内的官方报纸《人民报》在新年社论中说：在炮火的冲击下，“我们的通讯网络仍然畅通无阻，”并声称“人民加强了在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团结”。

胡志明主席在新年致辞中说，北越人民和南越人民已经“团结如一人”。这位 78 岁的主席预言：“今年美国侵略者将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和茫然的境地，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将乘胜追击，勇往直前，取得更多更伟大的胜利。”他至少说中了一半。

他对所有的友好国家和美国国内支持我们正义战争的进步人士“表示最衷心的祝愿。很显然，胡志明口中“进步人士”的运动在升级。据民意测验，不仅战争支持率在下滑，而且反战示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1965 年，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号召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时，许多人，包括一些旧时的和平主义者批评他们偏袒共产主义者，并对其策略和语言也有诸多不满。但两万人的示威依然在 4 月进行，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游行。

年初出版的一本名为《大社会导读：美国自由主义的衰败》认为“大社会”正和自由主义本身一起死亡。

到了 1967 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反战运动避免了老生常谈的冷战辩论，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Mobe），一个旧式的和平主义者、新老左翼分子、民权工作者和青年的联合体在旧金山上演了一场几万人的和平示威。在 3 月的纽约，他们召集了几十万人跟着马丁·路德·金从中央公园走到联合国总部。

在秋天的反对征兵周，约一万人在加州的奥克兰示威，其中大多为年轻的反战者，最后演变为与警察的街战。反战运动也逐渐脱离金的非暴力主张。示威者不愿老老实实被拖上警车。他们冲到警线内，又撤回到路上的临时路障后。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试图用最老的战术—几百名强壮者在校园内的一座建筑物内静坐，抗议陶氏化学公司招工。麦迪逊的警察没有把他们拖走，而是用上了梅斯催泪毒气和警棒，此举引起极大民愤，很快就汇聚了几千人和警察对抗。

陶氏化学公司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邪恶公司，该公司生产凝固汽油弹，用来对付越南的士兵、平民和土地。凝固汽油弹最初是“二战”期间被哈佛大学的科学家研制出来的，是军方利用教育机构研发武器的典型例子。起初，凝固汽油弹是指一种可以混合汽油和其他燃料的浓缩物。在越南，这种混合浓缩物本身就被称为凝固汽油弹。混合浓缩物将火焰转成胶状物质，在压力下射程可以很远。因为燃烧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它会粘在目标物上，无论该物体是植物还是人。根据国家学生组织的统计，在 1967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全国 62 所大学发动了 71 次示威游行，其中有 27 次是针对陶氏化学公司的，只有一次是针对教育质量问题的。

10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国家终战动员委员会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反战示威，示威者先在林肯纪念馆集合，然后穿过波托马克一直到五角大楼。杰里·鲁宾，一个从伯克利来的反战分子和他的朋友阿比·霍夫曼，一个来自纽约的民权运动成员也在其中。行进中，霍夫曼成功地引起了媒体注意，他声言要使五角大楼浮起并转动，以此来驱邪，但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当时，诺曼·梅勒也在那里，之后他将此写进了《夜之军》里面，该书成为 1968 年的畅销书之一。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语言学家兼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也在示威的队伍中。这些示威者不仅仅 是被宠坏和享有逃避兵役特权的孩子，也不似梅勒在他的书中更具同情色彩的描写：“迷幻药点燃了美国中产阶级年轻人的革命热情。”这是一场群众基础广泛而且形式多样的运动。“加入我们！”示威者冲着护卫着被包围的五角大楼的士兵高喊，好像沉浸在他们突如其来的号召力中，这力量能召来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1968 年的第一个星期，五个男人被控煽动年轻人违反征兵法，包括既是作家又是儿科医生的本杰明·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斯波克医生曾在纽约说，他希望“有 10 万、20 万甚至 50 万的年轻美国人要么拒绝被征兵，要么在部队遵纪守法”。斯波克的被捕引起了广泛注意，因为一直以来保守派们都认为，这一代人如此受宠溺和好争斗，罪魁祸首正是他这种“纵容的培养方式”。但是这些人被逮捕后，《纽约时报》又发表社论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反对征兵法的著名领导人，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大学牧师，正是这样的人对现在美国年轻人的道德困境尤其敏感。”

1 月 4 日，布鲁斯，一个来自长岛的有着披肩长发的 13 岁男孩，被控逃学。他的母亲有一家干洗店，布鲁斯在店里帮忙售卖迷幻药与和平符，他的父亲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老板。布鲁斯的父母说，布鲁斯是因为参加和平运动而被开除的。布鲁斯自己说他因为健康问题旷课 11 次，另有两次是因为参加和平示威。他母亲说布鲁斯自 12 岁起就参加了运动。

尽管对林登·约翰逊的声讨声势浩大，他却似乎极可能在五年任期之后赢得连任。1 月 2 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45%，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民众认为卷入越战是错误的。同一天，新年停火协定结束前的 1 小时 20 分，2500 名越共进攻美国步兵团位于西贡西北 50 英里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武器供应基地，杀死 26 个美国兵，伤 111 名，这是 1968 年开始后第一起美国人在越南的死亡事件。美国政府公布有 344 名越共被打死。美国有一个汇报敌军阵亡人数的制度，是在越战中发明的一个被称为“清点尸体”的宣传新招，如果敌军的死亡人数足够多，美国就宣称打赢了这一仗。

共和党在各州轮番主持了一项调查，其年初公布的结果显示，让约翰逊下马的唯一希望是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共和党估计，理查德·尼克松将一如既往地以微小弱势失败，而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已广为笑料，因为他宣称他从支持越战转到反对越战是因为被“洗脑”了。连乏味的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也调侃说，“我以为稍微‘涮涮’就够了呢。”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希望能趁机补罗姆尼的缺，但是他当州长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并且被认为太保守，容易像罗姆尼那样地被击败。共和党人深知落败滋味，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上一次竞选中，他们的参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与约翰逊竞争，结果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惨败。巴里·戈德华特一直也被认为太保守。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还有机会。

1967 年，一些民主党人讨论过找人替代约翰逊的事，但在美国政党内要替换当权者很难。像 ACT（候选人更换组织）这样旨在“甩了约翰逊”的组织也几乎不可指望。唯一有希望替代约翰逊的民主党人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但这位纽约州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却不想被牵涉进去。1 月 4 日，罗伯特·肯尼迪重申，尽管他与现任总统在对待越南战争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仍将支持现任总统连任。几年后，麦卡锡说，他估计肯尼迪认为自己不是约翰逊的对手，于是，1967 年 11 月，麦卡锡决定由自己来对付约翰逊。麦卡锡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他的参选。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引述麦氏的话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进行政治自杀……这很可能更像是判死刑。”他的这番言论被看做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最低调也最乏味的竞选言论。

现在，新年的第一天，麦卡锡说尽管得不到公众的大力支持，但自己完全没有受挫感，他坚持不通过“渲染战争”拉选票，而是用他干巴巴的语言论述道，越战“正在抽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我想它还给许多美国人造成了极大的焦虑，削弱和分散了我们解决国内问题和国外其他潜在问题的精力”。

如果敌军的死亡人数足够多，美国就宣称打赢了这一仗。

1967 年 11 月，麦卡锡又说，他希望因为他的竞选而使持异见者能放弃不满和挫折导致的非法抗议，走向正当的政治诉求。但话音刚落，一个月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和其他反战人物开始了 1968 年的计划，首当其冲的是第二年夏天在芝加哥召开民主党会议期间的几场街头抗议。

“异皮士”成为“国际主义青年党”的缩写是这一年后来的事，根据官方的并不确凿的说法，该运动成立于那一年的新年前夕，在一次格林威治村的聚会上，并且是吸食大麻之后的产物。其创始人是阿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我们在那里都人事不省，在地上打滚。”霍夫曼后来对联邦调查员说。甚至连名字“异皮”——就像反主流文化的“嬉皮”一样——也都表示了一种痴傻的智慧，这种东西唯有激进的年轻人欣赏。

这一年的第一天，联合国宣布 1968 年为“国际人权年”。联大也开始了一整年的观察，以开启世界性的和平努力。但是即使是罗马教皇也在 1 月 1 日和平致辞中承认“在越南有新的可怕的和平障碍”。

越战并不是对和平的唯一威胁。在西非新独立的国家中，最有前途、石油储备丰富的尼日利亚在过去的 6 个月里已经陷入了内战——执政者和伊博人的战争。在比夫拉这个小小的东部地区有 1200 万人口，伊博人占 800 万。而比夫拉恰恰是尼日利亚的石油重镇，有了它尼日利亚才有前途。

尼日利亚政府首脑雅各布·戈翁在圣诞节致辞中说：“我们很快就能有个转折，幸福已离这个地区不远了。”关于内战，他说：“让我们全力以赴，于 3 月 31 日前结束内战。”但实际上他很少致力于国家团结，从不离开拉各斯，也很少在拉各斯露面。来自东部的政府官员开始了一种类似于美国越战报道的新闻运动，那便是报告在比夫拉的兵变次数。那年初，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让 81 名叛离东部投奔首都的警察出席，但记者们注意到这些警察中没有人是来自伊博族的。然后，政府又展示了小尺寸的比夫拉制服，以证明敌人在带领孩子打仗。

比夫拉人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属于他们的领土，并给人数远高于他们的政府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1960 年，尼日利亚刚独立时，它被作为非洲国家民主成功的代表。但是地区之间以及 250 个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到了 1966 年 1 月，伊博人推翻了政府、杀死了民选领导人，6 月，戈翁在第二次政变中上台执政，屠杀了数千名伊博人，这些伊博人因为他们能够适应现代技术的能力而遭仇恨。民主状况的恶化加剧了地区间的冲突，到了 1967 年 5 月 30 日，东部被伊博人控制的地区脱离尼日利亚，独立成为比夫拉共和国。

经过 6 个月的战斗，战争到了僵持状态。拉各斯只受过一次袭击，但那架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在城市上方被击落了。但是记者们发现医院里满是伤员，军队设路障以强截重型、较好的汽车以作前线战斗用。战争开始时，国际观察家认为戈翁能够控制他的部队，减少平民伤亡的人数。但是到了 1968 年 1 月，据报道，有超过五千名伊博人被狂怒的暴民杀害，而尼日利亚军队只做旁观者。军队控制了比夫拉港口城市卡拉巴尔，打死了至少一千名伊博平民，还有报道说甚至多达两千。如果内战继续下去，必然会像其他内战一样演变成恶劣、血腥的冲突。

在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自内战后夺取政权以来已进入他的第 29 个“和平年”。虽然还是压迫人的专制，但比起邻国葡萄牙的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的情形好多了。近年来，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叛乱都被血腥清洗，数千西班牙人被杀死或关进监狱。反抗被镇压下去之后，压制也相对缓和，一些内战时期的难民甚至回国。但在 1967 年，年轻一代的学生开始游行，反抗政府，他们扔石子，高声呼喊“自由！”，“佛朗哥该死！”12 月 4 日，在佛朗哥 75 岁生日那天，学生们打出了“佛朗哥，凶手，生日快乐”的海报。

1968 年的开端，西班牙并不平静，马德里大学技术科学学院因为学生的反政府抗议而被警察关闭，第二天就有数百个医学院的学生进行示威，愤怒的学生向警察扔石头。到了 1 月中旬，因为反佛朗哥示威，政府已经相继关闭了哲学院、经济学院和政治学院。学生们在 1967 年赢得了结社权利，1968 年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在前一年学生运动中被逮捕的学生，并同意再也不允许警察进入校园。校园是具有不可侵犯性的区域，这也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认可的条规。但是学生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校

外事务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工会和工人权利方面的事务。

新年前夕，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呼吁中东的阿拉伯人“说出自己的意愿”，并要求阿拉伯领导人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1967 年 6 月，以色列再次与其阿拉伯邻国交战。这令戴高乐很恼火，因为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和武器供应者，他一直要求以色列不要主动开战。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已遭受了阿拉伯国家的几次三番的进攻，并且在埃及一度封锁亚喀巴湾之后，以色列坚信阿拉伯人马上就要发起新一轮联合进攻了，因此以色列就先发制人。烦恼不已的戴高乐从亲以转向了亲阿。他在 11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个新政策时说，犹太人是“精英民族，自信而专横”。直到 1968 年戴高乐还在试图解释他的这个论断，向诸位犹太领导人保证这不是一个反闪族人的言语，而是一句恭维话。这或许是真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分明是在描述他自己。

苏联——1956 年之前以色列的盟友——也很烦恼，因为它为给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和战争计划，但由苏联撑腰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却在六天之内被以色列轻而易举地击败，这让苏联很难堪。

以色列人开始玩起了新花样。在这次战争中，他们没收了叙利亚的绿色戈兰高地，埃及境内多岩的西奈山和约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然后他们试图以此作为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希望他们以和平换回土地。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阿拉伯人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在新年前夕，阿巴·埃班在广播里用阿拉伯语说：“你们的领导人在过去 20 年里所采取的政策，给这个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该政策已告覆灭。”他坚持认为 1968 年应该是阿拉伯国家改变政策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从耶路撒冷的以前由约旦人控制的地区拨出了 838 英亩的土地，用于在老城建造犹太人的居住地，计划盖 1400 座房子，其中 400 座给一度离开老城的阿拉伯人。

学生们打出了“弗朗哥，凶手，生日快乐”的海报。

正如“黑人”和“异皮士”这些词汇一样，“巴勒斯坦人”这个词自 1968 年才初次出现在大众词汇中。之前，这些人不被看做一个单独的文化群体，也不被认为有他们自己的国籍。人们称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的身份就更模糊了，因为这个地区被看做是约旦的，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也就是约旦人，从文化认同上讲，他们也与东岸的约旦人一样。一家美国报纸报道来自西岸的消息时，日期栏内写的是：“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

1968 年初，“巴勒斯坦人”指的是阿拉伯游击队成员，西方媒体常称他们为恐怖组织。这些组织用巴勒斯坦人作为标签，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巴勒斯坦革命、巴勒斯坦革命青年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先锋、巴勒斯坦革命阵线、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等组织。在 1967 年战争前，像这样的组织至少有 26 个。这些组织被极左翼的反主流文化叫做“民族主义者”并得到支持，但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很少有支持它们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因为支持他们，其一度为主要民权组织的形象受到了削弱，并且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

1968 年前的最后一周，艾哈迈德·舒凯里辞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领导职位，这一组织是阿拉伯人的一个重要组织。他最出名的是发誓要“将犹太人赶到海里去”，却又不能实现这一宏愿。巴勒斯坦人指责他不守信，好欺瞒作巧，有时还无遮拦地撒谎，另一个同样有影响力的组织法塔赫（Al Fatah）就拒绝接受以舒凯里为首的“巴解”的领导。“法塔赫”的意思是“征服”，是由传奇人物阿布·阿马尔领导的。1964 年法塔赫发起了第一次袭击，当时他们准备炸掉一个抽水机，但未能引爆炸药，当他们回到黎巴嫩时全部被捕。此后，阿布·阿马尔因为打游击战而成为阿拉伯人中的传奇人物。阿布·阿马尔是一个假名，其真人是 38 岁的巴勒斯坦人，亚瑟·阿拉法特。

1968 年初，八个巴勒斯坦组织宣布成立联合指挥部指挥游击队与以色列作战。他们声称要加强袭击，但不会针对以色列平民。发言人巴勒斯坦心血管医生依萨姆·萨塔威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清算犹太复国运动者”，并且拒绝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只相信枪杆子，要通过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1 月份的《原子能科学家公报》封面登载了更多不幸的事。封面上的时钟指向 11 点 53 分，也就是离午夜只差 7 分钟。这只钟象征着世界正在逼近已近在咫尺的核

战争，自 1963 年以来这只钟一直处在离夜半差 12 分钟的位置。该杂志的编辑尤金拉比诺维奇博士说，他们调整了时钟，以反映愈演愈烈的暴力和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1968 年的第一天，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新作《贾科莫·乔伊斯》的书评，开头写道：“如果开端确实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 1968 年应该是一个灿烂的文学年。”

经过 1967 年的大量争论，在 1968 年的第一天，英国就宣布由塞西尔·戴·洛易斯接替约翰·梅斯菲尔德的桂冠诗人地位。前者是推理小说作家，牛津大学诗歌教授。桂冠诗人是皇室的官方成员，大致位列看管人之上，副总管之下。梅斯菲尔德当了 37 年桂冠诗人，他在 5 月辞世之后，许多人认为，到了 60 年代末期，皇家诗人这个概念已很陈旧了。

1968 年的头一个星期，鲍勃·迪伦回来了。自从在一次摩托车祸折断脖子后，他消失了一年半时间。他的新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受到了评论家和歌迷的欢迎。自他开始用电吉他伴奏之后，就产生了“民歌摇滚”这个词。从 1968 年开始，鲍勃·迪伦回归到民谣之本，用吉他、口琴、钢琴、贝斯和鼓来伴奏。《时代》杂志评论说：“他的新歌是简单而安静的，一些是有道德含义的关于流浪者的歌，一些是有宗教意味的，包括《我梦见了圣奥古斯丁》和一支关于牧师犹大的寓意深长的歌。最动人的的是最后一首活泼的求婚歌《今晚我将是你的宝贝》。”但是，《纽约时报》的丹·萨利文指出，得克萨斯州的亡命徒约翰·韦斯利·哈丁的姓 Hardin 中本来是没有字母 g 的，他说，迪伦在省略了众多单词中的尾音字母 g 之后，“显然已意识到他应该归还一个 g”。

棒球在美国体育的主流地位受到足球的威胁。1968 年 1 月 1 日，102946 人观看了玫瑰杯橄榄球比赛，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观众们看到了出色的加州大学运动员 O. J. 辛普森两次触地得分，加州大学队总共赢得 128 码，以 14：3 击败了印第安那队。

伯纳迪恩·莫里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968 年最大的风险是裙子的长度是否能冒险长到脚或者小腿部位，因为几个季度以来，裙子长度都被权威定在膝盖以上。”这一年的 1 月流传着一则消息，联邦住宅供给委员会对手下员工颁布了一个冗长的指示：在寒冷的天气穿迷你裙容易导致腿部脂肪的囤积。结果证实该消息纯属虚构。

但是，英国政府正在失去来自迷你裙的税收却是真的。英国对女裙征收 12.5% 的销售税，为了不将童装包括在内，政府明示只有从腰到底部长度在 24 英寸的裙子才需要征税。1968 年冬天，英国时髦妇人的裙子长度在 13 英寸到 20 英寸之间。

然而，1968 年的时装观念即是没有任何禁忌。因循守旧已不合时宜，评论家们乐意看到人们正朝穿戴的多样化迈进。

1968 年对女性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不仅在于裙子的长度，更在于这一年 1 月 1 日一个名叫繆丽尔·西伯特的女子宣称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获得了一个席位，这是该所 175 年来头一次提供席位给妇女。西伯特是一个来自克利夫兰的 37 岁金发女子，朋友们都叫她“米奇”。她决定不听来自金融界的众多男士给她的建议：找一个男人买座位。“那是上星期四，”她说，“董事局同意了我的会员身份。我到证券交易所递上了价值 445000 美元外加 7515 美元入籍费的支票来买席位。然后，我买了三瓶法国香槟给我的同事。我至今不能相信那是我，我简直高兴得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1968 年是个充满争议的年份。好消息是，南非开普敦格罗特·舒尔医院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将一个 24 岁年轻人的心脏植入一个 58 岁的牙医体内。这是巴纳德做的第二次这类手术，也是世界第三次心脏移植手术，但该手术是头一次被医学界认为是成功的。巴纳德在 1968 年声名鹊起，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当国际名人，他签名、接受采访，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嘴里说着名言警句，但这些话从年初起就颇受业内指摘。巴纳德说，尽管他盛名不期而至，但他依然只拿 8500 元的年薪。然而他的手术成功也被笼罩在疑虑中。一个德国医生将之视为是犯罪行为。一个纽约生物学家显然把医生和律师弄混了，说应该“永久剥夺巴纳德的律师从业资格”。另有三个著名的美国心脏病专家呼吁暂停心脏移植手术，对此巴纳德立即表示他将不予理睬。

理论上，该手术涉及了两个病人膏肓的病人，一个捐出了心脏，死了，但即使不这样，他也是注定要死的，另外一个则被救活了。一些医生和外行人士就此质疑医生是否有权选择让谁死。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发生奇迹吗？如何决定谁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心脏？医生能似上帝般地做决定吗？对此，巴纳德的言论只能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他在《巴黎竞赛》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一个天生的白痴和一个数学天才同时需要一个心脏，而我必须做出抉择，那么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使这些争论火

上加油的是，巴纳德来自南非，一个因种族隔离而日渐臭名昭著的国家，而且之前他用一个黑人的心脏救活了一个白人。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在这一年度格外引人注目。

她决定不听来自金融界的众多男士给她的建议：找一个男人买座位。

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1959 年新年打了胜仗后，每年的 1 月 2 日，哈瓦那开闸的革命广场都要进行革命周年的庆祝活动。1968 年，革命 9 周年，庆祝活动中多了一幅 60 英尺高的壁画——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帅气的年轻人，阿根廷 38 岁的切·格瓦拉，他在两个月前在玻利维亚被杀，当时他正在贯彻古巴的新革命计划。

这次的古巴革命之路在一本叫做《革命中的革命》的书中有描述，作者是雷吉斯·德布雷，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对古巴革命着了迷。该书于 1967 年被译成英文，是全世界学生的最爱，因为它符合狂躁的青年们的需求。在书中，德布雷认为应该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要循序渐进的理论，革命一开始就应从农民军开始。这正是卡斯特罗在其家乡东方省的山中所运用的策略，也是切在玻利维亚所做的事情。但是切失败了。11 月流传着一张由玻利维亚空军上校展示的切的半裸尸体的照片。德布雷也被玻利维亚军队抓住了，但没有被处死，而是将他关在一个叫做卡米里的小镇的监狱里。1968 年初，德布雷还在狱中，玻利维亚人允许他的委内瑞拉情人伊丽莎白·比尔戈斯到狱中和他结婚。

1968 年，卡斯特的挚友和革命同志格瓦拉成了一个烈士，一个被神化的革命圣人——用鲍勃迪伦的话说，格瓦拉是“永远年轻”的，蓄着胡子，戴着贝雷帽，眼睛含笑，不论言行还是装束，他都是个纯正的革命者。在哈瓦那若洛马蒂国际机场，印着格瓦拉照片的海报上写有这样的文字：“青年将吟唱机枪的喊喊作响和战场厮杀声的挽歌。直到胜利，永远。”

在古巴的所有地方都可以见到“直到胜利，永远”的字眼。六万个身着灰色制服的中学生正步经过卡斯特的观礼台，每组人经过时都热情地高喊：“我们的责任是成为像切那样的人。”“Como che”——像切那样，有更多的切，像切那样工作的口号遍布全岛。对切的狂热崇拜已经开始了。

卡斯特罗宣布这一年的周年庆不会展示苏联武器，他解释说这样的阅兵仪式太昂贵，部分原因也包括苏式坦克也容易压裂哈瓦那马路上的人行道。

莫斯科又遇到了其他麻烦的征兆。麻烦始于这一年度的疲软经济和一次不受欢迎的对四个知识分子的审判，原因是他们散布反苏联的言论，支持反动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二人因为在西方国家出版著作而在两年前被关进监狱。中东的六日战争使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蒙羞，同时，集体农业走了下坡路，经济改革的尝试草草收尾，青年和知识界变得躁动不安，诸如鞑靼人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好对付。苏联集团的人民尤其是青年越来越排斥冷战姿态和语言。南斯拉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要独立的架势一直都是莫斯科的心病，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开始有了同样的倾向。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有对苏联忠心耿耿、俯首帖耳的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人民却不安分。1967 年 4 月，斯洛伐克党的机关报纸《布拉迪斯拉发真理报》做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反对党的路线。只有一半民众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而 28% 的人说双方都有责任。最令人震惊的数据恐怕还属仅有 41.5% 的人将越战归咎于美国，要知道，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国的民众也不会对美国如此网开一面。到了秋天，捷克作家公开要求更多的言论自由，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1967 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都对诺沃提尼不利。他对莫斯科的奴颜婢膝使他在 1953 年升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58 年，他成为捷克总统。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反感他对捷克境内约占 1/3 人口（450 万人）的斯洛伐克人的冷酷仇恨，觉得他应该让出一个位置给其他人。在 12 月的一次共产党主席团 10 人会议上，诺沃提尼几乎无招架之力，只得宣布“因圣诞”而休会。委员会决定在 1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重新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诺沃提尼开始密谋。他试图散布苏联要插手保留他的职位的谣言来胁迫他的反对派，但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招致反对派的更强烈反对。他接着策划了一次军事干预以自保，准备逮捕他痛恨的反对派成员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但是一个将军将此消息透露给了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再次失败。

所以，诺沃提尼总统在新年通过广播向国人发表了意在妥协的讲话。他答应向来受轻视的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经济规划的重点，他也安抚作家和学生，只要是进步的，即使是来自西方的，也会被允许。“我指的不仅仅是经济、工程和科学，还包括文化艺术领域的进步。中央委员会在 1 月 3 日继续开会，拿掉了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杜布切克，在是否革去其总统职位的问题上虽有分歧，但诺沃提尼显然已受到了重创。捷克斯洛伐克人直到 1 月 5 日星期五才知道他们的世界即将发生改变。当布拉格电台宣布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由杜布切克继位时，捷克人还没意识到诺沃提尼的处境，大多数人不知道杜布切克是何许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最成功的政治家们是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操纵政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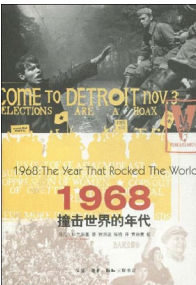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奇怪的是，强硬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什么反应。勃列日涅夫曾在 12 月访问过布拉格，被广泛认为是在挽救处于被围攻状态的捷克领导人的地位。但事实是，尽管诺沃提尼大事声张自己的忠心不二，却从未讨得勃列日涅夫的喜悦，当他被革职时，勃列日涅夫对他说：“Eto vashedelo.”——这是你的问题。

在华盛顿，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正在为国会准备年度报告，报告写道：“在 60 年代，我们所熟知的在二战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形成的简单的两极结构开始解体。挚交和死敌不再那么容易被贴上标签，而过去曾经很派上用场的字眼，如‘自由世界’和‘铁幕’，似乎都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因为各集团内外既出现了利益冲突，也形成了新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它们正在慢慢侵蚀着曾经被看做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

在周五，也就是 1968 年的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越南战场的周伤亡报告显示，185 个美国人、227 个南越人、37 个盟军士兵阵亡。美国及其盟国成员总共消灭了 1438 个敌军士兵。

这就是第一个星期，就这样，1968 年开始了。

本文摘自《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程洪波 / 陈晓 / 黄原竟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马克·科兰斯基 著
程洪波 / 陈晓 / 黄原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 10 月



马克·科兰斯基

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经常为《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撰写文章。著有《1968：撞击世界之年》《巴斯克人的世界史》《被选择的少数：欧洲犹太人的兴起》《非暴力主义：一种危险观念的历史》等畅销作品。此外，他的专著《鳕鱼：一部改变世界的鱼的传记》获得了具有“美食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希尔德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 ANTANAS SUTKUS / 'JEAN-PAUL SARTRE IN LITHUANIA', NIDA, 1965

非虚构

让 - 保罗·萨特的 完美的毛主义时刻

理查德·沃林 | 发现经典

萨特的毛主义介入促使他以全新的眼光
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者宣布萨特及其所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范式过时了。然而，“五月风暴”意味着对萨特的人类自由学说进行了一场响彻人心的辩护，因为“五月风暴”证明“事件”发生了，历史不仅仅是结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晦暗而凝结的风景。此后萨特与毛主义者的合作关系——他一度担任了至少三种毛主义出版物的名誉主编（《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和《一切！》）——突然把他抛向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自“五月造反”以来，左倾主义已经捕获了当代法国的政治想象。青年人是未来的发展潮流。萨特与“无产阶级左翼”的联盟清楚地表明法国青年人接受了萨特。

同样，萨特与毛主义者的合作不仅仅是政治便利的联盟。就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毛主义插曲是容许他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难的中继站与必经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联合允许他彻底想清楚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萦绕他心头好多年了。尽管萨特是 20 世纪法国造访非凡的知识分子，但是他总觉得这一角色令他感到极为不自在。一方面，知识分子声称是普世价值的倡导者；另一方面，他或她仍然无力去认识这些真实生活中的价值。这种分歧或裂痕影响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核心，并解释了其特有的“自欺”（mauvaise foi）。萨特的毛主义介入促使他以全新的眼光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friend of the people）。

“一个寻常人”

萨特是知识分子中间少有的天才，他几乎毫不费力地在每种文学体裁上都获得了成功：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哲学著作、随笔、政论、访谈和剧本。1963 年，他出版了获得巨大好评的自传性作品《词语》（Les mots），叙述一个他如何在幼年丧父、挚爱的女人们陪伴其左右的条件下为获得文学成功而接受教育的动人故事。通过讲述自己的过去，自由的哲学家萨特逐渐意识到他的性格和人格是如何永不磨灭地由其家庭出身塑造的——这证明超越它们是多么地艰难。萨特的叙述是极为坦率的，是自我苛责的，有时近乎资产阶级的自我憎恨。正如波伏娃曾说的那样，他是黑格尔所定义的“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的完美体现。当萨特以挑剔的眼光回顾他早期的文学突破性作品《恶心》（Nausea）时，他深刻地嘲弄自己的成就：“我就是洛根丁……圣灵的选民、地狱的编年史作者和一架正对着我自己的原生质汁液的微型钢化玻璃摄影机。后来我又快乐地阐述人是不可能的道理……我被彻底地蒙蔽和欺骗了，我在快活地描写我们不幸的生活条件……我除了不怀疑我是怀疑的选民，其余的一切我都怀疑……我把焦虑不安看作是我的安全保证：我是幸福的。”

萨特青年时期认为写作是一项高尚的——并使之高尚的——使命。后来他失望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克服阶级出身的污点和局限几乎是不可能的。1947 年大张旗鼓地倡导的整个“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计划似乎失败了。想象（作家的领地）肆无忌惮地使现实无动于衷、无法改变。在医治一个天真的孩子的痛苦方面，文学是无能为力的，萨特叹息说。假如萨特继续写作——例如他对福楼拜的宏大研究，那么萨特会主张写作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容易脱离习惯的力量。尽管如此，《词语》以一条谦虚的自我肯定的评论予以总结，萨特描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 him 相提并论”。

第二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随之就拒绝了。他的拒绝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并证明取代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文学嘉奖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接受它。毕竟有很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只有在另一种情形下，某个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人才不会拒绝它。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在瑞典评委会宣布萨特获奖的那一刻，他不可抗拒的力量基本上搁浅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萨特始终处于当时重大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冷战、斯大林主义、苏联入侵匈牙利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存在主义的倡导者萨特重新界定了“介入知识分子”（committed intellectual）的理想——这个概念具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法国谱系，可以追溯到像伏尔泰、维克多·雨果、埃米尔·左拉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这样的人。

萨特生涯中作为介入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engagé）的顶峰无疑是他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原则性立场，当时法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频繁地实施残酷暴行。1961 年，萨特公然签名《121 宣言》（Manifesto of the 121），这一宣言公开要求法国军队撤离阿尔及利亚，政府由此认为这份宣言公开煽动叛国。因其积极的反战努力，萨特位于左岸中心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上的公寓曾两度遭到轰炸。面对可能爆发的国内战争（1961 年，不满的军官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公开挑战戴高乐的政策，在法国领土上实施恐怖行动），政府扬言要逮捕许多签名者。戴高乐面对萨特的公开挑衅时，据说他以一句著名的珠玑妙语发表了评论：“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法国总统本不可能给萨特更高的赞扬，但是戴高乐给了。

然而，随着 1962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中苏关系破裂永久地分裂了“反帝国主义”阵营。流行的、关于“趋同”（convergence）的地缘政治学讨论意味着无论美国和苏联如何宣称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政治制度越来越相似，这种讨论有效地阻止了知识分子介入行动的富有意义的出路。此外，法国正处于准温和的 11 年总统独裁政治的困难时期，戴高乐“帝王式的总统制”（1958—1969 年）接着会被他精心挑选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的五年任期规则所效仿，内部政治变革的前途似乎凝滞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萨特出版了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本著作是他在安非他命诱发的昏迷状态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的。

（萨特对苯丙胺类药物上瘾了，当时这种药物可以直接在柜台上销售。不久这种药物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与罪恶的回应。在这本书中，他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限度和本体论限度。在他重新开始《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的概念构架时，萨特思考了群体惰性的必然性，一种他称为“序列化”的现象。在萨特看来，人类群体中间存在着——

种浪费最初的革命高潮之活力的准人类学趋势。萨特试图以历史例子来支持他的结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热月政变（Thermidor），当时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自己被推向了断头台；斯大林在 1936—1937 年莫斯科摆样子公审（Moscow show trials）期间对老布尔什维克人的残酷清洗运动等等。假如萨特的政治思考是正确的，那么革命斗争的未来可能是非常暗淡的，否则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此，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存在主义的革命冲劲似乎耗尽了。一位评论者评价说：“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他从不与其他知识分子、他的同代人有更多的接触。在巴黎、在拉丁区，他有点像一个过时的人。”

存在主义消亡的一个信号就是萨特与路易·阿尔都塞于 1960 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共哲学家的自家地盘）发生的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对抗。阿尔都塞的门徒连珠炮似地质问萨特，人是否能够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自我中心的框架来理解历史。像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导向的范式难道没有必要弄清楚社会群体的行动吗？萨特似乎一反常态，结结巴巴。按照大多数目击者的说法，阿尔都塞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这场争论。

在医治一个天真的孩子的痛苦方面，文学是无能为力的，萨特叹息说。

历史无主体

萨特费了前 10 年的时间来尽力融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胜任历史目标和政治目标。当时一种竞争性的知识范式出现了，填充了存在主义之后留下的虚空：结构主义严格而非个人化的格栅（grid）。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结构主义公开嘲笑笛卡尔儿哲学中的“我思”的自信，而“我思”曾是法国哲学的起点和必要条件。在援引了更高的“科学”权威后，结构主义竭力表明“我思”是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常量（所谓的“深层结构”）的附带性表现。正如弗洛伊德借助无意识来表明自我不再是其自身住所的主人一样，正如马克思论证文化、政治和法律最终是潜在的经济决定因素的表达一样，结构主义者调动“科学的”论证来对抗由意识、思维和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自律幻想。由此，社会科学的代表们联合攻击了哲学在法国知识分子生活中自吹自擂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与萨特的名字密不可分。

20 世纪 50 年代是结构主义的酝酿期。不过，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来临，萨特的结构主义对手们开始直接攻击他。在《野性思维》（The Savage Mind）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主义最令人敬佩的倡导者〔他于 1955 年出版的自传性研究《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发表了一篇言词猛烈、毫无保留的批评性文章。列维－斯特劳斯从流行的、后殖民的人类学相对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从殖民主义的烧杀掠夺和残酷暴行来看，更别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最新罪恶了，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简直就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虑。在萨特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视线”的著名论述中，列维－斯特劳斯论证说萨特的确不再抵抗这个陷阱。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萨特对“自为”（Pour-Soi）的痴狂，与野性思维自由自在的自恋具有亲缘关系。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在人们对华沙条约组织掠夺性入侵布达佩斯事件记忆犹新的情况下），萨特所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文化统治的另一种貌似有理的理性化。这位比利时出生的人类学家公然偏爱前现代的非西方社会的相对安宁。这些原始群体与周围的环境相处比较融洽，造成更少的全球性破坏。也许列维－斯特劳斯批评性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他颇不相称地将萨特与美拉尼西亚野蛮人进行比较的那些部分——值得称赞的是美拉尼西亚野蛮人仍未受失控的、妄想自大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影响，而这种“权力意志”令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苦恼不已。

不久后，米歇尔·福柯，结构主义日渐重要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对衰老的“主人”实施了毫不掩饰的攻击。福柯机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强忍着不去指名道姓，但是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可以辨别出其论辩怒火所针对的真实目标。福柯的著作本着结构主义的精神对“人”、“主体性”和“人道主义”（也就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所珍视的所有概念）的幻觉构成了正面攻击。在该书最著名的、充满抒情的章节里，福柯推测人的范式倒会像海边的沙堡一样被冲走。此后，将再一次存在着一个有可能进行思考的空间。

对一群“二战”期间成年并忍受政治失望的法国青年思想家来说，萨特获得了一代人的“超我”的地位。他是必须被谋杀的原始父亲，以便“儿子们”兴旺昌盛。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中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贬低为“意识形态的”、“前科学的”的时候，他的真正目标是极负盛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等人道主义批评者不断强化的共识就是萨特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已经失败了。到了范式改变的重要时刻了，一种结构主义者试图促成的“认识论断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时刻到来了。

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恰当地总结了这些新发展，兹述如下：

萨特曾有好几年是相当边缘的。结构主义、拉康主义、阿尔都塞主义：这些新趋势没有一个不是从他那里引申出任何回应、认识、批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他的新同行——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丁区的新明星们……他只是不在那儿了。他接受他们、与他们共存，任其自然发展。但是他仍然保持沉默。当阿尔都塞故意遗忘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时，他不吱一声。当拉康就语言发动大争论时，他不吱一声。当福柯出版两部关于疯癫和监狱的杰作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而已。他是缺席的，仿佛同代知识分子的关注跟他毫无关系。

1964 年，这两种敌对范式的倡导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值得纪念的遭遇。萨特反对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两名重要代表——《太凯尔》派的让·里卡多（Jean Ricardou）和让－皮埃尔·费耶（Jean-Pierre Faye）。这个特殊的时机就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在大型公共会议厅“互助会议厅”（Mutualité）举行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文学何为？”。《太凯尔》自从 1960 年创刊以来就故意与萨特作对，恳切地信奉以阿兰·罗布－格里耶的晦涩深奥的新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形式主义。对于萨特来说，他仍然是“介入文学”的捍卫者。由此，论坛的进程已经设置好了。萨特直接发起攻击，批评新小说是唯美主义者的自鸣得意而已。在一个充满社会不公的世界里，文学的放纵是人类难以承受的奢侈。但是“太凯尔”派更加坚定地持有自己的观点。里卡多恰当地反驳说，通过意义生产的能力，文学从一种沉默的匿名性中救赎了人的存在。值得赞扬的是，文学记录了其他方式忽略不计的人类痛苦的例子。就其自身而言，不管它愿意与否，它都是一种增强自我意识的练习。萨特似乎遇到了对手。

结构主义的伏击令萨特毫无提防。1965 年，他已过 60 岁了。除了列维－斯特劳斯外，或许还除了福柯，萨特似乎从未仔细地阅读过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尽管如此，萨特至少曾试图给予前后一致的回应。1966 年，法国杂志《弓》（L’Arc）发表了一篇对左岸存在主义老前辈萨特的访谈。萨特在反驳中坚持认为结构主义的真正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对历史的抛弃，”他继续说，“最终从总体上抑制进步的历史变革的观念。”随着对结构主义批评的到来，历史变成了一道凝滞的、僵化的风景，像一幅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的画作：地形缺少方向、目的或意义。萨特说：“历史背后，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遭遇了攻击。任务是想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再次建立起来的最新障碍，用以反对马克思……在语言系统中，有一些东西是惰性（即结构）不能单独给予我们的：实践的标志。只有在结构被其他结构制造的范围内，结构才会强加给我们。因此，为了理解一个结构是如何被制造的，有必要引入实践作为累加过程的方式。”

尽管萨特避免详尽地参与其结构主义对手的论辩，但是很难否认的是他对结构主义决定论的批评——这在萨特看来意味着确认而不是竭力超越“实践—惰性”——显示了他的先见之明。因为结构主义的时日也是屈指可数的。

一年后，弗朗索瓦·弗雷（Francois Furet）对萨特的诊断提供了一种不公平的证实。在弗雷努力给结构主义的兴起提供一种历史解释时，他指出结构主义大受欢迎，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同时发生。因为法国左派对进步的历史变革的信心被苏联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官僚主义愚笨逐渐消耗掉了，所以它往往陷入一种历史的政治宿命论。结构主义以一种对富有意义的人类改善的前途持自我消除的犬儒主义为特点，它在一个极端的政治幻灭的时代里变成风靡一时的范式。

文学记录了其他方式忽略不计的人类痛苦的例子。就其自身而言，不管它愿意与否，它都是一种增强自我意识的练习。

在一年内，“五月风暴”大概证明了“事件”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整整一个月，结构主义的陈词滥调天天在拉丁区的大街上、阶梯教室里遭受批驳。哲学家吕西安·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贴切地总结了“五月风暴的知识教训”，他的评论众所周知：“结构不上街闹革命。”换言之，历史不是“凝滞的”。主体性和“事件”重申了它们的特权。也只是在结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明确地把萨特看作是一个“废物”后的几年光景，他也在谋求着政治上的东山再起。

在很多方面，“五月事件”成为萨特思想的强劲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他完全相信，尽管客观条件不利，但是男人和女人有能力通过独立自主的意志行动来积极地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南泰尔大学心理学家迪迪埃·安齐厄 (Didier Anzieu) 提及萨特的革命“融合群体” (group-in-fusion) 学说时说：“五月学生造反试验了它自己的、有关萨特的原则‘群体是人类的开端’的版本。”那么，弗朗索瓦·多斯 (François Dosse) 在其结构主义运动的权威性历史著作中将关于五月风暴的那一章取名为“让－保罗·萨特的报复”，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在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政治积极分子的能力方面，萨特从一开始就卷入“五月起义”之中了。

5 月 10 日 (声名远播的街垒之夜)，萨特联合签名了一份宣言，这一宣言发表在强烈支持学生诉求的《世界报》上。这份材料因其显示关于学生造反的社会学基础和存在主义基础的深刻见解而闻名：法国青年人不愿意被消费社会的甜言蜜语与廉价玩意收买、诱惑。学生的不满情绪不再由零星的改革予以补偿。萨特早就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认识到，学生造反接受了一种“整体拒绝” (total refusal) 的伦理观。正如他与其共同签字人所倡导的那样：

我们此时向世界上所有学生运动所承诺的团结——这些运动突然颠覆了所谓的在法国如此完美体现的休闲社会——首先是对一切谎言的答复，通过这些谎言，所有机构和政治组织……和所有出版机关和其他媒体……目前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改变上述运动，通过嘲弄它们而将它们引上邪路。

不久以后，萨特开始利用卢森堡广播电台，试图左右学生们所赞成的公众舆论。他所发表的结论显示了萨特最典型的特征：敢于冒险、激情澎湃、多才多艺和旗帜鲜明。

这些青年人不想在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主题内去分享他们父辈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这一未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的怯懦、我们的厌倦、我们的惰性和奴性以及我们对封闭系统的完全屈从……不管政体如何，暴力是留给学生的唯一东西，这些学生还没有进入他们父辈们的系统，他们也不想进入其中……目前，我们松懈的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反政府力量是以学生为代表，但是我希望这种力量很快将传遍我们所有的青年人。

萨特的深刻见解立即被学生们复制，并以传单形式散发到整个拉丁区。

接下来，萨特开始占据《新观察家》的版面。自从他 1964 年东京演讲以来，他曾试图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萨特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被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张力撕碎了。一方面，知识分子声称从“普世”立场或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立场来发表意见。然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总是为特殊的社会利益服务。在这一点上，萨特吐露了他在自己的工作日益察觉到的张力，这一张力构成《词语》的自我批评主旨之一。萨特不断地努力定位他为了解放的目的与目标而进行的活动，但是他觉得阶级社会的制度性约束不停地阻挠他的努力。不管他怎么努力，事实证明是几乎不可能超越特权的污点。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萨特清楚地认识到列宁主义的“先锋”模式过时了。那么人们该如何根据这种认识来采取行动而不至于堕落为另一种过时的知识分子理想——文人理想或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者的理想？

在五月骚乱期间，萨特拜访了丹尼尔·科恩－邦迪，因为他有理由将公众关注的中心让给这位 3 月 22 日运动极具魅力的领导人。萨特的谦恭行为同时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行为预示了哲学的和个人的谦逊的新意义，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谦虚理解，就是知识分子是某类深谙进退时机的人。

萨特意识到，借由“五月起义”，革命主义的编年史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他持一种开放心态，并渴望向他的学生对话者学习。萨特敏锐地意识到戴高乐的总统独裁政治是多么地具有压抑性。出于这些原因，他越来越欣赏一种能够证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先兆与刺激因素的造反运动。在这一点上，萨特向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表露出他的优越性，而这些意识形态倡导者将“五月风暴”贬低为一场宏大的革命表演：一群被宠坏的“爸爸的儿子”进行的造反。

对科恩－邦迪进行的访谈有点儿滑稽可笑，有时像一场对牛弹琴式的对话。萨特反复想把学生造反比作一种拘谨的组织心态，这种心态不同于学生造反无拘无束的自发精神。因此，他一再劝说科恩－邦迪谈论学生们的长期“规划”与“目标”。而科恩－邦迪 (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厌恶的左翼共产主义传统有关的无政府主义者) 反而断然否认有任何“规划”和“目标”，这令萨特沮丧不已。萨特相信反动势力阻止了一场成功的革命夺权后只会被增强。就其自身来说，科恩－邦迪没有这种担心，对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厌恶使他怀疑那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是否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他意识到，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变革必定是演化的、渐进的。他已经感觉到“体制内长征”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引自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领导者鲁迪·杜切克] 的必要性。一旦一个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而且这仍然是 3 月 22 日运动一方与托派分子、毛主义者一方 (尽管这三方“小派别”显然都讨厌法国共产党) 之间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分裂路线，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科迪－邦迪相信，无论成功与否，学生造反在二战后法国政治体制生活中开启了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始，不再有回头路。在这些方面，科恩－邦迪表明自己比萨特更现实，在政治上比萨特更精明。

从这次访谈看，显然科恩－邦迪极为厌恶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所犯下的政治罪行清单：布尔什维克党人对 1921 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斯大林 1936—1937 年摆样子公审、华沙条约组织 1956 年入侵布达佩斯。假想的战略目标的极端观念令他讨厌不已。因此，学生造反的主要优势之一——强烈地厌恶僵化的、传统的组织结构——也是它的主要弱点之一。

随着“五月事件”达到极点，萨特发现自己陷入两种竞争性的、矛盾对立的政治激进主义观念之间。他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暗示了——正如法国共产党和毛主义者都反复强调的那样——无产阶级仍然是唯一真正的革命动力。从此，萨特如大多数正统的左派分子一样相信，为了即将发生的革命，法国工人阶级必须完成学生们已经开启的事业。因此，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尽管萨特对学生的关注持有值得赞扬的宽阔胸怀，但是他不能克服其残存的工运中心主义。

他越来越欣赏一种能够证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先兆与刺激因素的造反运动。

同样，在 1968 年 6 月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五月风暴”的新思想》 (“L'idée neuve de Mai 1968”) 一文中，萨特展示了一种对“何谓‘五月风暴’真正的利害关系”的敏锐意识。他认识到学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催化剂”。它同时预兆了一种全新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观念，后者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我斥责那些辱骂学生的人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学生吐露了一种内在的诉求：对主权的诉求。”凭着这种洞察力，萨特承认“五月风暴”的意义与夺取政权的布朗基派列宁主义的幻想无关，也与使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目标无关，它反而关系到“自律”与“自决”的自由主义理想。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既定利益和未经授权的社会权威对学生革命分子的意愿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他们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试图践行其原初的、激进的民主潜能与解放潜能。这是“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激增的多样性斗争的意义，这些斗争使车间和大学走向民主化。新的“日常生活政治”积极地使日常的存在变成人类成就感的储存库，而不是使日常的存在作为“闲暇时间”变成消费社会的具体化扩展。

“五月造反”结束后不久，科恩－邦迪致以萨特最高的赞颂，认为他的著作和学说对学生革命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当中没有人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许读过巴枯宁的著作，在当代思想家中，他们读过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和 (昂利·) 列斐伏尔的著作。但是 3 月 22 日运动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读过萨特的著作。”

学生革命分子对萨特致以敬意的一个突出证据是，在索邦大学 5 月 20 日声势浩大的集会上，萨特是唯一的、被允许在拥挤的会场发表演讲的知识分子“保守派”成员。

因此，尽管学生们心中有怒火中烧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冲动，但是他们渴望寻到萨特的认可。大约有 7000 名学生挤满了演讲厅和旁边的庭院，只是为了听萨特的演讲。

阿尔都塞、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的确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作为一名法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阿尔都塞通常与学生激进主义的政治保持一种安全而舒适的距离，因为一个令学生抗议者联盟团结起来的因素是他们无限地憎恶法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在自传性作品《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一书中，阿尔都塞给予“五月风暴”的叙述寥寥数语，只有 15 个词。作为回报的是，随着“五月事件”的发展，学生革命分子通过一个机敏的双关语向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与思想贫乏进行报复，嘲笑阿尔都塞的追随者是“毫无价值的阿尔都塞”（Althusser-à-riens）。福柯缺席“五月风暴”，当时他在突尼斯教书。他从同性恋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那里定期收到有关骚乱的最新消息。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注的是学生无政府状态将使结构主义事业倒退 20 年。他惊慌地逃离了法兰西学院，对学生的骚乱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长达 8 天之久。最令人沮丧的也许是拉康对学生们高人一等的姿态。“你们将找到一个新主人！”他在造反的高峰期众所周知地宣布道。由此以最典型的结构主义方式暗示了一切政治变革都是妄想，人们最多也只能成功地实现领导权的变革。

学生们对结构主义的厌恶是彻底的、根深蒂固的。对于他们来说，结构主义意味着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精英（新“主人思想家”）神秘深奥的话语。他们感觉到结构主义对“科学性”的诉求是一种他们竭力瓦解的管理心态的意识形态表达。毕竟，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布历史和事件本质上不再存在。学生们借由言语行动，凭其可以支配的各种方式努力去证明结构主义者是错误的。

学生革命分子反而向《恶心》《存在与虚无》和《词语》的作者致以救世主一样的敬意。“这位蔑视大学殊荣的哲学家，这位目前不流行的、15 个月前被埋葬的人道主义代表、作品曾被结构主义作坊磨成纸浆的哲学家，曾被阿尔都塞派的高压势力搞得非常沮丧，而现在萨特东山再起了。”正如埃尔韦·阿蒙（Herve Hamon）和帕特里克·罗特曼（Patrick Rotman）曾恰当地评论的那样，索邦大学的激进分子在 5 月 20 日找到他们的苏格拉底（Socrates）。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让步：“在法国……结构主义不再流行。自‘五月风暴’以来，一切客观性都被否定了。青年人的立场更符合萨特的立场。”

在《一切事毕》中，波伏娃描述了学生占领索邦大学时期的混乱场景，兹述如下：

在我刻苦学习的青年时期，甚至在 1968 年初，我都不可能想象这样一种集会。红旗飘扬在小教堂和伟人雕像之上，墙上挂满了几周前南泰尔校园创造的绝妙口号。每天都有新的献词出现在走廊里，出现在新宣传册、海报和图画上。簇拥的人群激情澎湃地在楼梯上或站在院子里进行辩论……青年人、中学生拥挤在阶梯教室的长椅上；任何想发言的人都可以陈述他的情况，解释他的想法，要不就提出任务或口令，同时听众会给予回复、支持或批评。新闻处设在演讲厅和幼儿园的阁楼里。许多学生在那里用睡袋过夜。支持者带来了果汁、三明治和热饭。

在“五月事件”的骚乱中，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向萨特接二连三地询问下列有关哲学、政治和人生等方面的迫切问题：

问题：您说“地狱就是他人”时，您想表达什么意思？

萨特：假如我们现在讨论那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吗？

萨特：直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通常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问题：您可能是一个好艺术家，不过您是一个讨厌的政客。

萨特：我不是作为政客到这里来的，我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到这里来的。

在萨特向学生听众演讲的过程中，他对“五月事件”提出了下列政治上敏锐的诊断：

科恩－邦迪已经确保这场运动仍然沿着适合于它的论战道路前进。显然当前的（工厂中的）罢工运动起源于学生造反。法国总工会的立场是一种延迟加入的立场〔尾

巴主义（suivism）〕，它发现有必要与罢工运动保持一致，以便镇压这场运动。它想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你们创造的、颠覆一切机构的基层民主。因为法国总工会本身就是一个机构。相反，此时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新构想、一个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的联盟，因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萨特承认工人与学生团结一致是“五月运动”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他意识到，对于其全部的优点而言，青年时期是人生的过渡阶段，它可以充当一种推进政治变革的催化剂。然而，假如任由自行决定，它的范围与抱负是有限的。大学改革只有作为更广阔基础的社会改造的一部分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萨特提醒学生们小心别有用心的、共产党主导的法国总工会。一般来说，共产党人害怕无政府状态，并且他们出于自己的官僚主义目的努力接受了这场造反。事后看来，萨特的猜疑完全得到了证实。6 月，共产党和戴高乐达成一项要求“五月事件”戛然而止的临时协定。

直到 5 月，萨特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模式，后者强调职业革命先锋队的首要角色。他曾在《情境》中评论道：“列宁的 40 卷著作体现了一种对大众的压迫：我们认为，因为大众如今没有时间也没有方法去处理这种知识，它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知识。”这种理论的经典性表达就是列宁 1902 年发表的《怎么办？》。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曾是在适合于沙皇警察国家的政治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因此布尔什维克强调一支训练有素的精英队伍的秘密行动。这种模式对其他欧洲国家的适用性是不确定的，尤其在民主社会主义自 19 世纪以来就享有一系列卓越成果的地方，但这一点又难以成功地加以论证。当布尔什维克党人 1917 年 10 月夺取权力时，尽管在一个政治发展被沙皇严重阻碍的国家中（农奴身份迟迟到 1861 年才在俄国被废除），但是列宁主义模式在 1914 年溃败后混乱的国际左派中间获得一种巨大的声望。

此时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新构想、一个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的联盟，因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萨特加入“毛派”

后五月时期萨特卷入左倾主义的传奇故事以他参与“无产阶级左翼”的行动为中心，“无产阶级左翼”是后五月时期各种小派别中间最激进的一个小派别。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左翼”的先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从根本上不满于法国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法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是极度斯大林主义的，而在于它充满了“修正主义的”倾向，因此是“不充分斯大林主义的”。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看来，1966 年法国共产党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法国共产党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青年马克思、格奥尔格·卢卡奇和罗杰·加洛蒂）的训诫，这些训诫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毛主义者来说，他们诽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滑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毛主义高师生们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教条主义被作为一种预防资产阶级政治道德和政治习惯旧病复发危险的措施。阿尔都塞学说以及在法国日益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的优势就是这两种思想潮流为了忠于列宁主义正统观念而坚决抵制修正主义的诱惑。阿尔都塞默默地反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建立，由此展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主人 / 导师与他的学生们之间的分裂。在他看来，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唯一可靠的革命机关，脱离了它，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

当“五月风暴”学生抗议爆发时，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激进分子仍旧漠然处之。就学生造反缺乏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而言，它的确不值得重视，它只是一个“被期望但未实现的事件”（nonevent）而已。他们死板的意识形态眼罩已使他们不能去理解这种被释放的激进抗议的新形态。他们反而仍固守革命先锋主义的信条。总之，当“二战”后最重要的革命巨变爆发时，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积极分子就开小差了，是一帮“爽约者”（no-shows）。

那年夏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以其典型的毛主义方式着手组织了持续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会，努力搞清楚他们政治上的错误判断。由于法国政府于 6 月取缔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所以毛主义者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改组为“无产阶级

左翼”。他们大幅双面报纸《人民事业报》的报头一侧饰以毛泽东的头像，下侧是锤子和镰刀的图案——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纯正性的象征。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有时被“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抵消了。

1970 年春，这一团体做了一项惊人之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劫掠了“右岸”时尚美食精品店馥颂（Fauchon）。当天下午 1 点 30 分，20 名“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带着大塑料袋破门而入，“解放了”大量的精美食品：鱼子酱、鹅肝酱、香槟酒、奶酪等。期间，50 名高中生支持者守候在外边，保证“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畅通无阻地撤向当地地铁站。然后积极分子转入罗宾汉模式，在贫穷的非洲人居住的伊夫里（Ivry）分发他们的战利品。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当地人在伊夫里可以直接比较俄国鱼子酱与伊朗鱼子酱的相关优点。“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事先提醒了新闻记者注意即将发生的机密行动，由此吸引大量媒体来关注他们的事业。在标新立异的新闻报道中，他们被封为英雄，甚至连主流媒体都禁不住称许毛主义者的无私精神，他们的行动有助于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奢侈与贫困之间令人震惊的差距。

在劫掠的过程中，一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弗雷德里克·德朗热（Frédérique Delange）被持刀的馥颂员工们抓住了。随着她被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一场争取将她释放的抗议运动随后发生了。公众人物与娱乐界名人因她的逮捕而开始鼓动抗议行动。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发表声明支持她，但没有什么效果，法国法院下达了一份严厉的判决书，判决弗雷德里克·德朗热 13 个月监禁。

尽管如此，由于馥颂劫掠行动，兼因政府过度紧张的回应，仅由几十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左翼”突然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法国舆论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转而支持毛主义者。按传统的逆转方式看，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被视为压迫者，“无产阶级左翼”罗宾汉式的革命分子被视为被压迫者。像弗雷德里克·德朗热这样的“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毕竟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们。从这一点来看，“五月事件”所释放的无政府恐惧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的法国对这一点极为愤慨：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及其同僚们故意监禁了他们的“孩子”，随后在匆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事件欢欣鼓舞。记者弗朗索瓦·吉鲁（Françoise Giroud）在《快报》（*L'Express*）上说：“谁正将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无纪律的孩子们（他们梦想着一个公正的世界，对他们在课堂上或教义问答书中被教导的行为来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做得很过分）吗？抑或是那些给社会秩序以这种可怕的面目的人（以便他们最终鼓动只是孩子的人来反对这种社会秩序）吗？”

随后更多的人被逮捕了。1970 年 3 月，马塞兰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控告了“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在没有警告的条件下，所有的《人民事业报》都被警察肆意没收了。3 月 22 日，《人民事业报》编辑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在警察的袭击行动中被逮捕，并被送到桑迪监狱（La Santé Prison）。“无产阶级左翼”再次制造了头条新闻，并赢得一大批支持者。当时弗朗索瓦·密特朗公开谴责这一系列合法而可疑的逮捕和查封：“如若当局没有预先判断发表在《人民事业报》上文章的内容，那么我既不赞成使用对作者不利的司法程序，也不赞成对勒·当泰克和（米歇尔·）勒·比利采取预防性逮捕行动，更不赞成对他们使用习惯法的概念。”

马塞兰和总理蓬皮杜表现得很愚蠢，使一触即发的局势继续恶化。4 月 30 日，政府提出了一项泛泛的、考虑不周的“反暴乱”法，国民会议审议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将其成员参与公共骚乱的组织判定为犯罪，由此牵连没有参与的人遭受控告。当天，继任勒·当泰克的《人民事业报》编辑米歇尔·勒·比利也被逮捕了。尽管“无产阶级左翼”没有犯可以确认的罪行，但是它已经成为政府大规模而全面镇压的目标。对“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进行仓促的监禁判决只是装腔作势而已：勒·当泰克被处以一年监禁；勒·比利遭受八个月监禁。最终，在一场相当于公开宣战的事件中，马塞兰于 5 月 27 日宣布“无产阶级左翼”彻底被取缔，但是他动用国家权力来强有力地镇压一小撮学生激进分子的企图竟然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立即决定找萨特商量对策，看他是否愿意当《人民事业报》的名誉主编。毕竟萨特长期以来支持被迫害者、被践踏者。自从“五月造反”以来，他始终支持学生事业。他们最好采取任命萨特做主编的策略，这样他们才会有可能戳穿政府的幌子。未事先通知就逮捕一些 20 岁左右的高师生是一个普通事件，而逮捕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另当别论了。

这种可怕的面目的人吗？

萨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挑衅马塞兰逮捕他。他立即通过卢森堡广播电台发布了他的消息。他指出，作为《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管，他要与其前任勒·当泰克、勒·比利一样肩负起许多责任。他的意图就是想使内政部长及其同谋们表现为伪君子、懦夫，由此使政府的名声一败涂地。说到逮捕学生的时候，他们大胆妄为，一旦触及文学名人萨特的时候却失去了斗志。

对自己该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无产阶级左翼”的意识形态计划，萨特是持矛盾态度的。他最初发布一条新闻，声称通过担任主编职位，“我肯定与（‘无产阶级左翼’）所有的行动休戚与共……这些行动将表现当前真实存在于大众中间的暴力，以便加强它的革命品质。”不过，几天后这位哲学家决定不再做出明确的表态。他不是给毛主义者的“行动”提供全盘支持，而是更加谨慎地确认他与他们发表的政治文章休戚相关。

在“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被逮捕后，萨特立即冒着更大的风险在“互助会议厅”召开了一次声援他们的会议。他与波伏娃、米歇尔·莱利（Michel Leiris）组成了《人民事业报》支持者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La Cause du Peuple）。更为不利的是，一个模糊的“无产阶级左翼”“军事派”开始出现了：自封的“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s Résistance populaire）。这个名字对毛主义者的信念产生了一定影响，即法国社会处于“占领”政府控制之下；毛主义者相信他们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抵抗”运动。接着，萨特和波伏娃在勒·当泰克 6 月被定罪宣判后谋划了一次极具宣传效果的行动：他们极为高调地在巴黎大街上公开发被禁的报纸。马塞兰迟疑不决，未敢贸然采取行动。这一年秋季，另一组“无产阶级左翼”坚定分子阿兰·热斯马尔被逮捕后，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毛主义报纸《一切！》的名誉主编，这份报纸在“五月风暴”中的口号是：“我们想要的是一切！”此时，萨特的公众关注度开始与他 10 年前阿尔及利亚战争抗议期间的形象相媲美。

毛主义者公众名声的转折点发生在 1970 年秋，刚好发生在阿兰·热斯马尔的审讯与判决之前。9 月 24 日，滚石乐队定于在凡尔赛门（Porte de Versailles）附近的大型露天体育馆巴黎体育馆举行演出。当天下午，一个共同的朋友促成了米克·贾格尔与“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塞尔日·朱利（日后成为法国日报《解放报》出版商）在滚石乐队下榻的、位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外侧的巴黎克里昂大酒店（Hotel Crillon）的会晤。当天晚上，当演唱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滚石乐队突然中断了他们的演出，并邀请朱利直接向观众演讲。他跨步走到麦克风前，代表全法国的政治犯发表了一场令人感动的抗辩演讲，这些政治犯当中既有毛主义者，同样也有非毛主义者，他们遭受了马塞兰施加的不公正监禁。朱利赢得了观众持久的热烈掌声。当天晚上演唱会结束时，“无产阶级左翼”增加了另一个改变他们的事业的称呼：滚石乐队的领唱。

常去听音乐会的青年人进而把这件事变成左倾主义的庆祝会。随着米克·贾格尔引吭高歌这个团体独具特点的圣歌《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世界报》将其描绘为“黑弥撒”（Black Mass），100 名激进分子设法冲破警察的警戒线，高喊着“青年人的音乐属于青年人！”“自由的演唱会！”等口号。根据法国有关可查的报纸的说法，娱乐业找到了其理所当然的左派分子。

尽管萨特及其朋友们对“资产阶级司法”的压抑性本质持完全怀疑态度，但是左派分子受益于一次著名的司法成功：在勒·当泰克的审判中，法官断然拒绝立即查封《人民事业报》。此后，内政部长继续笨手笨脚地竭力没收那些已经印刷和发行的报纸。

因此，萨特的传奇生涯掀开了一名介入知识分子的崭新篇章，他的传记作者贴切地总结了这些发展：“整整两年来，萨特分享了他的毛主义新同志的激进生活，完全过着一种新的、使他的政治活动激进化的生活，写文章、示威游行、提供证据、占领工厂。”不可否认，毛主义者利用萨特作为“庇护伞”，使镇压暴力陷入绝境。就其自身来说，哲学家萨特从他们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热情中复活了他暮年时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积极分子的光辉形象。

随着萨特的卷入，“无产阶级左翼”的公众关注度急剧飙升。正如一位评论者所察觉到的那样，随着萨特执掌《人民事业报》，“毛主义者没有一天不是报纸、广播……甚至电视的焦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整个巴黎知识界都陶醉并沉迷于毛主义之中。在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毛主义变成了激进的时尚——风靡一时的政治时尚。

谁正将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无纪律的孩子们吗？抑或是那些给社会秩序以

1967 年，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后，萨特和波伏娃开始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旅行，直接调查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转变。他们失望地离开中国。波伏娃解释说：“防止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权力，使每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人，我只能支持这些表达形式所描述的计划。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给予中国像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

萨特远非是投机取巧，他介入“无产阶级左翼”是受革命信念所激发。起初，他显然不同意毛主义者为纯粹的公民自由主义基础所进行的辩护。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从没接受毛主义的整个世界观。萨特觉得“无产阶级左翼”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令人十分反感——恰恰令人想起了他以前觉得难以忍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方面。在毛主义者向他谎称发生在圣心大教堂（Sacré Coeur Basilica）的抗议活动失败，由此把这位年老的哲学家置于危险之中后，他突然辞职了，不久后又返回到毛主义者的包围之中。他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批评《人民事业报》歪曲性的报道，甚至声称资产阶级媒体尽管谎言连篇，但是比“无产阶级左翼”的日报包含了更多的“真实”。

那么是什么吸引萨特注意毛主义者身上的左倾主义？归根到底还是萨特钦佩毛主义者的革命狂热。在一个欧洲工人阶级依然满足、懒散的时代中，“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能够把握好一股可能消失的造反冲劲。当然这股造反冲劲在法国共产党人中间肯定找不到了，他们的官僚主义僵化作风与议会守旧态度的结合已经在学生与知识分子等以前的同盟者中间产生普遍的失望情绪。

在萨特的后期政治著作中，他对“序列性”（seriality）的分析强调需要一种外部的催化剂来激励梦游般的、原子化的大众。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通过等车者离散积聚的例子来描绘“序列化的”或者具有惰性倾向的群体的困境：

譬如说圣日耳曼广场上，人们聚集在教堂前的车站上等候公共汽车……这些人——他们的年龄、性别、阶级和社会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在日常的平凡中实现孤独……是大城市的居民的特点……事实上，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涉及的是孤独的多元性：这些人彼此间漠不关心，互不说话。一般说来人不互相观察……孤独的强度作为一个暂时的和偶然的集合中成员之间的外在性关系，表达了社会整体的大众化程度。

对于萨特来说，“序列性”变成了法国当代社会反对力量和反对分子中间缺乏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隐喻。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贫瘠的政治风景中间，萨特反而认为“无产阶级左翼”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论战的宝库。

孤独的强度作为一个暂时的和偶然的集合中成员之间的外在性关系，表达了社会整体的大众化程度。

“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将他们自己理解为民粹主义者，而非先锋队队员——这是萨特所欣赏的另一个品质，由此他们试图融合卢梭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像值得敬佩的让－雅克（·卢梭）一样，毛主义者相信人民本质上是“好的”。因此，《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策略是“工人自治主义的”（autogestionniste）：除了偶尔来自“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的意识形态社论文章外，大多数文章是由工人自己写的，并且是为了他们自己写的。正是按照这种精神，萨特才在 1972 年的一篇访谈中公开声明，他被毛主义者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他们的“直接民主”的设想有关。萨特逐渐明白了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领导者背叛人民大众的历史。他相信，通过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克服这样一种使命的自我矛盾——这种使命使知识（观念上是“普世的”）服务于统治精英的目的。

在一些场合中，萨特不再相当详细地阐明他介入毛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原则。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不能通过增量变化被实现[这一立场是他在 1973 年的文章《选举：傻瓜的陷阱》（“Elections: A Trap for Fools”）所着重重申的]，而他将这种增量变化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萨特钦佩毛主义者们的坚贞不屈地现身于革命斗争。“治安武装力量”毫不犹豫地动用镇压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正如蓬皮杜政府相当粗暴地关闭《人民事业报》的诸多努力所充分表明的那样。萨特借阿兰·热斯马尔 1970 年被逮捕与被审判的时机发表评论：“《人民事业报》的任务是想指出，暴力以所谓

的经济规则的名义强加于人民，（工人们）在工厂里承受着难以捉摸的却浑然一体的暴力……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形式。没有合法的手段或改革的余地来对抗这种暴力。只有一种方法：大众暴力。在萨特的眼中，革命暴力是一个正当防卫（défense légitime）的案例。

但是，像 20 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萨特满怀激情地献身于社会正义，这使他低估了革命主义的弊病。殖民主义的各种不公以及萨特对苏联模式的灰心失望决定了他会异常地支持第三世界主义——古巴、刚果、越南等国家。在他眼中，“全世界受苦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法农）表现为马列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在萨特看来，苏联已经公开背叛了这一革命传统。“无产阶级左翼”“过激的”亲华定位由此与萨特 20 世纪 60 年代特有的激进政治倾向相吻合。值得赞扬的是，“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通过他们的教唆与象征性行动总是努力使五月精神保持活力。

在萨特看来，毛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其鲜明的“道德”品质。正如他在 1972 年出版的一本毛主义文集的序言中所声称的那样，“对于毛主义者来说……凡是革命暴力在大众中间产生的地方，它直接是极度‘道德的’。这是因为工人们直到那时始终是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的对象，他们变成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哪怕是片刻也好。”相似的是，“五月风暴”期间，萨特辩解学生的战斗精神是“以暴制暴”（counterviolence）的样本，“不仅仅是偶然的以暴制暴来反抗惹怒他们的警察，而且反对压迫他们的整个社会”。由此，萨特重新开始了一种相当可疑的（必须承认道德上是难以理解的）立场，他起初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各种文本中阐述这一立场，以支持第三世界主义。萨特论辩道，鉴于资产阶级暴力是压制性的，被压迫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暴力构成一种自我肯定的有利行动。当萨特利用他曾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理论框架时，他认为下层阶级的暴力给“序列性”或无产阶级的原子化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平衡力。正是在这样一些宏伟壮丽的革命高潮的时刻，工人阶级才达到了近乎“阶级意识”的友爱水平。这样，萨特论辩道，无产阶级不再是压迫的对象，而且第一次成为它自己的历史的主体。

罗伯斯庇尔的幽灵

萨特的暴力与道德的等式——他相信暴力是再生性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人性再生的先决条件——突出了一些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更普遍的法国革命传统有关的基本问题。此前，萨特尝试着去连接暴力和道德，这种最不含糊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努力就是他为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所撰写的煽动性序言。

萨特在阿尔及利亚冲突的高峰期撰写了这篇序言，当时法农自己处于创作的高峰期，却悲惨地死于白血病。萨特运用其全部的、惊人的修辞天赋来辩解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暴力是一项反殖民主义的自我肯定的关键性行动。在那些令人联想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提出的“主奴辩证法”的术语中，萨特提议，对于被殖民者来说，通向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就寄托在一场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血腥起义上。在充当了殖民地暴力的对象或目标之后，当地人在萨特看来别无选择，除了以类似的方式报复压迫者。萨特主张，只有通过消灭殖民者的方式，被殖民者才能实现两个有价值的目的：使自己从单调乏味的压迫心理中解放出来（这种心理仅仅有益于被动地接受殖民环境或者“合作”），并促使他通往一种完整的人的状态。对萨特来说，被压迫者身上表现出来的暴力就其例证了“以暴制暴”而言是合理的：其目标是摆脱压迫或控制的暴力。既然暴力自有历史以来就有了，那么对被压迫者来说，坚决抛弃这种手段将是伪善的，萨特辩论道，尽管这些手段是令人讨厌的。他断言这事实上是他们唯一的、可供他们支配的手段。

出于这些原因，在萨特看来（事后看来似乎是一样成问题的），暴力和再生是密不可分。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赞颂了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cleansing force）。法农主张，暴力将当地人从“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将他从只会导致“绝望与懒散”的麻痹心态中解放出来。为了回应法农，萨特在其有争议的序言中宣称：“击败欧洲人是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消灭压迫者，同时消灭他压迫的人：只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

几乎在同一时期，萨特赞颂古巴革命是一个“经由暴力获得幸福”的范例。按照波伏娃的说法，萨特在 1960 年古巴旅行期间意识到法农主张的真实性——“只有在暴力中，被压迫者才能意识到他们的作为人的状态”。萨特所赞同的“以暴制暴”可能变

形为一种新的暴政形式或压迫形式，这是这位哲学家莫名其妙地拒绝深思的前景。

不可思议的是，萨特对法农论点的赞同完全剥离了阿尔及利亚造反的政治特殊性。他对暴力的迷恋排除了这样一种前景——也许对冲突的协商解决可能更有助于促成一个和平的、民主的阿尔及利亚未来。而萨特似乎以一种与早期哲学的存在主义伦理观相一致的方式做出了先天的道德决定和承诺。他的主张具有康德“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的性质。好像他正努力使一种全新的绝对律令合法化，这种绝对律令适应了一个反殖民主义集体斗争的时代——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论述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持枪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with revolver in hand）。在萨特看来，协商与妥协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令人不悦的返祖现象。萨特喜欢遵循第三世界革命主义令人兴奋的逻辑，并将其贯彻到底。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种下了政治激进主义的种子，他将阶级社会与社会不公的问题归因于匮乏现象。不过，除了这种历史思考外，萨特认为还出现了群体动力学所特有的不利条件，也就是退化为“序列性”的群体的本体论倾向，它往往浪费革命冲劲，凝结为具体的、惰性的某种东西——一个物。

“以暴制暴”可能变形为一种新的暴政形式或压迫形式，这是这位哲学家莫名其妙地拒绝深思的前景

萨特仍如此执着于革命主义的逻辑，这显然是来自历史事例的研究，他曾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运用这些事例去说明有关群体的惰性消耗或序列性的主张。他从现代革命时代的开端——攻占巴士底狱（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开始着手分析。在萨特看来，这种向共同敌人发起的暴力革命起义统一了此前离散的群体，反而将其变成了一个“融合群体”（fused group/group-in-fusion）。对于萨特来说，攻占巴士底狱例证了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在《希望》（*Man's Hope*）一书中描绘为世纪末日的景象：“序列解体为融合群体”。萨特引用一个来自《国王的朋友》（*L'Ami du Roi*）的目击者的描述进行了解释：“将近傍晚的时候，巴黎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不时射出的炮弹提醒居民保持警惕。炮弹的爆炸声和不断发出警报的钟声汇成一片。聚集居民的 60 所教堂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在里面演讲。”

萨特对融合群体的溢美之词与其持续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与序列化群体相比，融合群体是介入的、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勇敢的。不过，问题在于融合群体在萨特的社会本体论中如若没有可能的话就极难保持它超越这一造反热情之初始时刻的革命激情。在存在主义意义上和在现象学意义上，群体命中注定要再度陷入序列性——不严谨的分裂群体的原子论。

为了保持革命计划，群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被重新激发活力。在这一点上，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差一点就危险地信奉恐怖是一种解决匮乏问题和序列化群体问题的意识形态平衡力。萨特在紧要关头将恐怖坚定地定义为“打破必然性的共同自由”。在这一点上，“必然性”承担了匮乏和“实践—惰性”的替身角色——这种“实践—惰性”是不可更改的自在或物的熵拉力。在萨特看来，恐怖意味着“反对实践—惰性的正义暴力”。“整体化的这种新地位是恐怖”，萨特断言说，“而恐怖是司法权：每个人都以众人为中介而对其他每个人表示同意，让每个自由的永久基础成为对必然性暴力的否定，也就是说，让在每个人中作为共同结构的自由成为对异化的个人自由的永久暴力。”当人们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赞成雷蒙·阿隆的判断，即萨特冒着将人类解放的哲学同暴力哲学合并的危险。

为了抵消群体消耗的诱惑和危险，萨特赞颂了革命“誓言”的好处。誓言迫使个体成员受制于群体及其目标——如若违者则以死论处。正如萨特所解释的那样，誓言是“在群体中建立一种对成员们施行绝对暴力统治的（为了每一个人而被众人接受的）一系列真实手段……发誓就是作为共同的个体来说话：如果我搞分裂，你就将我杀死。”在这一点上，萨特对法国抵抗运动姗姗来迟的效仿（他自己为了抵抗运动而开展的活动是不热心的、平凡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几乎能够想象这位哲学家钦佩地凝视着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那幅歌颂共和国美德的著名画作《贺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的场景，该画作就在卢浮宫，很便于萨特欣赏。似乎对于萨特而言，几乎任何有助于对抗匮乏、战胜压迫之目标的行为似乎可以说是“道德的”，因此其令人不安的结论是“恐怖”（Terror）产生了“博爱”。博爱，萨特写道，是“暴力……通过肯定的相互性表现为内在性联系”。

政治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开始之际，众所周知，罗伯斯庇尔命令道，在革命条件下，“恐怖”是“美德”的表现。罗伯斯庇尔相信，融合这两者的能力是革命政府的本质。“恐怖，”罗伯斯庇尔宣布道，“就是正义、迅捷、严肃而坚定不移；因此它是美德显现出的气质。”雅各宾派领导人的副手路易·安东尼－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公开颂扬了“美德”与“犯罪”之间的类似联系。正是这种被保持的联系，革命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这正是革命注定造成的历史场面。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在后代的脑海里留下持久而鲜明的影响。

萨特极其认同这种雅各宾派谱系，并竭力改造其后期的政治哲学来适应这一谱系。在许多方面，他只是将早期哲学夸大的唯意志论——《存在与虚无》中对自为或“意识”的赞美——转变为《辩证理性批判》中革命阶级或群体的集体立场。在 1973 年的一篇访谈中，正值他支持“无产阶级左翼”活动的高峰期，他对雅各宾派血腥的政治遗产提出了毫无畏惧的赞同之词，兹述如下：

在一个革命的国度里，当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权力时，那些煽动造反或密谋的人应该被处以死刑。并不是我对他们有丝毫愤怒。反动派自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但是革命政权必须清除某些威胁到它存在的个体；我杀除了处死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人们总是逃避监狱。1793 年的革命分子可能杀得不够多，由此无意间有利于恢复秩序，然后回到王政复辟时代。

假如萨特后期的哲学激进主义因序列化群体的问题搁置了，那么这一失败的认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存在与虚无》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实质上，萨特的哲学框架不能使团结或人类主体间性概念化。在萨特看来，他人（the Other）取代的是一种博爱精神，直接在人的自由之上设定了界限。在萨特的眼中，主体间性取代的是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在内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因此，萨特玩世不恭地按照科耶夫的方式（或按照科耶夫的黑格尔的方式）将主体间性视为一场永不松懈的殊死斗争。类似的是，对于萨特来说，他人是一种具有敌对倾向的意识（对我的存在的潜在的否定），这种意识使“我”遭遇“生成非人的永久可能性”。援引常常被提到的《禁闭》（*No Exit*）的结论就是：“他人就是地狱。”此处的问题是萨特的社会本体论缺乏人类互联性的积极意义或设想。所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关于人类群体的观点因序列性问题或群体内爆而失败，也就无足为奇了。他对主体间性所做出的好斗性理解实际上没给他留下什么选择的余地。

“枪杆子里出政权”

萨特赞赏的是，那些崇拜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主义者通过他们的行动试图使革命主义激情保持活力。他说：“因他们的反专制实践，（毛主义）激进分子似乎成为能够适应‘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时期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唯一群体。”萨特也沉思自问说，从自传的立场看，毛主义者的态度令他想起了他早期哲学的伦理唯意志论。他懊悔他在亲莫斯科的同路人阶段为了“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而危及了他青年时期信奉的道德准则。（这个时期大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持续到 1968 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在《斯大林的幽灵》（*The Ghost of Stalin*）中，萨特对 1956 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提出了有所保留的批评，这一事件为未来的政治联盟留下了空间。）通过与“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同甘共苦，他觉得他重新体验了其前共产主义时期“自由哲学”的特征。

毛主义者似乎给萨特提供了他多年来始终斗争期间的困境的一种解决方法：知识分子在一个政治转型的时代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他的眼中，列宁主义者的先锋队的政治模式完全不可信。20 世纪的历史充斥着领导阶层背叛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抱负的事例：最新的是法国共产党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这一协议令“五月事件”戛然而止，接下来是这年晚些时候苏联残暴镇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

萨特玩世不恭地按照科耶夫的方式（或按照科耶夫的黑格尔的方式）将主体间性视为一场永不松懈的殊死斗争。

“无产阶级左翼”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红卫兵“自发地”站出来清洗已经对大众需要反应迟钝的中共保守派领导层。在萨特看来，知识分子比人民大

众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主张常常是不可信的。在萨特与“无产阶级左翼”联盟的过程中，他逐渐相信“真理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这不再是一个给大众提供思想的问题，而是一个遵循他们的运动、找到他们的源头，并更清楚地表达他们的问题（假如他们赞同这一点的话）。例如，在《解放报》（萨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的独立日报）上，我能够阐述一种既是群体的又是我的思想。但是我并不幻想去写一本从头到尾将决定一切的书。”

萨特在 1970 年的一篇访谈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念，他在这篇访谈中解释说“五月事件”改变了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判断。他得出的政治结论之一是“五月造反”使知识分子（从伏尔泰到左拉，到朱利安·邦达）作为普世价值的守护者的传统观念过时了。“五月起义”显示了学生和工人完全有能力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此外，知识分子领袖在“五月风暴”期间不是作为先锋而是作为后卫来发挥作用。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

五月风暴发生时……我了解到青年人正质疑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等，而且也是我们这些假装反对一切的人。大家可以说我从 1940 年到 1968 年是个左翼知识分子 [a left-wing intellectual (un intellectuel de gauche)]，从 1968 年开始，我变成了左派知识分子 [a leftist intellectual (un intellectuel gauchiste)]。差异就在于行动。左派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使他免除虚无。他放弃了特权，或者尝试将其付诸行动。

在《知识分子请愿书》（“*A Plea for Intellectuals*”，1966 年）——所谓的“东京演讲”——中，萨特强调了知识分子使命的矛盾本质。一方面，知识分子以虔诚的德雷福斯护卫者的方式试图与美德、正义和真理的普世价值结盟。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阶级社会的畸变又系统地阻止知识分子去实现这些价值。

大约在 1970 年，萨特因参与毛主义活动而促使他再次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总结说左翼知识分子从没解决他们的普世抱负与职业排他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排他主义迫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在后五月的岁月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黑格尔“苦恼意识”的典型体现。否则说“自欺”——另一个典型的萨特术语——是他们的基本命运。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从没克服或解决那充满其存在之本质的本体论矛盾。因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不可能的”——正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宣布“人”是“不可能的”、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在那一点上，萨特将“人的真实性” (human reality) 粗略地定义为“这个存在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他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华丽辞藻进行了总结，说“沉迷于孤独或驾驭人民到头来都是一样”。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对他来说是一种逃避他早期存在主义立场具有倾向性的犬儒主义的方式。在萨特看来，只要知识分子的普遍自负与阶级负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意味着他们持续地留在“自欺”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不可能的”。

萨特很有可能是资产阶级自我憎恨的急性发作。据他自己承认，他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中。在其政治激进主义的巅峰时期，他意识到他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这样一种情感在他的亲华时期重新浮现出来，因为萨特概要地总结说知识分子作为普遍真理承载者的传统使命已经过时了。在萨特看来，成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相对的左派知识分子——意味着告别传统知识分子及其不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萨特亲华情愫的高峰期，萨特出版了最“超然的” (disengaged)、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家庭白痴》（*The Family Idiot*）：一项关于福楼拜的、卷帙浩繁的三卷本传记式研究。在研究福楼拜的过程中，萨特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认识一个人？他运用了以前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曾使用过的“向前的 – 回溯的” (progressive–regressive) 方法，以便评价福楼拜性格的社会决定因素与心理决定因素。萨特解释说：“我想要我的读者能够感觉、理解和懂得福楼拜的性格既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完整个体，又是他所处时代的完整代表。”名义上，萨特主张，在福楼拜文学秉性的审美观念与他自己的“介入”观念截然相反的范围内，他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研究主题。然而，法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花了近 20 年时间（萨特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构思福楼拜的研究）全身心地去研究法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显而易见的是，对自我认同的深刻评价在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研究主题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萨特努力破译福楼拜发展轨迹的关键要素的过程中，他同时努力地去洞察自己的人生历程。

“造反有理”

作为一种政治时尚，毛主义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身。为了充分利用对左倾主义的普遍陶醉，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 (Gallimard) 委托萨特编辑一套新系列丛书“野蛮的法国” (La Francesauvage)，该出版社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始终是萨特著作的出版商。萨特欣然接受了这一委托。这套系列丛书以《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为开端，《造反有理》是一本萨特、皮埃尔·维克多与《解放报》记者菲利普·卡维 (Philippe Gavi) 之间的政治谈话录。萨特先总结了自己的政治历程：从他 20 世纪 30 年代故意的“去政治思想” (apoliticism)，到德国占领时期转瞬即逝的抵抗行动，再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共产党同路人的身份，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他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渐失望。萨特承认他总觉得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僵化令人厌恶。这与他自己的自由哲学很不适应。他们的“风格”死气沉沉、冷酷无情，散发着压抑的臭气，这足以说明了一切。然而，正如萨特事后所说的那样（由此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幼稚性），只要他将法国共产党视为法国工人阶级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就总是认为他的同路人身份是合理的。这个假定后来证明是多么不正确。

与共产党人共命运提供了某些政治优势。世界恰好被划分为善良的势力与和邪恶的势力：一方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另一方是资产阶级。不过，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因为左倾主义抓住了法国的政治想象，左派命中注定的想法似乎一落千丈。造反的狄奥尼索斯方面——作为政治斗争和狂欢节日的革命——暗示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被彻底改变了。它不再等同于“使生产方式社会化”——一种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只会屈从于新型压迫形式的秘方。造反的要旨和征兆随着一系列新的激进“文化”诉求的出现而彻底改变了。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积极分子、囚犯和移民都试图找到宣传的焦点，以便促使他们的诉求获得认可。1970 年，“无产阶级左翼”的一个支部分离出来，组建了“革命万岁！”，放弃了毛主义者的工运中心主义的方向，去全身心地追逐力比多政治的需求。

只要他将法国共产党视为法国工人阶级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就总是认为他的同路人身份是合理的。这个假定后来证明是多么不正确。

尽管萨特年事已高，但是他拒绝回避这些新的造反形式。他是《解放报》报社（一个非正统的新闻社）背后的领导灵魂。这个名字暗指了左派分子的信念—德国占领期间（1940—1944 年）与戴高乐貌似温和的 11 年总统独裁政治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政治相似性。这个报社的创始者们试图让这份日报仿效抵抗运动于 1941 年创办的、名字相同的报纸。创办初期，《解放报》（为狂热爱好者所熟知）极不正规。一个评论者这样描述它：“报纸的专栏和标题印得乱七八糟，教皇来法国时充满了奉承之词，版权声明漏掉了照片，伪造选举结果（毛：0.3%），允许报纸因声名狼藉的‘排字工人的记录’ (Notes from the Compositor) 而出现移行，以致重排版面。”左派分子对抵抗运动明显的（当然有点困惑的）认同几乎伴随着他们所有的活动。因此“无产阶级左翼”所谓的“军事派”在奥利维耶·罗兰 (Olivier Rolin) 的领导下取名为“新人民抵抗运动” (the Nouvelle resistance populaire)。萨特与其同道的左派分子觉得人们不能信任主流媒体会去报道后五月时代出现的大量社会新斗争的“真相”。他们认为这类信息有必要传递给大众。为了启动财务方案，萨特将伽里玛出版社预付给《造反有理》的全部稿酬（大约 3 万法郎）慷慨捐出。在“无产阶级左翼”前激进分子塞尔日·朱利的领导下，《解放报》逐渐发展成为法国重要的、发行量极大的左翼日报。

从毛到摩西

萨特参与“无产阶级左翼”最奇异的陪衬情节之一就涉及他与皮埃尔·维克多的关系。维克多是班尼·莱维的化名：埃及出生的犹太人、政治煽动者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成为“无产阶级左翼”的实际领导人。在他的同仁中间，维克多被认为是圣茹斯特转世：朝气蓬勃、口齿伶俐、精力充沛，具有一种残酷无情的政治意志。根据其左派分子同仁的证据，维克多屡次想把“无产阶级左翼”推向其他派别唯恐踏入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就是因为维克多没有法国国籍，所以他只好参与他所构想策划的、为数不多的政治“行动”。一旦被

逮捕，就意味着他将被驱逐离境。

一般来说，萨特喜欢女性朋友，而不喜欢男性朋友，这一点众所周知。就这一点来说，他与维克多的关系是个例外。萨特既被维克多的战斗精神又被其非凡的政治魅力所吸引。萨特在 1977 年的一篇访谈中反思了他们的友谊之后，他评论了维克多的政治智慧，他说维克多的政治智慧尤其胜过他认识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而且，维克多表现了一种置他的政治地位于风险之中的非凡意愿——没有教条主义，这一点让萨特耳目一新。不像萨特其他的男性朋友，维克多在谈话中似乎也准备并乐意明确地偏离政治主题，一个萨特称之为维克多“女性”方面的特点。在许多方面，萨特视维克多为他不曾拥有的儿子。

促成左倾主义溃败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 PLO）对 1972 年奥运会的攻击（这一攻击被世界各地的观众“实时”观看了），致使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身亡。这一事件使萨特陷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的拥护者。对青年一代的法国犹太人，他于 1946 年撰写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著作〔《反思犹太人问题》（*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英译本名为《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成为犹太人自我意识的大胆号召。同样，在以往的一些时刻，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萨特试图为被压迫者实施的恐怖主义提供哲学上的辩护。因此，萨特完全有资格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施的攻击进行辩护：

那些肯定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有权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必须认识到以色列（政治）当局的政治策略是极其愚蠢的，故意拒绝一切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政治上有理由说战争状态存在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在这场战争中，巴勒斯坦人唯一可以利用的选择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贫穷而受压迫的人们没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方法；那些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用以反对法国人的恐怖主义的法国男女接着不得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动。这个被遗弃的、被出卖的和被放逐的民族只有组织致命的攻击才能表明它的勇气和仇恨力量。

萨特将他的回应 in 某种程度上立基于这样一种（结果是错误的）假设：在德国安保部队执行考虑不周的营救行动的过程中，以色列运动员丧生于一阵冰雹般的枪炮声之中。他由此假定他们是被德国人的子弹杀死的。然而，后来的证据清楚地表明一些运动员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激进分子实施袭击时惨遭杀害。但是，除了与以色列运动员死亡有关的特殊情境外，萨特一再忽视战斗者与非战斗者之间存在的、关键性的道德和法律差异。因此，即使有人为了论证而假定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一种假设，一旦做出这种假设，实际上就排除了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这种既非道德上的、也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声明，将会同意对无辜的平民实施攻击。

这一次萨特从左翼包抄了“无产阶级左翼”同志。“无产阶级左翼”在更加谨慎地前进的同时，寻求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它不断地批评以色列不公平地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另一方面，所谓的武装派别“新人民抵抗运动”发表了一项声明，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左翼”与慕尼黑谋杀案无关。“无产阶级左翼”的声明尤其主张武装斗争的伦理观是禁止攻击无辜的平民。〔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只攻击人民的直接敌人……（因此），人们必须要辨别一般以色列人与军队、警察或以色列占领机构。〕萨特反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探讨过暴力伦理学，他觉得认可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所采取的暴力行动而否认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同样方法，这是前后不一致的。

当 1973 年左右毛主义运动令人出乎意料地分崩离析的时候，萨特任命维克多为他的私人秘书。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动机既是理智的又是注重实际的。一方面，萨特尊重维克多是政治上机敏的对话者。另一方面，由于维克多的学生签证过期了，所以萨特给他的这个职位可以让他不必返回出生地埃及。1976 年，随着维克多的侨居身份越来越不安全，萨特直接给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写信，要求他插手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失明的萨特恳求说，如果没有维克多的帮助，他就不能完成他的著作。吉斯卡尔满足了萨特的请求，同时声称尽管他鄙视维克多先前的左翼政治情愫，但是萨特完成全集的重要性胜过所有的其他考虑。

维克多对萨特日渐增强的影响开始在萨特“家族”其他成员中间引起嫉妒，尤其是《现

代》的工作人员和波伏娃。在其感人的、关于萨特最后岁月的著作《告别仪式》中，波伏娃甚至控诉维克多“腐化老人”，就是说运用他对萨特的过度影响来利用年老的哲学家，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令人质疑的目的涉及维克多对正统犹太教日益强烈的兴趣。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埃尔坎－萨特（Arlette Elkaim－Sartre）感到她不得不发表一封公开信来证明萨特对有关犹太人弥赛亚主义主题姗姗来迟的兴趣的真挚感情，这封信就发表在萨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的法国日报《解放报》上。

除了与以色列运动员死亡有关的特殊情境外，萨特一再忽视战斗者与非战斗者之间存在的、关键性的道德和法律差异。

“无产阶级左翼”内部分裂后，维克多全身心地研究《塔木德》（*Talmud*），由此维克多因其原名班尼·莱维而放弃了化名，完成了一次奇异的、“从毛到摩西”（from Mao to Moses）的知识分子之旅。“五月运动”的四名领导者当中，有三名是犹太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阿兰·热斯马尔和阿兰·克礼文（Alain Krivine）。对于一些前左派分子来说，一旦左翼革命热情的浪潮衰退，重新接合他们长期遭受压抑的犹太人血统就变成了一种提供意义和定位的方法。鉴于他们的家人在维希掌权期间遭受的迫害，以前的左派分子觉得他们有权利获得认可，不仅仅作为公民而且也作为犹太人获得应有的认可。这样，一些著名的前左派分子从“犹太激进分子”（Jewish radicals）变形为“激进的犹太人”（radical Jews）。

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犹太人精神复活的关键性文本之一就是萨特的《反犹分子与犹太人》：哲学家萨特的请求，是在纳粹大屠杀投下的长长阴影下做出的，支持犹太人的自我主张。萨特主张，面对反犹主义时，犹太人必须避免使其假冒的迫害者的恶毒嘲弄与侮辱内在化。反而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和突出犹太人身份。在《想象的犹太人》（*The Imaginary Jew*）中，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回想起萨特 1946 年撰写的文章如何给他提供了一种范式，经由这一范式他可以彻底想清楚犹太人的本真性的问题——一个法国共和国知识分子传统不能对此沉默的问题。芬基尔克劳回忆道，“因为我是萨特的崇拜者……以什么样的超级愉悦，我利用了萨特赋予我的存在的词汇……通过无可怀疑的严密性，他跟我说我是一名本真状态下的犹太人，我假设我的条件、勇气、甚至英雄气概也是必需的……萨特散文的魅力弥漫着我想象我自己的样子与我当前体验的存在之间的隔阂。”

一旦维克多放弃左翼政治策略，他的哲学忠诚也就改变了。他对萨特思想的兴趣减弱了，从此以后他变成故意嘲弄的、反萨特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信徒。列维纳斯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他人”（l'autrui），我无限受惠于“他人”（运用列维纳斯的术语），而“他人”在萨特的哲学中对“自为”的自律性构成了持久威胁。维克多证明说：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有过两个伟大的哲学时刻：第一次是遇到了萨特，然后是我 1973—1975 年抛弃左翼立场后遇到了列维纳斯……在一系列漫长而徒劳无功的尝试（以便清楚地表达我的政治经历所提出的疑问）后，包括与萨特一起重读他的所有著作—归根到底，幸亏我邂逅了列维纳斯的著作，我开始怀疑的是，关于我作为一名犹太人的存在主义构造，存在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某种必不可少的东西。

列维纳斯对维克多产生了深刻影响，只要“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要经常谈论‘他人’；‘大众’，也许，对，那就是一切。”回顾以往，维克多觉得他与革命分子同仁因屈从于一种政治弥赛亚主义而误入歧途——一种认识此时此刻天国的、误入歧途的努力。相反，万能上帝的尊严恰恰存在于与被造生命的乏味焦虑相对的相异性性或超验性之中。因此，对维克多来说，列维纳斯的学说极大地矫正了左倾主义的政治过激行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列维纳斯作为无限超验性的他人的观念是对法国人的博爱（fraternité）观念在神学上进行的重塑。

如今的希望

1980 年哲学家萨特去世的时候，关于维克多对萨特影响的争论被重新激发了。几周后，维克多 / 莱维出版了一本访谈集《如今的希望》（*Hope Now*），毕生信奉无神论的萨特在这本访谈集中反常地承认他与犹太教的亲缘关系——这显然是维克多

影响的结果。在《如今的希望》一书中，萨特观察到他押在“介入”伦理的最后赌注泡汤了，他与“无产阶级左翼”的亲密关系破裂了。最终，曾是后五月政治文化之恒久特征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和工厂占领运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变革。自法国解放以来，统治法国的政治精英一直泰然自若，未受侵扰。在萨特的最后访谈中，他在犹太民族身上察觉到某些他曾属于工人阶级的、乌托邦式的伦理美德。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犹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命运。每个犹太人走向的结局就是重新联合全人类……这个目标只有犹太民族（才知道）……这是人类彼此存在的开端”。在维克多的指导下，萨特似乎要重新评估他思想中的一些关键观念——例如政治优先性，根据列维纳斯的看法，他几乎就成了一名“伦理学家”。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萨特的眼睛失明了，他与外部世界的全部联系由维克多 / 莱维负责协调。两个人计划一起写一本基于萨特对博爱概念的新兴趣的伦理学著作。但是如前所述，萨特在集中而连续的工作中滥用安非他明药片，他于这项计划可能实现之前的 1980 年 4 月就去世了。5 万名送葬队伍跟随他的灵车来到了蒙帕纳斯公墓 (Montparnasse Cemetery)。萨特临终前总结说，博爱不能再被“政治”生产出来。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到毛泽东，左派的政治梦想全都流产了，它的新担保者就是伦理学。这是一次向加缪的立场进行引人注目的回返——同样这一立场也表明了维克多 / 莱维的“列维纳斯主义”的迹象。

自五月风暴以来，萨特就与左倾主义同甘共苦。但是 1973 年无产阶级左翼分裂后，他失去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政治方案。此后，“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开始估量它所犯的错误。“五月事件”后，“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大大促进了去除政治先锋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幽灵们）罪孽的神秘性。但是他们还不得不系统地探查整个革命主义的过激行为 and 违法行为。姗姗来迟的是，“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意识到以左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几乎等同于以右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这是慕尼黑奥运会谋杀案让人们彻底明白的观点之一。突然之间，流行的毛主义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具有了全新的、不祥的意义。

“无产阶级左翼”的内部争论重新考虑了萨特与加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暴风雨般邂逅的友谊。萨特确信共产主义的承诺，并试图使个体道德屈从于这一目标，而加缪拒绝接受一种为了不确定的乌托邦政治未来而牺牲基本伦理戒律的视角。不过，到了 70 年代中期，实际上不存在“萨特思想的”左派。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加缪思想的追随者，支持伦理学优先于政治学。在法国，“反极权主义时刻”的钟声敲响了，恰好是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5 年 4 月现身流行的文学脱口秀《猛浪谭》(Apostrophes) 预示的。此时索尔仁尼琴的突破性著作《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 刚刚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这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广泛致敬为“我们时代的但丁”。

萨特也追逐着反极权主义的浪潮，与雷蒙·阿隆一起参加了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试图唤起人们对越南乘船外逃难民的绝望处境的关注，这些难民正逃离最近胜利的共产主义政府所施加的迫害。1980 年 1 月，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利用欧洲广播电台一台支持苏联正遭受国内放逐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 的事业。在同一个节目中，萨特开始呼吁抵制当年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夏季奥运会。

萨特确信共产主义的承诺，并试图使个体道德屈从于这一目标，而加缪拒绝接受一种为了不确定的乌托邦政治未来而牺牲基本伦理戒律的视角。

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萨特—阿隆的积极行动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意识形态的诉求已经丧失了优先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构法国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至高权威。反而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贝尔纳·库什内 (Bernard Kouchner) 的“无国界医生组织”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及其类似团体为象征。

在许多方面，萨特在其生命的终点重新开启了普遍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他放弃了政治激进分子或“人民的朋友”[让－保罗·马拉 (Jean-Paul Marat)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报纸的题目] 的姿态之后，他最终的政治介入方向更像伏尔泰或左拉。一旦革命主义的暴行和妄想被揭露出来，法国社会就重新评价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功绩和价值。自此以后，普遍知识分子的道德领导权具体表现为一个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法国重新改造了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萨

特虽然双目失明、身体羸弱，但是他勇敢地参与了重新改造的这一时刻。

就萨特与莱维停顿下来评价其体现在“无产阶级左翼”之中的左倾主义的政治意义而言，他们在《如今的希望》中所进行的广泛谈话是重要的。其中主题之一关系到“无产阶级左翼”对革命暴力的迷恋，还牵涉到这种迷恋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曾在萨特个人著作中所发挥的准系统性作用。如前所述，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忠于政治雅各宾主义，他认为革命暴力具有某种再生性的、救苦救难的能力。不过，到 1970 年晚期，这种观点在道德和历史上是不足信的。

也许对第三世界主义和整个革命主义的致命一击就是关于柬埔寨“杀人场”的恐怖报告。从 1975 年到 1979 年，波尔布特及其党羽大约杀害了 170 万同胞。加之柬埔寨共产党精英——乔森潘 (Khieu Samphan)、英萨利 (Ieng Sary)，还有波尔布特本人——在他们 20 世纪 50 年代初交换留学期间曾在巴黎最好的大学学过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作为波尔布特最忠诚的副手，民主柬埔寨 (Democratic Kampuchea) 国家主席乔森潘对法国记者解释说：“总理波尔布特和我深受法国思想精神的影响：启蒙时代、卢梭和孟德斯鸠。”像哲学家一样，红色高棉领导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将古代政体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进程加以概念化。英萨利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宋希坤 (Soang Sikoeun)，曾这样讲述了罗伯斯庇尔对红色高棉精英所产生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激进主义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不受腐蚀的、不会妥协的人……如若你做事，那么你必须做好它，坚持到底。你不能做出任何妥协。那是我的个人哲学、我的个人意识形态。你总该站在‘绝对’ (the Absolute) 一边——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任何妥协。凡事都不该半途而废。”

红色高棉追随“文化大革命”的模式，残酷地把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以达到“政治再教育” (political reeducation) 的目的。他们有组织地招募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追随者——用伟大舵手的话来说，就是一“穷”二“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波尔布特的传记作者勾勒出两场革命运动之间多方面的意识形态相似之处，兹述如下：

人优先于机器；吹捧人的意志（中国）与“革命意识”（柬埔寨）；意识形态优于知识（要“红”而不是“专”）；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消除城乡差异的需要；对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关注；修正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形式自发地产生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观点。

借由红色高棉开展的“农民共产主义”实验，结果显然是令人震惊的。

在讨论这些话题时，莱维以一名老练诉讼人的极大热情竭力引诱着萨特。某种意义上说，衰弱无力的哲学家萨特貌似不能承受更多的打击，温顺地投降了。在许多方面上，与萨特进行的对话对莱维来说是一场持久的自我批评练习——一种面对他自己感到困惑的政治经历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减缓他自己内疚的方式。当萨特开始思考我们的普遍人性的伦理基础时，莱维突然提醒他注意他以前赋予革命暴力的救赎角色。萨特悔改了，只是说：“我不再有那种观点了。”当提及殖民主义的困境时，他解释说，暴力的行为或许破坏奴役的状态，而它们缺乏再生性的特性或能力。而且他继续说道，他对暴力的赞许曾是“情境的” (situational)：它基本上关系到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残酷僵局。鉴于难以处理的殖民主义困境，萨特可能意识到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莱维继续逼问。假如博爱是经由共同敌人的纽带创造出来的，正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论证的那样，那么敌人被杀戮后会发生什么事？革命者不可避免地相互残杀吗？他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寻找一个新敌人吗？

主导着这些讨论的莱维进行了总结，暗示说他与萨特赞同的“造反暴力” (insurrectionary violence) 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众暴力” (mob violence)；犹太人经常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所以具有一种作为“目击者”的独特身份。因而莱维声称，假如有人想消除革命主义的罪恶，那么犹太人的证据是必不可少的。萨特只是战战兢兢地附和说：“我认为你想得没错。”

莱维对革命主义的厌恶深受国际左派本能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anti-Zionism) 的影响，这种反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新近发生的阿以战争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Six-Day War, 又称“六日战争”)] 和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 (Yom Kippur

War，又称“赎罪日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备受争议的、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联合国决议（后来被撤消了）自 1975 年生效。考虑到莱维刚刚幡然醒悟为一名正统的犹太人，那么与日益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左派团结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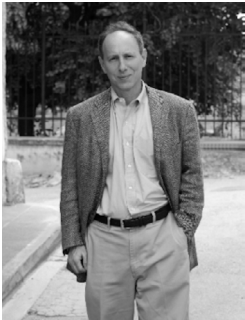
虽然《如今的希望》的抄本无疑是可靠的，但是毫无疑问，莱维引导着整个谈话，虚弱而失明的萨特盲从他的引导。他们总结性的交流关系到一个急剧衰退的政治期待的时代中变化无常的希望问题。在萨特看来，左翼政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只要为了选举成功牺牲了它们的信念，那么它们就不值得信任。就这点来说，左倾主义也崩溃了。30 年来，萨特在政治上确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替代。但是，如今这些希望已经永久地破灭了。既然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定义的、世俗的历史哲学的承诺失败了，那么萨特承认他钦佩犹太民族，因为太平盛世“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而非“在历史意义上”存在。萨特解释说：

（在犹太教中）新奇的地方是这一上帝与人缔结的关系。这是犹太人与他们曾称之为“大写的名”（the Name，也就是上帝）之间所拥有的直接关系。上帝对犹太人讲话，犹太人聆听他的话语，从所有这一切涌现出来的真实就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第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联系。我认为，那是古代犹太人的最初定义，人的整个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与上帝的关系决定的、控制的。而且犹太人的整个历史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原初的关系之中。

萨特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莱维和阿莱特·埃尔坎 – 萨特（他的养女）都是犹太人，他们影响萨特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最后，正是萨特的“孩子们”对他来说才变成了“希望”的宝库。



东风
理查德·沃林 著
董树宝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3 月



理查德·沃林

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等多部作品。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电视剧《人生切割术 第一季》（2022）剧照

档案

BuzzFeed 和 Vice 倒台，为什么数字媒体这条路总是走不通？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4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学 / 技术

多年前我看过这样一篇文章，关于彼时风头正劲的《赫芬顿邮报》(Huffpost)。现在已经难以找到具体出处，但它传递出的积极情绪让人印象深刻，文章围绕其传奇的创始人 Arianna Huffington，暗示她所开启的纯数字媒体时代，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取代传统媒体。

当时，这样的论调颇具说服力。2011 年，《[赫芬顿邮报](#) 流量一度超越《纽约时报》》，2012 年，[还获得了普利策调查报道奖](#)，一改过往纸媒当道的局面。每个事件都伴随着“颠覆媒体行业”的评论。

从后置的视角看，HuffPost 没能成为新的《纽约时报》，[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流量下滑后](#)，踩着它脚步的后起之秀 BuzzFeed [在 2020 年将其收购](#)。而近期，4 月 20 日，[BuzzFeed 也宣布将关闭新闻部门](#)，裁员 15%，将新闻业务悉数转移至体量已经远不及从前的 HuffPost。

紧接着，[曾经的又一媒体巨头 Vice 也宣布关闭世界新闻的报道业务，并准备申请破产](#)。它的辉煌史中写着：一度估值达 57 亿美元，拒绝了迪士尼的收购。

让人遗憾的是，缩减和业务重组的过程中，这些媒体不约而同地优先砍掉了一度广受赞誉的新闻业务部门 (BuzzFeed 虽然充斥着大量标题党和小报风内容，但也拥有过荣获普利策的强大调查新闻团队)。这也印证了多年的实践之后，深度报道仍然没有

出现一个真正的盈利模式。

当媒体试图复盘其中症结所在，会发现它们跟所有优质内容生产者面临一样的[困境](#)：内容提供者试图通过社交平台接触到更多读者，获取流量，转变为广告收益，但 Facebook 和 Google 这类平台吞下了越来越多的广告份额，甚至会根据需求随时更改推荐算法，乃至最终抛弃原始的内容提供者。

Facebook 不再推广新闻报道，TikTok 短视频几乎从不提及原始新闻出处，Twitter 的推荐流已经完全变成马斯克的情绪晴雨表。(微博上的头条新闻则完全是一个拿别家媒体内容刷流量出热点的洗稿号) 与此同时，“培养严肃的新闻力量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留住人才也是如此。”Vanity Fair 写道。这个背景下，坚定地将核心业务维持在新闻上变成难以完成的任务。

如果非要有什么结论，[Slate 写道](#)，那就是科技行业没能拯救新闻。

但人们从未打消对此的期望，就在此前不久，BuzzFeed 才宣布[将开始发布由 AI 生成的内容](#)，目前已经出现的包括一些测试题和旅游文章——它们“[平淡可笑且彼此相似](#)”，热衷于将任何景点描绘为“隐藏的珍宝”。

[芬兰媒体的反侦查术：《反恐精英》](#)。5 月 3 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年度报告中](#)，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滑，31 个国家被认为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两年前还只有 21 个。

与此同时，芬兰媒体《赫尔辛基日报》在当天发表了一项新的倡议，旨在利用《反恐精英》的自定义地图来绕过俄罗斯对于战争报道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游戏中建造了一座名为 Voyna (俄语为战争) 的斯拉夫城市，在这座城市一栋公寓楼的地下室，玩家可以找到该报驻乌克兰战地记者的俄语报道。墙上贴着大量的图片和地图，描述战争中对平民的攻击事件。

[Google 会出手，帮你扫描你的邮箱是否出现在了暗网上](#)。数据泄漏正在成为一个愈发严重的问题，并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一项调查显示](#)，勒索软件攻击的平均支付额度在过去一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150 万美元，超过四分之一的公司支付了 100 万至 500 万美元。

因此也出现了反制的思路。比如网站 [havebeenpwned.com](#)，它可以告诉你，你的邮箱是否在过去的一系列大规模数据泄漏中被暴露了。

刚刚过去的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上，Google 也宣布将推出一个新的安全功能，通过扫描暗网上的内容，帮助用户检查自己的 Gmail 地址是否出现在了暗网上，并提供指导让用户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保护自己的数据，比如开启两步验证。未来几周内，美国所有拥有 Gmail 账户的任何人都将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与此同时，Google 对浏览器进行了升级，在 Chrome 和 Android 上更大比例地阻止网络钓鱼的信息弹出；Google Drive 宣布了一个新的垃圾信息视图，帮助用户区分合法和不可靠的内容；Google 地图则允许用户更容易地删除自己的搜索历史。

夹在开发者大会一众琳琅满目的 AI 新工具中，安全功能可能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它的存在强调了一个事实，人们面临的来自技术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公元 2023 年五月 AI 简报

★ AI，危险危险危险！

“不是说气候变化不危险，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加紧迫的。”图灵奖获得者，有“AI 教父”之称的 [Geoffrey Hinton 对媒体表示](#)。此前不久，他离开了工作十年之久的 Alphabet (GOOGL.O)，原因是就目前 AI 行业的发展感到担忧。

媒体还引用了一句相当惊人的发言，“一部分的我，对自己过去一生所做的工作感到后悔”。这番言论，不免让人联想到对敦促美国进行原子弹研发而感到后悔的[爱因斯坦](#)（尽管他从未直接参与研发过程），或是奥本海默。

人们很容易认为，业内人士看到了被蒙蔽的真相，预见到逼近的毁灭性未来，是世界暗面的吹哨人。但事实上，稍加留意就会发现，Hinton 提出的许多 AI 技术的潜在威胁并非第一次为人所知，一部分已经提上日程，甚至已然成真。

比如虚假的照片、文字、视频导致真假难辨，真相贬值——在[最近一起特斯拉自动驾驶致死事故的庭审中](#)，特斯拉的代表律师声称一则马斯克的视频可能为“深度伪造”，无法作为证据。然而事实上，该视频是 2016 年马斯克在一场科技大会上的真实问答。

什么东西都可以被视作作假的，这便是“说谎者的红利”。AI 伪造的广泛应用会助长这个现象，导致受害者需要不断陷入自证的漩涡。虽然此案中法官没有采纳该律师的主张，并表示“特斯拉所争辩的内容让法院深感不安”，但可以预见，未来何为真何为假，会成为广泛的争议话题。

(有趣的是，中文互联网上近期的一起事件中，同样的手段被用以保护受害者。前国家运动员张继科被曝出以前女友私密照抵债后，网络评论区出现大量留言表示，“接下来如果出现任何疑似图流出，都是 AI 做的”，希望冲刷掉事件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

Hinton 的担忧还包括 AI 技术对人力的冲击 ([IBM 计划在五年内用人工智能取代 7800 个岗位](#))，自主武器杀手机器人成为现实等。

整体而言，让 Hinton 突然态度转向的仍是人工智能出乎意料的快速发展。过去他曾认为 AI 算法会在 30 到 50 年后超越人类，[现在他认为这个时间更有可能是 5 到 20 年](#)。但与此前暂停 AI 研究六个月的公开信不同，Hinton 并不认为中止当前的发展脚步是一种现实选项，他的主张更倾向于让政府和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研究当前的风险，了解如何让它变得可控。

相比于 Hinton，对于 AI 的威胁还存在一些更具攻击性的言论。[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 Robert Reich](#) 将从事 AI 研究的人称为“处于青春期末期的青少年”，“最近才发觉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但因为额叶皮层严重发育不全，社会责任感不是很强”。

[Slate 专栏作家 Alex Kantrowitz 指出](#)，这些批评大多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警告过多，细节太少。这股只重视名头而忽略细节的浪潮，很容易让 AI 成为一种 PR 手段，而非真实的生产力改变。比如在他看来，IBM 宣称的 AI 替代员工更像是为削减成本的一个借口，比起“组织冗余，盈利不善”，高新技术平价替代听起来让市场有信心多了。

这其中也存在一种危险，即围绕 AI 的争论变为一种泛泛的情绪对立。随着热度消散 (尤其是对于注意力涣散的普通人)，人们“梦游”着迈入一个 AI 侵入性发展的时代。

★ [《怪奇物语》《人生切割术》等大热剧集因编剧罢工而暂停拍摄](#)

拥有 11500 名成员的 WGA (美国编剧协会) 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抵抗。这场开始于 5 月 2 日的罢工，目前还没有势头减弱的迹象。考虑到上一场罢工持续了三个月才结束，这次的[预计会对今年的艾美奖和秋季档产生强烈的影响](#)。

该协会上一次罢工发生在 2007 年，彼时“新媒体”刚刚兴起，WGA 希望确保这种新兴技术发展的同时，编剧的劳动仍能得到公平的报酬。然而，流媒体近年来的流量暴涨仍然让编剧在其中的份额减少。这场劳资纠纷有许多复杂的细节，其中涉及到一个愈发常见的运作模式，“迷你房间”。这是一种灵活雇佣的新模式，但与之相应的，编剧的薪酬和稳定性都在降低。

此次罢工也与新技术的出现密切相关，也就是 AI 写作的发展。[WGA 要求在合同中规定](#)，每位署名编剧都需要是人类，电影剧本、处理方式、大纲和其他“文学材料”，不能用 ChatGPT 或类似的程序进行编写，还要求 AI 不得用于生成源材料 (比如小说、文章或其他 IP)，或使用 WGA 成员的作品进行训练。

可以想见这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因为批量生产、快速试错对于好莱坞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采用“迷你房间”这样的快速生产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人乐观认为，AI 永远不可能替代真正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TikTok 这类产品的流行一遍遍告诉我们，对于内容消费，人们非常热衷沉溺于重复而单纯的舒适圈内。

★ [Spotify 下架了成千上万首 AI 制作的歌曲，原因是买水军](#)

此次行动针对一家名为 Boomy 的人工智能音乐初创公司。这家公司于 2021 年投入运营，让人们可以通过仅提供描述词的方式来生成音乐，并发布到流媒体平台，获取版权收益。官方表示，目前其用户已经用这种方法生成了超 1400 万首歌曲——[占据全球录制音乐的 14%](#)。

生成式音乐的泛滥让很多人感到忧心。根据一位音乐经纪人的观察，过去几个月 Spotify 平台上的歌曲数量一直在以平均每天 10 万首的速度激增。

但这种技术入侵行业之后，带来的变化远不止如此。几周前，环球影业致信各大流媒体平台，要求打击使用生成式 AI 的行为，停止使用其版权所有的歌曲进行训练。同一周，一首使用 AI 模仿 Drake 和 The Weeknd 声音的歌曲在流媒体平台上受到疯转。而 Spotify 此次下架歌曲的主要原因是怀疑“水军机器人冒充人类听众来夸大某些歌曲的听众数量”。机器写歌，机器听歌，创造收益，一条龙服务。

★ [世界上第一部人工智能法将会全面禁止人脸识别](#)

经过 5 月 11 日的投票，欧洲议会议员 (MEP) 同意将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面部识别和预测性警务工具纳入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案。如获通过，这项法案将全面禁止面部识别，以及从照片或镜头中识别个人，雇主或警察用以识别疲倦工人或司机“情感监测”AI 也会被视为违法。

这个备受瞩目的法案过去两年一直处于谈判之中，目前已经[大步行进到下一阶段](#)，预计 6 月中旬将提交给更广泛的议会，并在今年年底获得通过。[从当前的进度看来](#)，这部法案的条款谨慎且严苛，将保护人类健康与安全放在首要位置，预计将成为人类与 AI 之间的一道重要护栏。

★ [抖音针对 AI 生成内容提出十一条平台规范](#)

[规范要求](#)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并要求虚拟人在平台进行注册，虚拟人背后的技术使用者则需实名认证。对于后一条，抖音还补充，使用虚拟人形象进行直播时，不允许完全由人工智能驱动进行互动，需要有真人在实时驱动。

如今市面上已经存在大量这样的虚拟人——利用配置好的对话功能，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的纯虚拟人，大多是为了带货。科技企业在推广自家的虚拟人时，也都会突出它的“纯粹性”。而抖音此次出台的规范正是针对这样的一种内容生产模式。

02

气候 / 环境

[海洋表面的温度正在飙升，并达到历史峰值](#)。也就是 21.1 摄氏度。科学家正试图理解解它的成因，一些人认为这跟拉尼娜现象的结束有关。过去三年，持续的拉尼娜现象一直在抑制全球的升温趋势，但随着这个周期的结束，它的效果也随之消失。

“这有点像我们把冰箱门打开了一段时间，这有助于为地球降温。”[NOAA 的海洋学家 Gregory C. Johnson 表示](#)，“但即使冰箱已经打开，房间温度仍在继续上升。现在冰箱关上了，一切都比以前热。”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与之相对的厄尔尼诺现象还没有真正来临，但温度已经上升了很多，未来一年的温度发展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起来。

海洋变暖会导致珊瑚白化、海洋生物死亡、海冰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并加剧全球变暖。过去，海洋为地球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和碳排放，温度上升也会削弱它的这些能力。

与此同时，东南亚已经开始[遭受极端天气的打击](#)。越南以 44.6 摄氏度的高温创下纪录，缅甸东部的一个城镇气温也达到了 43.8 摄氏度。这迫使工人更早地开始工作，以便在上午十点之前完成，避免在高温下作业。

[回收产业的又一个问题：一边回收，一边喷洒微塑料。一项新研究发现](#)，塑料回收的流程会产生大量的微塑料颗粒，一个回收设施每年的排放可多达 300 万磅。通常来说，回收流程包括将塑料制品分类、切碎并融化，过程中塑料会被多次清洗。这时，会有许多微塑料颗粒落入水中，最终冲入城市的供水系统或大自然中。

微塑料指的是 1 微米至 5 毫米的塑料颗粒，在流动过程中它们会吸附重金属在内的许多污染物，并随着它的轨迹释放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动物与人体内。研究人员还在设施内的空气中发现了高浓度的微塑料，可能被工人吸入，造成对肺部的侵害。

这项研究进一步指出了当下回收系统的缺陷，回收率低，过程中又产生了二次的污染。回收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成为使用塑料的理由，WIRED 指出，科学家和反污染组织一致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依靠回收或试图将垃圾从海洋中拉出，而是大规模减少塑料生产。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卡在电网里](#)。这是能源转型讨论中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建设了这么多大型绿色发电设施，但不论是太阳能还是风力发电，都需要接入电网才能投入日常使用，电网是否准备好承接这些电力了呢？至少英国还没有。

根据 BBC 的调查，英国的国家电网由于容量不足，一些新的发电站点需要等待 10 到 15 年才能接入。这些项目的总计价值超过数百亿英镑。而且英国目前的目标是在 2035 年前实现零碳发电，时间显然有些不够。

[越洋海淘确实很方便，但这种行为正在杀死鲸鱼](#)。数量异常的鲸鱼正在被冲上海滩，自去年 12 月初以来，共有 23 头死鲸被冲上美国东海岸，这我们之前提到过。但当时，

科学家对于这个现象几乎拿不出任何解释。如今尸检结果显示，其中有很多都是由于船只撞击而死的。

一方面，随着气候变暖，鲸鱼的迁徙和觅食地点更接近海岸；与此同时，海淘正在推动美国港口的货运量迎来破纪录的激增。这些货运船只的数量和吨位都在快速增长，[以纽约和新泽西港为例](#)，来往集装箱总数自 2016 年翻了 5.5 倍，其中有许多足以运载 9000 多个集装箱，让它一举成为美国最繁忙的港口。

这些船只不可避免地会与鲸鱼的行进轨迹发生重叠。“它们就像高速公路上的鹿一样。”一家非营利性鲸鱼研究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目前，纽约和新泽西港出台了一项计划，为靠近海岸时自愿减速的船只提供激励，以减少撞击对鲸鱼产生的危害。

[由于全球变暖,波多黎各的青蛙声音越来越尖了](#)。Coquí 是波多黎各特有的一种青蛙，因其明亮的鸣叫声而得名，雄性的 coquí 会用叫声来标记领地，警告别的雄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它们的叫声，发现随着海拔高度变化，这种蛙的鸣叫也会随之改变，山脚附近的 coquí 声音短促、调高，而山顶的则声音更长、音调更低，重复次数更少。

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这带来了体型更小，叫声愈发尖锐的 coquí 青蛙。而且为了寻找更适宜的温度，更多的青蛙搬到了山上居住。科学家担心，随着温度继续上升，不断搬家的 coquí 青蛙生存范围会持续缩小，直到全部用完导致种群崩溃。

[太平洋垃圾带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了入侵物种的新家园](#)。人们曾在 2011 年日本的 311 地震”之后记录到[这样的现象](#)：来自日本的沿海海洋物种，附着在人类的生活残骸上，随着洋流一直漂浮，直到被冲刷上美国西北部的海岸。

史密森尼环境研究中心前研究员 Linsey Haram 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她将眼光放到了著名的太平洋垃圾带上——一大团难以定义的区域，完全由微塑料、渔网、浮标和瓶子等各类塑料垃圾组成。研究中，她将这里称为“新远洋社区”，一片“塑料方舟”。收集的样本中，她发现了海葵、水螅和片脚类动物等“居民”，它们不是被人造物缠绕住，而是居住于此，繁衍生息。

过去，树木、浮石也会让物种产生跨洋的迁移，但这种漂流通常是短暂、偶发的，而“塑料方舟”则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交通工具，对不同海域以及公海的生态系统产生深刻影响。科学家尤其担心，这种迁移会带来入侵物种，对一个地区原本的近海生物带来威胁。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来自科技于环境、边缘人群，以及其他我们认为重要议题的新闻汇总。



题图来自 [Abdulaziz Mohammed](#) on Unsplash

档案

到 2070 年， 日本人口预计只有 8700 万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2 条新闻。

在沙特城市吉达 (Jeddah) 举行会谈后，苏丹军方和敌对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于周六**签署了一项为期 7 天的停火协议**。该协议将于周一晚间 9 点 45 分生效，并将建立一个国际支持的监督机制。它还允许运送人道主义援助。

至此，这场使苏丹陷入混乱并使 100 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战斗已进入第六个星期。一直到周日上午，战斗仍在继续。喀土穆中部和南部发生了零星冲突，包括空袭和防空炮火。

4 月 15 日，非洲东北部国家苏丹境内爆发激烈战斗，首都喀土穆和邻近的恩图曼都变成了战场。该国军事政权的两大派系正在进行权力斗争：苏丹武装部队普遍效忠于该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而民兵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则追随前军阀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将军。自苏丹前领导人奥马尔·巴希尔在 2019 年的民众起义中被推翻以来，布尔汉和哈姆丹一直担任苏丹执政委员会的最高职位。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 110 万人逃离家园，造成了一场威胁到该地区稳定的人道主义危机。那些仍在喀土穆的人在大规模抢劫、医疗服务崩溃以及食物、燃料、电力和水供应减少的情况下挣扎求生。即使在斋月期间，双方将领也无视民众关于寻求食物和医疗服务的呼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有 36 万 8 千名儿童被迫离开苏丹的家园，另有 8 万 2 千名儿童逃往邻国。据估计，在战争的头 10 天里，有 190 名儿童丧生，1700 名儿童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苏丹国家主任告诉[路透社](#)，“由于这场冲突，我们看到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关闭。在持续的轰炸和袭击之下，儿童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

根据吉达协议，一个由交战双方各三名代表、沙特阿拉伯三名代表和美国三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监督停火。吉达会谈的重点是允许援助进入和恢复基本服务。调停者说，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来寻求军队撤出，以促成一项有平民参与的永久和平协议。

这并不是双方第一次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前的尝试均因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协议而失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道：“现在是停止枪声，允许人道主义救援不受阻碍进入的时候了。我恳求双方坚持这项协议，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这场冲突中，截至目前，已有约 705 人死亡，至少 5287 人受伤，不过据信真实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

ALSO IN THE NEWS

[乌克兰女性正在打破性别规范](#)

乌克兰女性正在承担男性被征召入伍后不得不放弃的工作，比如地下采矿、锻造热金属和操作重型机械等。历史上，女性劳动力在战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承担传统上主要由男性负责的工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如此。

[CNN](#) 采访了一位 38 岁的女性 Tetiana。当数百名矿工被征召入伍时，Tetiana 所在的矿业公司要求女性志愿者在地下工作，她是最先举手的人之一。Tetiana 来自一个煤矿家庭，但她从前并不被允许进行地下工作。来自乌克兰北部城镇的 Maria Kobets 则接手了丈夫的铁匠铺。她说一旦乌克兰取得胜利，她希望把指挥权交还给丈夫。乌克兰议会议员 Yevheniia Kravchuk 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中还有 6 万名女性，其中 5000 人在战斗部队服役。

[秘密网络正在帮助洪都拉斯妇女堕胎](#)

洪都拉斯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堕胎禁令之一，宪法禁止在任何情况下终止妊娠，违者可能面临长达六年的监禁。洪都拉斯妇科医生协会表示，目前的立法与科学不一致，使医生每次拯救妇女的生命时都容易受到违反宪法的指控。

但在令人窒息的社会和宗教反对声中，妇女们正在秘密网络的帮助下终止妊娠，这些网络试图使堕胎过程尽可能安全。

美联社发布了一篇相关报道：秘密网络使用暗语、别名、加密信息、一次性手机和其他手段来掩饰他们的活动，大多数参与者彼此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在链条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外的任何细节，许多女性通过口口相传了解到秘密网络的存在。

一些寻求堕胎的妇女拨打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热线电话。她们会被追问一些问题，以确认请求是真实的，而不是试图追踪和举报的人。这之后，该网络会提供米索前列醇和米非司酮，并确保每个妇女在堕胎过程中都有一个向导，可以远程帮助和回答问题，以尽可能保证堕胎的安全。

[到 2070 年，日本人口预计只有 8700 万](#)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研究机构大约每五年根据人口普查等公共数据提供未来 50 年的人口预测。

四月下旬公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到 2070 年，日本人口预计将降至 8700 万，比 2020 年减少 30%。该报告称，到 2056 年，日本人口将跌破 1 亿大关；到 2070 年，65 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8.7%，导致社会保障成本激增；而 15 岁至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即通过缴纳保险费来支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口，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7509 万人大幅减少到 2070 年的 4535 万人。

人口下降预防研究中心主任 Masashi Kawai 强调，随着商业和政府服务变得难以维持，社会需要“战略性收缩”，他呼吁建立约 10 万人的紧凑型城市，提供集中服务。与此同时，韩国也在努力应对出生率急剧下降的问题。其 2022 年的人口约为 5180 万，预计到 2050 年将减少到 4580 万。

[新加坡三周内发生第二起与毒品有关的死刑](#)

上周三，新加坡绞死了一名走私大麻的男子，这是三周内的第二次处决。这名 37 岁的马来族新加坡人在 2019 年因贩运 1.5 公斤大麻被定罪，此前他曾在最后一刻要求重新审理此案，但被上诉法院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驳回。

新加坡的大多数死刑犯都与毒品犯罪有关。等待执行死刑的 54 人中，有 51 人与毒品有关，剩下的三个是谋杀。多数情况下，走私超过 500 克大麻、30 克可卡因或 15 克海洛因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

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类似罪行的刑期要轻得多。人权组织和联合国敦促新加坡停止对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执行死刑，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死刑作为一种威慑

手段是无效的。但新加坡当局认为，死刑仍然是“新加坡针对毒品需求和供应的综合危害预防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持死刑”，[人权组织发言人 Kirsten Han](#) 说。因而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主张在新加坡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在首尔, LGBTQ 文化节被基督教的青年音乐会取代](#)

多年来，韩国盛大的年度 LGBTQ+ 骄傲庆祝活动——首尔酷儿文化节（SQCF）一直在首尔市中心的草地广场举行。但今年，这个活动却被一场青年音乐会取而代之。

文化节组织者称这是一种歧视行为。“我们对首尔市政府感到愤怒，他们试图把性少数群体排挤出，让广场充满歧视和仇恨”。市政府 25 日发表声明称，从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酷儿文化节和音乐会的组织者都申请使用该场地。由于两个团体都拒绝更改演出日期，因此政府将决定权交给了市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1 日选定了由 CTS 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演出。

据[路透社报道](#)，CTS 基金会与基督教广播公司 CTS 存在连结，而该基督教广播公司曾公开反对同性恋和骄傲节活动。尽管一名代表声明，音乐会的演出与阻止酷儿文化节无关。

而 SQCF 的组织者和支持者指出，前几年在场地沟通方面就已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虽然在符合所有要求的情况下提交了使用首尔广场的申请，但每年都受到了‘国民情绪’等带有偏见、歧视性和主观的借口。”

[突尼斯释放了两名因言论而被捕的学生](#)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革命推翻了独裁总统本·阿里。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是当时的突尼斯人取得的主要进展。但近年来，尤其自现任总统赛义德在 2021 年关闭议会并夺取所有权力以来，活动人士和记者纷纷表示，突尼斯的言论自由正面临严重威胁。

本月，两名突尼斯青年学生 Youssef Chelbi 和 Dhia Nsir 被捕，起因是他们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首讽刺歌曲，批评警察和禁毒法律。这让众多维权人士感到震惊，并引发了大量的声援，促使赛义德最终对案件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对两名学生的拘留“完全不可接受”，并呼吁尽快释放他们。在总统的评论发表不久后，这两名学生被释放。他们的律师告诉法新社，他们将在下周再次出庭。

活动人士们说，突尼斯的自由受到围困，已经变成了一座大监狱。记者工会主席 Mahdi Jlassi 表示：“这是黑暗时代……言论自由日益受到打击。大约有 20 名记者和博主因为发表反对当局的文章或言论而被追捕”。

[巴基斯坦的跨性别者们正在与伊斯兰法院斗争](#)

在南亚国家巴基斯坦，许多人对性别和性行为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变性人通常被认为是弃儿，有些人被迫乞讨甚至卖淫来赚钱，并生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中。该国议会曾于 2018 年通过了《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以确保巴基斯坦跨性别者获得如法律上的性别承认等基本权利。

但本月，巴基斯坦的跨性别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计划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因为伊斯兰法院的一项裁决推翻了一项旨在保护他们权利的法律。

联邦伊斯兰法院在一个周五驳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中的几项条款，称它们“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法院裁定，一个人不能基于“内心深处的感觉”或“自我认知的身份”来改变自己的性别，必须符合出生时被赋予的生理性别。律师 Sara Malkani 在一次活动上发言，否认该立法违反伊斯兰教。她说，包括《古兰经》在内的伊斯兰文本并没有将特定的行为与特定的性别联系起来。

“我们绝对打算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我们会胜诉的”，巴基斯坦跨性别权利顾问执行主任 Nayyab Ali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权委员会认为，撤销跨性别法案将导致巴基斯坦跨性别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和被虐待。

[英国人已经厌倦了污水](#)

根据英国环境署（Environment Agency）的数据，在 2022 年，英格兰的水务公司向河流和海洋排放了 301091 次未经处理的污水，平均每天 825 次。

上周六，数千名英国人参与抗议活动，要求自来水公司停止污水排放，这一议题很可能成为下届大选的议题。活动人士表示，水务公司的排放频率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水平，这种情况被归咎于数十年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

周四，英国水务公司（Water UK）道歉，表示公众的不安是正确的，并表示行业投资 100 亿英镑，进行“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下水道现代化改造”，以减少污染。但这些承诺遭到了活动人士的驳斥，他们表示，该承诺仍需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且这笔资金远远低于政府此前所说的 560 亿英镑的投资。

[澳大利亚政府想让青少年们戒掉电子烟](#)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禁止娱乐性电子烟的计划成功，那么青少年们将无法继续在街角商店购买口味丰富的、包装显眼的电子烟。未来，唯一可以合法购买的地方是药店，并且需要处方。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 Mark Butler 本月表示，电子烟作为一种治疗产品向公众宣传，旨在帮助吸烟者戒烟，但却催生了新一代尼古丁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我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医疗保健史上最大的漏洞”，他说。政府的数据显示，该国吸烟率上升的唯一群体是 25 岁以下的人。14 岁至 17 岁的澳大利亚人中有六分之一吸电子烟，18 岁至 24 岁的澳大利亚人中有四分之一吸电子烟。

政府的下一个提案包括电子烟的包装也必须与药品一致、肺癌筛查项目和一项鼓励用户戒烟的全国公共信息运动。但正如悉尼大学公共卫生和烟草控制专家 Becky Freeman 所说的：“在电子烟普及之后，还没有哪个司法管辖区或国家能够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吸烟率。”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便利店、烟草店和电子烟商店都存在“不受监管、本质上是非法的”黑市。

[南非失业率在电力危机中上升, 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南非失业率在去年连续四个季度下降后，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 32.9%，原因是该国受到创纪录的停电影响。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停电，原因是该公司无法生产足够兆瓦的电力来满足需求，导致南非人每天断电长达 10 小时。电力危机对家庭和企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一些公司难以维持运营，许多人的就业状况堪忧。

一个最主要的担忧是，南非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 46.5%。这是南非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在 30 岁以下，这一事实本可能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南非未能收获这一人口红利。

[西班牙通过将火车票价格减半来鼓励年轻人旅游](#)

今年夏天，西班牙政府将向年轻人提供半价的欧洲铁路通票，18 岁至 30 岁的西班牙居民可以使用这种特殊的折扣通行证，乘坐数千公里的欧洲铁路网，从挪威的峡湾到意大利的海滩。折扣有效期为 6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一份声明，政府希望该计划将“鼓励年轻人的夏季旅游，并帮助文化和旅游在疫情后的复苏”。该政策是一系列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在夏天的这三个月里，年轻人乘坐国营公共汽车和中短途火车也将享受 90% 的折扣。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来自科技于环境、边缘人群，以及其他我们认为重要议题的新闻汇总。



题图来自 [Sky News](#) on Unsplash

档案

“我不会是转身离去的那个人”

马丁·艾米斯 | 发现经典

纪念马丁·艾米斯

马丁·艾米斯是当代英国作家，其父是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马丁·艾米斯素有“英国文坛教父”之称，与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处女作《雷切尔文件》获毛姆文学奖；《金钱》入选《时代》杂志“百部最佳英语小说”；《时间箭》《黄狗》获布克奖提名。马丁·艾米斯的作品风格形式复杂多变，不乏先锋实验的味道，被形容为蘸着迷药水写作的大师”。2023 年 5 月 19 日，马丁·艾米斯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去世。小鸟文学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取了《经历》一书的导读以及艾米斯对于朱利安·巴恩斯的回忆，作为纪念。

马丁·艾米斯和他的小说

文 / 瞿世镜

马丁·艾米斯 1949 年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父亲金斯利·艾米斯是著名小说家，母亲希拉里·巴德威尔是农业部一名公务员的女儿。马丁十二岁时，父母离异。继母伊丽莎白·简·霍华德也是一位小说家。马丁原来和其他同龄孩童一样，喜欢阅读连环漫画。继母引导他读简·奥斯丁的小说，这是他最早受到的文学启蒙熏陶。马丁曾在英国、西班牙、美国十三所学校上学，然后在伦敦和布莱顿补习，为大学入学考试作准备。他考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语系，毕业时获一等奖誉奖。他写的第一部小说《雷切尔文件》1973 年获毛姆奖。1975 年，他担任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助理编辑，出版了第二部小说《灵与魂的夭亡》。他还发表了许多书评和散文。于是他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部录用，这时他才二十七岁。后面两部小说《成功》(1978) 和《其他人：一个神秘的故事》(1981) 出版之后，他成了专业作家，并且给《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写文学评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陆续发表了下列

作品：《太空侵略者的入侵》(1982)、《金钱——绝命书》(以下简称《金钱》)(1984)、《白痴地狱》(1987)、《爱因斯坦的怪物》(1987)、《时间箭——罪行的本质》(1991 年获曼·布克奖提名)、《访问纳博科夫夫人及其他游览杂记》(1993)、《经历》(回忆录，2000 年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会面屋》(2006)、《第二平面》(2008，关于“9·11 事件”及反恐战争的文集)、《黄狗》(2003 年获布克奖提名)、《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2012)。2007 年至 2011 年，马丁在曼彻斯特大学新写作中心担任创意写作课程教授。2008 年，《泰晤士报》将他评为 1945 年以来五十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马丁·艾米斯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二位夫人伊莎贝尔·丰塞卡也是一位作家。马丁·艾米斯曾经住在伦敦肯辛顿区王后大道，他的小说时常以这个地区作背景。书中人物抱怨这里外国游客过多，商业气氛过浓，反映了伦敦市民丧失文化根底的异化感。他像狄更斯一样，喜欢从伦敦街头俚语、行业切口中吸收新鲜词汇，来丰富他的英语。这种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通俗语言，被其他青年作家、记者、读者们纷纷仿效而流行一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丁·艾米斯阐明了他的文学观念：“如果严肃地加以审视，我的作品当然是苍白的。然而要点在于：它们是讽刺作品。我并不把自己看作先知；我不是在写社会评论。我的书是游戏文章。我追求欢笑。“我不相信文学曾经改变人们或改变社会发展的道路。难道你知道有什么书曾经起过这种作用吗？它的功能是推出观点，给人以兴奋和娱乐。

“小说家惩恶扬善的观念，再也支撑不住了。肮脏下流的事情，当然成为我的素材之一。我写那种题材，因为它更有趣。人人都对坏消息更感兴趣。只有一位作家，曾经令人信服地写过幸福，他就是托尔斯泰，似乎除他之外，再无别人能把幸福写得跃然纸上。“我利用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所有荒诞可笑的、人们所熟悉的、凄惨可怜的事情……在这些日子里，到处存在着寒伦破旧、苦难悲惨的景象。

“阐明社会因果关系并非小说家的事业。他们必须对他们所具有的艺术效果非常敏感。”

马丁的处女作《雷切尔文件》被誉为青春期赞歌。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晚上，但是通过记忆联想和闪回等意识流手法，扩展了它的容量。主人公查尔斯·海威在他二十岁生日之夜，回想他第一次爱情经历。他是一位聪明、敏感的青年，渴望成为作家。在几本笔记本里，他写满了描述女友雷切尔·诺伊斯的文字。通过这些笔记和其他回忆，第一人称叙述者查尔斯展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机智幽默地描述他的成长过程和初恋的惊喜感受。马丁·艾米斯认为，“在青春期，人人都感到创作的冲动——想要写诗、写戏剧、写短篇小说。作家不过是那些把这冲动继续坚持下去的人。”

我们发现，马丁·艾米斯的创作冲动继续坚持着，而且他有一种黑色幽默的灵感。他的第二部小说《灵与魂的夭亡》，把幽默讽刺、生活堕落、荒诞暴行混杂在一起。这部小说写六个年轻人在伦敦郊区一幢大房子里度周末。时间跨度从星期五早晨至星期六。作者仍然使用意识流闪回手法，来扩展六个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深度。当这群青年星期五聚在一起过周末时，来了三位美国客人。他们激起了大家放荡的欲望，在酗酒、吸毒之余，男女混居，任意淫乱。然后是一连串罪行：殴打、虐待、谋杀、撞车。此书的平装本改名为《阴暗的秘密》，因为《灵与魂的夭亡》这个标题实在太触目惊心了。这部小说如实暴露了西方社会的阴暗面，然而它的情色、暴力内容却可能会引起我们东方读者的强烈反感。

1984 年出版的《金钱》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社会讽刺小说。此书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约翰·塞尔夫是位极端令人厌恶的反派角色，集粗野、好色、蛮横、奸诈等恶习于一身。他的职业是制作电视广告和色情影片。他坦言其所有的嗜好都具有色情倾向，包括“诅咒、斗殴、射击、玩女人、吸毒、酗酒、吃快餐、赌博、手淫”。塞尔夫 (Self) 的英文含义是“自我”，可见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然而他自我意识的核心元素是金钱。他用金钱来购买一切，包括爱情。他的情人塞琳娜·斯特里特是交际花。斯特里特 (Street) 的英文含义是街道，暗示塞琳娜是出卖色相的街头女郎。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她和塞尔夫上床，她拍三级影片，都是为了金钱。塞尔夫与她臭味相投。他说，“我爱她的堕落”。他们做爱时不是说我爱你，而是说钱。只有钱才能帮助塞尔夫达到完美的性高潮。他内心情绪很不稳定，有偏执狂。他认为塞琳娜应该有众多情夫，这才显得她更够劲，更有价值。他又总是怀疑塞琳娜对他不忠，突然间没来由的惊恐不安、汗流浹背。约翰的父亲巴里·塞尔夫离不开毒品、女人、黄色录像、高级餐馆。他的情妇维罗妮卡是有露阴癖的脱衣舞女。他用儿子的钱来购买性爱。人与人之间没有伦理亲情，只有金钱关系。故事发生在 1981 年，查尔斯亲王和戴安娜王妃成婚，举国欢庆。这是个势利社会，金钱可以购买一切，而高尚的文化毫无意义，因此塞尔夫

追求金钱而不追求艺术。他的另一位情妇玛蒂娜·吐温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她试图引导塞尔夫欣赏高雅艺术，消减他的满身铜臭。但是在塞尔夫眼中，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不是艺术品，而是金钱的等价物。他的心灵已被金钱彻底地占领和腐蚀！小说的主题是金钱：描述了主人公如何得到它、保存它、消耗它、丢失它。在这过程中，塞尔夫日益腐化堕落、丧失自我。作者所使用的语言相当独特，充满着俚语、行话，弥漫着市井色情文学的特殊气息。在字里行间，响彻着金钱以及金钱的呼声，令人寒心地感到这里有一种异化压抑的气氛。这是一个国际性毒品文化的世界，吸食各种毒品的瘾君子令人恶心，人际关系极其混杂。塞尔夫表面上是个文化人，暗地里是个奸商，频繁往返于纽约和伦敦之间，靠走私毒品牟利，小说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变换。在纽约和伦敦各有一个马丁·艾米斯，他们似乎是作者的化身。这些知识分子是在金钱世界中仅存的批判性良知。艾米斯给塞尔夫打工，为他写电影剧本。塞尔夫强迫他在剧本《良币》中添加暴力色情场景。后来塞尔夫穷困潦倒，与艾米斯下象棋赌博。艾米斯不肯手下留情，要将塞尔夫置于死地。最后，塞尔夫撞地铁列车自杀，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口袋里那本用来赚钱的剧本《良币》成了陪伴他走向死亡的绝命书。在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经济暂时复苏，贪得无厌的拜金主义成了流行一时的社会风尚和万恶之源。作者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深恶痛绝。作者以“绝命书”作为副标题，发人深省。金钱的破坏性控制力笼罩一切，要想摆脱它的控制，除了死亡之外别无它途。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警示！

马丁·艾米斯 1989 年出版的《伦敦场地》，题词所示是献给他父亲金克利·艾米斯的。此书篇幅五百多页，是他最长的小说，其中蕴含的黑色幽默甚至超过了《金钱》。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区拉德布罗克丛林，时间是 1999 年。作品结构并不复杂。男主人公基思·泰伦特是个精力充沛、容易激动的飞镖手。他非常迷恋他的女友妮古拉·西克斯，又怀疑她不忠于爱情。读者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最后果然发生了惨案，西克斯被残暴地谋杀了。结果发现是死者本人精心策划，诱骗凶手杀害了她。在人们期盼的“至福千年”前夕，伦敦场地上居然发生了如此惨剧，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什么希望！此书在 1989 年布克奖评委会中引发了一场剧烈争辩。两位女性评委麦吉·琪和海伦·麦克奈尔实在难以容忍女主人公西克斯被残暴杀害的血腥场面。由于她们竭力抗辩，此书被否决了。另一位评委戴维·洛奇为此悔恨不已。他认为当时五位评委的意见是 3:2，此书应该入选。

1991 年出版的《时间箭——罪行的本质》是一部简短的小说。马丁·艾米斯借鉴了库尔特·冯内古特 1969 年的小说《第五号屠宰场》和菲利普·迪克 1967 年作品《时光倒转的世界》中的叙事技巧。作者在此显示出他对自己所掌握的辉煌技巧的极端自信：整个故事用倒叙法从坟墓回溯到摇篮，读者必须仔细辨认那些轶事和对话，把它们颠倒的时序重新理顺。在作者的颠倒叙述中，穿插了许多插科打诨的笑话，其五花八门的内容包括吃饭、排泄、争吵、做爱等等；与此并行的书中人物的倒叙，涉及叙述者苦恼的道德价值判断。叙述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战犯，他在盖世太保集中营里当军医，他不是用其医术救治扶伤，而是用它来蓄意杀人。他在战后逃亡到美洲，把时光之箭倒转过来，从死亡到出生把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于是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犹太难民自然也活了过来，纳粹集中营里出现了奇特的复苏景象。食物不是从嘴里吃进去，而是从胃里反刍出来。清洁工不扫垃圾，而是往地上倒垃圾。既然一切都颠倒了，双手沾满鲜血的纳粹战犯的罪行也就被漂白了。这种是非颠倒的态度和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何等相似！这部黑色幽默作品，启发读者去思考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本书的副标题：罪行的本质——是非颠倒，人性泯灭！

1997 年出版的《夜车》是一部简短的作品。叙述者是一位颇有男子汉气魄的美国女侦探麦克·胡里罕。小说情节围绕着她老板年轻美貌的女儿的自杀案件逐渐展开，总体气氛灰暗、凄凉而充满着不祥预感。作者炫耀他的语言天赋，随意穿插美国本地土话、切口。评论界对此书毁誉参半。

2003 年出版的第十部小说《黄狗》与《夜车》相隔六年之久。主人公汉·米欧是演员和作家。他的父亲梅克·米欧是极其残暴的强盗，早已死在狱中。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唯恐遇见父亲生前的仇人或同伙，害怕他们对他报复。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变得十分孤僻，甚至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直想实施报复的科拉，指使色情演员卡拉把汉诱骗到加利福尼亚，想以色相破坏其婚姻，但未得逞。汉在加州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安德鲁斯。这个意外发现使科拉放弃了报复的念头，因为他并非米欧的真正后代。小说把梅克·米欧作为暴君的象征，表现了主人公如何摆脱暴君影响的过程。他渴望摆脱亡父的阴影，正如那条哀鸣的黄狗试图挣脱背负的锁链。小

说家泰勃·费希尔写道：“我在地铁里阅读此书，唯恐有人从我身后瞥见我在读什么……就像你喜爱的叔叔在学校操场上被当场逮住手淫一样。”马丁·艾米斯却说这是他最好的三部小说之一。此书入围当年布克奖候选小说之列，但最终未能获奖。

《怀孕的寡妇》原来打算在 2008 年问世，后来一再修订，拓展到四百八十页篇幅，到 2010 年才正式出版。此书的主题涉及 1970 年代欧美的性革命，西方世界两性关系的规范从此改观。然而，旧的道德伦理被摧毁了，新的道德伦理尚未诞生。亚历山大·赫征将这个过渡时期称为“怀孕的寡妇”，暗示逝者已去，新儿未生，尚在寡妇腹中。作者以此作为本书标题。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坎帕尼亚一座城堡中，主人公基思·尼亚林是一位文学专业的英国大学生。1970 年夏季，他与一群朋友到意大利度假。他们亲身体验了男女两性关系的变化。叙述者是处于 2009 年的基思本人的“超我”，即他的道德良心。与基思一起到意大利度假的有他若即若离的女友丽丽以及她那位富于魅力的闺蜜山鲁佐德（这位姑娘与《一千零一夜》传奇中的公主同名）。基思与山鲁佐德互有好感，丽丽因而开始折磨基思。小说下半部的情节发生出乎意料的转折，给基思后来的爱情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此书幽默、机智、感伤，是对于性革命浪潮中失去自控能力的年轻人的漫画写照。

2012 年出版的《莱昂内尔·阿斯博：英格兰现状》是马丁·艾米斯的第十三部小说。此书似乎可以看作《金钱》的续篇，金钱魔力在此书中引发的闹剧甚至比前者更为夸张。故事发生在伦敦迪斯顿城。主人公德斯蒙德·佩珀代因住在大厦第三十三层。这位少年的同龄伙伴们在街头打架，他却在图书馆里看书。他的舅舅阿斯博是个贪得无厌的流氓无赖，臭名昭著的罪犯恶棍。他以独特的方式关怀外甥，对他谆谆告诫：男子汉必须刀不离身，与女朋友约会还不如色情挑逗管用，在斗狗场里赢钱的诀窍是用塔巴斯科辣酱拌肉片喂狗。然而德斯蒙德对此毫无兴趣，他在书本的浪漫天地中寻求慰藉，这种娘娘腔的行为使他舅舅火冒三丈。德斯蒙德学识增长，逐渐成熟，想要开始过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这时阿斯博买的奖券突然中了一亿四千万英镑大奖。一位工于心计的诗人模特儿委身于阿斯博，成了他的情妇。阿斯博腰缠万贯而始终不改其流氓本色，然而舅甥俩的人生轨迹却从此发生了剧烈变化。有人认为作者是以轻蔑的目光审视大英帝国的沉沦。马丁·艾米斯辩称此书并非皱着眉头对英国评头论足，而是以“神话故事”为基础的一幕喜剧，并且坚持认为他“作为英国人，深感自豪”。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 A.S. 拜厄特认为，现代英国小说有两种传统。第一种传统是前现代的现实主义。菲尔丁是这种传统的鼻祖。这种传统侧重于小说模仿现实、记叙历史的功能，并且通过“情节”与“人物”之间的交织来表述，注重思维的逻辑性、时间的顺序性和文字的清晰性。第二种传统是现代的实验主义。其远祖可以追溯到斯特恩。这种传统侧重于小说的虚构功能，强调探索小说本身的形式结构，挖掘其象征内涵，并且认为叙述技巧与形式结构的标新立异比思维的逻辑性、时间的顺序性、文字的清晰性更为重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小说出现了两种传统交汇合流的趋势。马丁·艾米斯正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可以想象这样一部小说：它和罗伯－格里耶的那些小说一样复杂微妙、疏远异化、精心撰写，同时又能提供节奏、情节和幽默方面沉着而认真的满足感，这些品质使我联想起简·奥斯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这是我自己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马丁·艾米斯兼收并蓄的创作方式，不仅继承了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传统，而且从法国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爱尔兰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和美国小说家冯古内特、索尔·贝娄、纳博科夫那里借鉴了不少新颖技巧。他的标新立异来源混杂而丰富多彩。在当今英国文坛，不少青年作家深受他的影响，威尔·塞尔夫和扎迪·史密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虽然作者自嘲他的小说不过是游戏文章，我们千万不要被他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所迷惑。他创作的那些“讽刺漫画”中所蕴含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判断，表明他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作家。1989 年春，我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初次阅读马丁·艾米斯的《金钱》时感到十分震惊。狄更斯《双城记》的场景在伦敦和巴黎两个城市展开，《金钱》的叙事线索也在伦敦和纽约两个城市之间交织。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爱情是纯洁的、神圣的。《双城记》主人公席德尼·卡尔登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他为自己心爱的女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金钱》的主人公塞尔夫简直是个卑鄙畜生，情妇是他用金钱购买的泄欲工具。摒弃了圣洁的光环，爱情异化为买卖，英雄堕落为反英雄。我原来以为英国是一个具有绅士之风的国度。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怎么会变成塞尔夫那样猥琐卑鄙的恶棍？我简直无法接受这样的人物形象！

起初我觉得马丁·艾米斯的小说令人反感，难以卒读。后来我注意到，约翰·塞尔夫

在小说中自称“六十年代的孩子”。我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经历过一场激进自由主义社会风暴。正是这股强烈的右倾社会思潮，冲垮了西方传统道德的底线，英雄才会异化为反英雄，神圣的爱情才会异化为可用金钱交换的生物本能。

与英国著名小说家多丽丝莱辛研讨当代英国小说发展,使我对此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她严肃地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造就了整整一代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受过充分教育，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却用它来满足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造成了野蛮的后果。虽然科学昌明、物质丰富、经济繁荣,但是精神空虚、传统断裂、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族冲突、性别歧视、国家对立、战争灾难、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中国现代化千万别蹈西方覆辙，必须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读到马丁·艾米斯小说中的色情暴力场景，莱辛关于“文明的野蛮人”这个振聋发聩的警句，就在我心中回响。也许这就是阅读马丁·艾米斯的价值所在吧。

滚蛋之一

据说我转身离去。据说我视那份友谊轻如鸿毛——我视友谊轻如鸿毛。

我面前放着朱利安·巴恩斯写于 1995 年 1 月 12 日的信。按理说，这张纸是属于我的物品，但版权归朱利安所有。我不会从信中摘抄，只想说信中最后一个短语是人所周知的某个口语词。那个短语由两个词组成。总共七个字母。其中三个是“f”。

就《情报》一书从媒体（“马丁·艾米斯卷入贪婪风暴”）中得到的“再打他，戴”的待遇，在我看来，这是谈判的走向已经出了错的事实证据。所以，最后我就全部交给了美国的经纪人怀利，而这意味着离开我二十三年的英国经纪人，帕特·卡瓦纳。这一过程的第二部分我觉得全然是悲伤不快的（虽说不久前才五味杂陈地经历了更为亲密的关系的断绝），让我觉得这一类的悲伤是直接累积作用于人的，会达到一个极限，而我突然间就到了我的极限。不过，几年前我的父亲也中断了帕特的代理，但没有因此而失去友谊。职业关系上的分裂没有引起什么说辞，但我这次远远要公开化得多，让人痛苦不安，每件事都被夸大，每件事都被扭曲……

当然，朱利安和帕特·卡瓦纳，那时是夫妻，现在也仍是夫妻。我也知道他是个疼爱妻子的男人。但 13 号早上吃早饭时，我认出了他的笔迹，以为他会说自己知道教堂和政体之间的差别，在他的认识中两者会继续分离。之后我读了他的信。

我的第一反应是罪恶感，我让他自降身份，写出这等粗笨丑恶的东西来。而且还弄巧成拙。天哪，我心想：他从来没喜欢过我！这封信让我质疑这份被取消的友谊的内涵，更不消说其价值所在。我意识到，如果那么想，听起来倒是简单干脆得难以置信。那种感觉没有持续下去。读者们都清楚得很，我还有其他更为迫切的忧虑——朱利安列了几项他知晓的，但毫无同情之意。1 月 13 日，其实是个好日子，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二十个月来，我第一次和前妻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话，那封信就在我的口袋里。那天晚上，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写了回信。

上一次我失去一位朋友是在童年时代。自打那时起，我有过几次短暂的不和，却从未断交过。在这事上，正如这类事常见的那样，我失去的不是一位朋友，而是两位。我的回信说好话想求和解。差不多一年之后，有些冰雪消融的迹象后，我也企图想恢复友谊。他的拒绝还算客气礼貌。遣词造句很大程度上能证实我的直觉：所有这些龃龉还有更长远的历史，早在 1995 年之前。

我是在做什么呢？算是澄清问题吗？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当时签下宣誓词时，已经学到了这一教训（他反驳了克林顿的总统助理、他的朋友西德尼·布鲁门索作出的宣誓证词），牺牲友谊对媒体里的“索尔们”和“乔纳森们”来说，是极大的冒犯（他们之间有一个帕特洛克斯就有一个阿克琉斯）他们的描述总是有倾向性，像是这种牺牲了友谊的行为不但用尽了心机还带来百般的开心。而且从来不会觉得遗憾。而在真实的世界中，亲身经历的世界，一场消失的友谊给你留下许多的困惑和疑问；那种模糊不定的空缺不断地萦绕着你的现今、未来，而且尤其不受欢迎的是，还萦绕着你的过往。我觉得，朱利安也是一样的感受。

我写给朱利安的那封信是属于他的物品，但版权归我所有。

利明顿路别墅区 54A
伦敦 W11 1HT
亲爱的朱尔斯：
我原本打算给你写封信，说上这么一段话的：

十二年之前，你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马特，你可以让我滚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我还是要问，你离开了安东妮娅吗？”事实是，我回到了安东妮娅身边。那个时候。十二年之前。但我喜欢你组织这个问题的方式。非常地像你。

之后，我又打算说上这么一段话：

朱尔斯，你可以让我滚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还是请你继续做我的朋友，并且帮我继续做帕特的朋友。

还没来得及提出这个请求，我已经有了你的答案。我过阵子给你打电话——过很长一阵子。我会想念你的。

马丁

写着这几页，我第一次体会到心中冒出怨恨的感觉。写着这段话时，我的双手也感觉到做着不愿做的事，冰冰冷的。但我得把它说出来告诉读者，也告诉我的朋友们。有人称，我转身离去——我是不会做那样的事的。我不是转身离去的那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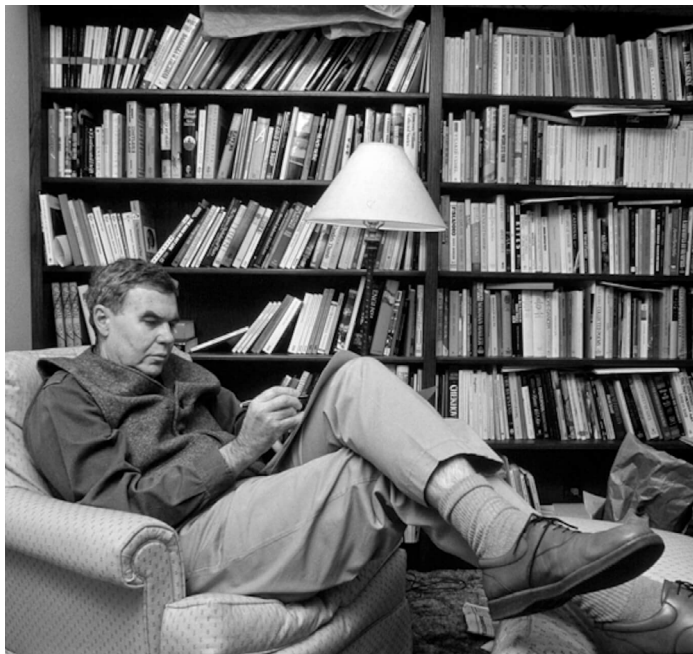


马丁·艾米斯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49 年生于牛津文学世家，著名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与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1974 年，艾米斯凭其处女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并被誉为“文学天才”。艾米斯在创作上深受卡夫卡、纳博科夫、乔伊斯等大师的影响，在写实的手法上融入了意识流、黑色幽默及浓郁的魔幻主义风格；其先锋实验的文学品格、标新立异的创作形式、变幻莫测的情节铺陈以及惊世骇俗的语言天赋是的他被形容为是“蘸着迷药水书写的文坛大师”。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摄影 Bob Adelman

档案

收聚到桶里的雨

苔丝·加拉格尔 | 发现经典

我们能学到他对“什么是重要的”的感知：“爱、死亡、梦想、志向、成长，与自己和他人的局限和解。”

雷蒙德·卡佛 1938 年 5 月 25 日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他擅长以精炼冷峻的笔法呈现生活背后的巨大沉默和种种隐而不露的情感，被誉为“极简主义风格大师”。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大教堂》，杂文集《需要我时打给我》，诗集《我们所有人》等。

今天是卡佛诞辰 85 周年。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小鸟文学摘选了卡佛的文学遗产执行人，诗人、短篇小说作家苔丝·加拉格尔为《需要我时打给我》一书所作的前言，以表纪念。

封

“最后的最后了。”在新发现的五篇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整整一年的出版准备过程中，我对朋友写道。作为诗人，我在这句话中听得见“恒久”的回响。然而，这就是那个非凡的声音全部的新作了一——他用毫无保留的坦诚如此清晰地见证了现实，他的小说也因此在全世界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

雷去世后，村上春树——优秀的小说家、雷作品的日文译者——偕夫人洋子来访。那时他坦言，他能感到雷的存在陪伴着他，而一想到要完成雷作品全集的翻译工作，又感到害怕。现在我明白了，那时的他一定悲喜交加。

当下的努力带给我一种欢喜，是从似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声音里听到新的声响，在落幕后看见意料之外的返场的快乐。如今，要是发现一箱卡夫卡或者契诃夫的手稿，人们应该会争先恐后地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我们的心情也差不多——好奇，怀念，渴望亲近我们在文学世界和人生中倾慕的那些熟悉的灵魂。

对雷新作的发现是独立事件，却也和他在世时发表的作品有关。对于那些盼望着这件事的人来说，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当我们爱一个作家时，我们想一读再读，想遇见

他或她所写的全部——超凡的、意外的，甚至未完成的。我们可以。这种价值不只会从整体中来，也体现在细处：措辞和句法，人物带来的共鸣和惊奇，叙述逐行逐句的展开。

这些小说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发现的。第一次是 1999 年 3 月，在华盛顿州安吉拉斯港的山脊屋，雷去世前最后一段时间我和他的居所。《时尚先生》的资深编辑，我的朋友杰伊·伍德拉夫在这一过程中帮助了我。第二次是同年盛夏，从事卡佛研究的威廉·L. 斯塔尔和莫林·P. 卡罗尔夫妇查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威廉·查瓦特美国小说馆藏。在翻检一箱原稿时，他们找到了两篇完整的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在我生日那天，他们兴奋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新消息。

在我和杰夫找到的三篇之外又有了这两篇，简直是锦上添花。这也为雷未结集作品的重新出版打下了基础。作品集里有许多篇已经收录进之前的《行行好，别逞英雄》（由英国的哈维尔出版社和美国的古典书局出版）。除了这几篇未发表的短篇小说之外，我们还收入了四篇随笔来丰富本书，它们之前收录在 1983 年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杂集《火》中。

雷去世后不久，我在写《通往瀑布的新路》导言时，偶然发现了一些文件夹，里面装着打字稿和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的手稿。那时我不确定这些是不是完成稿，如果是，不应该把它们公开发表。我觉得在考虑这些未发表的作品前，应该先保证出版所有雷明确打算刊印的作品。这就花了整整九年的时间，直到雷的诗歌全集《我们所有人》（哈维尔，1996 年；克诺夫，1998 年）出版才完成。

在五十岁的雷于 1988 年因肺癌英年早逝后，我也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见证了他三本书的英国版和美国版印行；完成了《卡佛的国度》，一本由鲍勃·阿德尔曼摄影的书的相关工作；给罗伯特·奥特曼的电影《银色·性·男女》[1] 做顾问，这部电影是以雷九篇已发表的短篇小说为蓝本的。我还参与了三部关于雷的纪录片的拍摄。以上大部分都是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教书时做的。我居然还写出了三本诗集，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随笔集。

1998 年初快到雷的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时杰伊伍德拉夫打来电话说想在《时尚先生》上做什么来纪念雷。“桌子有这些文件夹。”我说。“可能没什么完整或者有价值的东西，”我告诉他，“但我可以找时间看看。”我猜杰伊听出了我的犹豫。总之，他和我：“苔丝，等你准备好看这些东西时，我很愿意过来帮你。”

杰伊也许正是我一直期盼的那个人。他尊重我的作品，喜爱雷的写作，也了解修改和出版的过程。更何况，作为小说家和杂志编辑的杰伊能够一眼认出好小说。1999 年 3 月，他飞到西雅图，又乘车、坐轮渡，花了三个小时才来到安吉拉斯港。第二天，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们仔细地翻检雷的书桌每一个抽屉里的内容，阅读文件夹里的纸页，做好标记，复印好，最终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整个过程安静、亲密、目的明确。我们就这样读着，渐渐明白有三篇精彩的小说就在其中。想要处理好这几篇未发表的小说的心情盖过了我之前对雷的作品即将完结的恐惧。让《时尚先生》参与这个发现过程似乎也恰到好处，毕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雷的短篇小说就是通过它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批读者。

杰伊负责破译雷潦草的笔迹，好进行准确的抄写。有一份原稿完全是手写的，其他几份是打字稿，上面有改写的笔迹。杰伊完全没觉得这项任务乏味，反而从中汲取能量。而有十一年破译雷的笔迹的经验的我则逐字逐句地对着原稿检查杰伊的抄写，填上他因认不出来而留下的几个空。我们都知道雷有时候会把一篇短篇小说重写三十遍，而这些被搁置的小说远远没达到这个程度。（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雷从小说转向了诗歌，那些作品后来结成了他的最后一本书《通往瀑布的新路》。）不过这些小说不怎么需要编校，人名地名都合乎标准，多蒂不会在下一页变成多洛雷斯，尤里卡也没有变成阿克塔。结局通常是雷着力最多的地方，但在这里，故事有时就停在类似电话铃响了、有人离开了饭桌这样的地方。我们只是让这些最后的时刻回荡着，允许故事在此休止。

想要处理好这几篇未发表的小说的心情盖过了我之前对雷的作品即将完结的恐惧。

雷写过几篇关于人重新开始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我打电话的地方》。而在这批新小说中会最先在《时尚先生》上发表的《柴火》里，一个男人拼命地劈木头，想证明自己在酗酒和婚姻破裂后继续前进的意愿。叙述者也是个作家，他对再次提笔写作的初步尝试让我不无感动地回想起 1979 年，那时雷和我一起在埃尔帕索开始了我们的生活，他也在和酗酒抗争十年后开始了自己全新的写作生涯。

在五篇新小说中,《梦》成了我和杰伊的最爱。一个婚姻破碎的女人在一次火灾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个故事似乎连接了我们在雪城(像小说里那对夫妇一样,我和雷也睡在地下室里躲避八月的暑气)和西北部(我们住的街上着过一次火,不过没人送命)的生活。我也从中认出了雷的短篇小说《好事一小件》的回声,里面也有个孩子死了。我很欣赏雷在这两篇小说中对这个太容易变得多愁善感的主题的大胆处理。《梦》中的细节像烟雾一样从屋顶缭绕升起,行动在明暗对比中展开:场景隐现,聚焦,燃烧。人物的生活完全被周遭环境裹挟,而他们的生活也变成了我们的。

比尔和莫林发现的两篇短篇小说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讲的都是婚姻的破裂。其中《需要我时打给我》中的核心形象可以看作小说《山雀派》[2]和诗歌《雾与马的深夜》的先声。在这三篇作品里,马都在宿命般的离别时刻神秘地从雾中出现。另一篇《你们想看什么?》就像是《瑟夫的房子》[3]的表亲。这两篇小说中都有一对试图重修旧好的夫妇,但他们内心深处重伤未愈,只能各走各的路。结尾处关于“糟蹋”的意象让我回想起雷的小说《保鲜》,它点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就像解冻的食物一样,是会变质的。过了某一个时间点,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当这些小说陆续发表,只剩下一篇还未刊行时,雷的朋友——编辑加里·菲斯克琼又跟我一起把它们细看了一遍。某一刻,我们发现自己删掉了自己放进去的逗号。我们大笑着,互相引用雷的话——发现自己删掉自己刚刚加进去的东西,是小说完成的明确迹象。我最近重读了本书收录的《火》中的四篇随笔。我感受着《我父亲的一生》,像雷第一次给我看它的雏形时那样。这一定是有史以来关于儿子对父亲的爱的最动人的表达之一。有段时间,雷的父亲就住在雷的孩子刚刚降生的那家医院的精神病房里,在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中,雷找到父亲,告诉他“你当爷爷了。”他父亲回应道:“我感觉像个爷爷了。”这句话像远方的隐雷一样轻,听来却像一把锤子砸了下来。

在《论写作》中,我们得以看到雷的文学信条。他避开所谓的“小花招”,以修改工作为乐。他有足够的勇气,在写初稿时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什么地方。他确保小说的张力,也就是他所说的“永不休止的运动”。他知道要省略什么,或者让它们“刚好藏到表面之下”。最重要的是,他强迫自己使用“清晰准确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他为他这一代的作家树立了标杆。

雷对自己的导师、教师约翰·加德纳的致敬,让我想起我们开着车穿越暴风雪去约翰在纽约上州的家里拜访他的情形。我们一直聊到了天亮,尽情享受他的陪伴。是他在雷最迫切地需要关心的时刻在乎雷,在乎雷的作品——甚至交给雷自己办公室的钥匙,好让雷有地方写作。后来,约翰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去世后,我和雷还能记起我们和他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晚,那晚约翰迟迟不愿意上床睡觉。

想了解我们欣赏的作家从何处起步是件很自然的事,而雷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将福克纳和乔伊斯视为导师的《狂怒的季节》标志着他的起点。还有一篇《头发》是块未经打磨的原石,像是后来的《小心》的前篇。在《头发》中,我们见证了“不安之症”最初的几个时刻,它在后来经过打磨,卡佛由此闻名。《迷》也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雷发表的作品中,这是他仅有的两篇戏仿之一。借着笔名约翰·维尔,他刺向那个显著影响了他的人。即便如此,海明威仍然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榜样,后来契诃夫取代了这个位置。

本书收录的评论、导言和其余随笔提醒我们雷的热情所在:他对纯粹的“好读物”、不可捉摸的人物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之喜爱。总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处在紧要关头。当我们读到雷说的关于如何教授写作或如何为选集挑选作品的内容时,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关于地点的生动描摹”或“有魔力的强度”的敬意,学到他对“什么是重要的”的感知:“爱、死亡、梦想、志向、成长,与自己和他人的局限和解。”雷把写作理解为

一种启示的过程,他的随笔《关于修改》也强调了修改的重要性。作为打开小说的一种重要手段,修改从深层意义上探索了小说最初会被书写的原因。

我对本书收录的作品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情感。这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传记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因为它们的明晰和激情。和《行行好,别逞英雄》初版发行时一样,我对威廉·L. 斯塔尔满怀感激之情,是他把雷散落在报纸杂志上的篇章搜集了起来。我也永远感谢杰伊·伍德拉夫,在公开我们发现的这三篇小说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展现出自己私人的善意和合作精神,这项工作也增进了我们早已深厚的友谊。

在西北部这里,我们常常把雨桶放好,来捕捉一些自然的馈赠。雨桶让我们接到充足的软水,可以用来洗头发,浇灌植物。本书就像是收聚到桶里的雨,从天上汇集而来的水。我们能随时沉浸其中,找到一些让我们神思清明、得到滋养的东西——让我们能再次接近雷蒙德·卡佛的人生和创作的东西。

苔丝·加拉格尔
山脊屋
安吉拉斯港
2000年1月

[1] 又译《人生交叉点》《浮世男女》等。

[2] 又译《黑鸟派》或《山雀饼》。

[3] 又译《谢夫的房子》。



需要我时打给我
雷蒙德·卡佛 著
姚卉 译
新经典文化
2023年3月



苔丝·加拉格尔

美国诗人、散文家和短篇小说作家。雷蒙德·卡佛文学遗产执行人。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电影《晒后假日》（2022）剧照

专栏

我们走在大路上

沈非 | 驾驶我的车

如果记忆是照片，
究竟什么才是让真相大白的显影液？

记忆是个抓不住的东西，细节不仅模糊，还总在变化。你越是努力回忆，就越难看清。追忆是一场对记忆本身无止尽的破坏。最近我意识到，感受是比记忆更强大的存在，但它也会让人困惑。因为当你回想起某个时刻，以及那时自己有何感受，回忆将被你此刻的情感重塑——它总是关于当下，也就是那个时刻对现在的你意味着什么。土耳其语（这门语言有许多难以直译的词）里有个词叫 hasret，它的含义包括渴望、爱和失去。

——夏洛特·威尔斯，电影《晒后假日》导演

01

忒修斯的船

过去的那个冬天，特别是 2023 年 1 月开始，我通过一场没有放过家里任何一个人的疾病，重新认识了离我最近的家人。更具体一点的说法是，我对于他们在我熟悉的身外之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了新的理解。

比如沈彤，他是我的爸爸，也是一个本应该延续着雷打不动的日程，每天搭最早一班地铁去吃面，然后买菜回家，期盼着在春节来一场长途旅行的退休爷叔。实际上，他不仅属于一个三口之家，因为远早于成为父亲、丈夫，他持续时间最长、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两个老人——他们是被病毒压垮的典型，一个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一个已经很难记住些什么——牵挂的长子。他和我都在常德路上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地址长大，拥有和我类似的童年。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不仅是我爸爸，他的每一面都有我了解的表层，也存在我无法窥探的暗部。虽然他和妈妈一样从最初就陪伴着我长大，在我早期的记忆里，他的存在感并没有我妈的那么强。我能勉强拼凑出的年轻的他，是一个对我没什么耐心、

听到我哭就会发火的男人，连当时的长相都很模糊，需要老照片提醒。相比之下，我妈和我的爷爷奶奶或许是因为承担了更多近距离且亲密的互动，在回忆里总是很有份量，他们是确定的、不变的，与每个人共度的时光我都能想起好几个故事，不需要动用太多脑力就会浮现在眼前。而老相册里和我在杭州有过一张合影的男人，这个第一次当父亲的年轻人，是比别人晚了一点才在我的记忆森林里落地生根。

他和我温柔地沟通，也是迟到了很久才慢慢开始，同时又因为没有参考，也不知何处去学显得相当笨拙。这种不知所措其实持续至今，有时我甚至会在他和我爷爷奶奶的互动中察觉到某种镜像的存在。我们都在最脆弱、最需要温柔的阶段被拒绝获取一颗糖，以至于当我们终于等到那颗被握在手心太久，有些化开的糖果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面对少有的柔情，我们似乎总是不知该如何做何反应；发生争执，我曾承受过其后果的武断和暴躁，也在我抬高的声音和越来越快的心跳中体现。越是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走上不同的路，越是在偶遇时感慨这可能就是血脉的证据，他虽然不如其他人那样和我亲，但隐隐约约地，我总能在我成为我自己、认识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他的存在。

可能他并不是离我远，只是藏得比较深。藏得久了，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读，有的时候甚至连把他找出来都有些费力。好比说那张在西湖湖畔的合影：小小的我把手放在脸颊边，靠着他的腿，我很想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是害羞还是害怕？

我对于那场旅行的所有记忆都只能通过相片和对话补充来构建，一切既新又旧：我想到照片上的小人一定不会想到近 30 年过去，她依然对于关于自己，关于家人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少。我最早能记起的有关他的事情，包括对他最高频的形容，总是和暴脾气有关，而习惯了这么先入为主的解读，以至于妈妈为那段过去“找补”，都像是我在重新创作有关他的一切，关于我们最初是如何学着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见证。

有些时刻我不需要他人转述，甚至我自己说起它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语速柔和。说到底，还是因为这样的父女时刻，太过难得。印象最深的两个时刻都发生在夏天，其中一个是一某一年我放假回国，所以事后想来那短暂的亲近也是聚少离多带来的顺理成章，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他意识到可以离我再近一点，再近一点也没关系。

无所事事的下午，我横躺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头枕着一边的扶手，小腿肚搭在另一边扶手上，像个被吊床兜住的水手，整个人都浸在适宜的温度里，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爸爸穿过走廊，慢慢地来到我身边，因为害怕吵醒我所以脚步很轻，像是以前住常德路时奶奶养的猫。我迷迷糊糊，也没睁开眼睛，但我坚信自己感受到了他的止步与注视，以及几秒钟后，他轻触我额头的手。

另一个时刻发生在我即将升入高中的八月，我在书房抱着切了一半的西瓜，边挖边在电脑上看着动画。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我们关系比较明显地缓和下来的开始，因为刚结束一场大考，一切休闲都是被允许的——中考结束那天，我走向等在考场对面的爸妈，爸爸的反应是向我击掌，尽管我想不起他当时是以怎样的笑容迎接我，我仍记得手掌相碰的力道。

而在八月的那个午后，他走进书房问我：“你想不想去苏州玩？”

在说完“好啊”以后，他像过去的那个冬天里“命令”我爷爷奶奶不准出门以免感染上新冠那样，让我简单收拾下行李，和他一起坐火车去苏州。很多年后，他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和他的脾气一样，时不时在我身上复现：总在提前决定，希望对方接受一场精心策划过的大冒险。那年的我太年轻，是后来回忆起那个奇妙的提问时刻，才意识到他做了多少准备。当然，这准备对大人来说并不难，但对不知道糊涂女儿是否答应的大人来说呢？我猜他没有对我拒绝他做任何心理准备。我怎么可能拒绝他？他那么笃定，就如我如此信任他那样。

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单独旅行。

我们好像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02

择邻处

常德路 771 弄 2 号，这是由我奶奶张平的爸爸，一代“沪漂”张遵时买下的房子。他和妻子邹蕙卿在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育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花园里种过四棵树的树苗。等我长大一点才听大人说起，这个弄堂的另一个名字叫“择邻处”，而且弄堂深处、大门正对着弄堂口的房子里，还住着康有为的后人。因为当时的我依然还是

个小孩, 这些名字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含义, 住在常德路的十多年, 我没有想过要去深入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 因为它的存在是如此理所当然, 在爸爸买下第一套房子、“我们家”和“奶奶家”之间的区别开始隐约显现之前, 那就是我唯一的家。

很多年来, 那个老房子也是“我们家”许多人, 从张遵时、张平, 到沈彤和沈非唯一的家。而我们最大的“失策”可能就是从对家习以为常开始的,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不承载历史, 没有一处破旧“生来如此”, 一旦记录停止, 我们就再也不知道它曾经是怎样的地方, 那里的人是因何相聚又离散的。

我的太外公遵时是常州武进人, 因为去世得早, 我对他的印象局限于一张挂在墙上的肖像, 一些模糊的夸赞和难掩的遗憾。根据我奶奶的描述, 他不仅会写很美的毛笔字, 文章也写得很好, 是个“文化人”。他曾是个热血青年, 而在一百年前, 深信某种理念的代价是逃离家乡, 好在上海接纳了这个人, 他的文化与文字最终助他成为纺织业协会的秘书长, 拥有体面的生活, 成家立业。他选的是择邻处。

直到今年春节, 我再想起他之前, 除了几次拜访我奶奶时她提起过几句, 没有人会意识到他明明是家里故事最丰富的人之一, 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在这里,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选择。我甚至怀疑, 如果不是我在年夜饭上如此好奇, 刨根问底到不愿意怀旧(“都是不好的事情呀”)的妈妈因为不耐烦, 劝我少问少说, 对遵时仍有些印象的爸爸和嬢嬢也会忘记那些仅存的片段。他们小的时候, 相机是特别稀罕的东西, 而等到我出生, 大家更愿意拍的也是远行时的风景, 而非近在咫尺的老房子和日常生活。

遵时在择邻处的人生像是残片, 每个人手里拿着的都是不同的版本。爸爸告诉我, 他的外公在大鸣大放时期, 因为说了真心话, 被打成了右派, 下放至嘉定外冈的化工厂, 当时从上海去那儿, 路上要半天时间。最终遵时提前摘帽, 属于脱帽右派。他和自己的第一个外孙, 也就是我的爸爸共度过几年时光, 而爸爸印象比较深刻的事件是被外公领去合作社买棒冰吃。

我的嬢嬢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临终时全家人聚在床边的画面: 遵时提笔留下了“步调一致”, 因为没有力气, 四个字歪歪扭扭地挤在了一起。我一度为这个细节深深感动, 后来才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 嬢嬢出生时遵时已经离世了, 她不可能见证外公离世。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出自我奶奶的日记, 还是哪位姨婆之口, 再怎么充满好奇, 我也察觉到通向过去的路始终是有边界的。除了记忆自然衰减, 另一个原因在于那过去太沉重, 要想好好地活下去, 必然要和创伤拉开一段距离, 而不是沉浸其中。

因此, 我对遵时的调查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去看望奶奶, 想问问她记得多少关于那个人的事, 最开始她因为新冠影响, 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 只知道他是自己的爸爸, 听我讲起这个名字, 她会条件反射似地反复念叨“危险、危险”, 当我问家里有没有留下他的遗物, 也只是摇头。那几天我怕她伤心, 回忆过去又耗费脑力, 不敢再深入地问, 但她的提醒也验证了我爸爸的说法: 那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年代, 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坦诚, 全家人付出了代价。

等她在我们的陪伴和护工照料下变得清醒, 有关遵时的问题, 她能回复我的, 也没有超过已知的范围。那范围太小了, 因此仅仅是确定他笔名写作“晦庵”, 都让我感到自己发现了无价之宝, 即便它只是两个普通的字, 我连有几篇以此为署名的书法和文章还留存于世, 都无处知晓答案。

“家里还有遵时的东西吗?”

“没有, 这里没有了啊……你还记得常德路吗?”

我想奶奶的意思可能是指, 当常德路 771 弄 2 号因为建设昌平路地铁——那个位置现在是昌平路地铁站三号出口——而拆掉, 她也正式和那里做了切割, 不仅是物理上的, 也是回忆层面的。她和爷爷搬进了安远路上的公寓楼, 老气的择邻处、父亲的遭遇, 以及因为空间狭小而和兄弟姊妹争地盘的往事也被她塞进了“没必要多想”的抽屉里。

我试着引导她再搜寻一下残片: “记得有人和我说过, 遵时因为是第一代党员, 县志编撰组在他去世后主动找上门采访、要遗物。不知道常州来的人是不是拿走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一样都没有留下吗?”

“可能有过吧。后来、后来搬了……”

我开始清醒, 意识到我们再怎么努力, 可能都是无用功。他是她面容遥远的父亲, 也是我无比崇拜的太外公, 我和他相隔了三代人的时间, 如果说才 30 岁出头的我就记不清爸爸年轻时是怎么陪伴在我身边的, 我又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帮助奶奶想起 1940 年代, 在不满十岁的她眼中, 遵时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否想过一百年后, 此刻的我们会如此强烈地希望了解他, 想象他刚搬进择邻处时的样子? 他想象过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吗?

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有关父母的顿悟瞬间。从此, 你开始意识到他们在成为你父母之前, 是截然不同的人,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做过蠢事。我已经忘记第一次听说爸爸的童年故事时自己几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它应该发生在父女关系开始缓和之后。

记得生活在常德路时, 我曾因为目睹爸爸和奶奶吵架吵得愈发激烈, 偷偷跑去亭子间打电话报警。这是一个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 在当时又如此自然的决定。警察上门了解情况, 留下几句告诫的话就走了, 最后是妈妈(也可能是奶奶)来到亭子间对我进行教育, 大致是说“你不要害怕, 这样的事不需要叫警察”。那并不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爸爸和其他家人争吵, 但的确是我最后一次为了“家里事”报警, 无论之后的争吵有多让我难以忍受。

在奶奶口中, 被称作“彤彤”的爸爸是一个从不让人消停的小孩。先是因为体弱多病, 总是被送去位于新闻路的静安区中心医院, 等身体好了, 似乎又会进入过度补偿的贪玩模式。奶奶描述过一个极具喜剧效果的场面, 有阵子只要一回到 771 弄, 就能遇到站在弄堂口等着她的邻居, 依次列出“彤彤妈, 彤彤今天又调皮捣蛋了”的诸多罪状。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一顿毒打, 而且奶奶从来不听爸爸的解释。

我估计爸爸那时候已经不算幼童了, 至少是会跟着弄堂里的大小孩一起占山头当大王的年纪, 因为根据嬢嬢的目击证言, 她记得自己的哥哥总被妈妈打, 那场面也让她害怕——很多年后, 爸爸会调侃自己说“小时候太爱玩了, 不打不行的, 要做好规矩。”

要论口无遮拦, 爸爸最著名的事迹要数在参加完一场在龙华举行的葬礼后, 竟然在回家路上突然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奶奶回忆说, 当时大人们都不知做什么表情, 但就此认定这一定是个聪明的男孩。

爸爸在文革期间长大, 规矩在那个时候不仅善变, 对小孩而言也过于高深。奶奶还分享过一件现在想来我也后怕的事: 当时, 家里还住着奶奶姐姐家的小孩, 也就是爸爸的表姐。一天, 弄堂里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革命标语, 有人挨家挨户寻找嫌疑人。没料到, 爸爸和表姐因为不懂事, 宣称对方是写字的人。所幸因为两人年纪太小, 大人们也没太当回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些规矩属于某种民间“智慧”。爸爸因为过于调皮, 成了 771 弄的小名人, 弄堂对面刚好是个化工厂, 那里的工人们觉得这个男孩很有意思, 故意用冷饮哄他, 让他对着工厂的喇叭唱样板戏。冷饮当时是稀罕玩意儿, 没什么人能吃到, 对爸爸来说是极大诱惑, 最终这奖励成了甜蜜的痛苦, 肚子吃撑了, 过了马路凯旋而归, 刚到家门口爸爸就憋不住, 吐了个精光。

同样是在奶奶的规矩下长大, 我要比爸爸省事不少。我对自己的定位从不是豁得出去的类型, 我能记起的调皮捣蛋, 也就是把花园里的砖头一个个拨开, 用小树枝招惹蚯蚓。有一阵子, 奶奶总是会提起小时候我家装完电话后, 每次我接起电话的反应——“您好, 请问您找谁?”——她还会转述打过电话的大人们对此的强烈感受: 很懂礼貌、知书达理。

我一度接受了这个“初始人设”, 但也因为看起来比较好欺负吃过不少苦头, 连奶奶都对我一些完全不懂变通的行为感到不解。说到底, 大人是希望你做个“乖孩子”, 但又要维持住一条不太好惹的底线, 不然总有一天走上社会就会吃亏。这句话的问题在于, 社会一直都在, 并不会因为我从小就自动隔离出我的世界, 我始终“在社会上”。懂礼貌但不懂得如何为自己出头是要吃苦头的, 有一次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去附近的点心店, 他们让我占座, 自己去柜台点菜了, 结果有一家三口占了剩余的三个位置, 我始终没有开口。可能不知道说什么是要的, 主要还是怕。事后分析, 可能是我过早就懂得回避冲突的重要性——这是我最先习得的生存技巧。

要到很多年后, 差不多是我开始工作, 长辈们才开始道出我意想不到的往事。对他们来说是怀念, 对我来说却仿佛第一次听到爸爸顽皮史那样新鲜: 什么, 我曾经是这样的吗? 连我都有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刻。我甚至有点喜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朋友。

奶奶讲的故事和常德路院子里的树有关, 右边角落的法国冬青长得很好, 但影响到了二楼邻居, 那位阿姨二话不说就剪掉了不少冬青枝叶。奶奶见树被损毁, 非常光火, 在院子里指着二楼开始说狠话, 说着说着, 也不知道我从哪里“登台”, 有模有样地学起奶奶, 祖孙搭配着训斥了好长时间。妈妈还补充细节说, “当时你双手叉腰”, 非常神气。

原来我是敢说话的, 在大人安静的时候也勇于冲在前头。妈妈告诉我, 以前有人给我们家送水, 结果水迟迟不来, 她和爸爸非常恼火, 骂骂咧咧地抱怨了一阵子。等水终于

送上门，她俩气也差不多消了，反倒是我开始像录音机一样，冲送水师傅大发脾气——每一句话都是刚才她和爸爸讲过的。

因为无知无畏而口无遮拦。如父如女。

04

仙鹤的孩子

春节后，我和爸爸提起要去给太外公张遵时和太外婆（小时候，我喊她“太太”）邹蕙卿扫墓。最初，爸爸只是凭记忆大概知道墓在一个叫仙鹤墓园，对墓穴究竟在哪里、怎么找则是一头雾水，我们其实都很清楚，我的奶奶和姨婆们，作为遵时和蕙卿的女儿，都因为上了年纪和不在上海，这几年几乎没有给他们扫过墓。到了爸爸和我这一代，能想起他俩的人就更少了。

就好像择邻处那样，悄无声息地被遗忘。而我是太太带大的，因为写下《驾驶我的车》，我非常想念她，也想好好看一眼遵时。在我们还不知道爷爷能否顺利出院，奶奶只记得我会开车的那个下午，我坚信自己收到了他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信号，希望我能把奶奶照顾好。

2月4日，我在微信上又一次和爸爸提了想去扫墓的事情，没多久他便发来长长的回复：“……但如果真想去亦有办法：问清醒时的奶奶或真真阿婆甚至小玉阿姨，总能问到的。至于嘉定的仙鹤墓地因为规模很大，一般的上海人都知道且前往的交通还算方便。”“那更要去了！我打印文章出来多烧几份。”我兴致勃勃地说道。

因为《驾驶我的车》，我和爸爸的关系有点像从父女变成了战友，他记得我在文章中写到和他互动较少，主动表示会用联系多年失散的家人等方式，和我一起把家族记忆保存下来。他先是从和自己一块儿长大的表姐，也就是我的小玉阿姨那里问到了正确的墓园地址（不在嘉定），还有了一张小玉阿姨画给我们用来找墓穴的路线图。

在搜集素材方面，他比我更懂也更热情。我们从未想过一场疾病、一篇文章会在我们心里激发出那么强烈的与家人“重逢”的欲望。春节期间为了“传播”我的文章，他加入了奶奶所在的一个家族群，加上了他的那几位姨妈们。

其中一位姨妈也是我奶奶最小的妹妹，我叫她满满阿婆。满满阿婆很多年前移居加拿大，爸爸和她若是想聊天，总得算好时差。

2月9日凌晨，爸爸突然向这位阿姨说了很长一段真心话，并且把他们的对话转发给我。

他告诉已经多年未见的满满阿姨“印象中的外公会抱着我芸合作社（近西康路拐角处）买棒冰吃，其他的印象几乎没有了。但自他最后查出肺癌（晚期）直到他死的那段日子我是记忆犹新的。……临终的那一幕我更记得清楚，你们几个子女急送他去医院抢救，只留阿婆和年幼的小玉和我在家留守等候消息，当时我心里很害怕，几个小时后，你们几个子女回来了，从后门进来后便是一片哭声……”

“外公外婆的墓区我去的次数很少。早年是我妈代表去仙鹤墓园的，墓穴毕竟在哪个位置，几路几号我都不知道。这回我爸妈的这场灾后，尤其是非非写出了《驾驶我的车，拿起你的笔》后，她也屡次问我当年的情况，并流露出想去那儿看看的想法。好了。现在这事论到我們了。我与非非原已商定近期会去看一次。满满阿姨，我俩肯定会去……他离开人间整整55年了……”

可能是爸爸的坦诚为表露真心创造了久违的安全空间，那天早上小玉嬢嬢也用自己的对遵时和蕙卿的记忆予以回应，在给爸爸的微信里写道：“对外公外婆可以说还着比父母更深的感情。没有外婆就没有我。我小时候差一点是被奶奶带到河南。是外婆把我带到上海的。我每年都会去1-2次给外婆扫墓。墓前的狮子金粉也是我和尤卫星刚刚去年10月份刷上去的。因为实在找不到刷的人。还有小时候我们一起长大。平平阿姨和姨夫对我们都很好。我的童年也是蛮幸福的。这些我也不会忘记。”

小玉嬢嬢提到的平平阿姨和姨夫正是我那走了一次的奶奶和爷爷。2月14日，我去看望二老，在奶奶的日记本，也是我给她的留言簿里预告了我和爸爸要去扫墓的事，还将小玉嬢嬢的话摘抄下来。我害怕奶奶忘记，更害怕她不相信。她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失忆”，越是对于我们在本子上的表达感到不信任。

我准备带上相机去扫墓，这样如果奶奶仍旧不相信的话，我还能把照片打印出来给她看。她本身就不怎么用微信，相比点开微信里的数码照，一张能拿在手里的照片才称得上“铁证”。

我和爸爸是2月16日去扫墓的。工作日早上的墓园除了我俩没有其他祭扫者，门口贴着有关文明祭扫的宣传广告，说里面不能烧东西。因为我许多年没有扫过墓了，本以为可以当场把带去的文章烧给太外公和太太，只好作罢。爸爸在商店买了鲜花和两瓶水，当作是祭祀用酒。

我们遵循着小玉嬢嬢的指引，穿过松柏树和连成一片的灰黑色墓地，内心默默计算着排数，没多久就找到了。

遵时和蕙卿的墓小小的，碑上的字没有褪色，黑红分明。那上面记着对我和爸爸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名，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但从很多方面来讲，我们又对他们一无所知。我看着碑上的照片，发现我早就不记得小时候看到的遵时照片是什么样子的了，或许那也是我们全家唯一拥有的一张他的照片。

许多人的过去与思念就这么安安静静地雕在这里。四个日期提醒着我，原来他走得那么早，很巧的是，他的忌日刚好和我生日隔了一周。太太蕙卿的死我有印象，那时候我还没有过五岁生日，钟点工陪着作为第四代的我待在家里度过了一个隐约知道发生了很糟糕的事，却不知究竟怎样的夜晚，就像爸爸当年和小玉嬢嬢作为第三代留守在家一样。

我们其实记得很清楚。我举起相机，拍下了合掌祈祷的爸爸。全程我们都像已经在大脑里排练过好几遍那样克制冷静，直到临走时，爸爸才突然带着哭腔说道：“外公外婆，我一定会帮着非非写好她的文章，让你们在她的文字里得到永生。”

回家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我爸爸自苏州那次旅行以来，第二次父女单独“远行”。我们都没想象过，这次“远行”竟然走得那么远。

回家后，我把爸爸拍下的我的照片发给了小玉嬢嬢。

“今早打印五份文章去看他们了。”

嬢嬢回复：“好样的[强]记得太太小时候一直和你玩办家家。一个扮孩子她爸一个扮孩子她妈。你给了太太很多快乐时光[合十][合十][合十][强][强][强]”

办家家？我知道太太陪我长大，但对我们具体做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谢谢嬢嬢叔叔去年上了金粉，真好看。我都忘记这件事了，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开心。她是爸爸还是我是爸爸？”

“我们自己涂的没有专业涂得好。你是孩子妈妈，太太是孩子爸爸。”

“还好嬢嬢记得，不然我也忘了。”

很感激即便没有相机见证，也有别人记得这件事，让我知道我也给长命百岁的她带去过快乐。

爸爸想起了另一个细节，忍不住和我分享关于一首歌的“真相”：

“我爷爷（沈墨林）过世（约1964或1966年，待查实）在龙华殡仪馆开追悼会结束后，我外公（即张遵时）抱着我走在了家族队伍的第一个离开殡仪馆时，因龙华的那条笔直且绿化做的很好的道路，在我外公的怀里高兴的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来…这和当时的场景多违和，只因我只是个小孩，一千大人们只能面面相觑，没人敢叫我停下来…”

“原来这首歌即是在这个情景下唱的。你也给大大和其他人带去过快乐，在那么悲痛的时刻。”

“此事我长大后，每每被奶奶（我妈）作为我打小就聪明开口早会唱歌的例子，广而告之天下。”

“是的，没想到。”

“我突然有个想法。索性就把《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为你文章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吧。”

05

证言

2月19日，我去看爷爷奶奶，发现奶奶在我14日写下的小玉嬢嬢每年都会扫墓的信息旁留下了一个问号，甚至还在15日她自己写的条目里说翻阅昨天沈非写下的长论，觉得其中有些内容是不可信的，如每年都会去扫墓。”

我们该如何让一个人想起自己是被爱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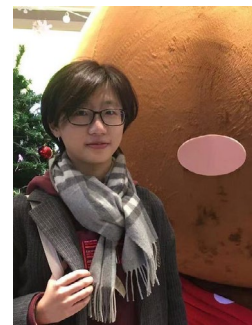
我能做的也只是在日记本上接着写、记罢了：

中午非非来看你们,并告知她和她爸于周四,即 2 月 16 日上午去看了大大太太的墓。她还给你看了扫墓的照片,让你知道墓碑干净是因为贺玉和尤卫星叔叔每年去看的结果。因园区规定不能烧纸,她打印了五份《驾驶我的车,拿起我的笔》放在墓上。

可惜,今天和你提起小玉嬢嬢他们扫墓的事,你仍不信,认为是在骗你,我不知如何是好。或许,我们必须把照片打印出来、贴下来,你才能确认是嬢嬢叔叔二人,我和爸爸二人,接力扫墓。

奶奶,我们很爱你,也爱太太大大。希望你多相信我们的爱。

我把几张照片在微信上发给你了,你可以用以佐证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沈非

小鸟的家人。她“飞”过许多地方，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驾驶我的车

她接收到了来自昨日世界的信号，轻轻踩下油门，去往她爱的人身边。



题图为《欲望都市 第一季》（1998）剧照

专栏

你知道雪地女王是谁吗？

刘天 | 斯嘉蒂的眼睛

如果每个人都要去追求正确的、
优秀的感情，世界有点无聊。

最初看到这个名字是在小红书，一些女孩把雪地女王的理论做成章节体的 pdf，截图画出重点。

后来我知道，雪地女王的理论发源于豆瓣。豆瓣有一个[失恋开导小组](#)，组长和这个 id 为雪地女王的组员承担着帮 19 万组员走出失恋痛苦的重任。

组长甚至出了一本书，叫《如何优雅地挽回前任》。在书的封面上，作者的头衔是，“资深情感开导师，失恋复合大师。”

不得不说咱这儿的语言，堪称幽默。有一天我看到有人反反复复提到一个叫青砖的词，好像是个代指，看了评论才知道指的是“情专”，即情感专家。

在雪地女王的理论里，应对失恋最有效最核心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断联。她有一个著名的帖子：《和你们聊聊分手和断联背后的哲学》。

高频词是“断联”、“mv 低”、“爆 pu”，这些词衍生于 ayawawa。MV 指的是 Mate Value，伴侣价值。

PU 是 Paternity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是指男性天生无法直接确定后代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于是男性会通过观察女性的表现来判断是否可以和这个女性生孩子，以及养孩子。比如女性社交圈越广，PU 越高。女性物质条件越好，PU 越高。女性脾气越不稳定，PU 越高。雪地女王强调了“本帖终极的精华”：

“要一个男人爱上你就是要不爱上他，就这么简单”。

在这个帖子里，每天都有人排队“求骂醒”，有的人后悔没早点看到这个帖子，浪费了很多时间。雪地女王的理论打入了女孩们失恋的心房，成了一种方法论，在各个女性社群跨越年限地流传。有个女孩这样说：“在断联的过程里反思总结，收拾心情，提升自己。这才是我们这位女王的真正用意啊。”

我看到一个女孩学习了雪地女王的理论之后，在小红书发日记，每天更新自己失恋断

联心得。

第一天：为什么都女生在想爱不爱？妄念太重！！有什么爱不爱的，你跟人家谈爱，人家就看你有多少便宜可以占，你对他有什么帮助，只会跟你算账呢。

第二天：今天的感悟：女孩子不如也学学男人，相处过程中不要在乎多少虚无缥缈的爱情，只注重需求，看清楚这只不过是提供需求和索取需求的过程，就好过很多。

第三天：恋爱就是一场博弈，分手了就是敌人。

让我惊讶的是，几年过去了，在小红书失恋的女性群体里，这些理论依然流行。因为环境还是一样的环境。这不是女孩本身的问题，这是父权社会的问题，环境导致个体独立性的缺乏与低自尊。

为什么我想跟他再试试，他一句话都不回？为什么我痛苦，但他好像打打游戏就好了？

为什么他可以说自己从来不会陷入这种境地，努力加班就好了？为什么我会回溯，会反刍，但他不会？

女孩有太多问题，希望老师提供标准答案。看起来雪地女王和 ayawawa 理论是相反的，她要女性独立强大，不再关注男性，核心是重建自我，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但它的延展还是用男性的逻辑去解释一切。这些理论都是希望女性适应现有的社会框架，从而过得舒服，而不是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

可是，独立女性就是要像男人一样活着吗？独立女性不能因为失恋而伤心吗？独立女性应该只谈需求不谈恋爱吗？独立女性到底是人吗……

很难赞同这些理论。

很多人说要像男人一样活着，像男人一样谈恋爱。我很理解这样说的出发点是出于女性有着更丰富更细腻的情感所以承受了更多痛苦。但既然知道男性很难有女性这么细腻的情感感知，为什么还要像男人一样活着呢？这背后的价值观还是慕强，以及用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解决情感问题。但这不是购物节买东西，没法利益最大化。

承认为感情而伤心为断裂和失去而哀悼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情绪啊。人心的幽微，感情的深邃，每段具体关系的复杂性，也没法三言两语套用理论讲清楚。

如果这些可以解决具体的问题，那大家踏踏实实去做期望交配的合格的高等动物就好了，又何必期望天马行空的爱情。

我们希望分手的时候要优雅、独立、姿态好看。但是看心电图就知道，人的心永远不可能走直线，除非死了。如果每个人都要去追求正确的、优秀的感情，世界有点无聊。

还有，分手了一定要提升自己吗？我觉得我们这里的人，对“提升自己”有一种出于恐惧的执着，或者必须获得点儿“意义”的执着。

想到一件事。有一次和三个已经工作了好几年的朋友聊天才知道，他们的父母直到现在还会督促他们不要荒废学习，而且学习的领域是非常应试和功利的，比如考试、考证、提升学历、炒股等等。

这几位朋友都举了一些好笑的例子。一位朋友的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最近经常催他多看书，并且要写读后感。

另一位朋友的爸爸希望她学习炒股。我小心翼翼地问，是 A 股吗，叔叔赚钱了吗？朋友想了想：“我也不知道，好像没有。”

还有一位朋友的爸爸督促她要坚持学英语，并且十分以身作则，年近五十天天用扇贝背单词。但因为一直在国内生活，好像没有实际能应用的场景。

“我去英国读研之前，考雅思的时候我要背单词，所以他和我一起背。后来我不背了，这些年他还在背。可能是跟同龄人说起的时候会自豪吧！”朋友对爸爸的行为这样推测。

接着上面说的人们总是追求一种正确和优秀。

这几天文化圈的性骚扰曝光愈演愈烈。但很多讨论正在从谴责性骚扰本身，又悄悄回到了对女性、受害者本身的训诫。

比如这个微博：

“那些锤史航的女孩，建议写东西直接简练，文字精准点。勇气可嘉，但文字水平一言难尽，矫揉造作，重点不清，七八句说清的事在那长篇大论，情绪大过内容，水话超多，我一个支持者都有点没耐心看。都是这类文艺青年，难怪最初会仰慕史航那点微光，就史航那个破水平。

这种摆事实说道理的申诉檄文，一个个写得跟琼瑶似的，自减杀伤力。写小作文是情非得已，性骚扰就是很难取证的，我支持对这个流着口水的公猪全网围剿，他所凭不就这点网上名气吗，混圈赚钱都靠这，就让他死在网上。但是写东西简练直接清晰才最有

力量啊朋友们，可以争取更多清醒的支持。”

这段话是挺典型的抑制女性写作的口吻。它仿佛在暗示，女性那些细腻微妙的情绪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不重要，无价值，也上不了台面。

可是情绪为什么不重要呢？人每时每刻都能产生情绪，情绪、情感，这些占据了人生这么大比例的事情，它们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可以被写出来，不能被放在公共议题里讨论？

重要的是，她记录的那些细节，也许能给其他女孩带来共鸣、指引和勇气。这些在以前是空白，没有人告诉女孩该如何做，如何记录，如何寻求帮助。

这条微博的评论里，很多人说看不下去，啰嗦，自己压根都没转发之类的。啊你没那么重要吧，你什么感受我也不在乎呀，你又不是当事人。

也有人说，都美竹就是逻辑清晰的范本，但大概率找了代写。总之受害者怎么做都不对，写得好的是代写，写得不合意是矫揉造作一言难尽。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受害者的要求很高，希望一个人在面对不愿回忆但却无法回避的痛苦时，还要冷静客观，简练精准。可是那些陈述即便是公共写作，但首先也是个人议题和私人感受。那是她的叙事，她的书写，她的经验，她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的、可用的、喜欢的文体。这没有标准答案。她们不用自己擅长喜欢的方式写，难道写申论？

问题可能不是一些女性太关注感情了，而是人本身就应该得到足够的情感教育，而咱这儿大多数人缺了这一课。

总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别人的“建议”不重要。都是碳基生物，谁又比谁高级呢，死了都得装小盒。

我是说也别把这一篇当成建议或情感专栏。



刘天

干过营销，做过创意，爱在饭馆偷听别人聊天，爱骂人，爱玩。播客“几乎正常”的主播。

斯嘉蒂的眼睛

专栏名字来源于 DotA 里的装备“斯嘉蒂之眼”，冷静观察但激情输出。 试着做一种具体的表述，过具体的生活。做一个真的人，说些真话，有一些真心。



题图为电影《她说》（2022）剧照

专栏

037 郭睿 不做记者之后， 她选择做一名刑辩律师

杨樱 | 接力访问

“跟诸位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

2023 年 3 月下旬，郭睿在成都做过一次分享，题目是：为何从一个新闻人变成了一个法律人。她当时说，如果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她还在广西的山里跟着新闻发布会提供的地点寻找东航的碎片，以及想办法采访家属。

郭睿现在是实习律师。当时她刚刚结束作为记者的工作一个月。分享会选择的时间点当然是碰巧。比这个时间点更巧的其实是她的职业生涯。“第一个跟进的大选题是马航 370 一周年，一个空难，到结束的时候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难，而媒体环境已经变化了这么多。”

郭睿生于 1988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先是做了两年多独立电影然后去了凤凰网担任深度报道记者 2018 年下半年因为还是想做传统的硬核新闻，以及更多国内媒体操作上越来越困难的公共议题，她搬到广州，入职《南华早报》，用英文做报道。回顾这一路，她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赶上了一个尾巴——无论是市场化媒体、调查新闻甚至是法律——“感觉那时候都还比较繁荣”。

这个说法其实更接近于某种怀旧，因为繁荣严格意义上从未真正发生过，只不过一切都互为参照系。郭睿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她会说“记者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的核心是如何把故事写好这句话乍看上去会很像一个把公共议题仅仅当作选题来对待的冷血记者，但如果了解郭睿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她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有公共面向的职业里面，记者可能是身心消耗成本总体相对较低的那一个。尽管郭睿说自己“还处在一个有很多好奇心的阶段”，但她对消耗在大量卷宗、漫长诉讼的刑辩律师工作并不陌生。

她在 2021 年就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但记者这份工作依然持续了两年。这里

面当然有挣扎。她一度想过是否要举家搬去香港，后来这个选择也失去了意义。在各种挣扎里，“公共价值”是一个硬性标准：她的下一份工作必须是她愿意做的，而且是有公共价值的。最后让她下决心离开媒体的，东航坠机报道算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2018 年入职《南华早报》的时候，她其实是有准备的。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写给历史。我知道它是不能在墙内传播的，又是英文的，你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读者。自己还有一个艰难的职业转换，从写中文变成写英文。”

但还是有她无法招架的局面。

“以往跑一些突发现场或者写一些比较大的稿子你跟同行之间大家都会在现场会遇到。会有那种大家又合作、又暗暗较劲（的情况），看谁能拿到更多料，会想着要打败同行，我要比你写得更好。”

“之后虽然可能发出来之后会被删掉，但是有一个时间差，一开始一两天，后来可能是半天，或者几个小时，但你觉得你至少发出来过，至少这个故事被人看到了。你觉得这些人的悲惨的遭遇或者是引发他们这些悲剧的原因，你至少曾经把它写出来过。你觉得都是值得的。甚至那时候跟同行之间的合作和较劲，那种竞争，你都会觉得还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就表明你总想比别人采访到更多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状态，还是可以写。”

“到后面去（采访）东航（坠机事件）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大家之间就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了……大家开车一起跑来跑去，最后大家恨不得说，‘来，我们把东西都给你，你的空间最大’，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普通民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对媒体的污名化……我也觉得我真无奈，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这都是记者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就得不到正常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是越来越少的，然后那种恶意和戾气是越来越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郭睿的转行选择是做律师。一开始是想做商事律师，但是最终依然变成刑事辩护律师。

“一开始带着记者职业生涯的倦怠感和挫败感，后来觉得还是应该试一试，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你想帮助一些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至少是知道刑辩流程是怎么样的，具体如何操作，在哪些很具体的细节上可以保护自己。”

此时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或者朋友碰到麻烦了吗？”

郭睿奇怪地反问：“这不是很多吗？这不是很正常吗？”

她的确没有马上开始作为刑辩律师的工作。“一开始肯定不行，因为我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职业转换的新晋律师。没有那种抗压能力，你是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郭睿不是一个对“麻烦”陌生的人。除了社会新闻的一线报道，她从 2012 年开始接触青年女权行动，一直持续至今。

“那时候我的朋友们穿着那些带血的婚纱去街头走，要求‘不要暴力好好爱’，‘打不是亲骂不是爱’，就这些现在看来是常识的话，在那个时候都不是，然后那时候都很难，又会被指指点点。我们那时候还去地铁里面唱歌，我们把《悲惨世界》的主题歌改编成了《女人之歌》。”

那些一直到 2014 年都比较活跃的女权艺术行动、表演和倡议，郭睿都曾参与其中。“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这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如果去做刑辩的话，不见得跟这个就一定要有关系，好像我做记者的时候，我也写很多跟性别不相关的新闻。但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虽然从身份来说，郭睿的职业过渡已经完成，但是从社会角色来说，你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记者的状态里。

在那次成都的分享之后，她被告知一个读书会正在讨论她当年写的一篇报道，曾经引发“盛世螻蛄”讨论的“杨改兰杀子自杀案”。虽然不曾出现在读书会现场，但郭睿聊天时提及往事的状态，让人觉得她应该有很多次复盘这些记忆的时刻。

“我当时应该是那些记者里面唯一一个当天晚上住在村子里面的，我跟杨改兰的妹妹，还有她的小姑就睡同一张床。那天下午到了之后，我就没有去采访，我就躲在了杨改兰的小姑家的房子后面大树下面，在那蹲到差不多快天黑。我是先看到她小姑，聊了几句，她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问她说晚上你是不是自己睡，她说是，我说你是不是会害怕？她说，对有一点。我说，我今晚能跟你一起住吗？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她很开心。然后我想今晚既然可以住在这儿了，我也不用急着去扎堆采访了。”

“我那天晚上就住在村子里面，这种生活上的感知，你就会知道很多细节。原来这种八九月的甘肃，夏天晚上这么冷要开电热毯，我问他们杨改兰有没有电热毯，他们说没有。

包括说杨改兰从来没有上过小学，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

“当时拿到了一个当地精准扶贫的名单，挨家挨户全部都走了一遍，知道了名单上面的那些人的构成：第一个可能是村书记的哥哥，第二个是村书记的侄子，然后第三个是村书记本人……就挨挨家挨户走一遍就知道了……那天晚上在她小姑家里，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正好在放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有句台词，‘一家六口人一夜之间都死光了’，然后所有人看到台词都沉默……”

多年过去，郭睿为还有人记得这个稿子和杨改兰这个人物而惊讶，同时感到感激。这篇报道对她来说意义特殊，杨改兰和她同是 1988 年生人，而她的身上叠加了太多的社会议题。离开村子之后，郭睿晚上睡觉屡屡做噩梦。

我问她要如何解决“凝视深渊”的问题。

她说：“我的方法是，你要凝视它，然后跟它拉开距离……我们历史系之前挺常用的词叫做‘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但是你把用在‘深渊’上它一定是不对的，很多人会不由自主陷入这些……当你写了很多精英人物，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然后说他们也不容易，也挺辛苦的……但其实不是，我觉得首先要意识到它是深渊，可能有的人凝视久了，就会忽视这是一个深渊。”

“做新闻你会看到庙堂之上那些人的命运和形象是什么样子你也会知道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人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议题就像某种提醒。

“它是和很多其他话题的消失平行进行，很多其他的议题消失了，不能讨论了，这个就变成唯一还在进行的……毕竟男女平等还是基本国策，毕竟妇联也会反性骚扰。”

成都那场分享会上，郭睿提及了影评人波米。“他说了这些年华语电影的变化，又说，当时比一个特别火的词是‘润’。然后说，‘润出去的朋友，希望你们落地生根；留下来的，不做做鬼。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演奏，跟诸位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

郭睿引用了最后半句话来解释她的转行。

“我感觉我也一直在跟大家一起演奏，之前好像我在弹奏一个钢琴，钢琴其实并不属于我，可能属于某个机构或者平台，事实上，它已经被夺走了。我现在手里还有一把小提琴，它可能短暂属于我，我还可以把它紧紧抱在怀里继续演奏，所以，只是换了一个演奏的乐器。跟诸位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 想要好好做刑辩女律师的访谈计划，但也没有固定工作量。比如我现在访问了我很喜欢的张燕生律师。其实张老师是“50 后”了，我想接下来可能是“60 后”、“70 后”、“80 后”到“90 后”，我还希望大家有社群感。男律师之间就很容易，因为他们一起喝酒。其实我也喝酒，但好像跟他们一起喝酒就变成了一个特殊化的存在，但我有时候也比较凶。

Q: 这个访谈从你的职业经验来看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A: 我的自由度会比较高，跟记者生涯不一样，跟做纪录片也不一样，没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然后想去跟采访对象共同讨论和呈现，对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就跟他人建立连接，彼此看见、找到对方。因为我跟他们好像变成了职业共同体，做记者的时候不是的，大家的关系就是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而现在，我可能还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以前的职业习惯，但是其实职业已经变了。我觉得还挺奇妙的。

Q: 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A: 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不太做自媒体的人，可能这就相当于从零开始自己做个媒体，但是又不符合那些所谓的传播规律。

Q: 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接棒？

A: 梅若。她在北京做服务流动妇女的工作已经超过十年，最近在做第三届“百手撑家”家政工艺术节，有剧场演出，摄影展，纪录片等，非常了不起，也非常有趣。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Michael Myers](#) on Unsplash

专栏

038 潘赫 这个世界对内向的人 越来越不公平， 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

伊险峰 | 接力访问

潘赫剥离了各种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的工具：任务、目的、身份、比较……而这些剥离定义了潘赫。

以前我们认识。两年多以前了。

那时候《张医生与王医生》刚上市，有一家媒体让潘赫来采访我们。沈阳人潘赫在约好的时间打电话过来，聊了两个小时，因为有共同记忆，好像大家都很开心。

过几天，他发来微信，手机没弄好，只录上了十分钟，有没有可能按照我们那天聊的问题，你们自己把回答填进去？

后来，潘赫的名字不断在各种场合出现：44 剧场，实践论，城市行走“奥森多·大灰狼”，满洲飞儿子……我们跟人说起他，他们都哈哈大笑，这就是潘赫啊。这很潘赫。他居然能按点儿把电话打过来！

金特之后，推荐了潘赫。采访金特那天，本来在宁波就可以看到潘赫，但如大家所言，他的身上随时都会有意外情况发生，那天他把自己鼻子摔骨折了，去了医院。

这一次是在武汉。我发微信给他，他一直不回。晚上在市集上见到他，这一次他的意外是手机掉在出租车上。

我们从上一次在宁波他领大家城市行走说起。

他说他三到六岁那个年龄段里，他是一个地图迷，喜欢看地图。

我采访很多人，地图是一个很重要的开阔视野的东西，开阔视野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我理解，一是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而不是只有眼前那点破事儿；二是它们之间有相互

的关联。我们看到的世界大都是碎片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管他有多强的好奇心或者求知欲——更是如此，地图是一个可以使之完整起来的手段。

他住在七二二厂的宿舍楼里，他爷爷是副厂长，那时人们出差，会带回来陌生城市的地图，听说潘赫喜欢看地图，就不断有人送地图给他。他的世界可以不断扩充。

七二二是个军方背景的印刷厂，也会印地图，印列车时刻表。潘赫会背沈阳站的列车时刻表。八十年代，沈阳还称得上是全国铁路最发达的地方，东北铁路自成体系，背下来很厉害；不但会背，而且还会对着两年不一样的时刻表，发现变化，增开了什么车，减少了什么车。他会试着去理解或者总结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地图锻炼了他敏锐的感受力。感觉他会在时空当中迅速建立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中有历史事件，有地理位置，有沿革，他觉得导航这东西让人缺少了识别地图的能力。

比如聊到宁波余姚江边上一片即将拆掉的清朝或者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叫孝闻街。他就说在中山公园后面，那里曾经有一个地方叫报德观，报德观一八七几年时着过一次火，烧了一个叫华森的洋管带的照相胶版，损失巨大，抢救出来的一点已经让人叹为观止，大部分都烧掉了。他随口就讲出一段历史来。

总的来说，他是学习好的孩子，但不招老师喜欢，也不招老师烦。因为成绩好，二年级公选班干部，他被推选学习委员，第二天辞了职。我问是因为不爱收作业本吗？他说他甚至都不知道当学习委员要做什么，就是不想做，不愿意。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他总结自己是不愿意做“要对一件事负责任的人”。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尝试。成功了。后来还戴过一道杠，我说是小队长吗？他说不是，他是“看走廊的”，这个职位就是课间站走廊里看着小朋友不要喧哗打闹，“这是一个常规设置的岗位吗？”“不是，就是为我单独设定的，不让我在教室里一坐一天。”老师希望所有小朋友在课间都要出去玩一玩。“你要管吗？”不管。

他对学习有兴趣，从来没有压力。按他的说法，他家里人对他没提过任何要求，他们全家都是随遇而安的人。他强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随遇而安。

他爸爸温和善良。他妈妈从来没有固定工作。“一直帮人做出纳。原来公司黄了，每个人都自己创业，都会找到我妈做出纳，九十年代的时候她还真的能赚一点钱，比我爸爸当厂办主任赚得多得多。”

潘赫有两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

“家庭影响很大。”

“我们家人的性格都是随遇而安。”

他在南湖小学上学，南湖小学在保安寺路上，我认识那条路，很短。我问他，保安寺是不是很早就扒掉了，他说并没有，他说保安寺被后来的气管厂围进去了。气管厂搬迁的时候，他进去过。“看到很多瓶瓶罐罐，那时候不懂，现在想，那都是骨灰盒。”保安寺是可以寄放骨灰的庙。南湖小学一共有四种人，气管厂的子弟，七二二厂的子弟，文化厅的子弟，医大二院的子弟。“当时看不出来差异，后来不一样了。医大的子弟很快跟着爸妈出国了。工厂子弟就不行。”

潘赫是“不行”那一伙的。七二二，一家当地还有些名气的印刷厂，有军方背景，但也仅此而已。两年前海采访我们那次，我们聊到他的履历，他在沈阳最好的育才学校上学，去了武汉大学读书，后来去法国学艺术史，听起来就像个育才学校里经常出现的富家子。他又说他爸爸后来也做了七二二的厂长，听着就更觉得这是东北那些肥了个人穷了工厂的穷庙富方丈的故事。又听说他靠网贷生活，故事就进入富家子没落的进程。这一次聊，至少富家子这个刻板印象被抹除了，他爸爸的厂长角色更像一个无助迷茫的职员。至少在潘赫那里，八十年代记忆是七十三平方米住一大家子十一口人，没一点富贵可能。

父亲随和厚道是极其温柔温和没有脾气的，因为周围其他人都是第一代职工的家属，如果家里有婚礼葬礼，你作为厂长或者老邻居是不是得给人包红包？每个月他包的红包就超过六七千，但是他每个月的收入只有 2000。”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他还被要求有责任感，因为是厂长，他不知道厂子会被他带到哪里，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家族性格中的“随遇而安”的“安”总是难以实现，一直到 2015 年。

那年潘赫生活中出现一个大的变故，父亲去世。

潘赫至今依旧还会想像各种可能。那天我在另一个场合说吴飞有本书里讲“道德资本”，人们希望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占有更多的道德资本，但并不意味着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最后也会导致“更委屈”，最后甚至喝了农药，那是一本讲自杀者的书。他说他爸爸可能也会遇到道德资本的问题。

在那之后，潘赫说，“对很多事情就无所谓了。”

之后的聊天中，几乎每跳出一件事，我都会问这是在 2015 年之前还是之后。

在那之前他是正常轨迹的人。

他爸爸无限宠爱他。潘赫小时候生病，恐惧打点滴，每次吊点滴，都会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

有一段时间，看到奇怪的地名，比如“陈相”，或者单纯觉得地形有意思，就跟他爸爸说，我们去这里看一看吧。周末他爸爸就开车领他去了。

那是他一段匪夷所思的时间，我们都难以理解：

他说他在十二岁到十八岁这六七年的时间里自己不曾单独下楼去玩。他楼下是三好街，热闹，他奶奶说外面都是拍花子，拐卖小孩。我算了一下，他奶奶这么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沈阳治安实在很差，刨饼儿的，三八大案，都发生在那个时间段里。奶奶可能只是更担心潘赫的安危。这时候，他会跟他爸爸商量着周末去个什么奇怪名字的地方。

后来可能觉得他不独自下楼这事过于匪夷所思了，他也大了，他们家决定放他出去。他跑出去发现世界太有意思了。他想的第一件事，是离家远点，这得多有意思啊。算了分数，觉得武汉大学不错，他去了武汉大学，学世界史。

那时他开始做个文艺青年，组织个电影放映之类的事。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艺术基金会里工作了一年。

“为什么没接着做下去？是因为发现职场太无趣了吗？”

“没有，基金会不是很职场。就是觉得得学点什么啊，旁边的人都太厉害了。”他说了几个名字。

“但你不主动做什么事，这又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所以选了艺术史，它没用，它不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压力。它不能改变什么东西。”

“为什么选法国呢？”

“上学的时候，宿舍楼下正对着法语联盟的办公室，就去学法语了。所有课程学完了，语言也考过了，但那时候也没想着出去。”

潘赫那时候上进，现在他言之凿凿，这事儿顺理成章，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的一部分。

法国回来之后，做一个不像书店的书店，叫失败书店。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想做，在法国的时候就想做，也不是因为在法国看到了好的书店，也不是要把知识传播得更远更广阔——没有目的。所有事都要去目的化。

为了去目的化，他还得剥离专业性——艺术史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如果有专业性，这事就不再潘赫了。我直觉，他最想表达的是这个。也许这本身是一个暗藏着的“目的”。他的确有一种使人涣散起来的能力。

2014 年，他做了“失败书店”。它得名于注定要失败的模式，“我家里有一大堆书，法国买的艺术有关的书，再进书是靠借的钱，有几千本，我每种书只进一本。”“就是在电商那里买。”“租房也不花钱。谁有空房子在那里，我说就在那里放一放，他要是把房子租出去了，我就从他那里搬出去。沈阳租房市场不景气，所以那段时间他总有地方可租，后来没有地方，他把一部分书给了呐喊书店，沈阳一个现在还在坚持运营的书店，楼上有一块地方摆潘赫的书。而且书不卖。

另一部分书放入仙境俱乐部，一个酒吧。有人形容冬天去仙境的时候，进门一霎那，被陈年烟味熏得脑子“嗡”一下。顾客什么人都有，大家一起玩。作为一个酒吧，难免要面对各种管理者，“谁有路子谁去做那些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的事”。

那是 2015 年之后的事了。

做失败书店那会儿潘赫去了一次上海，认识了很多，于是有了后来的各种活动，还有金特。潘赫、金特和冯喆，还有其他挺多人，一起做了“满洲飞儿子乐队”。官方介绍里，它是这样一个机构：

满洲飞儿子是以乐队为核心的实践团体，是成立于 2017 年秋季的注定失败的爆红乐队。满洲飞儿子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音乐理念，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有自己对整体的理解，以及对自己在现场中行动的推动，在演出的过程中构建一个共同的劳动现场，在其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体、思想、知觉系统都能获得一个完整性（完整性几乎不可能）的表达。

“完整性”之类的表达，会不时出现在潘赫的谈话之中，连相处多年的朋友都会说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有些会更复杂，比如他在说到与广州朋友合作的时候，冲击他的是“普

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也听不太懂。

“我这个人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也没有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但我喜欢做一些共同项目，共同工作，共同写作，这些我愿意。如果要让我自己写，我不愿意，如果要让我自己工作，我也不愿意。我不是一个太有主体性的人。”

“在一个没有掌控者的环境下，我会觉得舒服。我不喜欢危险，我也不喜欢冒险。自己是一件事情的责任人，这种我不喜欢。但是你还是得做事。对，所以我喜欢跟人一起做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形容“满洲飞儿子乐队”的规则时会说，“我们不开会。”开会意味着有议事程序，有中心，有决议，有要执行的任务。都是潘赫要警惕的东西。不开会是重要原则。

我问如果要决定做一件事，比如要去重庆演出，难道不要商量一下吗？“可能一分钟？去不去，大家认可，就去。不去，就不去。”“那总得有个牵头的。”“那就算冯喆吧，他可能更能话事一些。”

乐队诞生大约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时说，要做一个乐队，这个乐队里没有人懂乐器。又说应该有个名字，有人说了飞儿子，就是把儿子甩出去，金特是满族人，他提了满洲。这个乐队里，冯喆负责合成器和吉他，金特负责冬不拉，潘赫负责人声，“我不是主唱，是人声。”遗憾的是，“他们学东西太快了，金特的冬不拉已经拉得很好了，冯喆编曲也上路了。”

他又解释说，他不排斥学习，也不是没有上进心，而是没有好胜心。就好像他和几个朋友打桌球。半年之后朋友都成了高手，潘赫还是和第一天玩一样——他没有好胜心去学习如何瞄准。

不做中心，不做话事的人。“那你怎么做城市行走？”

城市行走是潘赫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奥森多·大灰狼”。他在活动海报上用这个名字。在宁波没见上面，除了鼻子事故，还因为潘赫要做功课，安排城市行走之前的功课。

“你领大家去看什么？”

“宁波在明朝有一段时间是与日本人通商的口岸，有些日本人的故事。日本有两个大名，两伙人都来到宁波，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类似大逃杀这样的事。”

“要准备多久呢？”

“半个月吧。在老地图网先买一套旧地图。然后在这里看有什么线索，再从这个线索里找一个点，找更多的资料。我在领大家走之前，我自己走一遍，发现一个碑，两个使团被安置的地点。”

“这个事有很强的主动性。”我想知道他如何克服自己“不做话事人”的想法。

“我尽量少跟他们说话。有的时候会介绍一下，但我不会表达我的态度。”

“但你只要讲这种东西，大家很容易建立起来回忆啊，缅怀啊，这种情绪。”

“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会尽量避免。我很担心他们被我的态度影响。我不想搞得很团建或者共情。”

我们曾经探讨过对沈阳一些地方的理解。比如太原街，那是日本人建的商业街区，拆了；东北电影院，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电影院，拆了。我们都觉得可惜。如果是我带人去走，大约很难不把个人情绪传递出去，但潘赫说他不会。

“我觉得这是我性格里的东西，我会觉得有很多人，以这种环境思维或者是共性思维，来要求别人共情，或者说引导别人共情。”

他说这是一种冒犯，“我就是对冒犯特别敏感。”

“有些人不愿意讲话，或者说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对内向的人越来越不公平，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会维护这一点。”

“我不会设置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团建，对内向的人是不公平的。”他觉得自己既不内向也不外向，可能偏内向。

“在农业社会，一个人的收益跟种一块地有关，他自己能控制这件事，但如果社会需要一个人的交际能力才能获得资源，对内向的人就不公平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会想起《看不见的女性》这样的书，大意是说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性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可能内向的人也是这样，外向的人得到了很多机会，发出很多声音，但内向的人可能悄无声息。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自觉的？”

“不知道。可能是接触到一些 NGO，或者类似的组织，他们都很强，他们都很团建。”

“你很反感？”

“不是反感。我自己会警惕，不要这样。”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 对着武汉, 武昌、汉口的老地图在走。

Q: 你在武汉上大学, 这种地方已经熟悉的地方, 还要探索的是什么呢?

A: 我熟悉的是某时某刻, 但我不熟悉另一个时间段, 我可以按个时间段来探索它。
比如明清, 唐宋, 比如民国前二十年。我就着老地图来对现在的地方, 一点一点地对, 哪条路的路基没有变, 哪个点还在, 我最近还对地形感兴趣。

Q: 推荐下一个接力对象?

A: 刘山英。货拉拉司机, 也是书籍装帧设计师。本来是个设计师, 但由于家庭原因之前忙着做别的, 最近终于轻松一些了。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 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 也写东西。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剧照

专栏

039 思邪 & 月亮 我们从创伤出发， 有了交流的动机

杨樱 | 接力访问

即便在多样化程度已经很丰富的酷儿社群内部。

第一次知道上海有这么个地方是因为同事转来一条播客，她说这些人应该来做接力访问。播客详情页开头便写着：以上海某住宅为物理空间，事件多元亲密关系，提倡共同劳动，重视情感沟通的非二元性别 / 女性共居社群。

播客发布在 2022 年下半年，我看到大约是在 2023 年 3 月初。接力访问还是做了，[是由阮阮提名](#)，时间就到了 4 月，此时受访者思邪和月亮已经要求我不要再提及那个空间的名字。俩人因为一些社群内部的原因离开了，搬到了成都。这也是这个酷儿社群第一次面临“分裂”的议题。

在采访之前不久我还认识了小羊，一个被 Tinder 上的朋友邀请去“家里”落脚的酷儿。当时她说，“我们家”在一个老小区里，人很多，所有地方都是卧室，按照不同人的起居习惯分配床位，每个人几乎也没有多少私人物品。这个地方还有猫和其他种类的宠物。以前的确会做一些公共活动，最近大家情绪都不高，所以要再调整。

在和思邪和月亮聊天之前，我没有把小羊说的“我们家”和播客里的共居社群联系在一起，要那么一会儿，我才想起来，小羊说过，“大家情绪都不高”。

冲突是什么，后来月亮有一些描述，但比冲突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月亮和思邪处理冲突的方式：首先是自己开始搜集知识，然后以知识为凭借，不断沟通试图促成共识。就原本的社群成员而言，这个沟通过程长达半年之久，而后月亮和思邪才创立新公众号，开始面向更多的人。

从思邪的角度来说，这种试图对话的努力多少建立在对这个酷儿社群的乌托邦想象之上：大家应该以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处理和社群有关的问题，包括之前所有人都没有经验的“神经多样性”议题，比如，孤独症谱系。

青年志公号发布过一篇[体验这个酷儿社群的文章](#)，文章写得具体而深情除了共情之外，还有对一个乌托邦实验和实验参与者的欣赏。作者之前曾经受邀参观过那个酷儿空间，也加入了她们的微信群，得以近距离感受各种生活细节。

如小羊所说，这是一个不太兼容私人生活的居住空间，它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普通意义上的家居生活，而是一种“非二元和非专偶制为主的线下共居社群”实践。社群创建者之一霜霜在文章里说，“我能够感受到青年一代，特别是酷儿这些社群，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相对比较高昂的城市市场域下，一群人聚在一起，可以或多或少减少来自城市和社会制度带给青年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们的另一个目的。”

没有人分享过类似的经验，可能有人分享也得自己趟一次水，才知道河有多深。思邪也是最初的创建者之一，她发给我一份问卷，曾用来帮助筛选适合加入社群的人，空间成立的最初并不存在这样的设置，朋友带来更多朋友，但“后来发现比较混乱”，于是增加了审核机制。问卷的问题涉及女权、跨性别、非专偶、公民意识、精神障碍权益、新自由主义……它其实基本是一份人权问卷。阅读问题的时候，我有一瞬间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套用一下这些问题。比如说，“你认为弱势地位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变吗？”

在冲突发生之后，思邪才意识到除了非二元性别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细分议题值得注意。她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组织者，在 2020 年参与建立这个共居社群之前，她从高中开始就在 QQ 空间发布 LGBTQ 和女权议题文章，这也是她的性身份探索时期。思邪生于 1999 年，那个 QQ 空间资讯号到 2019 年被炸掉之前，一共有 6 万左右关注。当时她进大学不久，发现学校里一个彩虹社团都没有，本来还想攒一个，后来发现做这件事很难，因为大家不仅不关心 LGBTQ，也没有表露出任何对公共议题的关心。资讯号炸掉之后，她去寻找别的事情来寄托自己的意义感，其中有一个救援项目，救援对象是一个 23 岁的女生，因为同性性取向被父母关在家中。在这个项目中，思邪认识了外校的彩虹社团，得以在那边继续组织活动。

月亮说，“做活动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意义感来源，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观点和视角……可能我们不怎么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我们需要去抵抗这种没有成就、被贬低的感觉，做活动或者发推文也是在跟这种无意义感去做一些斗争。”

因此孤独症谱系和“神经多样性”这一类议题，对思邪和月亮来说，既是自己遭遇的处境，也是从未了解过的新知和导致自己被卷入冲突的重要议题，反复强调和普及也不仅仅是为了缓冲自身处境，而是为了让他人看到也许之前并没有想到的问题，即便这是多样化程度已经很丰富的酷儿社群内部。

月亮加入共居社群的时间是 2021 年，她在一个女权活动上认识了思邪，并成为其伴侣。刚搬入空间的时候，她对新生活有蜜月期一般的兴奋，把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冲突暂时掩盖起来。“我其实一直不是非常擅长交朋友或者社交”，但是空间是完全公共的，“然后我就要面临的是大量的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况），需要和人见面、跟人说话。是的，所以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月亮没有具体说自己在孤独症里面表现为为什么，她只是说后来自己对是否继续住在共居社群里有一些犹豫，在将定未定的时候，上海封控三个月。包括月亮在内，当时一共有 8 个人住在那间公寓里，其中 2 个是来空间玩的客人。不适和冲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空前放大了。解封后的 7 月，月亮和思邪去了广州，但依然希望和社群成员继续沟通，于是包括在广州的时间，以及后来 10 月回到上海的时间，都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试图对话。只不过回到上海后，俩人搬到原来共居社群两公里的新租房。因为空间宽松了很多，做活动的频率反倒更多了。

关于活动里大家都如何介绍自己，月亮提及了一个体验，“我们之前有去各地的女性、少数友好的活动，就会看那些参会者用什么标签来介绍他们自己。如果用学校、工作等等这些去介绍，就会让人很紧张，好像要念一个微型简历，会不自觉地去比较后面（有人）想到可以介绍自己最近在关注什么公共议题，感觉会更轻松一点，还可以开启一些讨论。”

月亮生于 1998 年，也在上海读大学。“大学里可能有遇到一些性少数身份的自我接纳问题，比如说网上对于双性恋会口出恶言，自己在大学里面没有找到太多的意义感，有些好像必须要做的事情一直在拖延，或者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融入那种生活。关注到边缘社群社群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归属感。”只不过这个归属感遭遇了未知的挑战，在社群里，月亮的孤独症症状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

思邪的身份认同是非二元和女性，月亮的身份认同是非二元。我问一个人在说自己非二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表达什么。Ta（这是月亮的身份指代）有一个干脆的回答：

“它代表的是一种视角。有很多人可能事实上没有在男女性别这两端，但 Ta 自己对性别的认知就是要不然做男的，要不然做女的，甚至 Ta 可能追求成为一个纯粹的男

的或者女的。而我强调这个身份，是代表我的一种视角，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成为两端中的某一个。”

而思邪和月亮花很大精力去普及的孤独症谱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谁都不正常》说的。和思邪、月亮聊天之前，我恰好在看这本书。它解释了谱系和标签的差异：“文化，而不是身体的生物性划定了（孤独症谱系的疆界）……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正式我们做出的判断，即一个人的症状是否影响到他的生活，并且需要治疗……标签一旦得到，就会永远贴在患者身上，而频谱不仅挑战了经常成为污名渊源的诊断的不可推翻性，也挑战了一种假设，即每个得到同样诊断的患者都是相同的。频谱是一种邀请：它要我们进入那个充满持续痛苦的未知世界，要求我们与神经多样性倡导者一起说：正常和异常都是虚构的国度，在那里，实际上并无人居住。”

《谁都不正常》是一本试图纠正精神疾病污名化问题的书，也重申很多文化偏见。比如《红字》里胸口戴着 A 字的海丝特·白兰，作为一个通奸者，她必须把这个字母戴在胸前，然而罪名消除之后，她依然这样做，因为这个字母现在代表经验和尊严——被边缘化的海丝特有足够多的体验，以至于处境相似的人会去她那里寻求建议。

后来月亮给我发微信，补充自己为何要不断做活动和科普。

“我觉得这种进入公共生活的途径，把自己的受害经历转换成一种帮助更多人避免受害，或者去救助受害者的动力，也是一种自我疗愈。这样的路径也能相对有效地避免自己再去复刻曾经遭受到的创伤。”

“在原生家庭或者亲密关系之间的创伤里面，无法互相理解的部分，很多是由于一些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导致的沟通障碍……对于欺凌的多种形式，很多人是不了解的，这种不了解有时会让 ta 们莫名扮演了冷漠路人的角色。于是我们从创伤和受害经历出发，有了自我教育，互相学习交流的动机。”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思邪): 我们想做一个册子，内容关于“变革性社区问责”，具体来说，它有一个立场是“变革性正义”，也就是“不要用惩罚的思路去对待一些犯了错误的人”，而应该使我们的社区向着更好的方向转型，在这个前提下进行问责。比如当社区发生了暴力和虐待，是否有办法不通过警察程序，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使这个事情变得更好。

我们参考的是一份国外有色人种激进社区的文本。在他们的社区里，黑人如果被送进警察程序里，是会受到暴力对待的，即使社区成员伤害了别人，他们也并不希望同胞被白人警察虐待，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框架，叫做“废除主义”或者“变革性正义”。我们觉得可以参考的点在于，因为我们是酷儿社群，社群里有很多成员，在监狱系统里会遭到非常严重的羞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希望事情简单粗暴地通过警察程序来解决，如果这件事的程度是可以被我们所解决的，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框架。

其他还想做一些比较日常的，比如性别友好的游戏之夜，感觉现在游戏行业还是整体被顺直男主导，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先来做玩家，再进一步一起共同创作独立游戏，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由女性和酷儿创作的游戏。

B (月亮)：我可能过段时间要去找全职的工作。我现在在 muchroom 做服务生，我们也会去那里办活动。

Q: 月亮要找什么工作呢？

B: 感觉方向比较多，很理想的话，会希望能打零工。接单性质的，不要坐班或者按时到岗，但是肯定工资就会少很多。但我还是希望时间可以灵活一点。

我有一个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文档。可以先列举一下，我和思邪还在做音乐，低等数学。还会想做女性音乐人的连接，可能做群组或者信息表单什么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一些爱好相同的人，或者组队去做音乐。只要我没有被迫打工或者被困在什么地方，我的整个生活都是跟随着兴趣的，也不会给自己设置一个 deadline，可能今天这个事情我很想做，我就去做了。

Q: 你们想做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A: 因为文本是从国外社群参考过来的，我不太确定在这里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在想怎么生动地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事情是值得推广的。

B: 困难可能在于物质支持。我们还另外有一个朋友，Ta 会觉得跟我们的生活状态比较接近，可能会打一年工，然后过一年这样的日子。我们也不怎么消费了，基本的支持可能就在于每个月大概有 3000 的基本花销，需要有住的地方、吃的、交通成本，然后在不消费的基础上创造快乐的基本材料，对，可能需要这样的物质基础，有些人可能有家庭支持，或者暂时还有存款，一部分人可能他们需要探索打工和维持这种生活的比例

分配。

Q: 你们会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B: 我们想推荐公众号“郊游造作”的活动家们。

A: 她们保证了私人生活的同时，开放了自己家的客厅给社群。

B: 这个空间会更有界限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她们公共与私人状态的切换，以及办活动的持续行动力。有时候活动结束，主办方就用没有太多负担的表达，说自己需要回到独立生活空间了。有可能会约饭，有可能不会。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受访者作品

专栏

040 葛宇路 我是一个个体户， 我生产一些观念

杨樱 | 接力访问

很多时候，观念来自葛宇路感觉到有些东西在“反人性”，而且首先是他自己的人性。

葛宇路现在在北京一个基金会做一份很难定义的工作，他有报酬、有预算，但要做什么都是自己决定。这种事情之前也发生过，那一次是一个合肥的软件开发商，希望葛宇路可以帮他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理论上这件事涉及一款 App，但是葛宇路什么具体事务都不用做，只需要把握“意义”的那一部分。这些葛宇路都理解为“赞助”，主要说明：一，他的影响力被肯定了；二，影响力可能会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帮他解决生活问题。

那会儿是 2017 年，那块叫做“葛宇路”的路牌刚被摘下不久，知乎和微博上还挂着一大堆关于他的讨论，《好奇心日报》问他为什么会在作品里做明确的社会议题表达，他的说法是，“你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现在媒体一如既往地爱他，在我们坐在武汉光谷大悦城花坛上聊天之前，一家艺术媒体刚刚用 5 篇文章的规模探讨了葛宇路，而他那天下午的任务，是和弦子探讨权力不对等时女性和弱势一方的“共同感知”。在那一系列文章里，他对创作有一个很艺术家的回答：“进入系统内部，然后让系统不舒服。”

什么时候可以用艺术家这个身份，具体得看葛宇路在干什么。开顺风车的时候不能“司机是个艺术家”和“一会儿车开河里去”的想象很可能连在一起。他会说自己是搞设计的、做策划的，还有做玩具的。做打工人的时候也不能。葛宇路当年考央美的研究生，第一年没考上，上一年班再考。纪录片公司，做特效。同事关心他考研专业，他说实验艺术：什么方向？行为艺术。同事幽默感上身：那你今天怎么穿着衣服来上班？

这就导致葛宇路轻微的应激，认真解释，我是一个观念艺术家。如果非要仔细讲讲，他会说到实践艺术和行动艺术，不是行为艺术，那叫 performance art，直译就是表演

艺术。有人这么问他就这么答，挺老实，很少油嘴滑舌。

不过这些对他妈妈来说都没有用。他妈妈不太理解葛宇路到底是啥的，唯一的肯定是他毕业之后就没人问过家里要过钱。这还是通过采访的媒体表达出来的。可能他妈妈也觉得葛宇路没个正形还没流落街头也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葛宇路估计也没为此作更大的努力。他本能希望离家远点儿。这次回武汉，妈妈问葛宇路想吃什么，回答是热干面。不想尝尝“妈妈的味道”？葛宇路当时就一激灵，啥是“妈妈的味道”？报了几个菜名。那不就是几个菜吗，不用那么煽情是吧？

他不适应这种爱意表达方式。父母对他来说，就是从小打到大矛盾体，与此同时，各自的性格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方式汇入了葛宇路的人生态度。葛宇路的父亲是 77 届高考生，华东师大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又慢慢转型做了公务员，进入了教育系统；葛宇路的妈妈出身农村，极为要强，高中毕业之后来武汉奋斗，在某个学校的小卖部里当售货员，然后嫁给了葛宇路的爸爸。葛爸爸拒绝去深圳下海，拒绝奋斗做特级教师，在安逸的体制里遭遇中年危机，而解决中年危机的方式就是打麻将，一打一星期不回家。葛宇路小学的时候经常睡到半夜，听到家里的打砸哭喊，有一次他过于崩溃，冲出去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别打了，然后打开了家里靠里的那扇木门，把自己夹在了木门和外面的防盗铁门中间，继续哭。

即便没有遭遇这种暴力时刻，父母从生活审美到脾气性格都很难对口。葛宇路家有个插座坏了，带电的零线和火线往外探出好长一段——他比了一大截手指——而他就睡在线的正下方，每天起床就得握住核心，绕过电线，保证自己不被电死。如此这样来回，持续了三年。这件事仿佛是葛宇路家种种状况的浓缩：妈妈觉得这事理应爸爸解决，爸爸说着好的明天但明天继续明天，而葛宇路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忍受者、问题承担者，而非解决者。

不过葛宇路爸爸的拖延症有一个例外，就是在老师家访之夜打麻将回家，会立时三刻把睡梦中的葛宇路拎起来跪搓板。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希望利用身处教育系统的优势，给葛宇路安排最好的学校。葛宇路读过好几个小学，加上家庭危机，到了初中，已经觉得制度化的教育是个骗局，而他进的是当时最好的初中。作为一个不良少年，他高中进入了职高，因为是从好初中过去的，又变成了那里的异类。葛宇路说，他始终不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且，他在父母极为割裂的价值观里已经养成了判断自己处于什么位置的习惯。如果要选择一条稳定的人生轨道，他可以有一系列选择，比如找个学校混着当老师，但这时候爸爸过早的中年危机就浮现在他脑海里。没意思。没意思就会整个礼拜打麻将。一直从三十岁打到现在。

因为觉得学校是个骗局，葛宇路自己补上社会演习的方式是打《魔兽世界》省钱去网吧。《魔兽世界》教会了他团队协作和责任感，让他觉得自己有了归属目标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也对时间有了观念：晚上到点没上线那就相当于没上班一样。

在接受父亲的安排去职高学画画之前，他试图证明过自己在真实社会的价值，结果以心有余悸告终。没考上高中之后，他对父母说，我肯定牛逼，我出去到哪儿都牛逼。作为一个初中生，葛宇路跑到各种店里去问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职位，结果遇到的都是惊慌的店主，说不能雇佣童工。只有一个餐厅老板想了想，问他是不是假期，葛宇路心想自己可能永远在假期了，就是说的。于是葛宇路被带到后厨，说可以去洗碗。

“我的妈，盘子泡在水里都看不见，那就是一个粪坑，盘子从里面捞出来洗。又热又臭又闷。”

这份工作之所以没有影响葛宇路日后在外吃饭的食欲，主要是他当时说需要回家说一下，然后就回来好好干。他言出必行，但是回来的时候老板说很抱歉，刚刚有一个阿姨来应聘，她比你更稳定。

这是葛宇路遭遇到的人生第一次挫败。但他没有罢手，继续找。在一个大排档里，有人问他，小孩，想不想学做菜。想的话可以去汉阳一个酒店找我。葛宇路答应了，回去跟妈妈说，妈妈问他你知道在哪儿吗？他这才想起来查一查。电脑上的地图告诉他，这个传说中的酒店太远了，并且看着荒凉。他返回排档再去找人验证说话人的身份的时候，没有人记得这个人了。

于是葛宇路就去学了画画。他在职高里遇到了好的老师，以某些要到很多年以后葛宇路才能意识到的技巧重建了他的自信、对人的信任和进取心。作为一个从名校来的好学生，以及事实上也是一个上进人，葛宇路和职高的同学混得不错，被人欺负的时候有人出头的那种。葛宇路受邀参加同学生日会，看着几个人吸粉笔灰一样的粉末，还问人家难不难受，人家跟他说，你别管了，你别玩。传说中的差生和处于鄙视链下游的学校，

给葛宇路的人生留下的都是那些看似光耀的东西没有的爱意，人的质量和身份标签并不可以划等号。葛宇路说他的作品总被人说“市井”，他对“市井”的理解有一部分就来自于此。

葛宇路后来到了湖北美术学院，专业是影像媒体，因为被社会毒打之后牢记找工作的技能重要性。结果老师松弛，热情地讲了当代艺术，自此开启了葛宇路的新世界：这也行？这也是可以学的？这也是大学会教的？

于是他过上了两种生活，一面是去不同班级上课，把老师列出的书单和艺术家作品列表全部看了，一面是到外面学软件课，学影像后期处理。到这一步的葛宇路还是十分稳妥，“两条腿走路”，直到他开始在网上自学教程，觉得厉害，去问软件课老师原理是什么。

“他说你不需要掌握原理，又花时间又不讨好，你只需要掌握模版，到时候给老板看让他们选，这事儿就完了，你就能接活赚钱了。”葛宇路说，这话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效率，但是他非常不喜欢。

于是他的生活热情只剩下了当代艺术。在琢磨了很多艺术家之后，他问老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回答很高级，做艺术作品。那如何才能做艺术作品？回答更高级了，做了就是做了。葛宇路说，那我现在就做，我能做吗？能成吗？老师说，你现在做，你现在就是艺术家。

葛宇路作为艺术家的第一个作品就这样出现了。他每天从学校工地里捡一块石料，带着去上课，带着去食堂吃饭，带着去学生会开会，总之到哪里都带着，然后郑重其事地把石料放在一个地方。

“这块石头砸开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所有人跟你的生活交集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了，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对它的反应。还有嫉妒和恨，你就会看到那种很浓烈的情绪。”

“还有嫉妒和恨？”

“一个同学，唾沫星子横飞，很激动。‘葛宇路！你每天带个石头，你以为你是谁？你觉得你带个石头就能成为艺术家了？’”

葛宇路觉得太好玩了，一个石头居然会激起这么多声音。

然后他对老师说，虽然做了，但不知道它的意义，没想明白。老师说，没关系，没意义也挺好。

这种松弛的教育方式对葛宇路非常有效，后来他总结，原因是它不干预，而只是保护了一个人的特殊性。

“特殊性没法教。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如果我教你一种特殊性，其实那就是我的东西，等于摧毁了你的特殊性。”

“你自己得有一点苗头，然后把它呵护起来就行了。”

“有些人如果有一点特殊性，他会马上把自己的特殊性给摈掉。我可能做问题（小孩）太久了，我在那两个学校一直很特殊，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你们都不理我，批评我，再怎么着也没人打我。”

然后我们就说到了他的那个“系统”。石头让“系统”不舒服，路牌让“系统”不舒服，如果你去检索葛宇路做过的作品，你还会发现丢到武汉东湖里的糖，靠自然风吹向北京的一张纸，给一个美术馆所有工作人员放的假，凝视监控摄像头的眼睛……都让“系统”不舒服。

“系统是什么无所谓，就是你融入了某个环境，随着你的变化，环境的形态也会变好。”葛宇路的答案和我原本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他会说乔治·奥威尔式的系统，‘老大哥’的系统。

“就好像一个花坛，你是里面许多花里的一朵，你看上去不出彩，没什么特别的，这就是我理解的进入系统。”

“不舒服其实是有很多种程度。更多的时候是，首先我不舒适，然后我要告诉我怎样才能舒适，而我的舒适让它不舒服了。”

“但我又会觉得，我的不舒服是一个个体真实的感受，一般我会考虑这个不舒服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我的问题，我改进；但很多时候我发现它来自对人的压抑，那不好意思，我就不乐意了。”

我很诧异葛宇路进过学生会。一个凝视监控摄像头的人不应该是学生会积极分子。对此葛宇路跟我说了一道番茄炒蛋的故事。

职高毕业那会儿，葛宇路和同学在东湖农家请老师吃谢师宴。点菜的时候，老师学生都说随便随便，然后菜单就到了葛宇路手里，他人生第一次负责点菜。“这就说明我

是多么不社会化。”他从前看到后，对服务员说，番茄炒蛋。

“如果我同学那时候有一点社会意识，大概也会觉得我是傻逼。总之当时老师就把菜单拿过来，说算了我来吧，然后一边点着菜单对服务员说，臭鳊鱼，一边对我说，哎，葛宇路，你呀，你后上社会要吃亏的，你知道吗？”

“搞得我特别害怕。不知道这个亏怎么吃，什么时候吃。”

葛宇路说，这就是他进大学很积极申请学生会的理由。而且竞选了两轮，一个是整个美院的学生会，另一个是系学生会。他觉得学生会还是教会了他“什么是社会”，进入一个系统，了解其中的规则，知道这套规则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这是我的抽象概括，葛宇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而是抽离出来，观察系统本身。

这就要回到他的那块石料。

在他随身带着石料去学生会开会的时候，会遇到各种书记干部，会遇到官僚系统——无论规模大小官僚系统都有一样的气味——大小领导看葛宇路把一块石头正儿八经摆上，质问他：干嘛？

“我会找一种方法去解释。”

“怎么解释？”

“比如，这是我的作业。”

葛宇路说，只有他们都接受了，那份作业才成立。这是葛宇路布置的作业。这种小型胜利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就是那段时间我以为我跟大的系统还居然能兼容，能共存。”

“其实现在也是某种兼容，这个兼容很膈应，越来越膈应，那个时候我还能把事情摆到明面儿上来求同存异，说法上尚未调整一下，‘这是作业’。现在（要是这么做），只会遭遇‘少来，我们什么没见过，有这样的作业？’现在变成这种了，你知道吗？”

这些变化发生在 2017 年以后。也就是他的路牌占领社交网络热搜的那一年。也是从那个时候，他从自己做的一些作品里更多感知到公众情绪，这也是他在专业评论之外看到的回应。

“也就是说艺术应该有社会介入性？”

葛宇路说“应该”这两个字要拿掉。“可以有社会介入，也可以没有。因为人在社会中，你自然就会做一些动作，有一些思考，然后公共性就产生了。那种你们觉得公共性很弱的作品，是因为他先把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我并没有带着强烈的对抗意识去创作，而只是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摘出去而已。”

这又回到了他对《好奇心日报》的说法，时代是什么样子，作品就是什么样子。

他警惕仅仅靠卖作品维持生活也与此有关。“如果真那样做，我就跟社会脱节了。就想着刷新拍卖纪录什么的。”就连团体和机构也是要保持距离的，即便自己认可其中一些人的价值观，葛宇路说，他也只会短暂合作，而不是长久地被雇佣。他的身份是个体户。

“我只能定义我。我只能做到对我自己真诚，没法做到对人性真诚，因为人性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样的话容易变得虚伪——预设了一个在你之外的课题，然后去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团体让他的自我触觉不再敏锐“感受不到社会情绪，我就不会活着了，在我的意义上说，很大一部分触角就被砍断了，那就不好玩了。”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把哪些相对没意思的东西摘掉……好吧，女朋友种的花开了。

Q：这事儿的特殊之处在于？

A：我就负责浇水，我每天看一个破盆子，这一堆草——叫铁线莲——一天早上突然开花了。感觉有点像是桌上放一杯子，然后突然杯子开花了。“这东西还能开花”，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它不开花之前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但就是有趣。以前从来没有过。

Q：你会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在基金会里面做残障项目的 Sally。她的一些认知很让我刷新，比如一个关注残障人士的展览，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本质上带来的问题是可能相反的，一场专门为残障人士做的展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的，这种展览不知不觉就把残障人士切割出去了。这个事情 Sally 看到了。第二个是，她具体处理工作中的艰难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那些问题。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Pawel Czerwinski](#) on Unsplash

专栏

041 孙大肆 2020 到 2022 年，我和 上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杨樱、伊险峰 | 接力访问

在即将拆迁的社区里游走聊天，
她把遇到的人和事都写到了歌里。

4 月底孙大肆在朋友的空间发布新专辑，她和搭档张添一在玻璃幕墙前挂上绿色尼龙丝网，装在纸盒里的新专辑用小号尼龙丝网袋套着，挨个系在网上，买了专辑的人需要自己解下来。专辑压轴歌曲叫《你的家看得见东方明珠塔吗？》，晚上演出唱到最后几首，效果器失灵，孙大肆清唱。一部分副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来拆迁的呀
我们不是来拆迁的呀……

空间地方不大，折叠椅子四五排，四十来个人。唱完互动，先有人感谢孙大肆把本地文化写进歌里，说看到了很多小时候的画面。接着有人问孙大肆怎么理解“乡愁”，“你觉得上海大都市的乡愁和乡村的乡愁有差别吗，上海很早就拆迁，现在又旧改，很多人感觉流离失所，这种时空体验激发了乡愁。你怎么看？”

孙大肆整张专辑可能都在回答这个问题。2020 年 10 月到 2022 年底，孙大肆和张添一创立的“神炁现形”艺术小组接受上海外滩美术馆公共教育项目“客堂间”的邀请，以美术馆周边的外滩社区为原点，在街区里游走，和各种人聊天，以这些体验为基础创作音乐。她们赶上了外滩旧城改造，很多人都处于逃离和搬迁的情绪状态，聊天得看运气和缘分。在这样的兵荒马乱里，孙大肆和张添一还是遇到了一些人。

《你的家看得见东方明珠塔吗》，说的是张阿婆的故事，她每天站在小区门禁那边，给快递员开门，招呼路过的游客。故事人原型是孙大肆在圆明园路元芳弄遇到的一位

阿婆，第一次去的时候大家在门口认识了一下，阿婆热心，指点她们去拍摄东方明珠塔的最佳视角，“拍到了伐？给我看看。”第二次去，阿婆请孙大肆和张添一上家里坐坐，聊起她在这个房子里的生活。聊到中途阿婆的女儿过来，认定来人不善。阿婆觉得尴尬，说这是朋友。阿姨骂阿婆：你会有什么朋友，还是这么年轻的朋友，你脑子有毛病啊。然后转向孙大肆，你知道她脑子有毛病吧？后来孙大肆和张添一走。不是被阿姨震住，孙大肆说，而是怕阿婆继续被羞辱。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没有再去看过阿婆，只是在歌词里写，这首歌代表她羞愧的心。

孙大肆的歌里有上海话，她说比例要控制好，多了听不懂的人会抗拒，少了又没有意义。《你的家看得见东方明珠塔吗》里，除了阿婆说的两句话，只有一句半用了方言，其中半句是“一家一当”，而阿婆那两句话，一句是“此地一塌糊涂了”，另一句是“后首来损炸弹了”，前者说的是现状，后者说的阿婆小时候，日军轰炸上海。而另外一句方言，像孙大肆给这段短暂友谊写下的脚注：你的家，看得见东方明珠塔伐。

通过调研写音乐，不是孙大肆遇到美术馆之后才开始做的事情。其实她写歌总是要一点“东西”。小时候她就被大人说耳朵好，听到什么马上就记得住，小时候拉小提琴，看谱不一定看得懂，磁带放一遍，就能把调子拉下来——孙大肆生于 1981 年，小时候主要听磁带，要么就是广播。

但这些都是爱好。真正的创作要到 2011 年，那一年她写了三首歌。第一首她很少对人提起，是微博上关注“7·23 温州动车事件”之后写的，叫《无声无息的人们》。“我观察了整个过程中，触动很大。这首歌我自己录了，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好久以来我再次开始写歌，拿着一把吉他，旋律歌词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这首歌之前，孙大肆经营过酒吧，做过打工人，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直是在一个“框架”里的。那三首歌写完之后（另外两首，分别是《全民皆商》和写女性主义的《她们》），她意识到“框架”里的生活结束了，以后她就得这么过，于是去学了音乐制作，自己做专辑，自己做发行。

有些音乐她是在和人合作艺术项目的时候创作的，也就留在了项目里，不曾拿出来单独发行过。比如 2016 年她和青年剧场导演吴梦合作，访问了德阳二重的一位退休工程师，他是从哈尔滨支援德阳三线建设的宁波人。这是孙大肆第一次了解中国三线工程，她感慨的是个体命运在历史和宏大政治计划面前的随机性，写了一首歌，叫做《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很多时候我需要有感性的资料才会做音乐，就是要和地方、和人接触。我要知道历史是怎样的，人的感受是怎样的，还有我对 Ta 身上命运的感受。这不是一个可以布置的作业，我得感同身受。”孙大肆说，她不太觉得自己在调查或者采访，但是包括这种和人的交流在内，她的确一直在琢磨以音乐为表现媒介的各种“能量互动”，这种互动结合了音乐的律动，还有一些从剧场出发的工作方法，它最终的目的，是让人和人、人和地方之间的“能量”流动起来。

孙大肆又说，她有时候说话就是这样神叨叨的，艺术的好处，是把神叨叨变成可以被大家感知的东西。

那套神叨叨的“能量互动”，孙大肆在一个叫做“意游未境”的艺术项目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它的有趣之处。这是初来乍到上海的尤伦斯美术馆（UCCA Edge）在 2021 年发起的“触手计划”的一部分。和外滩美术馆一样，策展人也希望“触手”真实的上海。

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四条路线。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市民气息一方面尚有相对完整的保留，一方面因为士绅化改造不断退场。各种各样的历史重叠在一个物理空间内，冲撞出足够的多样性。“鲜活”，孙大肆说。

2021 年 11 月 28 日，神炁现形发起第一条路线行走“四川北路 – 山阴路 – 鲁迅公园”。孙大肆和张添一是这样规划的，参与者跟随发起人出发，沿着路线行走在各种街巷里弄，步道绿地，拆旧现场大家最后在一个公园停留，写下各自想到的字句共同汇集成一首歌，有时候，也会一起表演一首诗。其后的三条路线分别是 2022 年 1 月 9 日的“长乐路 – 皋兰路 – 复兴公园”、3 月 29 日的“九子公园 – 南苏州河路 – 外白渡桥”和 7 月 31 日的“定海路 – 定海桥 – 共青路 – 复兴岛公园”。因为上海封控，最后一条路线与之前的间隔格外长，而第三条行走的时间，是浦东已经封控、浦西即将开始的倒数第三天，街上大家已经开始囤货，有些店门口贴出了它们预期的关店时间。

“这几条路都是我自己之前走过、有过音乐作品的，我自己觉得有意思，愿意再带大家去走一走”，孙大肆说，“在走一走的过程中，我们想试试剧场里的互动能不能在公

共空间呈现, 因为那两年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已经进不去了, 唯有街道可以。”

后来 UCCA Edge 在这个项目的一份总结里写: “在我们规划的四条线路中, 已经可以看到市中心的市民文化悄无声息地淡出历史舞台,像是一场与旧市民文化的告别仪式。那么,新的市民文化又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城市结构更替中确立自己的身份?”

在“意游未境”之前, 孙大肆就和一群人一起走过苏州河那条路线。那次是应澎湃新闻邀请, 原本形式就是城市行走, 邀请孙大肆的理由是, 她可以带大家唱一唱外婆教的上海老童谣《摇船》。但孙大肆不愿意循规蹈矩, 她一如既往地想实现更多“能量互动”。于是在 2020 年 7 月, 一群人跟着孙大肆走苏州河沿线, 张添一准备了这条路线上每座桥的故事, 每经过一座, 就把事先录好的音频发在微信群里, 最后大家在“啤酒阿姨”落座, 一人写下一段感悟, 孙大肆现场把感悟里的字句串联起来, 有一些稍加改变, 最后合成一首歌。

你在“神炁现形”公众号里能看到这个过程的视频, 那首叫《最温柔的水鬼》的歌, 汇集了每个人文字的一小部分。视频开始的时候, 能听到孙大肆鼓励大家不要怕唱错, “把声音放出来! 但是不要哇啦哇啦, 要有中气。”然后音乐就起来了。它的第一小节是:

如果没有一点点臭味
苏州河和其他河有什么不一样
雨从河里落到天上
一只鸟吃掉一条鱼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人是有共同的灵魂的, 当他们的话变成了一段歌词的时候, 仿佛这 20 个人拥有了同一个人格。”

这 20 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背景, 有上海本地人, 也有外国人, 有文化行当的, 也有日常和文字根本不搭边的, 有男有女, 年龄各异。大家有一张合影, 因为盛夏走路又远, 脸都红扑扑的。歌成的时候, 是一个孙大肆没有感受过的瞬间。“神炁现形”这个名字就定在那天, 虽然她和张添一更早之前就有了这个主意, 但那實在是“神炁现形”的一天。

“神炁现形”的第二个字 Qi, 去声, 同“气”, 是一个古字, 意思是人自有的能量。这个名字是孙大肆取的。笼统地说, 她常常会捕捉“神炁”, 张添一是那个帮助把握“现形”的人。

外滩美术馆的邀约也发生在 2020 年。孙大肆后来在《你的家看得见东方明珠塔吗? 》的创作感受里说, “在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中, 我和上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过程, 就是 2020 年到 2022 年。

最早的时候, 她计划要找“人来疯”的人。因为邀约方叫“客堂间”, 在上海话里, 这是客厅的意思。大人在客堂间说话会客, 小孩子如果跑跳笑闹, 就会被叫做“人来疯”。孙大肆说, 她用这个意象, 其实是想结识外滩社区里那些很“灵”的人, 他们的行为、想法和表现, 或许在普通人看来“人来疯”, 但其实是有意思的、有个性的。

但实际上, 她在真正的接触过程中, 发现的是“上海市民小安稳、小乐惠、小聪明、小灵动……也许这样就很好, 上海人本来就不人来疯”。与此同时, 更大的变化冲击着这个本色, 黄浦区老城厢改造迅速推进。2021 年 12 月前后, 很多人已经搬走, 孙大肆和张添一一进小区, 大家以为她们要么是去淘旧货的, 或者是进来打听搬家状况的, 到后来, 穿着蓝褂子的疫情防控员把守在小区门口, 小区也进不去了。通常来说, 孙大肆和张添一会找一个地方, 坐下来唱歌, 别人若是有好奇心, 就会过来搭讪聊天, 有时候这样就会认识人。

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6 月之间, “神炁现形”做了一张 EP, 叫《肆陈相识》, 故事来自于这个过程里结识的四位上海人, 恰巧, 他们都姓陈。

我和孙大肆讨论“灵”, 这个词很难直译成普通话, 灵动太文气, 机灵太狡黠, 似乎什么都差一点意思。孙大肆有个理论, 是从胡适那里来的, 她说西方人认为人人有灵, 中国人认为举头三尺有神灵, 大家对灵的理解不一样。要到五四之后, 近代翻译家把灵放到了个人身体里, 一切新东西就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回事, 但我认同她说的“灵”说到底得个人主义一点。要先独立, 才会“灵”。作为一个上海人, 她一度对上海的市民文化很不懂。

“我以前对上海是半爱半恨的, 一方面觉得这里有自由的空间, 有很多可能性, 一方面又觉得这里是一个文化沙漠, 大家都是小市民, 太乐惠了, 有一些很奇怪的传统文化, 《繁

花》写得还是很透彻的, 就是那种男男女女爱恨情仇, 不是很大, 但足够支撑生活的意义, 足够有滋味。”

“比如一个上海男的老了, 回忆自己这辈子有几个女人, 赚了多少钱, 送儿女去了国外, 就这种。我觉得, 难道这就是上海的全部了吗? 或者是我认识的不够多, 这么活跃的一个城市, 确实海纳百川, 各种见怪不怪, 但同时又没啥可能性, 大家都奔着赚钱而去。”

目睹拆迁和疫情让孙大肆多少体会出了一些别的。

“我忽然发现上海的人格还是渔民。以前这里是个小渔村, 后来是繁华的大渔村, 但大家还是渔民, 只是捕鱼的方式变了, 被所谓的国际化、现代化弄得越来越异化, 其实还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 想如何才能捕到鱼的事。不管你学了多少语言, 有多少技能, 还是这样。”

所以她在新专辑发布会的空间里挂上渔网。

“我觉得我到哪里都能撞到这样一丝游魂,我是跟游魂在共情,所以一开始说很灵的人, 我已经放弃了,大家已经这么悲伤,我还要坚持去找一个灵的人去消费, Ta这样我做不到。”

拆迁后的外滩社区是一个空壳, 更多时候是粗暴的一堵墙, 就好像她一度去一个理发店老板那边理发, 有一天踩着共享单车到门口, 发现门已经被水泥灰砖砌死, 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任何活物。这样的伤感难以抵挡, 尽管就连理发店老板也跟她说过, 早晚会有这一天。

孙大肆说, 她发现这一切就像一个轮回。

就好像她的外公外婆, 当年在苏州河旁厦门路买下两间“三层阁”, 90 年代为了支持苏河改造搬到彭浦新村, 旧址造起黄浦区环卫所。而这一轮拆迁, 环卫所也将不复存在。更多社区里的人, 有的像她的外公外婆是私房的拥有者, 但占大多数的, 是 1949 年之后被政府安排到别人家里的住户。旧城改造里建筑物还会保留外壳, 但人会彻底被置换。绝大多数住在原址的人在新经济、新城市生活面前被认为没有消费力, 于是再一次, 这个区域恢复成了有消费力的人的区域, 当时被安排进来的人如今又以另一种方式被安排了出去。倒是当年自己买下房产、又让出很多房产的人, 他们觉得, 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被打发了呢……

这轮回让孙大肆感慨, 因为她发现很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不曾改变, 而她会先把那些“游魂”写到歌里——不管还有多少历史不了解, 还有多少信息没补全, 既然时光机还没有被发明, 既然无法百分百地了解人去楼空前的现场——这是她能做的, 也是这几年来她做事最大的变化。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每天都在做有趣的事情……我脑子里会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我最近在想人工智能的终极会是什么样子, 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如果说 ChatGPT 是造物主对人的终极考验……我脑子里会想着想着, 就出来一个剧本大纲什么的。

Q: 想这些的时候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 就是如何通过你可以使用的媒介和日常活动, 把这些问题的探讨带出来。光自己想的话, 问题可能是别人想过的, 也有可能陷入个人的偏颇, 所以还是要把讨论给带出来。

Q: 那困难呢?

A: 困难在于时间。你要等机缘。空间、资金的支持等等。如果没有机缘, 这些想法就只能在我脑子里存在。而且往往出现的也不一定是好机缘, 很多时候只是被消耗。但我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 因为机缘嘛。如果我是一个能活一万年的人, 我愿意这么去消耗, 来者不拒地去看看这个世界能把我带到哪里去, 但是我内心还是有我想做的事情的。

Q: 想让什么人来继续接力?

A: 阿峰, 他以前在贵州山里开了一家青年旅舍, 很多去贵州演出的音乐人都会去那里, 如果乐队票卖得不好, 阿峰就不收他们钱。三年疫情之后他卖掉所有的东西, 住到一辆改造过的金杯里, 还弄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比我厉害的地方。我做不到。而且我好奇的是他接下来要怎么接触社会, 怎么去生活。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自己怯懦而且不承认的地方, 而阿峰是承认的, 但他内心又没有什么恐惧, 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太多。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Fikri Rasyid](#) on Unsplash

专栏

042 曾嘉慧 你有没有想过， 流亡意味着什么？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很短的旅程，
让我整个人被彻底震动了。

曾嘉慧是 1992 年生人。在她 27 岁的时候，也就是 2019 年，她开始追踪一位叫 Djawoto 的、已经去世 26 年的印尼知识分子在世上的痕迹，当时她计划创作一部 Djawoto 后半生流亡史纪录片，还有一组摄影，通过他人的叙述、遗留材料和历史记载还原 Djawoto 的后半生。

这个计划一直牵引她走到现在。最近她的博士论文开题，研究中国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镍矿企业对当地的影响。“从资源边疆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钱是怎么飞到了这样的地方，引发了一场像工业革命的场景。”

这个研究看似和当年那份创作计划没有关联，但其实是她对印尼另一面的探索。在过去的四年乃至现在，印尼流亡者从未离开过她。理解他们的经历、决定以及背后的情感，让曾嘉慧沉浸式地进入印尼这个国家，如果矿业人类学研究是一种更当下的进入，那么和流亡者的交流则会让她进入 1965 年印尼“九三〇屠杀事件”之后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后续涉及的全球各地现场。

曾嘉慧试图触摸的是一种人类状态，只不过它以印尼流亡者的身份被表达出来。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时空场景里出现，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和社会状态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这也是为何她在聊天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流亡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曾嘉慧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同时兼具了“他者”的观察思考视角，以及近似于亲历者的共情能力。她并没有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而是在思考一种生活的可能。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流亡”这样的字眼只是在文学或者历史文本里出现的概念，如

何在具体的生活里去理解它，即便是最轻微的触碰，也需要相当的勇气。

以下是曾嘉慧的口述，谈话顺序有调整。

我曾经给一个超级富豪做美术馆策划，在北京市中心。我工作的时候有很多谜团，项目迟迟没有开展，一直在等待和想象，直到泡汤。我在 2019 年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公司，获得了一点点补贴，然后当时又拿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就特别痴迷地投入到一个电影计划当中，寻找 Djawoto，后来正式的片名是《没音没字歌》(Only the Deaf Can Hear Well)，取自历史学家 Rudolf Mrazek 写印尼大文豪 Pramoedya Ananta Toer 的一篇文章，文章特别动人。

我是非常偶然地知道 Djawoto 的，他是 1965 年之前，就是“印尼 9·30 政变”之前是印尼外交官。这个人的前半生很有意思。他做过记者。在印尼，记者变成政治家或活动家是一个常见的 pattern，因为最早在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社会里有反抗意识，想要去唤醒民众的一批人，绝大部分是记者。当时就很想拍一个跟 Djawoto 有关的纪录片，他在 1965 年反共屠杀后十几年流亡在中国，后来去了荷兰，在荷兰去世。

从他开始，我了解到有一批这样的流亡者在 1965 年后流亡中国。2019 年，因为想要拍摄这样一个流亡者群体，我先去了巴黎市中心的印度尼西亚餐厅 (Indonesia Restaurants)，然后去荷兰，再到印尼，这样的一个很短的旅程，让我整个人被彻底震动了。

这些流亡者离开了中国之后——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当时法国移民政策非常开放友好，这是为什么一部分人会选法国，即使他们在法国没什么朋友。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入境法国的时候，海关官员给他开了一支香槟，庆祝他来到自由世界。他们来到法国的时候，已经四五十多岁了，完全不符合这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了，能做什么？开餐厅是一个求生选择。同时餐厅特别好的一点是有一个空间作为活动基地。

所以他们除了给巴黎人提供好吃的印尼餐，同时也是要成为一个活动场所，成为一个聚集场所，成为一个联络站。他们当时一直在做流亡者通讯，发给整个欧洲的流亡群体，自己印报纸，自己写一些关于印尼时事的评论，然后还有一些流亡者群体内部的消息。

关于流亡这件事，我在接触之前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因为当时觉得离自己很远。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性的东西来促进思考的人。如果只是读一些东西，或者想象一些东西，(就不太行)，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讲述了亲身经验，然后我被感染到了，我会去想很久，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也有关系。

不光是这些流亡者经历了什么，也不光是他们意识形态部分，而是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是怎么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我发现我必须要对印尼的背景、族群、宗教、地方、历史有更多了解。2019 年之后，我觉得自己要不断重访这个地方，不然的话你也搞不懂他们这些人跟我说的那些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看起来是明白，但其实没有明白。

我 2019 年就开始学印尼语了，虽然很多人都说印尼语是东南亚最好学的语言，但对于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一直到现在才将将过关，四年过去了。我觉得要找一个机会更深入地学习这个地方，所以才申请了后来的博士项目。其实从 2019 年开始，我对他们的故事和流亡这个状态非常感兴趣，这个题目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

比如说我这次在雅加达见到一个流亡群体里的老先生 Martin Aleida——我们现在以朋友的关系在互动，而不是说我需要听你的故事采访，关系轻松了很多——他谈到对荷兰印尼流亡群体的一些批评。后来从他的批评当中，我就想到一件事儿，“9·30 大屠杀”2015 年在荷兰海牙有一次国际法庭公审，当时需要很多的目击证人。很多已经获得了荷兰国籍的印尼流亡者，明明相对安全，他们都是躲在帘幕后出席，反而是这位朋友，一位 80 岁左右的作家，以真名、没戴口罩，直面镜头出席了那场审判，结束后他还要回到雅加达继续生活。

他的批评就是，久居荷兰的流亡者已经无法理解现在的变化了，他们永远活在两种时间当中，一种是新土地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故土时间，对他们来说，即使每天阅读新闻，也不见得真的能理解和感受到故土的变化。印尼在 1998 年民主化改革后，社会上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则仍然活在 1965 年的恐惧当中。

虽然 1998 年之后社会空间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真正去促使社会、公众承认这件事情，承认它旷日持久的恐怖，承认上百万家庭的创伤，还有怎么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和官方的正确记忆对抗，是 1965 年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因为要拍摄流亡者，我幸运地和 1965 作为文化群体建立了联系，其中有记者、作家、艺术家。他们在讲述，在记录，在利用一切公共的机会，去改写这段官方历史。

因为好几代人的持续工作，这场文化运动获得了相当的成效。最近印尼政府公开承认

了 1965 年的这场暴行,当然另一方面也没有那么乐观,当时的一些知名刽子手,人们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名字,现在这些人仍然安然无恙,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承认之前的这场屠杀,已经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我和 1965 群体产生的友谊,也让我觉得有责任去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故事,而不只是把他们故事当做作品的一部分。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开放接纳了我,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为什么要把我最深处的故事讲给陌生人听。他们知道必须要在死之前把它讲出来,不然这些事情就会被遗忘。

有一次去拜访一个老人,他在自己家建了个图书馆,他家很小,政府公租房,收满了各种各样跟 1965 相关的图书文件,什么语言的都有。他也是一个独居老人。社群一定要让我去见他,让我去读那些书。我当时就懵了,我怎么看得懂,他们把很多材料给我,我只能拍照,期待有一天可以读,他们为了帮助我完成采访,甚至找了一家人来陪我翻译。现在看当时视频的截图,我整个人是懵的,我其实是被他们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

前阵子看到消息,这个老先生刚刚去世了,采访我现在还没有去重听,因为在另外一个硬盘里,没有带过来。但现在我能够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了。

我还去过荷兰的一个小城 Zeist,在阿姆斯特丹边上,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我去拜访一位女士,她叫 Tatiana,是 1965 年印尼共某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女儿,父亲被杀之后,她先在中国流亡一段时间,觉得中国实在是很难受,因为当时搞文革,一天到晚就是政治教育,她也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去了,就想离开中国。

那想要去哪里?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去欧洲,法国、荷兰……就是去西方世界,然后她偏不,她觉得当时已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中国了,就说要去一个真正革命的地方,然后跟爱人一起去了古巴,在哈瓦那大学教书。

在哈瓦那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其实她跟印尼的家庭还有联系。因为印尼所有的政治犯家庭,身份证上面都会写“前政治犯”(ex tapol),这样的身份证就很难获得任何正式工作,经济非常困难。她的家庭希望她能够给予一些经济支持,她肯定要负责任,因为家庭是对印尼人很重要的,哪怕最叛逆的孩子也会尽到对家庭的经济责任。

她当时在哈瓦那大学教书。为了赚钱,她搞到了签证,暑假去巴黎打工。因为很短,可能是旅游签证过去打黑工。她去做女佣。

去到一个人家,发现那人家里有很多清洁设备,她根本就不会用,因为没见过。那人是个画家,画巴黎街头观光明信片的。她战战兢兢打扫完之后,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类似于称赞一下他的作品。画家很惊讶,一个女佣还能有这样的评论,就把她请到工作室,请她看那些作品。他们就聊起来。

我问她,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谁?她说没有,当然不会了!然后就离开了。她把暑假挣的钱全部寄回了印尼,对于印尼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她非常高兴,又回到哈瓦那。后来她移居了荷兰。

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想象那个场景,特别震动。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法语结结巴巴的日结女佣,背后是那样风起云涌的历史。后来我又见过几次 Tatiana,我特别想和她维系女性友谊,可能因为我们聊过不少她和“同志们”的八卦,她是唯一一个还会热情地唱中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流亡者对中国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我不是说 Tatiana 的很美好——她混杂了对领袖的崇拜,因为她当时非常年轻,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她离开中国的时间也相对较早。

Tatiana 独居,她家里基本上所有的家具都是捡来的,状况都还蛮好的。她说,你看,这就是资本主义。它会迫使你不停淘汰足够好的东西,这些完全是可以用的。她住的那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在中产甚至中产以上的街区,只有她那一排房子是政府提供的联排公屋。

她家有非常多的照片。因为当时我已经认识了其他一些流亡者,所以我也认出了一些照片上的人,那些照片贴在厕所门背后。我上厕所时看着那些照片就百感交集。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印尼共的后代——女性后代——的聚会照片,有吃饭的,有唱歌的。当时就觉得,她们的生活世界是我特别想明白,不只是对她们经历了什么的事件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她们的情感,那些事情发生之后,她们是怎么变化和涌动的。

“前线”是漂移的,人们的处境也是漂移的,有一些人可以一直跟着“前线”移动,而有一些人却被时间凝固在那里。

我一直都非常想拜访,可是至今还没有得到机会的一个人,是其时间没有被流亡胶住、随着印尼的发展变化自己阵线的人。这个人后来和 1965 群体里关系就不太好了。他是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在巴黎有非常中产的生活之后,突然有一天就离开了自己的家,飞回了加里曼丹,和一个 Facebook 粉丝生活在一起,做一些原住民教育相关的工作。

他很有争议——离弃婚姻、离弃社群——但是我对这个人一直是好奇的。

结束了美术馆三年工作时,我特别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而工作。那个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 proposal,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才能实现(来印尼的想法),之后是印尼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次来印尼,回想起三年前扛着相机和三脚架在烈日下走街串巷,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比那个时候更有能力,更理解语境,也认识更多人,但是我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热情或者体力,几个小时地走在大街小巷。印尼基本没有人走路的。这是一个几乎不能走路的国家,很少有人行道。经常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马路中间。

我特别不喜欢去思考自己是谁,或者要成为谁,我只是一个通道。有时会羡慕一些清楚知道自己是谁的朋友,有时也害怕他们那个过于热烈的自我,我没有,现在我也必须对自己承认。

2019 年时,有朋友好像看到了我的未来似的,他冷不丁对我说过一句话: be an Indonesian, don't be an Indonesianist. 成为一个印尼人,不要成为一个印尼学家。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跟我说,这句话到现在都对我有影响。

很多研究印尼的人是先学了语言,在不同的外语学校。很少有我这种一句印尼话都不会讲,刚来印尼就认识了这么多生命轨迹如此奇绝的人,被这种丰富度所震撼、所感动,觉得要做这件事。很多印尼语流利的人在这边可能很多年也不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他们也不感兴趣。我进入印尼的路径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带给我的影响可能也会持续很多年。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今年决定不再使用“有趣”这个词。它有点被滥用。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有趣,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是很痛苦的,或者是对他们来说是特别日常的。在田野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个外面的人说“这样的生活或者东西好有趣”,当时会觉得 ta 说有趣是因为根本不生活在这里。

Q: 最近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 问题太多了,问题永远比答案多。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 troublemaker……可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人口密集,卡车极多的工业区骑摩托车。

我越了解印尼,越觉得我无法真正成为印尼人。我太“中国”了。比如我好像还是很喜欢工作,不太可以每天无所事事。在印尼,70% 的工作都是非正式就业,有很多形态,自己做个小生意,有时候好几个人的工作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等待,时间是大块大块亟待填满的,这是第三世界普遍就业不充分的情况,在 Guy Standing 大谈 precariat 之前已经是常态。而我更适应正式就业环境里的人的时间,比如时间是分段的,有时间点的,这可能也是一种特权。宏观来说,印尼人的时间观更加基于祈祷和节庆。我经历了无数次从伊莎到 subuh 的闲聊讲故事,讲故事(cerita)特别重要,任何好的、坏的经历都会变成故事,你的故事又变成其他人的故事。有时候坐在那里听一晚,感觉像看了一篇特别好的小说。这样的环境你第一天会特别放松,特别欣喜,但是老这样,我好像会感到焦虑。

我最近很想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写点什么,普遍不充分就业、对时间的认识、教育的高度私有化、大人物/老百姓、聪明人/笨人的二元分类……中国企业喜欢说印尼人懒,这其实不是懒惰还是勤奋的问题,这是对时间、教育、何为工作、工作的意义等等概念的定义问题。但我自己的时间好像还是分段的更加舒服一些。

Q: 希望找谁来接力?

A: 想提名格布。我和她还没见过面,网上认识了很长时间,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很感兴趣。她做过一系列东南亚纪录片,在我看来她是野生的东南亚人,自己开路自己走,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Bozhin Karaivanov](#) on Unsplash

专栏

043 荷花 在广州，做一个马路裁缝

杨樱 | 接力访问

现在城管管得严，马路生意不可维持，
即便如此，她还是说自己没什么烦心事。

荷花在广州的生活最早是靠一把四块钱的剪刀撑起来的。那是两年前，她第二次尝试在广州落脚。第一次要再往前推一年，那时候她在站前路附近开了个店面，做她的裁缝老本行。这地点的选择没什么讲究，她在广州谁都不认识，随便打听，别人也就随便告诉她，那里的租金可能便宜。但这店没开多久，荷花生病，不得不回了浙江老家。

荷花是 1966 年生的，理论上到了退休的年纪，但她没有和什么社会福利保障沾边过，一直在做裁缝，也谈不上退休。在站前路开店的时候，她偶然来晓港这边批布，才发现这里有个碎布市场，于是再来广州，她就在附近找了个住处。

我到荷花家时差不多下午一点，她还没有吃饭，刚给连衣裙锁完扣眼。来接我的时候笑嘻嘻，一边走一边拉裙子后面的拉链，说早上干活太投入，连拉链都忘了拉好。她那天穿了一件绛紫红的短袖上衣，黑色短裙，有点灯笼款的样子，都是自己做的。什么都自己做，内裤也是，她说。

家就是荷花的工作室。其实从布局上来说，更像是在做衣服的地方里挤出来一点点家的功能。吃饭洗澡睡觉之类的事情对荷花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不到 10 平方米的房间，最亮堂宽敞的地方放着缝纫机、人台和各种工具，一块布隔开生活区，灶台贴窗，另一边靠墙则是一张上下铺单人床，上铺算是杂物架。吃饭一张折叠桌，已经支起来，占满了大半个房间。这个屋子最贵的物件是一台空调，荷花孩子给买的；但最被妥善对待的是衣服，顾客定做的都穿在人台上，她自己的七八件衣服，都用防尘套套好挂在高处，这样不会被老鼠咬到。房子是一排石棉瓦平房中的一间。

进门的前五分钟都在聊荷花刚做好的四条连衣裙。很夏天的颜色，条纹、波点、纯白机绣棉布，顾客定的，一共 800 元。荷花价格给得中肯，“如果去海印桥要做贵得多”。那边到现在差不多运转了 40 年，相当于上海的十六铺，留得住的都是做了十来年的老铺，

客源稳定，溢价也高。荷花盘算过自己的生意怎么做，她初来乍到，也上了年纪，去海印桥大概率是吃不开的，倒是晓港这边的碎布市场，只有卖布的摊位店铺，缺个裁剪，她正好可以补上。来这里买布的客人图个便宜，经常顺手就想做点什么，她也可以给加工了。接活的量自己可以控制，也不会过于辛苦。

这就是她在网上买那把四块钱剪刀之前想的事情。此前她也从来没有干过在马路边帮人现场裁衣的事情。“四块钱的剪刀可以干嘛？什么都干不了！”她这么跟我说。但她那时候只能买这个价钱的剪刀。到碎布市场的第一天，赚了五六十，这才买了一把正式的裁缝剪刀。别的都没变，还是一块一米长的木板架在椅子上做裁剪台，一块泡沫广告牌翻过来，上面写着“承接裁剪、量身定做”和她的手机号码。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市场没根没底，人家出价多少钱都给做，如此揽下第一批顾客。

这就是苗子最早看见她的样子。她们相识的原因，是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服装设计师、偶尔的碎布零售小贩苗子当天在市场卖布，却连一把剪刀都没有，跑过去问对面摆摊的荷花借剪刀。那是荷花 50 块重金买下的新剪刀上手第一天，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磕出豁口，就再也沒用了，她有点不舍得。

“我要是不借，我心里过不去，我是有信仰的人。要帮助别人，没有人帮助的人更要帮助她。所以我心疼我也借了，就让她小心一点。就这样认识了。”

苗子对当天的回忆则是：“我就跑到对面，说姐，能不能帮借一下你的剪刀。她当时还有点不友好，说摔坏了你要赔——其实那把剪刀在她心目中，可能有点像我跑去跟你借电脑那种——但她还是借给我。我当然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做衣服的，我知道她肯借那么好的一把剪刀给我，我才不管她说什么难听的话，因为我知道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友好的，我就跟她建立关系了。”

她实在佩服荷花街头制衣的能力，“简直和行为艺术一样”，她之前接触的同学或者同行，无不是开工之前先买好各种不菲的设备工具，至少，需要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当时很看不惯她怎么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这么便宜，但首先荷花有一套便宜的处理方法。就是她能够很快剪出一条裤子——这个是没有谁能比得过的，就美院服装设计毕业的人都没办法做到——他完全不用打版，直接剪刀在布上剪。然后她就只做那种裤子，而且会建议顾客做简单的款，这样就只收 10 块钱。”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又是定做又是量身，价格又低过。广州是那种工厂特别多的地方，到处都是尾货清仓，即便这样，环卫工人什么的都不去买那种清仓裤子，都去找荷花另做。”

苗子后来发起一个叫做“衣疗暴走”的付费活动，内容包括体验广州布料市场、一对一的半天制衣体验，以及在一个空间内免费使用缝纫设备一个月。除此之外，她还计划筹划一个衣疗剧团。这个活动的背后，是苗子希望帮助荷花提高接活的溢价空间和工作条件，也可以借助这样的途径，让年轻人可以做自己设计的衣服。

“当时我也没钱。如果有钱的话，我直接找个店铺，先把环境搞起来。”“但荷花觉得我的计划不会持久，后来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她自己一步一步走，哪怕有时候看上去还是挺落魄的，但一步步在改善。她是很认可自己那条路的。”

我看到的那四条连衣裙，就是从街头制衣一路发展过来的成果。后来荷花认识了一些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顾客还有一些希望掌握剪裁缝纫技巧的人过来向她学习技术，可以单次付钱给她，也可以一次性付一笔钱，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比普通的缝纫培训便宜得多。她后来还跑到距离广州一千多公里外的揭阳，帮助苗子给女工做缝纫培训。“荷花比我妈还叫得动，我妈身体很好，都很难跨越 1000 多公里来找我。”

我问荷花，为什么愿意和苗子一起做事。她又说了和借剪刀一样的理由：“没有人帮助的人，更要去帮助他们。”“市面上的人，说是利益才有来往，但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有技术和时间，这都是我可以付出的，也是我可以帮到别人的。”

荷花有信仰是近两年的事，但是她很早就知道基督教，因为老家教徒很多。以为她与苗子的合作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好奇心，这固然有一点——荷花把苗子看作是“创意时尚”那类人——但更多的，是她认为有义务帮助一个看起来没什么人帮助她的苗子，就好像借那把剪刀一样。

如果更年轻，荷花或许会接那种计件的活，她最早做的就是这个。那是 1980 年代末，荷花的孩子出生之前，她还可以发狠干活赚点钱。和很多妈妈一样，她的人生是由孩子作为分割线的：孩子出生、孩子读书、孩子工作。

荷花的缝纫技术是高中毕业之后学的，从袖套做起。后来有温州人在青岛开厂，做皮衣，荷花去打工，做了两个下半年。在这两个下半年里，每天从早上 9 点开始，除了扒拉几口饭的时间，一直做到晚上 12 点，就此锻炼了手速和车工技术。孩子出生之后，荷

花留在老家，做中学教师的老公也希望可以多赚一点钱，于是停薪留职，和荷花一起去了上海。

俩人最早在上海做海绵垫肩的加工，荷花负责制作，老公负责出货。这生意并不好做，他们没什么话语权，也不擅长商业技巧，很多订单都成了坏账，一直到老公离开上海，还有很多账款没有收回来。有一度他们把孩子接到上海，三口人连一百元的花销都拿不出来。在此之前，因为妹夫在上海卖菜，荷花夫妇还试过种大棚蔬菜，大棚自己搭建，没有经验，大风一吹就坏了。

那是 1990 年代末，荷花一家住在上海三林，孩子在凌兆小学读书。她对上海有两个美好记忆，一个是有一种叫矮脚青的青菜又便宜又好吃，后来她再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另一个是，从未读过幼儿园的孩子在上海上小学就十分上道，有一次考了双百分，得意到当场笑出来，被老师看出骄傲，让他一直保持才值得这样笑。荷花觉得厉害，“上海老师就是不一样”——说归说，听得出来，荷花得意的还是孩子。

荷花是他们家最后离开上海的人，她后来在上海开了一家裁缝店，就在凌兆新村里租的门面，一直开到收完海绵垫肩的尾款，才回到老家，在别人的店里打工，同时照顾上学的孩子。

孩子是荷花的骄傲。成绩在老家亲戚里有口皆碑，最后在广州找了工作，具体是什么荷花说不清楚，只说是学物理的。这已经要到 2020 年，孩子在广州工作 2 年之后，她从老家来广州谋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照顾孩子，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家里被骗负债，老公说，债务他来管，让荷花和孩子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些事情苗子说过一些，她说荷花是一个很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同时又特别热情。邀请荷花[做接力访问的静远](#)觉得，荷花和苗子之间的互动本身就很让人好奇，至于荷花的生活，她其实了解得不多，因为荷花也不太跟人讲。并不是避讳隐私，而是觉得别人会同情她，帮助她，这些人情她都要还。但有顾客或者朋友来看她，她又总是要忙一桌子菜。就好像我提到她老家有好吃的麦饼。她很认真地说，我会做很好吃的麦饼，你晚上来，麦饼没办法现场做，我现在准备，你晚上来吃。

后来她用一辆小电瓶车带我去碎布市场，从家里骑过去不到 2 公里。市场在晓港地铁站对面，说是市场，其实有一半都是巷子里的流动摊位，只有一排是门面房。流动摊位的生意最好，穿着吊带裙、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时髦女青年，和背着双肩大包的中年阿姨一起在布堆里挑挑拣拣，很多人手臂上都搭一条一条挑中的布料。

荷花指着路边公共厕所前的位置说，这就是她原来摆摊的地方。她一出现在市场，就有好多人过来打招呼。管垃圾站的大姐从一个门里拿出一小盒苹果，说是别人带给荷花的。荷花一边开包装，一边听大姐说现在城管严厉，不让随便摆摊了，只能打打游击。苹果一共 8 个，她到处给人分。又指着在买布的一个姑娘身上的裙子说，那时候也给苗子她们做过这样的衣服，但是后背款式要变一变。不能摆摊是个麻烦，但现在好多人都知道她的手机号码，如果要找她做衣服，就给她打电话。

Q: 你最近在忙的事情是什么？

A: 就这四件衣服，我答应顾客的，因为前几天回过一次家，这几天要给她做好。她手臂特别粗，只能订做，买的话没有那么合适。

Q: 现在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A: 我心里面没有烦恼，最烦恼的事情是我小孩没有结婚，但是反正和他说也没有用，我就和神说。生活上我只要身体好，吃吃喝喝很容易，我生活费 400 多块，赚个 1000 块钱就过得去。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归不是你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荷花为化名）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九，2023.05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